

博 士 學 位 論 文

韓國華人華文文學研究

— 以韓國華人身份認同為中心

梁 楠

釜山大學校 大學院

中語中文學科

2018年 8月

韩国华人华文文学研究

이 논문을 문학박사 학위논문으로 제출함

양 난

부산대학교 대학원

중어중문학과

지도교수 김혜준
공동지도교수李晓虹

양난의 문학박사 학위논문을 인준함

2018년 7월 3일

위원장
위원
위원
위원
위원

김영재
박민수
錢錦
李曉虹
김혜준



< 目 录 >

中文摘要	iii
第 1 章 绪论：韩国华人的发声 — 韩国华人华文文学	1
第 1 节 韩国华人华文文学的定义与范畴	1
第 2 节 研究目的与方法	9
第 2 章 韩国华人华文文学的创作情况	22
第 1 节 韩国华人华文散文的创作情况	26
1. 韩华华文杂文的创作情况	26
2. 韩华华文哲理散文的创作情况	28
3. 韩华华文游记的创作情况	29
4. 韩华华文随笔的创作情况	31
5. 韩华华文散文集的创作情况	34
第 2 节 韩国华人华文诗歌的创作情况	36
1. 韩华华文抒情诗的创作情况	36
2. 韩华华文叙事诗的创作情况	39
3. 韩华华文拟古派诗的创作情况	41
4. 韩华华文现代派诗的创作情况	42
5. 韩华华文诗集的创作情况	43
第 3 节 韩国华人华文其他文类的创作情况	46
1. 韩华华文评论的创作情况	46
2. 韩华华文小说的创作情况	51

第 3 章 韩国华人华文文学的“离散”与“反离散”	58
第 1 节 “排斥”：“大国奴”与“高丽棒子”	58
1. 羡慕与恐怖两面性心理下的“排斥”	58
2. 文化想象意义上的“排斥”	61
3. 生存意义上的“排斥”	67
第 2 节 “乡愁”：“落叶归根”还是“落地生根”	73
1. 寄托于故乡的“乡愁”	73
2. 建立在在地化之上的“乡愁”	74
3. 建立在想象或再创意义上的“乡愁”	82
第 4 章 韩国华人华文文学的跨国性	87
第 1 节 韩国华人华文文学中出现的混种性	87
1. 韩华华文文学中出现的口头语上的混种	88
2. 韩华华文文学中出现的书面语上的混种	90
3. 韩华华文文学中出现的文化上的混种	97
第 2 节 韩国华人华文文学中出现的在地化	106
1. 韩华华文小说对在地化重要性的暗示	106
2. 韩华华文其他文类作品中所体现的在地化	114
第 5 章 结 论：韩国华人对身份认同的发声	120
[参考文献]	131
초 号(韩文摘要)	142

韩国华人华文文学研究

— 以韩国华人身份认同为中心

梁楠

釜山大学校 大学院 中语中文学科

中文摘要

全世界范围内的华人，已经形成一个庞大的跨国移居者群体。在这种情况下，学界有必要突破既存概念的框囿，重新思考和认识华人，尤其是韩国华人的问题。作为跨国移居者群体一部分的华人，以及华人群体一个组成部分的韩国华人的称谓，就成为首先需要明确的问题。本文所论述的韩国华人(韩华)，是指长期生活在韩国地区的汉族，以及被汉族同化或在文化上具有一体性的人。韩国华人使用华文创作的文学作品就是韩国华人华文文学(韩华华文文学)。再鉴于1992年以前移居韩国的华人，与1992年以后移居韩国的华人在性质上的不同，进一步以1992年为分界，将韩华划分为先迁韩华和后迁韩华。另外，将先迁韩华中由韩国再迁往其他国家/地区的群体，称为再迁韩华。先迁韩华、再迁韩华、后迁韩华使用华文创作的文学分别称为先迁韩华华文文学、再迁韩华华文文学、后迁韩华华文文学，属于韩华华文文学的组成部分，均被视为本文的研究范畴。

为了打破目前有关韩华华文文学研究的硕士及博士学位论文处于零状态的现况，笔者将在本文更加详细更加系统地考察韩华华文文学的具体情况。首先从散文、诗歌、小说以及其他文类着手，对韩华华文文学情况做出整体分析，并在此基础上，针对每个文学体裁中的代表作者及作品进行重点分析。其次，在对韩华华文文学情况做出综合论述的基础上，分别从不同角度提炼出先迁韩华华文文学、再迁韩华华文文学与后迁韩华华文文学中出现的特征，并在各自独特性的基础上找出共性。最终通过韩华华文文学考察作为跨国移居者的韩华所形成的新型文化身份认同。

早期韩华在移居地韩国所处的独特社会地位，使韩华与韩国社会形成了一种特殊的关系，因而韩华华文文学具有了不同于其他地区华人华文文学的独特特征。这些独特性主要体现在韩华华文文学中出现的“排斥”具有相互性，并且韩华所感到的“排斥”存在一种特殊的文化

想象内涵。早期韩华在清国政府的庇护下，以“大国国民”傲慢姿态的登场，使得韩华移居韩国的历史，从一开始就伴随着韩国人既羡慕又反感的两面性情绪。当地人对移居者的排斥是普遍存在于世界各地的现象。而韩华在韩国社会所感受到的“排斥”就因为韩华与韩国社会的特殊关系，而具有了相互性特征。再到韩国的近代化促进期，韩国华人大多以苦力身份出现，在韩国社会又成为“野蛮”与“无知”的象征。“掌柜”、“王书房”成为先迁韩华的代名词，先迁韩华被想象成落后、无知、贪财、吝啬的守财奴形象。

韩华在人口数量和人口特征上存在的独特性，以及韩华同时受到韩国文化、中国大陆文化、台湾文化间穿插交错的影响，使韩华华文文学体现出不同于其他地区华人华文文学的独特特征。由此产生的独特性，主要体现在韩华华文文学中出现的与众不同的混种性上。韩华华文文学中体现出韩华在口头语上自创了属于自己的语言——“韩华汉语”：一方面“韩华汉语”使先迁韩华觉得语言似乎是一道无法逾越的厚障壁，隔在先迁韩华与故乡人之间；另一方面，又从“韩华汉语”中感到了先迁韩华的凝聚力。后迁韩华移居韩国的时间仅有二十几年，又在中国大陆充分接受了汉语/普通话教育，即使如此，在后迁韩华的口头语中也已经开始出现混种现象。韩华华文文学中体现出韩华在书面语上形成的特殊混种现象：具体表现在他们从事华文文学创作时，混杂使用自创性的韩语直接音译词汇，以及创作中的一些表达方式和思考方式上。韩华华文文学中体现出韩华的混种性身份认同：先迁韩华承认自己以中国人的身份生存在韩国社会，却将自己与中国大陆的中国人相区分，与短暂往来韩国的商人游客相区分。同时他们积极地进行在地化实践，努力使自己成为韩国社会的一部分，渴望得到韩国社会的承认。后迁韩华选择往返韩中两地的双重居住形式，并通过模仿等形式积极进行在地化实践，在此过程中形成了混种性身份认同。

韩华华文文学中所体现的这种混种性身份认同，意味着韩华已经具有多重所属，这些所属也已经不像拼接在一起的碎片那样容易被分离，而是互相糅杂融合在一起，难以再分割开来。在当今这个跨国移居者与日俱增的现实情况下，对这种新型身份认同的重新认识，已经成为整个人类共同面对的课题。本文希望通过整理韩华华文文学独特性的整理，对于更加完整的理解华人华文文学的特征上，起到一定的贡献意义；通过强调韩华华文文学中所体现的韩华语言混种性与文化混种性，在重新思考中国文学的概念和范畴问题上，起到一定的启发意义；通过强调韩华华文文学中所体现的混种性身份认同，在呼吁人类认识新型身份认同的必要性上，可以发挥微薄之力。

第 1 章 绪论：韩国华人的发声 — 韩国华人华文文学

全世界范围内的跨国人口移动现象时至今日仍然方兴未艾，这种跨国移居现象使既往的一些概念与认识随之改变。比如“华人”的概念：19世纪以来主要指汉族，而到了20世纪以后在广义上不仅包括汉族，还包括被汉族同化或在文化上与汉族文化具有一体性的人，另外在华人/洋人的区分上又具有了指代中国国民的意义。今天所谓的华人大多数情况下沿用20世纪的概念，但特别是指其中长期生活在中国以外地区的汉族以及被汉族同化或在文化上与汉族文化具有一体性的人。在此意义上，韩国华人就指代长期生活在韩国地区的汉族以及被汉族同化或在文化上与汉族文化具有一体性的人。¹⁾

第 1 节 韩国华人华文文学的定义与范畴

本节首先想阐明本文选择使用“韩国华人”，而非“韩国华侨”表述的理由，继而对韩国华人华文文学的定义加以界定。其次根据韩国华人移居历史上的几次重大人口构成上的变化，再具体将韩国华人华文文学划分子集，进一步明确本文的研究范畴。

在韩国，人们更习惯将移居韩国的中国人称为“韩国华侨”。除了极少数韩国学者以外，大部分学者也都习惯在学术论文中使用“韩国华侨”这一称谓。“华侨”这一表述在韩国可以理解为韩国人的一种习惯用语。换句话说，韩国人在使用“华侨”这一表述指代1992年以前移居韩国的华人，是因为在当时韩国人对“华人”这一表述不是很熟悉。再加上1992年以后移居韩国的华人从居住时间上来看还比较短，从身份上来看留学生或者短期滞留者占有较大比重，而真正的长期居住者人口不是很多，因此韩国人尚未意识到区别表述两个韩华群体的必要性。

根据中国国务院侨办侨务干部学校编著的《华侨华人概述》所说，华侨(或称“旅外华侨”)，是指定居外国的中国公民；华人(或称“外籍华人”)，是指华侨或其后裔中已加入、取得住在国国籍者。并且认为“华侨”一词的使用始于晚清时期，1883年郑观应在《稟北洋通商大使李傅相为招商局与怡和、太合订立合同》中，使用“华侨”这一表述，再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经章炳麟、孙中山等同盟会人士的广泛使用，“华侨”成为“海外爱国华人”的代名词。而“华人”一词，虽然早在中国古代即常被用作华侨的称呼，但基于国籍身份的定义，则是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才出现。²⁾

1) 以上论述是在金惠俊·梁楠，〈韩国华人华文文学初探〉，《中国语文论丛》Vol.55，首尔：中国语文研究会，2011，p. 323的基础上进行修改后的内容。

2) 参考国务院侨办侨务干部学校编著，《华侨华人概述》，北京：九州出版社，2005，pp. 1-2。

华人学者王赓武也认为“华人”或“华侨”一词并非一开始就是指代居住海外中国国民的称谓。根据王赓武的考证，从十九世纪上半叶开始，较多使用“华人”一词来指代海外华人。官方对于“华侨”称呼的使用，始于《光绪东华录》1904年的外务部奏。民间对于“华侨”称呼的使用时间尚难断定，但是在1903年5月章炳麟的《革命歌》中称海外华人为“华侨”，呼吁华侨应把富贵视如浮云，投身到革命的队伍，推翻清朝，建立民国。“华侨”字眼的使用被蒙上了一层强烈的政治色彩。此后“华侨”的使用曾一时出现普遍化趋势，这一趋势延续到1955年的万隆会议而告终。之后“华人”又重新取代了“华侨”的称谓，“华侨”时代已成为历史陈迹，又回复到“华人”时代。³⁾

从王赓武的考证上不难看出，在指代居住海外中国人之称谓的意义上，不仅在出现时间上“华侨”要晚于“华人”，而且在使用时间上“华侨”也要短于“华人”，甚至自1955年的万隆会议之后，已经出现“华人”取代“华侨”，重新回复“华人”时代的景象。另外，按照1950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东南亚各国签订的条约，东南亚各国华人必须在中国国籍与当地国籍中做出选择，其中90%以上的华人都选择了当地国籍。因此，实际上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法的规定，属于华侨的人口还不到全世界华人人口的10%。

不管“华侨”这一表述被使用的时间始于何时，“华人”和“华侨”表述被使用的时间孰长孰短，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法的规定，“华人”和“华侨”在人口数量上孰多孰少，“华侨”这一表述的再登场，就象征着中国政府看待海外居住中国人立场的变化。即，表示中国政府开始关注海外居住华人在政治、经济方面的利用价值。⁴⁾“华侨”从被赋予指代海外中国国民意义开始，就带有强烈的政治色彩，时至今日，“华侨”被赋予的政治色彩似乎仍然保存，韩国也有学者批判“华侨”这一称谓本身就存在着中国偏向的政治属性⁵⁾。甚至还有华人学者认为中国政府有效且持续地播撒“海外华侨”此一具意识形态的身份认同，是在利用他们在异地遭受种族歧视与其他形式的歧视，将这些歧视有效转化成有利中国的远距民族主义，让海外华侨们能永远效忠中国。⁶⁾在这种情况下，从“华人”与“华侨”称谓的使用问题，再到“韩国华侨”与“韩国华人”称谓的使用问题，我们不得不在综观整个世界范围内的跨国移居局面下去重新思考，慎重对待。

在中国大陆学界也有使用“华人华侨”连用表述的现象，但其实这是东南亚地区华人学者最为反对的提法。他们认为最不可取的就是将华侨和华人联接起来使用。东南亚地区的华人学者反对华人与华侨连用的理由大概有以下几点原因：首先，中国政府将各种各样意指商

3) 以上内容参考王赓武，《王赓武自选集》，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2，pp. 231-237。

4) 参考임채완·여병창·이단·최승현·이성란, <화교 디아스포라 이주рут트와 기억의 역사>, 성남: 북코리아, 2013, p. 27.

5) 김경국·최승현·이강복·최지현, <한국의 화교연구 배경 및 동향 분석>, 《중국인문과학》 Vol.26, 광주: 중국인문학회, 2003, p. 509.

6) 史书美,《反离散—华语语系研究论》,台北:联经出版社,2017, p. 9.

人、劳工和南方居民的术语，换成“华侨”或“中国侨民”这一更有礼貌的提法，明显带有官方认可其地位的政治意义，并极为重视他们对中国政府的效忠。其次，中国政府提出“华侨”或“中国侨民”这一称谓的根本原因，是因为中国政府开始意识到海外华人可以成为国外投资的大量来源、海外的巨大商业资产以及从先进工业国家获取新知识的有用桥梁。第三，“华侨”或“中国侨民”的提法，不可避免地一定程度上引发移居国应抱有怎样的态度来看待这些外国移民的问题。最后，中国政府所坚持的华侨和华人连用是明显表明中国在不久的将来可能成为吸引华人和华裔的磁体，是“大中华”及其所有类似说法产生的原因。⁷⁾

其实，在“华人”与“华侨”这两个表述的选择上，我们更应该从如何看待中国，如何看待中国人的问题上去思考。也就是说，我们应该把中国看作如某某“王朝”这样历史概念上的中国？还是如“中华人民共和国”这样的政治实体？亦或是看作以汉族或以汉族文化为核心的文化共同体？⁸⁾因为看待中国的角度不同，看待中国人与生活在中国以外地区华人的范畴也随之不同。中国已经不是一个一统的概念，所谓想象的中国共同体也不是一统的共同体，因此我们有必要从文化共同体的角度，选择使用“华人”这一表述，指代长期生活在中国(中国大陆、台湾、香港、澳门)以外地区的汉族人(以及被汉族同化或在文化上与汉族文化具有一体性的人)，站在华人的立场上，强调他们虽然与中国或汉族具有一定的关联性，但是从根本上说几乎或完全不具有回到传统的汉族共同体的可能性。⁹⁾

因此，笔者在本文中统一使用“韩国华人”(韩华)一词，指长期生活在韩国地区的汉族以及被汉族同化或在文化上具有一体性的群体。而韩国华人使用华文创作的文学就是“韩国华人华文文学”(韩华华文文学)。

韩国华人的移居历史可以追溯到19世纪末期。随着日本对朝鲜侵略的加强，清国也开始积极干涉朝鲜内政。1882年发生“壬午军乱”时朝鲜向清国政府请求军事援助，清国派吴长庆率兵3千来到朝鲜，其中就包括40几名军役商人。虽然这些军役商人大部分都在1885年天津条约签订后回国，但是凭借他们打下的基础再加上一般商人的开拓，之后来到朝鲜的华人越来越多。再加上“清朝水路章程”的签订，允许两国商人通商，允许拥有土地及房屋、租赁、建筑等的规定，使清国人向朝鲜的正式移居成为可能。一方面由于1898年的黄河泛滥、1899年和1900年的干旱、1920-1921年的洪水、1894年之后日本、德国、英国等的入侵、1899-1901年的义和团运动、地方军阀的横征暴敛以及清国政府对汉族的满洲(东北三省)移居许可等等原因，使许多山东省出身的人大举移居朝鲜。另一方面由于日帝强占朝鲜，

7) 以上几点原因的总结参考王康武，《王康武自选集》，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2，pp. 208-221。

8) 参考葛兆光，《宅兹中国—重建“中国”的历史论述》，北京：中华书局，2015，pp. 31-32。

9) 具体内容参考김혜준, <화인화문문학(華人華文文學) 연구를 위한 시론>, 《중국어문논총》 Vol.50, 서울: 중국어문연구회, 2011, pp. 80-83; 金惠俊·梁楠, <韩国华人华文文学初探>, 《中国语文论丛》 Vol.55, 首尔: 中国语文研究会, 2011, p. 323.

为了实现殖民地经营大规模开展建设工程，造成廉价劳动力的大量需求，这同样是华人大批移居朝鲜的原因。

[表1： 韩国华人人口变化表]www.immigration.go.kr

年度	先迁韩华 (台湾籍)	年度	先迁韩华 (台湾籍)	年度	先迁韩华 (台湾籍)	后迁韩华 (中国籍)
1901		1941	73,274	1981		
1902		1942	82,661	1982		
1903		1943	75,776	1983		
1904		1944		1984	26,823	
1905		1945	12,648	1985	25,008	2
1906	3,661	1946		1986	24,822	1
1907	7,902	1947	17,443	1987	24,512	
1908	9,978	1948	12,578	1988	24,088	4
1909	9,568	1949	21,885	1989	23,828	42
1910	11,818	1950		1990	23,583	147
1911	11,837	1951		1991	23,464	67
1912	15,517	1952	17,687	1992	23,479	516
1913	16,222	1953	21,058	1993	23,461	2,661
1914	16,884	1954	22,090	1994	23,259	6,597
1915	15,968	1955		1995	23,265	11,825
1916	16,904	1956	22,149	1996	23,283	17,387
1917	17,967	1957	22,734	1997	23,150	23,571
1918	21,894	1958		1998	22,928	19,169
1919	18,588	1959	23,318	1999	22,985	19,413
1920	23,989	1960	24,723	2000	23,026	26,541
1921	24,695	1961	23,975	2001	22,791	30,740
1922	30,826	1962	23,575	2002	22,699	36,297
1923	33,654	1963		2003	22,585	77,202
1924	35,661	1964	29,462	2004	22,285	80,036
1925	46,196	1965	29,154	2005	22,178	70,654
1926	45,291	1966	29,939	2006	22,118	90,298
1927	50,056	1967		2007	22,047	111,008
1928	52,054	1968	30,810	2008	21,789	121,754
1929	58,000	1969	31,243	2009	21,698	125,564
1930	69,109	1970	31,918	2010	21,490	139,261
1931	56,502	1971	32,605	2011	21,381	147,301
1932	41,303	1972	32,989	2012	21,176	151,945
1933	37,732	1973	32,841	2013	21,187	161,098
1934	49,334	1974	32,255	2014	21,014	171,174
1935	57,639	1975	32,434	2015	20,485	187,934
1936	63,981	1976	32,436	2016	20,413	207,259
1937	43,000	1977	31,751	2017	20,363	208,343
1938	45,533	1978	30,562	*后迁韩华(中国籍)不包括韩国系中国人(朝鲜族)		
1939	51,014	1979	30,078			
1940	63,976	1980	29,623			

总体来看，早期移居韩国的华人大体有三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从山东经仁川来到朝鲜的移居群体，商人比率较高；第二种情况是从山东向满洲地区移动的过程中，一部分经新义州等地来朝鲜的移居群体，大部分为劳动者；第三种情况是从清国移居日本后又来到朝鲜的少数商人群体。但是从早期韩国华人的数量上看，还难以构成从事文化或文学活动的规模。即使有少数人留下了文字记录，也很可能用文言文写成。因为拥有清国政府的大力支持，早期的韩国华人对自己的身份与地位有很强的自豪感，并且大部分人把家人留在中国，也不在朝鲜建立家庭，可以说这一时期的韩国华人仍然保持着中国人的身份认同。

进入20世纪初期，日本殖民当局想方设法限制韩国华人口的增长、居住地以及经济活动范围的扩张，甚至在1931年还阴谋制造了万宝山事件，挑拨离间朝鲜人与华人的关系，曾经造成一定的人口减少现象，但整体来看韩国华人的数量仍然保持持续上涨的趋势。如表1所示¹⁰⁾：1910年11,818名→1920年23,989名→1930年69,109名→1940年63,976名→1942年82,661名。早期来朝鲜定居的群体成为韩国华人的中心，从事以贸易业为主的各种商业活动，对朝鲜经济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韩国华人的数量不断增多，越来越多的华人在经济上也逐渐稳定，因此一部分华人就把家人接到朝鲜一起生活。继而为了解决子女教育问题，开始在各地区设立华人学校。最早是1901设立的仁川小学，接着又在1912设立了汉城小学等。这些华人学校为日后华人从事文化及文学活动打下一定的基础。但此时期的韩国华人大部分属于受教育程度较低的劳动者，再加上移居朝鲜的时间不长，还没有打下良好的经济基础，因此可以推测他们几乎无暇顾及从事文化或文学活动。

1945年光复以后由于过去80%以上的华人生活在北韩，原本达到82,661(1942)人口的华人，南韩只剩下12,648(1945)人。大韩民国政府成立之前，韩国华人仍然从事以贸易业为主的商业活动，发挥自己的经济影响力。但是大韩民国政府成立之后，由于各种限制的出台，韩国华人的贸易业、商业、农业领域开始走向没落，向餐饮业以及少数的中医药业转型。1948年大韩民国政府成立以后开始限制外国人的出入境，使韩国华人人口几乎完全依靠自然增长而不是外部流入。这就意味着随着时间的流逝，在韩国出生的第二、三代华人将占有很大比重。

特别是按照韩国政府的教育自治政策，韩国华人在自己设立的学校接受教育。实际上在韩国出生的第二、三代华人从幼儿园到高中都在“中华民国”(台湾)的教育体制下接受母语，即汉语(国语)的正规教育。1990年代以前，韩国华人学生高中毕业之后，有一部分学生受到台湾政府的优待政策到台湾的大学继续升学，也有一部分学生就读韩国的大学。华人学校的

10) 最终调查日期为2018年6月30日，在金惠俊·梁楠，〈韩国华人华文文学初探〉，《中国语文论丛》Vol.55，首尔：中国语文研究会，2011，p. 341的基础上补充完成。数据主要参考이효재·박은경(1981)，최승현(2000)，출입국·외국인정책본부《출입국통계연보》<http://www.immigration.go.kr>。以下有关韩国华人口的数据均参考此表。

建校数量在1974年达到顶峰，全国共有50所小学，5所中学。1974年韩华人口为32,255人，其中学生人数达到了11,169人。随着第二、三代华人人数的增加，这种学校体制使韩国华人的社会关系由亲属或同乡关系逐渐向同学关系转型，同时使对故土中国的依恋逐渐转向对在韩生活经验的重视。原本属于清国或中华民国国民的华人也在此教育体制下，开始出现台湾化的倾向。此时期的韩国华人已经在韩定居，具有较强的凝聚力，并且接受了较高层次的教育，又得到台湾政府的支持，因此从事文化以及文学活动也较过去活跃。

1950-60年代开始出现韩国华人离开韩国向台湾或美国等地再移居的现象，这种现象一直持续至1970-80年代达到高潮，韩国华人口数量发生明显变化。比如：1974年的韩国华人口为32,255人，而10年后的1984年则减少到27,662人，再到1990年韩华人口为23,583人，比1980年的29,623人减少了6000多人，比1970年的31,918人减少了8000多人。虽然韩国华人的再移居现象可能由诸多原因造成，但是韩国政府给韩华社会所施加的各项法律限制毕竟对韩国华人在政治发挥、经济发展以及就业领域等问题上造成了影响，成为韩国华人再移居的重要原因之一。20世纪后半叶在经历了永住权制度缺失、国籍变更限制、经济制度压制、教育自律政策等一系列困境之后，韩国华人开始对自己的身份提出疑惑，开始重新思考韩国华人的身份认同问题，这种疑惑与思考也就成为韩国华人华文文学创作欲望的源泉之一。

1990年代之后，韩国华人在构成上出现了新的变化。随着1992年8月韩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交，两国间的交流逐渐增多，韩国政府也开始通过实施各种政策，放宽移居条件，促进华人的在韩投资与移居。因此从中国大陆来韩的华人数开始增加。1992年韩中建交当时只有516名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的滞留者，25年后的2018年6月已登记的中国大陆来韩的华人就有208,343人。当然因为其中留学生(51,818人)和企业界的派驻人员等短期滞留者占很大比重，现居韩国国内的中国大陆人今后大部分将回到中国，所以不能把他们全部看作长期居住的韩国华人，但是其中相当一部分也会长期居住下来。

从韩国华人移居历史情况来看，由于移居时期的不同，韩华群体自身又出现了几个不同性质的韩华子群体，笔者认为每个子群体性质的不同，必然会影响每个子群体文学创作性质的不同，因而有必要将韩华群体进行进一步的划分。

首先，鉴于1992年以前移居韩国的华人，与1992年以后移居韩国的华人在性质上的不同，以1992年为分界，将韩国华人划分为先迁韩国华人(目前为20,363人)和后迁韩国华人(目前约有15万人)。先迁韩国华人使用华人创作的文学就是先迁韩国华人华文文学(先迁韩华文文学)，后迁韩国华人使用华文创作的文学就是后迁韩国华人华文文学(后迁韩华文文学)。

其次，由于韩国光复后，先迁韩华中居住北韩的华人成为北韩华人(约6万余人)，居住南

韩的华人成为南韩华人(12,648人)。北韩华人使用华文创作的文学就是先迁北韩华人华文文学,南韩华人使用华文创作的文学就是先迁南韩华人华文文学。由于目前研究条件上的限制,先迁北韩华人华文文学尚不被看作本文的研究范畴。因此本文中所述的先迁韩国华人华文文学,仅指代先迁南韩华人华文文学。

再次,由于19世纪末期移居朝鲜的先迁韩华,得到了清国政府的大力支持,这些早期移居朝鲜的韩华,与20世纪初期以后移居韩国的韩华在性质上产生不同,因此本应将先迁韩华再划分为早期先迁韩华和后期先迁韩华。但是考虑到名称上的繁琐性,笔者将19世纪末期移居朝鲜的先迁韩华简称为早期韩华,将20世纪初期以后移居韩国的韩华称为先迁韩华,本文中的先迁韩华华文文学主要是指这一群体创作的文学作品。

最后,由于开始于1950年代,并在1970-80年代形成规模的先迁韩华的再迁现象,笔者将先迁韩华中由韩国再迁往其他国家的群体,称为再迁韩国华人(约有1万5千人)¹¹⁾,再迁韩国华人使用华文创作的文学就是再迁韩国华人华文文学(再迁韩华华文文学)。

笔者之所以将再迁韩华在再迁之地创作的华文作品,仍然看作是韩华华文文学的范畴,其理由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解释。一方面是从研究学者的观点来看,即研究学者们如何看待再移居后的华人,在当地创作的华文文学作品,应该归属于哪类文学的问题。其中一个有力的例证,就是如黄锦树这样的,再移居台湾的马来西亚华人作家。这些本来具有马来西亚华人身份的作家,即使他们长期移居台湾,甚至在台湾入籍,长期在台湾从事华文文学创作,他们的作品也仍然被研究者看成是马来西亚华人华文文学。只不过有些学者认为这些作品在台湾发生,出于严谨,主张他们的文学应被称为在台马华文学。¹²⁾这与笔者所主张的再迁美国韩国华人华文文学也并不冲突,具有同出一辙的意味。

台湾学者认为“‘在台马华文学’的历史,可追溯至1960年代初,由中国大陆迁移台湾的国民政府推行侨教政策,招收海外华裔子女赴台升学。东南亚为中国以外华裔人口最多的地区,当时的南越、马来(西)亚、印尼等东南亚国家每年都有不少‘侨生’赴台就读大专院校。东南亚侨生参与台湾的文学生产活动要以1960年代的王润华、淡莹、林绿、陈慧桦(陈鹏翔)、毕洛以及翱翱(张错)等所组的‘星座诗社’(1963年成立)最引人注目。”¹³⁾可见这些由东南亚地区再移居台湾的华人使用华文创作的华文作品,是具有台湾在地化性质的东南亚华人华文文学。而韩国华人初安民和郝明义也是在同样的背景下,以这里所说的“侨生”身份再移居台湾。特别是初安民,甚至被一些台湾学者看作是“星座诗社”的后继诗人,认为虽然他是

11) 一剪梅,〈冀望韩国政府多一点“施惠”少一点“互惠”〉,《美国齐鲁韩华杂志》第26期, Laguna Woods, California: 美国齐鲁联谊协会, 2010.5, p. 9.

12) 张锦忠,〈跨国流动的华文文学 - 台湾文学场域里的“在台马华文学”〉,《中国现代文学》No.34, 首尔: 韩国中国现代文学学会, 2005, p. 27.

13) 同上, p. 29.

来自韩国的华人，但是“如果早生个十几年，因缘际会，很可能也是民国五十年代的星座之一。”¹⁴⁾他们在台湾开展了文学创作活动，但是他们在台湾的身份仍然是台湾的韩国华人，他们的文学作品仍然是在台韩国华人华文文学，这同样与笔者提出的再迁台湾韩国华人华文文学具有一致性。

另一个方面，是从韩国华人及韩国华人华文文学作品本身来看，虽然他们由于各种原因，选择由已经移居几十年的韩国再迁他地，但是再迁之后他们仍然与曾经的移居地韩国，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特别是再迁美国的韩国华人，在这一特征上体现得更加明显。首先再移居美国的韩国华人，并没有因为移居美国，而改称为“美国华人”，只在称谓的前面加上美国的成分，称为“美国韩华”。也就是说，他们没有因为再移居美国，而完全抹掉曾经移居韩国的痕迹，反而采取毫不掩饰的态度，通过使用“美国韩华”这一称谓，与仍然留在韩国的华人，以及散居其他地区的韩国华人保持联系，或者说维系一种“共同体”意义上的关系。

其次，从他们主要的华文文学创作舞台，即在再迁之地美国，创办的华文杂志的名称，《美国齐鲁韩华杂志》上来看，名称本身就包涵了“美国”、“齐鲁(中国大陆山东)”、“韩国”三重文化元素、所属元素，体现出再迁韩华在文化身份认同上的混种性。而由再迁美国韩华在美国创办的另一本华文杂志，干脆称为《韩华世界》，叙说着自己与韩国的陈年往事。再迁台湾韩华，在华人社团等方面，明显不如移居美国地区韩华那样组织化，因此他们的华文创作与出版也多属于个人行为，但是他们仍然会定期参加韩国华人的同学会等各种聚会，与散居各地的韩国华人保持联系。他们的作品中也熔铸着韩国的文化，韩国生活的一切。

最后，从他们创作的华文文学作品内容上来看，很多作品都与韩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与他们的韩国移居经验息息相关。比如，再迁美国韩国华人在其文学作品中直言不讳，认为在美国生活的韩华，在性格上更接近于在美国生活的韩裔，比起从其他地区移居来美的华人，他们更喜欢与在美韩人群居在一起。即使移居到美国，他们仍然在生活饮食等方面，保持着在韩国养成的诸多习惯。

综上所述，本文所界定的韩国华人(韩华)是指长期生活在韩国地区的汉族以及被汉族同化或在文化上具有一体性的群体。韩国华人使用华文创作的文学作品，就是韩国华人华文文学(韩华华文文学)。韩华华文文学还可以进一步划分为三个子集：先迁韩华华文文学、再迁韩华华文文学、后迁韩华华文文学。

1990年代以后先迁韩华的人数比重较小，并且继续呈减少趋势。先迁韩华的职业仍以餐饮业为主，中医药业、贸易业、旅游业等呈增加趋势，年轻的一代开始涉足信息通信、电子、设计等新领域。先迁韩华中与第一代华人接触机会越多，或接受华人学校教育越多者，

14) 初安民，〈真正的初安民—张梦机序〉，《愁心先醉》，台中：晨星出版社，1985，p. 2。

较之韩语更精通汉语。相反与老一辈华人接触机会越少，或接受韩国学校教育越多者，则越加韩国化，与汉语相比也更精通韩语。因此，第四代之后的先迁韩华从事华文文学写作的活跃程度较之第二、三代韩华，很可能出现回落现象。因此，第二、三代先迁韩华使用华文创作的文学作品，将成为韩华华文文学研究的重点。

另外，再迁韩华中的很大一部分曾经与第二、三代先迁韩华属于同一群体，因此可以预测他们的文学与第二、三代先迁韩华的文学会出现部分相似性，但是又由于他们再移居经验的影响，可能使再迁韩华文学与第二、三代先迁韩华文学出现同中有异，异中有同的现象。

与此相反，中国大陆出身的后迁韩华在大陆成长，至少具有中学以上的文化程度，可以推测他们从事华文创作的机会更大。但是因为他们的移居时间较短，恐怕距离他们正式开展文学活动还需要一段时间。另外后迁韩华试图在韩中两地都建立生活基础，这种两地双重居住策略就使得他们今后如果进行华文创作，也会与先迁韩华华文文学作品的特质大不相同。

第 2 节 研究目的与方法

据笔者的不完全调查，从1960年代到现在¹⁵⁾韩国国内有关韩国华人的论文包括博士学位论文8篇、硕士学位论文61篇、学术论文171篇。韩国的华人研究在1960年代，出现了具孝庆、金信子的学术论文《在韩华侨实态》是针对韩国华人人口等实况问题进行的研究调查。进入1970年代高承济发表了学术论文《华侨对韩移民社会史的分析》通过对韩国人满洲等地的移民与中国人朝鲜地区的移民情况的对比，开始真正关注韩国华人移居当时的实际活动情况以及韩国与中国的韩国华人政策等问题，并将韩国华人移民的初始时期考订为1882年《朝清商民水路贸易章程》签订之后。¹⁶⁾更重要的是1970-80年代，在韩国成长并接受了高等教育的第二、三代韩国华人开始关注韩国华人的韩国移居现实，思考自身的身份认同问题。申文廉、姜德志、邹美兰、谭永盛、朱凤仪、谭建平等人的硕士学位论文，通过对韩国华人经济、韩国华人文化意识、韩国华人社团组织等方面的考察打开了韩国华人研究的新局面。特别是姜德志的《对韩国华侨经济的考察》与谭建平的《在韩华侨的社团组织研究：以首尔地区为中心》受到后进学者的关注。前者受到重视的原因在于其对饮食业如何成为韩国华人经济核心的过程，以及1970年代韩国华人向美洲或台湾等地的再移民背景所做的论述。后者受到重视的原因在于这篇论文通过对首尔地区韩国华人组织的详细调查分析了这些多样又相互联系的韩国华人组织对韩国华人种族认同的形成起到了巨大的作用¹⁷⁾，对韩国华

15) 笔者的调查日期为2017年12月30日。

16) 参考김경국·최승현·이강복·최지현, <한국의 화교연구 배경 및 동향 분석>, 《중국인문과학》Vol.26, 광주: 중국인문학회, 2003, p. 503; 왕언메이, 송승석 역, 《한국화교 - 냉전체제와 조국 의식》, 서울: 학교방출판사, 2013, p. 29.

人身份认同研究具有参考价值。

1980年代以后出现更多韩国学者有关韩国华人的研究，其中最值得关注的是朴银琼的博士学位论文《华侨的定着与移动：韩国的事例》。后进学者对此篇论文有肯定也有批评，持肯定态度的学者如金庆国、崔承现、李康馥、崔智贤等，认为此篇论文已经将韩国华人作为一个研究对象，通过具有当时韩国时代特征与单一民族国家建设紧密相关的“同化”与“异化”理论对韩国华人这一研究对象做出了详细分析。王恩美也表示朴银琼的这篇论文从种族性的观点出发，将韩国华人从初始至1980年代的移居历史分为形成期、全盛期、定着期和移动期等四个时期，并分别分析了各个时期韩国华人的种族性变化特征。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按这种分期方式所划分的1970-80年代韩国华人向美国以及台湾等地的再移民现象所做的考察尤为值得注意。宋承锡也承认这篇论文从种族性观点出发对韩国政府在法律制度上对韩国华人实施的差别政策、韩国社会对韩国华人根深蒂固的偏见并由此引发的排斥和边缘化行为、韩国华人的衰落过程和在美国台湾等地的再移居等韩国华人定着与移动过程所做的整体而详细的分析，因此认为朴银琼提出的理论框架在以后相当长的时间里对之后所展开的韩国华人研究起到了强烈的影响作用。

但是宋承锡在肯定的同时也对朴银琼提出的同化与异化、自我与他者的二元对立式的理论框架持有批判态度。即，他对朴银琼的韩国政府通过排他性的华侨政策使韩国华人不能完成同化，从而造成韩国华人不得不再移居他地，韩国政府只有采取更加积极和肯定的华人政策才能将华人容纳进来的结论持怀疑态度。宋承锡认为这种以国民国家为单位的“他”或者“我”是近代主义理论框架的延续，具有无视差异只求通过同化来强调国家统一性的局限性。并由此强调承认种族内部存在的多种差异，并由此来了解韩国华人社会的重要性。另外，李昶昊也批判朴银琼因为误解了巴斯(Barth)理论是通过设定一个与韩国华人种族相对应的另一个所谓韩国人的国民国家种族来主张种族群体的多样性与复杂性的本意，对巴斯理论的误用，造成人们对本应该是族群间境界设定主体的韩国华人反而成为被动存在的错误认识。¹⁷⁾

值得关注的是，同样出现在1980年代的南知叔的硕士学位论文《首尔市华侨的地理学考察(1882-1987)》提出了与朴银琼截然不同的结论。南知叔通过将1882年至1987年首尔地区华人居住地的形成与发展过程分为形成期、扩张期、安定期、移居期，并通过各种图表以及问卷调查分别进行考察，得出造成首尔地区韩国华人向首尔整个地区分散居住的原因之一是华人的韩国社会同化与适应。即，韩国华人的再移居现象造成韩国华人社会内部凝聚力的

17) 参考송승석, <‘한국화교’ 연구의 현황과 미래 - 동아시아 구역 내 ‘한국화교’ 연구를 중심으로>, 《중국현대문학》No.55, 서울: 한국중국현대문학학회, 2010, p. 186; 왕언메이, 송승석 역, 《한국화교 - 냉전체제와 조국 의식》, 서울: 학고방출판사, 2013, pp. 30-31.

18) 参考이창호, 《한국 화교의 사회적 공간과 장소: 인천 차이나타운을 중심으로》, 한국학중앙연구원 박사학위논문, 2007, pp. 7-9; 송승석, <‘한국화교’ 연구의 현황과 미래 - 동아시아 구역 내 ‘한국화교’ 연구를 중심으로>, 《중국현대문학》No.55, 서울: 한국중국현대문학학회, 2010, pp. 186-187.

弱化，最终原因可以归结为韩国华人的韩国社会同化。¹⁹⁾也就是说朴银琼将韩国华人整个群体看成一个被动的研究对象，从同化与异化的理论框架上讨论韩国华人不能被韩国同化的外部原因，从而提出韩国社会的差别政策造成韩国华人再移居的结果。而南知叔则通过对韩国华人社会内部情况的考察，结合韩国华人在地性特征，得出韩国华人的再移居现象造成韩国华人社会内部凝聚力的弱化，而这种弱化现象反而反作用于韩国华人的韩国社会同化倾向。

进入1990年代随着严翼相、陶秀华、李在正、梁春基、石美龄、金基弘等人的加入，韩国学界有关韩国华人的研究开始多样化，分别出现了韩国华人经济、教育、语言、居住地、华人网络等方面的研究。其中金基弘的硕士学位论文《在韩华侨的种族性研究》受到王恩美、金庆国、崔承现、宋承锡等学者的关注。这些学者对这篇论文的评价褒贬不一，王恩美对这篇论文通过采访调查，从韩国华人受到的来自韩国社会的差别制度以及韩国华人被韩国社会同化程度较低的事实出发，对韩国华人的韩国社会适应类型归类为阶层化与异化交叉类型这一点持肯定态度。金庆国等学者认为随着1990年代冷战体系的瓦解，韩国社会对韩国华人的认识也出现变化。而金基弘的这篇论文强调韩国华人是韩国社会一部分，这一点打破了延续至1980年代的，韩国华人是中华民国国民的绝对普遍认识。崔承现也认为这篇论文预示了韩国的韩国华人研究已经摆脱了纯血统的民族主义观念与以国民国家为单位的思考方式。但是宋承锡却不完全赞同这种看法，认为这篇论文呼吁作为少数民族的韩国华人应该积极与韩国社会沟通的观点仍然没有摆脱同化与异化理论的框架。即使如此，笔者认为在将韩国华人的每一个个体都作为能动对象看待，在此基础上将整个韩国华人社会看作为韩国社会一部分的少数群体存在的意义上，金基弘的硕士论文对今后的韩国华人研究也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1990年代末至2000年代初，有关韩国华人的法律地位与人权问题受到韩国学界的关注。梁必承等对韩国华人具有新的认识，提出在韩国兴建中国城将中国大陆资本引进韩国的建议，在劝说韩国政府以及法务部重视韩国华人的法律地位和人权问题上做出了努力。2000年代后李昶昊、崔承现、李玉莲、金基昊等学者从新的视角、新的观点出发打开了韩国华人研究的新局面，随着更多研究者的加入，此时的韩国华人研究才逐渐走向正轨。其中李昶昊、金基昊两位学者更值得关注，两位学者均打破了以往将韩国华人看作被动行为对象，被动接受韩国政府的不平等待遇从而不能完成同化的研究局限，注意将研究视角放在韩国华人社会内部的多样性与差异性上。前者通过对居住在仁川与中国城等地的韩国华人如何认识与实践空间与场所的考察来探索韩国华人社会的变化原理以及文化认同。认为韩国华人正是通过

19) 参考송승석, <‘한국화교’ 연구의 현황과 미래 - 동아시아 구역 내 ‘한국화교’ 연구를 중심으로>, 《중국현대문학》 No.55, 서울: 한국중국현대문학학회, 2010, p. 187; 왕언메이, 송승석 역, 《한국화교 - 냉전체제와 조국 의식》, 서울: 학교방출판사, 2013, p. 31.

对具有母国中国渊源的自身所特有的生活原理，即以关系、面子、会²⁰⁾等为代表的政治、经济、社会实践所构成的社会空间来维系作为特殊少数者的生活。后者则强调了韩国华人是通过跨越韩国、中国大陆、台湾等国家/地区境界来构成自身的生存战略， 并由此形成了新的国家认同意识。也就是说他们在韩国是中国人，在台湾是韩国人，在中国大陆是台湾人的这种被他者化的韩国华人形成了既不属于中华民国也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所谓“想象中国”的“第3中国人”国家认同。²¹⁾

在广泛围的跨国移居理论框架下， 移动在韩国、中国大陆、台湾、美国等地的韩国华人研究还不能只满足于关注作为能动对象的韩国华人社会内部的差异性与多样性， 韩国华人向台湾、美国等地的再移居问题也是韩国华人研究领域中不容忽视的组成部分。金基昊在他最近的论文，《在中国与台湾之间变化的韩国华侨移住民认同——对首尔华侨社团组织的案例研究》(2016)中通过韩国华人在台湾由于外省人的身份而受到排斥，1990年代以后逐渐有更多韩国华人回中国大陆探亲以及1970年代由于韩国的不平等待遇而再移民美国的案例， 强调这些案例正暴露了有关跨国移居是对“去领土化民族国家”的扩张， 还是对国家境界瓦解的二分法理论的局限性。提出随着跨国领域自由性的扩张， 处在境界线上的韩国华人不能从民族国家的框架来界定， 已经在地化的华人的再中国化现象也要与华人固有的“中国人”的种族性既互相结合又互相冲突的过程中来理解。就目前韩国学界对韩国华人的研究情况来看， 除了金基昊以外， 只有姜素英的《海外居住韩国华侨的韩语使用现象研究》(2011)、李昶昊的《韩国华侨的“归还”移住与新的适应》(2012)、金京学的《韩国华侨的跨国特征与展望》(2012)、安秉日的《通过密歇根的案例看韩国华侨的美国移住与定着， 以及美国韩华身份认同》(2015)等， 关于韩国华人再移居现象的考察和研究还有待于进一步的深入与扩张。

实际上， 以上所论述的韩国华人都属于笔者所界定的先迁韩国华人， 韩国华人的再移居问题也指代先迁韩国华人的再移居群体， 即再迁华人的范畴。而对于1990年代以后移居韩国的后迁韩国华人的研究就显得更加不足。后迁韩国华人移居韩国也已近26年的历史， 但是韩国学界有关后迁韩国华人的研究， 排除为界定、对照或区分先迁韩国华人而在论文中简短言及的论文之外， 真正将后迁韩国华人作为研究对象进行考察的论文则出现在2010年代之后， 只包括李昶昊的《新华侨的国内移住与认同的政治》(2014)和李恩相的《中国中产阶层的增长与新华侨的济州岛流入》(2016)等。李昶昊指出在跨国移居时代居住国的归化者回到祖国行使投票权的事例逐渐增多， 这正是对传统的同化主义理论， 即移民者对国民国家政治

20) 这里的“会”是指一种亲睦组织或团体。具体内容参考이창호, 《한국 화교의 사회적 공간과 장소: 인천 차이나타운을 중심으로》, 한국학중앙연구원 박사학위논문, 2007.

21) 参考이창호, 《한국 화교의 사회적 공간과 장소: 인천 차이나타운을 중심으로》, 한국학중앙연구원 박사학위논문, 2007; 김기호, 《초국가시대의 이주민 정체성—한국화교의 사례 연구》, 서울대학교 석사학위논문, 2005; 송승석, <‘한국화교’ 연구의 현황과 미래 - 동아시아 구역 내 ‘한국화교’ 연구를 중심으로>, 《중국현대문학》No.55, 서울: 한국중국현대문학학회, 2010, pp. 189-191.

的关心逐渐减少论点的排斥。另外后迁韩国华人大部分属于海外留学后转变为长期居住，或者以寻找更好的经济环境为目的的“投资移民”等形式的移居。他们不仅具有较高的学历，并且具有较为优越的经济实力。所以与长期处于韩国社会不平等待遇下只能经营中国餐馆的先迁韩国华人相比是一种飞跃性的发展。因此后迁韩国华人的研究是亟待韩国学界关心与重视的领域，特别是先迁韩国华人与后迁韩国华人的比较研究也是非常值得重视的研究课题。

韩国学界有关后迁韩国华人研究的不足已是既成事实，但是与此相比问题更加严重的是另外一个领域——韩国华人文学领域的研究。从目前韩国学界有关韩国华人的研究情况来看，主要围绕政治、经济、社会、地理、文化等方面，关注韩国华人的移居、定居、居住地以及身份认同等问题，而涉及韩国华人文学方面的研究却是凤毛麟角寥寥无几。

从笔者对目前韩国学界研究情况的调查上来看，有关韩国华人文学，特别是韩国华人华文文学领域的研究成果，仅有笔者独立完成或由笔者与其他学者共同完成的几篇学术论文。金惠俊·梁楠的《韩国华人华文文学初探》(2011)可以说是这一领域研究的滥觞，打破了这一研究领域的空白局面，其他的学术论文还包括：梁楠，《离散语境下韩国华人的身份认同》(2013)、梁楠·高惠琳，《韩国华人华文文学的混种性》(2015)、梁楠，《生根的流星：论韩华诗人初安民《愁心先醉》中的跨国认同》(2017)等，分别从韩国华人的韩国移居历史和华文创作情况，先迁韩国华人与再迁韩国华人华文文学中出现的具体特征，作为跨国移居者的韩国华人文化身份认同等方面进行了尝试性研究。而实践证明，韩国华人华文文学充分具有其重要的研究价值。遗憾的是，与其重要的研究价值相比，目前有关这方面的研究力量还相当薄弱，相关硕士及博士学位论文的研究成果仍处于零状态，是一片尚未开垦却又亟待开垦的处女地。

在笔者看来，韩国学界对于韩国华人华文文学情况不甚关心的原因大概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考虑。一方面是从韩国华人华文文学自身情况来看：首先，韩国华人的数量与成员知识水平上的限制，影响了韩国华人华文文学的发展。其次，由于韩国华人经历坎坷，各种资料没有得到及时地收集和适当地保管。第三，1992年以后流入的中国大陆系华人大部分属于短期滞留，一部分长期居住者由于移居时间较短的缘故，再加上他们更关心经济、投资等方面的问题，尚未形成华文文学创作规模。第四，韩国华人华文文学创作主要在韩国华人内部进行，缺乏与世界华人及韩国人的交流。另一方面是从韩国学者的研究角度来看，韩中未建立邦交等多种政治与社会局势因素，使韩国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自1980年代后才真正得以开展。再加上现有的中国文学或者韩国文学研究者对华人华文文学缺乏重视等等。²²⁾

朴宰雨等的《韩国华文文学：探索四个来源与现状》(2015)，其中有一部分内容涉及到韩

22) 以上叙述是在金惠俊·梁楠，〈韩国华人华文文学初探〉，《中国语文论丛》Vol.55，首尔：中国语文研究会，2011，p. 338的基础上进行修改后的内容。

国华人写作问题，但遗憾的是这篇论文的最终目的在于界定韩国华文文学的范畴，而非韩国华人的文学研究，即，在韩国国内所有使用华文进行写作的人，其中包括韩国华人，也包括非韩国华人：韩国人以及1992年之后长期居住韩国的朝鲜族出身的韩国归化者。论文指出不管华侨、华人、华裔写的还是纯粹外国人写的，只要用华文写作，都可以包括在华文文学范畴。²³⁾笔者认为这篇学术论文在关注韩国华人华文的写作问题上具有一定的贡献，但是这种单纯以语言为依据的界定，难免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比如，不管是以许世旭为代表的使用华文创作的韩国人，还是以金英明为代表的使用华文创作的朝鲜族出身的韩国归化者，他们都与韩国华人具有不同的社会与文化背景，具有不同的生活经历，虽然他们的现居住地(韩国)相同，但是即使在同样的居住场所，也会由于社会、文化背景以及生活经历的不同而各自构成不同的社会关系空间，从而形成不同的政治、文化身份认同。这篇论文所提出的韩国华文文学很可能成为世界各地华人和华人学界所批判的“汉族中心、汉族主流的大一统的中国性建构”，以及在此建构下产生的中国大陆学界将中国文学与华人华文文学合并称为“世界华文文学”的一个分支，并为此建构助上一臂之力。

中国大陆学界从1980年代中后期开始，也就是1997年香港回归问题被确定之后开始关注香港文学，进而这种关心逐渐扩大到台湾文学、澳门文学以及华人华文文学领域。特别是1993年以后，更将中国文学与华人华文文学统称为“世界华文文学”，而世界各地的华人对此称谓持有强烈的怀疑态度。²⁴⁾在对“汉族中心、汉族主流的大一统的中国性建构”的理论，以及在这一建构下所产生的“世界华文文学”理论的批判中，值得关注的就是华语语系文学理论的提出。华语语系文学从名称上来看明显也是以语言来界定文学类型的方式，但是华语语系文学与世界华文文学最大的不同就在于，华语语系文学理论最根本的出发点是为了解决华人所遭遇的困境问题，即华人所受到的来自居住地与出发地的双重支配乃至双重边缘化，摆脱离散者的状态，确立自身的文化身份认同。²⁵⁾

华语语系文学的概念首先由美国UCLA的史书美(2004)教授提出，再加上美国哈佛大学王德威教授的积极响应，华语语系文学概念在随后的10几年时间里，不仅扩散到以两位学者为中心的北美华人学界，甚至扩散到台湾学界、香港学界以及马来西亚华人学界。²⁶⁾这里的华语语系文学(Sinophone Literature)是与英语语系文学(Anglophone)、法语语系文学(Francophone)、西语语系文学(Hispanophone)、葡语语系文学(Lusophone)等相对应的

23) 朴宰雨·于丽丽·郑有铉, <韩国华文文学:探索四个来源与现状>,《中国学报》Vol.73, 首尔:韩国中国学会, 2015, pp. 334-347.

24) 参考김혜준, <시노폰 문학, 세계화문문학, 화인화문문학 - 시노폰 문학(Sinophone literature) 주장에 대한 중국 대륙 학계의 긍정과 비판>,《중국어문논총》Vol.80, 서울:중국어문연구회, 2017, p. 330.

25) 김혜준, <시노폰 문학, 세계화문문학, 화인화문문학 - 시노폰 문학(Sinophone literature) 주장에 대한 중국 대륙 학계의 긍정과 비판>,《중국어문논총》Vol.80, 서울:중국어문연구회, 2017, p. 347.

26) 同上, p. 329.

概念，意谓在各语言宗主国之外，世界其他地区以宗主国语言写作的文学。但是华语语系文学概念的提出者们也承认当代身在海外的华语语系族群，除了少数例子之外，很难说与中国有殖民或后殖民的关系，这是华语语系与其它以语言为划分标准的后殖民社群，如西语语系、法语语系等之间最大的不同之处。尽管如此，史书美仍然从华语语系包含了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外使用各种不同汉语语言的各种区域的角度，强调华语语系族群就像其他非大都会中心地区必须使用大都会中心语言一样，也有着一部殖民史。史书美甚至认为部分在中国境内的少数民族文学也可以视为华语语系文学之一，因为这些作家不是经历了外部殖民(如果他们希望独立自主)就是遭到内部殖民(如果他们感到受压迫)，强调他们虽然用汉语写作但是感觉结构与“政治文化的中国”相对，也与汉族中心、汉族主流的大一统的中国性建构相对。因此在史书美看来华语语系与中国的关系充满紧张，而且问题重重。27)

王德威在华语语系文学必须从后殖民主义的角度理解的问题上与史书美出现分歧，王德威认为海外华语文学的出现，与其说是宗主国强大势力的介入，不如说是在地居民有意无意地赓续了华族文化传承的观念，延伸以华语文学符号的创作形式。百年来大量华人移民海外，他们建立各种社群，形成自觉的语言文化氛围。尽管家国离乱，分合不定，各个华族区域的子民总以中文书写作为文化(未必是政权)传承的标记。而他们书写时所使用的语言也不必只是中州正韵，而必须是与时与地俱变，充满口语方言杂音的语言。王德威甚至认为不应该斤斤计较汉语与华语的对立，强调“从边缘打入中央”，继而将中国大陆境内的汉语也视为华语语系的一部分。28)

不管两位学者在理论展开上是否观点一致，他们都是在对仅仅以标准汉语来标示“独一无二”的“中国性”的批判，认为应该解放华语语系的复杂性与活力，让众声喧哗。强调华语语系文学研究的出现正呼应了现当代文学的课题，希望华语语系文学可以打破国家文学的界限，不再将华语语系文学视为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分支或延续，而是将其定位在与中国现当代文学同等对话的位置上来看待。这是对重写中国文学(或者说汉语文学、华文文学)史的要求，更进一步说这也是与中国大陆学界展开的关于中国问题话语主导权的争夺。如果主流群体对少数群体实行压制或是霸权性的压迫，受压迫的少数群体为了对抗这种压迫与抑制而进行的努力是非常值得肯定的。在这一点上与作为跨国移居者文学一部分的华人华文文学在范畴上存在相当部分的重叠性。29)

27) 参考史书美，杨华庆译，蔡建鑫校，《视觉与认同—跨太平洋华语语系表述·呈现》，台北：联经出版社，2013，pp. 46-69。

28) 参考王德威，〈华语语系的人文视野与新加坡经验：十个关键词〉，《华文文学》第122期，汕头：汕头大学，2014，pp. 7-13；王德威，〈中文写作的越界与回归—谈华语语系文学〉，《上海文学》2006年第9期，上海：上海市作家协会，2006，pp. 91-93。

29) 参考김혜준，〈시노폰 문학, 세계화문문학, 화인화문문학 - 시노폰 문학(Sinophone literature) 주장에 대한 중국 대륙 학계의 긍정과 비판〉，《중국어문논총》Vol.80，서울：중국어문연구회，2017，p. 330；김혜준，〈시노폰 문

华语语系文学的提出尽管具有如此的重要性，但是仍然不能就此忽视其单纯以语言为基准来定义文学本身所具有的局限性。朱崇科、黄维梁等学者在“Sinophone”的汉语翻译问题上就曾提出过异议，他们认为王德威将“Sinophone”译成“华语语系”犯了学术上的错误，因为所谓语系原本指“语族”，选用这一术语作为“Sinophone”的翻译不够严谨，给人造成“Sinophone”就像语族一样由众多其他语言构成的错误认识。³⁰⁾王德威就此问题曾在多处做出过辩解，其理由是“中文/汉语/华语/华文”等术语存在强调汉语同一性的成分，又因为这种偏见已经形成，为了强调汉语的多样性和异语性，最终选择了“华语语系”这一术语。³¹⁾虽然史书美和王德威通过强调广义上包括标准汉语和各种汉语的汉语复杂性来批判汉族中心、汉族主流的大一统中国性建构，批判将所有相关群体同质化总体化的意图值得肯定，但是在文学即人学，每一部文学作品都熔铸着作者的生活经历与人生智慧的意义下，选择单纯使用语言作为人类文学的定义方式，很有可能在某种程度上遮盖了文学作为人学的作用。金惠俊也在论文中提出过这种单纯使用语言这唯一的标准来定义某一人类群体的文学显得过于牵强的疑问。他认为某一人类群体的文学所使用的语言固然重要，但是更重要的是这一群体的生活本身。华语语系文学主张“众声喧哗”，但是由于他们过于强调各种汉语的语言共通性，很可能使这些语言使用者的多样的“发声”，即多样的生活被掩盖。另外使用标准汉语以外的各种汉语这唯一的标准来定义华语语系文学，其范畴就难免会无限扩张，其特征也会变得过于复杂，结果就造成具有不同特征的众多人类群体的文学都被包括其中，随之需要更复杂的解释，甚至不可避免地出现论理间的互相矛盾。³²⁾

在此意义上，华人华文文学的概念似乎可以弥补华语语系文学概念存在的上述局限与不足。华人华文文学作为跨国移居者文学的一部分，与华语语系文学在范畴上存在很多重叠部分。但是华人华文文学与华语语系文学概念最大的不同，就在于华人华文文学不是根据语言，而是从新的人类群体的角度做出的定义。

华人华文文学的概念是由韩国釜山国立大学的金惠俊教授提出，金惠俊认为如今跨国移居者在人口数量上更加增长，空间上更加扩大，时间上更加频繁，现象上更加普遍化，因此有必要将他们看成一个跨国移居者群体。这一群体并非都是传统意义上的殖民、难民形态的移居者，但仍然可能生活了几个世代也摘不掉出发地的标签，被居住地(或居住地的主流社会)怀疑他们的忠诚，被排斥成为居住地社会的正当成员。另一方面随着时局的变化他们又

학(Sinophone literature), 경계의 해체 또는 재획정>, 《중국현대문학》 제80호, 서울: 한국중국현대문학학회, 2017, p. 95.

30) 朱崇科, <再论华语语系(文学)话语>, 《扬子江评论》2014年第1期, 南京: 江苏省作家协会, 2014, pp. 18-19.

31) 김혜준, <시노폰 문학, 세계화문학, 화인화문학 - 시노폰 문학(Sinophone literature) 주장에 대한 중국 대륙 학계의 긍정과 비판>, 《중국어문논총》 Vol.80, 서울: 중국어문연구회, 2017, p. 343.

32) 김혜준, <시노폰 문학(Sinophone literature), 경계의 해체 또는 재획정>, 《중국현대문학》No.80, 서울: 한국중국현대문학학회, 2017, pp. 80-98.

可能会受到出发地国家的强烈召唤，或者无情的抛弃。因此新移居者也将可能同时成为居住地和出发地双方的边缘，持续着边界人不安定的生活。所以他们的文化意识和表现文化意识的文化形态不是固定于特定的种族或国家，而是始终具有可变性的同时，自行表现出某种新的人类群体的性质。在这个庞大的跨国移居者群体下，又可以划分为华人群体，韩人群体等等各个群体，而华人群体又可以细分为华人华文群体，华人英文群体等等。因而作为跨国移居者文学一部分的华人华文文学也就具有了展现新人类群体生活的特征。

金惠俊认为之所以各个时期各个地区的学者对华人华文文学会产生不同的看法，最根本原因在于其如何看待中国，如何看待中国人，如何看待汉语的问题上。金惠俊认为强调中国概念的不确定性本身就意味着中国已经不是一个一统的概念，所谓想象的中国共同体也不是一统的共同体了。因此中国人与生活在中国以外地区华人的范畴也随之不同，进而中国概念的差异使种族与民族的概念也变得不同。因此金惠俊所定义的“华人”概念是指长期生活在中国(中国大陆、台湾、香港、澳门)以外地区的汉族人(以及与汉族同化或在文化上与汉族文化具有一体性的人)。他们除了有一部分人仍然持有中国(不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还是中华民国)国籍以外，大多数人已不再持有中国国籍。虽然他们与中国或汉族具有一定的关联性，但是从根本上说他们几乎或完全没有回到传统的汉族共同体的可能。这些人的文学称为“华人文学”，其中用华文写作的文学称为“华人华文文学”。这里选用“华文”代替“汉语”，是因为“汉语”主要在中国大陆使用，“华文”主要在中国大陆以外地区使用，再加上“华文”与“华人”又相互呼应的关系。³³⁾

在笔者看来，金惠俊的这种通过构建跨国移居者群体文学，并将华人华文文学看作跨国移居者群体的子集，从而将华文文学从王德威的所谓广义的中国文学(即华语语系文学将中国文学包括在外构成广义的中国文学)中分离出来的理论构想，似乎要比史书美的彻底与中国文学断绝瓜葛的目的更现实更具有可行性；同时也比王德威通过构建广义的中国文学来实现华语语系文学与中国文学间对话的设想更少危险性，也就是说，王德威广义的中国文学构想反而具有促进自身所反对的“大一统的中国构建”的可能性。

因此，本文旨在将韩国华人群体，视为在全世界范围内形成的庞大华人群体的一个组成部分，同时将韩国华人华文文学，视为整个华人华文文学领域的一个组成部分来进行考察和研究。本文的研究目的可以归结为以下几点内容：第一，为了打破有关韩国华人华文文学的硕士及博士学位论文研究处于零状态的现况，笔者将在本文更加详细更加系统地考察韩国华

33) 以上两个段落有关金惠俊观点的概述，主要通过参考金惠俊的几篇论文总结的要旨，论文包括：김혜준, <화인화문문학(華人華文文學) 연구를 위한 시론>, 《중국어문논총》 Vol.50, 서울: 중국어문연구회, 2011, pp. 77-116; 김혜준, <시노폰 문학, 세계화문문학, 화인화문문학 - 시노폰 문학(Sinophone literature) 주장에 대한 중국 대륙 학계의 긍정과 비판>, 《중국어문논총》 Vol.80, 서울: 중국어문연구회, 2017, pp. 329-351; 김혜준, <시노폰 문학(Sinophone literature), 경계의 해체 또는 재획정>, 《중국현대문학》 No.80, 서울: 한국중국현대문학학회, 2017, pp. 73-105.

人华文文学的具体情况。第二，为了多少可以弥补韩国华人研究领域中有关再迁韩国华人和后迁韩国华人研究的不足，本文将从先迁韩国华人的华文文学、再迁韩国华人的华文文学、以及后迁韩国华人的华文文学三个方面来全面考察韩国华人华文文学的情况。第三，避免将韩国华人群体作为被动的研究对象，而是将韩国华人每一个个体都作为一个能动的行为主体，关注韩国华人每个个体移居生活的具体情况，聆听他们的“发声”。第四，本文的研究目的不在于通过考察韩国华人与中国的关系来强调其“落叶归根”的中国性，而在于探索作为跨国移居者的韩国华人所形成的新型的文化身份认同。第五，将韩国华人华文文学看作跨国移居者文学一部分的华人华文文学的一个子集，通过探索韩国华人每个个体的文化身份认同特征，构建整个韩国华人群体文化身份认同的共同特性，最终目的在于将韩国华人群体的特殊性放在整个华人群体的普遍性中去考察。

韩国华人华文文学资料本身的缺乏确实是不可否认的事实，但是，缺乏并不意味着不存在。笔者通过走访韩国多个地区的华人学校、华侨协会、华人教会、华人社团、以及曾经从事韩国华人华文报刊编辑或记者工作的人士，收集了韩国华人华文文学资料，并通过采访的形式更加深入地了解韩国华人华文文学创作当时的社会背景、华人社会的反映等情况；并多次到韩国的国立中央图书馆、国会图书馆、各高校图书馆查询和收集相关资料。笔者又多次到美国和台湾等地，走访了再迁美国和台湾地区后，继续从事华文文学创作、华文报刊编辑、或出版行业的韩国华人，收集了再迁韩国华人华文文学资料，其中包括再迁美国韩国华人创办的华文杂志，以及再迁台湾韩国华人出版的华文文学作品集等资料，另外还通过与作者的面谈，了解到更多作者创作当时的心理状况。

目前笔者所收集到的资料主要包括四个部分：第一，先迁韩国华人创办的华文报纸《韩中日报》、华文月报《韩华通讯》；华文杂志《韩华春秋》(月刊)、《韩中文化》(月刊)、《韩华天地》(季刊)、《韩华》(月刊)；学术性华文杂志《韩华学报》；华文单行本出版物秦裕光的《旅韩六十年见闻录—韩国华侨史话》、杜书溥编著的《仁川华侨教育百年史》；先迁韩国华人个人柳耀广于1969年10月10日至12日，在中国大使馆(当时的中华民国驻韩大使馆)中山堂举办的诗画展中展出的华文诗集，以及作者提供的日记。第二，再迁美国地区的韩国华人创办的华文杂志《韩华世界》、《美国齐鲁韩华杂志》(2009年之前的名称为《北美齐鲁韩华通讯》)；华文单行本出版物崔仁茂编著的《韩华在浴火中重生》；“美国南加州韩华联谊会”网站中的“韩华文艺”专栏。第三，再迁台湾地区的韩国华人的单行本出版物，分别包括初安民的诗集《愁心先醉》、《往南方的路》；郝明义的散文集《故事》。第四，后迁韩国华人的华文单行本出版物，李文的长篇小说《蒲公英：文麒留韩记》。

因为本文是以研究韩国华人华文文学为目的，所以在确定研究对象时，对于韩国华人报刊资料进行了如下的筛选程序：韩国华人华文报刊—>韩国华人华文报刊中的韩华文艺板块/

文艺副刊-）韩华文艺板块/文艺副刊中可以确定是韩国华人原创的散文、诗歌或其他各种文学体裁的作品。因此虽然设有文艺副刊，但是难于确定作者身份的《韩中日报》³⁴⁾；以及以政论性文章为主，且未设文艺板块的《韩华天地》不被看作本文的研究对象。再迁美国的韩国华人创办的华文杂志情况例外，两份杂志均没有单设文艺板块，但是杂志中发表作品的体裁以及作者身份容易区分，所以也被看作本文的研究对象。对于韩国华人华文单行本出版物的筛选则本着不包括以整理韩国华人各方面历史为目的，带有史学性的编著或个人回忆录性的作品，也不包括各种学术性作品，只选择纯文学性的诗集、散文集、小说集/长篇小说等类型的作品。因此《旅韩六十年见闻录—韩国华侨史话》、《仁川华侨教育百年史》、《韩华在浴火中重生》、《韩华学报》也不被看作本文的研究对象。这些资料虽然不是本文直接研究的对象，但仍然是本文重要的参考资料。³⁵⁾

最终，笔者所确定的研究对象资料包括：先迁韩国华人华文杂志《韩华春秋》、《韩中文化》、《韩华》、华文月报《韩华通讯》中，登载在文艺板块/文艺副刊的散文、诗歌、小说等文学体裁的作品；先迁韩国华人柳耀广在诗画展中展出的华文诗歌作品；再迁韩国华人的华文杂志《韩华世界》、《美国齐鲁韩华杂志》中的散文类作品；“美国南加州韩华联谊会”网站所设“韩华文艺”专栏中的散文类作品；再迁韩国华人的华文单行本，初安民的诗集《愁心先醉》、《往南方的路》，郝明义的散文集《故事》；后迁韩国华人的华文单行本，李文的长篇小说《蒲公英：文麒麟韩记》。表2是笔者对本文研究对象的整理。

[表2：本文研究对象一览表]

作者类型	时间	刊行物/单行本/网站	板块/专栏	文体类型
先迁韩国华人	1964.6	《韩华春秋》第1期	《评论》	评论
			《随笔·游记·小品》	散文
			《文艺·漫画》	诗歌
	1964.7-1964.8	《韩华春秋》第2期-第3期	《评论》	评论
			《随笔·游记·小品》	散文
			《生活·艺术》	诗歌
		《连载小说》	小说	

34) 笔者曾为确定《韩中日报》文艺副刊中发表作品的作者身份而走访了当时参与记者和编辑工作者，遗憾的是他们也表示因为作者作品数目太多，并且过去时间太长，很难回忆和区分每篇文章的作者身份。另外当时《韩中日报》中有很多作品都是台湾报纸的转载内容却没有标注，这就给确定作者身份工作带来了更大的困难。

35) 在这里需要强调的是，笔者对于本文研究对象的选择完全是出于对韩国华人华文文学研究之主题的考虑，在这里未被选定为研究对象的资料，仍然具有重要价值。特别是像崔仁茂编著的《韩华在浴火中重生》就是非常重要的参考资料，崔仁茂1942年出生于韩国大邱市，至高中受教于韩华学校，1961年赴台升学进入国立政治大学新闻系，离开校门返韩后投入韩华教育工作，1974年移民赴美，经营餐馆并兼任会刊《韩华通讯》总编辑，其后参与再迁美国华人华文刊物《美国齐鲁韩华杂志》的编辑业务，2003年夏完成著作《韩华在浴火中重生》，著作中有很多是对先迁韩国华人再迁美国情况的叙述，不仅对于本文，对于韩国的其他有关再迁韩国华人研究也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1964.9-1964.11	《韩华春秋》 第4期-第6期	《评论》	评论	
			《随笔·小品》	散文	
			《新诗》	诗歌	
			《文艺小说》	小说	
	1964.12-1966.4	《韩华春秋》 第7期-第20期	《论述》	评论	
			《随笔·漫画》	散文	
			《春秋诗苑》	诗歌	
			《文艺小说》	小说	
	1969.10.10-12	柳耀广诗画展		诗歌	
	1974.6-1974.7	《韩中文化》 第1期-第2期	未分类-〉 笔者判断	诗歌 散文	
	1974.8-1975.1	《韩中文化》 第3期-第8期	《侨社论坛》	评论 散文	
			《新诗》	诗歌	
	1975.2-1978.10	《韩中文化》 第9期-第49期	《侨社论坛》/《短评》	评论	
			《韩中园地》	散文 诗歌	
	1978.11-1983.8	《韩中文化》 第50期-第101期	《短评》	评论	
			《读者论坛》/《读者 投书》/《读者园地》	评论 散文	
	1983.9-1984.10	《韩中文化》 第102期-第114期	《短评》	评论	
			《文艺·小品》	散文	
	1984.11-1985.12	《韩中文化》 第115期-第128期	《专论与报导》	评论 散文杂感	
			《侨社动态》	散文杂感	
1990.5-1990.6	《韩华》 第1期-第2期	《评论》	评论		
		《纪事》	散文游记		
		《侨社园地》	散文		
1990.7-1990.9	《韩华》 第3期-第5期	《论坛》/《评论》	评论		
	1990.10-1991.2	《韩华》 第6期-第9期	《诗文创作》	诗歌 散文	
			《评论》	评论	
			《文艺》	散文	
	2010.6-2013.1	《韩华通讯》 第96期-127期	《衣建美生活随笔》	散文	
	2013.2-2014.5	《韩华通讯》 第128期-第143期	《衣建美教授文集》	散文	
2014.6-现在	《韩华通讯》 第144期-	《衣建美文集》	散文		
再 迁 韩 国	再 迁 美 国 韩	1982-现在	“美国南加州 韩华联谊会”网站	《韩华文艺》	评论 散文
		2007	《韩华世界》第1期	未分类-〉 笔者判断	评论 散文

华人	国 华 人	2009	《韩华世界》第2期	未分类-〉笔者判断	评论 散文
		2011	《韩华世界》第3期	未分类-〉笔者判断	评论 散文
		2009.10-现在	《美国齐鲁韩华杂志》第 24期-	未分类-〉笔者判断	评论 散文
	再 迁 台 湾 韩 国 华 人	1985	初安民 《愁心先醉》		诗集
		2001	初安民 《往南方的路》		诗集
		2004	郝明义 《故事》		散文集
后迁 韩国 华人		李文 《蒲公英： 文麒留韩记》		长篇小说	

笔者的实地调查经验证明，韩华华文文学是存在的，通过笔者的先行研究实践证明，韩华华文文学具有不容忽视的研究意义与价值。韩华华文文学在理解华人华文文学的问题上是不可或缺的一个组成部分，在理解中国文学，或者更进一步说理解中国和中国人的问题上也是必不可少的。本文试图以一条垂直线和三条相互交叉的水平线构成一个立体式的研究框架。垂直线直立立体框架中的最中心部位，实际代表的意义是韩国华人的身份认同，也是贯穿本文始终的一条中心主轴。第二章可以看作构成立体框架中的一条水平线。作为对韩华华文文学创作情况的一个整体性把握，第二章首先分为三大部分：第一部分从韩华华文文学作品数量最多的散文着手，分别介绍先迁韩华与再迁韩华华文散文的创作情况，以及这一文学体裁的代表作者作品的情况。第二部分介绍韩华华文文学作品数量较多的诗歌作品的创作情况，以及这一文学体裁的代表作者作品情况。第三部分介绍韩华华文文学作品数量相对较少的其他文类的创作，以及代表作者作品情况。第三章和第四章可以看作是构成立体框架的另外两条水平线，从不同角度分别提炼先迁韩华、再迁韩华与后迁韩华华文文学中出现的具体特征，并试图在各自独特性的基础上找出共性。第五章可以看作是垂直中心主轴的归结，主要目的就在于通过第二章、第三章、第四章的论述，最终考察作为跨国移居者的韩国华人所形成的新型的文化身份认同问题，同时对整个立体式研究框架的建构做出归结。

第 2 章 韩国华人华文文学的创作情况

韩国有很多与韩国华人有着密切关系的组织或社团，而由其中的一些组织社团主办或协办的华文报纸与杂志，在韩华社会中不仅起到了互相交流的言论媒体作用，并且为韩国华人的华文文学创作活动提供了重要平台。这些韩华华文报刊或杂志，是掌握韩华华文文学创作情况的重要资料依据。因此在具体介绍和分析韩华华文文学创作情况之前，有必要简要介绍一些与韩华华文文学创作关系密切的韩华华文报纸与杂志的情况。

1964年先迁韩国华人发行了第一本华文杂志《韩华春秋》，这本杂志在韩华华文文学历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它代表了韩华华文文学创作的正式开始，也是韩华通过华文文学创作来发声，叙说韩华坎坷人生经历，抗诉不公的社会现实，反省韩华社会弊端，重新思考身份认同，寻找更好生活突破口的珍贵资料。同时，《韩华春秋》杂志的文艺板块集散文、诗歌、小说等多种文学体裁于一体，是韩华所发行的华文杂志中，文体类型最为全面的一册。在韩华华文文学创作历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位置。

《韩华春秋》是月刊，1964年6月15日在首尔³⁶⁾发行，自1964年6月至1966年4月共发行20期。这份杂志的创办者是鞠柏岭、刘学武、谭永盛、曹积杰，按照当时韩国的法律，外国人没有创办杂志的权利，所以《韩华春秋》在发行上不得不借用韩国人的名义。四位创办者均为曾经留学台湾后返回韩国的第二、三代先迁韩国华人，他们出于热爱文学、关心韩华社会，希望韩华能有一本真正属于自己的华文杂志的热情，不求报酬，凭借不懈努力的精神创办而成。

《韩华春秋》之所以在此时期诞生，大概有以下几点原因：第一，1952年台湾针对世界各地华人实施侨生归国升学优惠政策，第一批先迁韩华青年赴台湾留学，升入台湾的大学。先迁韩华青年在台湾受到系统的高等教育，使其具有了从事华文文学创作的可能性。再通过接触韩华社会以外的世界，开阔了韩华青年看待事物的眼界，增长了重新审视韩华社会的能力，为韩华华文文学创作奠定了文学基础。第二，此时期的先迁韩华人口变化相对稳定，为韩华华文文学创作以及华文杂志的发行奠定了市场基础。第三，随着韩国日本强占期的终结与韩国战争的结束，韩国政治局势趋向稳定。1960年代发布《新闻以及政党等的登录法施行令》，将期刊物的许可制变成登录制，扩大了言论的自由度，虽然这一法令在1963年12月被修改为限制外国人的刊物发行权利³⁷⁾，但是韩华华文文学的创作以及华文杂志的创办，仍然因

36) 按照杂志创办时间，当时的地点应被称作汉城。但笔者在本文中，除了“汉城华侨协会”等固有名称外，所有代表地点的名称均统一称为首尔。

37) 宋佳，〈한국회교의 출판활동에 대한 일연구〉，《한국학연구》Vol.46，서울：고려대학교 한국학연구소，2013，p. 75.

此获得了一定的言论自由基础。第四，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原因就是由于当时在先迁韩华社会发行的华文报纸被台湾政府驻韩使领馆操控，基本上变成了国民党的党政机关报性质，这一点造成了先迁韩华的不满，他们希望办一份属于韩华自己的杂志来与被台湾政府控制的华文报纸相抗衡。³⁸⁾其实，这同时也是韩华对身份认同产生疑惑的一种体现。

《韩华春秋》在台湾驻韩使领馆及其代行机关华侨协会³⁹⁾的压制下短短坚持了两年时间，但是在这短短的两年时间里，《韩华春秋》却给韩华社会带来了不小的冲击。直到现在说起韩华华文文学成就，先迁韩华也总会首先提到《韩华春秋》。有一位再迁美国韩华，至今忆起《韩华春秋》都会称赞当年几位志趣相投的年轻朋友创办的杂志，首开针砭侨社月旦人物风气之先河，有如春雷名噪一时。⁴⁰⁾《韩华春秋》的发行给以后韩华华文杂志的发行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1974年在首尔发行了另一份华文杂志《韩中文化》。这本杂志是月刊，从1974年6月发行至1985年12月停刊，历时12年，共发行128期。《韩中文化》在名义上是韩中文化亲善协会⁴¹⁾发行的刊物，因此发行人、编辑人以及印刷人均以韩国人名义，只有主干是先迁韩华王世有⁴²⁾。但是实际上的资金筹备、稿件征集等实际运营工作都是韩华自己来完成，特别是在1982年以前，韩中文化亲善协会以及台湾驻韩使领馆基本不过问。王世有当时的计划很大，他不希望《韩中文化》的读者群只局限于先迁韩国华人，而是希望将其阅读面扩展到东南亚各国的华人社会。

《韩中文化》之所以在此时期诞生，除了上述原因之外，还因为1970年代为了寻找更有利于经济发展，子女可以受到良好教育的环境，过上更好的生活，为了寻找没有歧视的地方，而出现的先迁韩华再移居高地。⁴³⁾大批再迁韩华的出现，再加上世界格局的变化，如台湾与美国的断交、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始登上世界政治舞台等事件，造成在韩华人口急剧减少，给先迁韩华的心理上带来严重的不安。为了宣泄和安抚心理上的不安，他们需要一个互相沟通的平台，一个可以打破空间局限，不仅包括先迁韩华社会内部，更可以与移居他地的再迁

38) 《韩华春秋》在创刊号的发刊辞中说：“韩华春秋不是阿谀党派的机关纸，更不是任何权势的应声虫。韩华春秋的生存，不是代表本社同仁的生存，而是三万华侨表现意志的生存意义。”

39) 1947年中国总领事刘驭万将南韩的华人划分为48个自治区，政务被组织化，1950年代所有华人团体一体化成立韩国华侨自治联合总会，1962年改称为韩国华侨协会，华侨协会下面由50个地区分会组成，此时的华侨协会事实上就是中华民国的行政与外交业务的代行机构。

40) 季冬，〈东漂散记〉，《美国齐鲁韩华杂志》第35期，Laguan Woods, California：美国齐鲁联谊协会，2013.1，p. 16。

41) 韩中文化亲善协会设立于1965年12月，由曾任韩国驻台湾大使的韩国空军中尉崔容德命名，目的在于通过文化亲善维系韩中[台湾]两国的友好关系，文化亲善的具体实施就是发行《韩中文化》等华文报纸或杂志。

42) 王世有在中国大陆参加过抗日战争，中国内战爆发时加入国民党，后随国民党部队撤到台湾，韩国战争爆发后，又来到韩国在韩国陆军当局的协助下组成由韩国华人战略情报队(HIDSC)。1970年10月获得了韩国政府颁发的保国褒章和国防部发给的韩战参战纪念章。1970年代他开始到首尔、大田等地策动韩华协会会长办刊物，他的建议被韩国大田韩华协会朱维珊会长接受，表示愿意出资支持发行《韩中文化》。

43) 박경태, <화교, 우리 안의 감춰진 이웃>, 《황해문화》, 인천: 새얼문화재단, 2005, p. 238.

韩华社会之间，甚至像王世有所设想的，可以与东南亚各国华人，乃至全世界华人互通彼此的平台。

《韩中文化》的意义就在于：第一，虽然由韩国民间组织发行，但是1982年以前真正的经营运作全由先迁韩华负责，台湾领馆干涉也不多，基本可以保证杂志投稿人的言论自由。第二，《韩中文化》是韩华华文杂志中发行时间最长的杂志，为韩华的长期创作提供了可能性。通过此杂志可以从某种程度上了解1970-80年代先迁韩华的生活状况以及身份认同的变化情况。第三，开始注意关注韩华社会以外的华人世界，产生了将韩华华文杂志的视野，扩展到东南亚华人社会的想法。第四，开始重视与韩国报刊媒体的互动，力求争取更多韩国读者，扩大韩华华文杂志的影响力，这同时也是先迁韩华在地化欲求的一种外在体现。

1990年5月先迁韩华又创办了一份华文杂志——《韩华》月刊，1990年5月至1991年2月停刊，前后共发行了9期。《韩华》月刊的总编辑也是发起人是先迁韩华李溪信，副总编是柳耀广，两位均为第二代先迁韩华。多年从事《韩中日报》和《韩中文化》报刊发行工作的李溪信曾表明自己之所以努力想为先迁韩华社会创办华文杂志，原因是在看到先迁韩华华文报刊一一停刊后内心充满感伤，出于不想再听到韩华社会是一片文化沙漠的声音，通过华文杂志给韩华提供精神上的消遣，最终使沙漠变成绿洲。

不能否认这是《韩华》月刊得以诞生的重要原因之一，但是笔者认为《韩华》月刊之所以在此时期产生，更重要的原因还包括两个方面。其一，1970-80年代达到高潮的，先迁韩华的再移居现象，给整个韩华社会带来了不小的冲击。其二，此时期正值韩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邦交前夕，先迁韩华凭借韩国政府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政策上的变化、韩国媒体的报道宣传，以及韩国社会舆论等多种渠道，已经意识到两国建立邦交已是势在必行。先迁韩华因此开始对自己的未来惴惴不安，也许此时他们正需要一个可以互相沟通的渠道，相互交流应对目前政治局势的策略，商讨如何以中华民国国籍的身份在韩中(中华人民共和国)友好邦交的社会背景下继续生存下去。

2002年6月，汉城华侨协会开始发行华文报纸《韩华通讯》，每月发行一期。自2009年1月第79期开始，又另外开设《韩华通讯》电子版。值得关注的是从2010年6月《韩华通讯》第96期开始，在最后一版综合消息上增加了《衣建美生活随笔》板块。作者衣建美是第二代先迁韩华，是“韩华文艺讲习会”⁴⁴⁾的创办者之一，从2010年6月开始，衣建美基本上坚持在每一期《韩华通讯》上发表一篇个人随笔作品。自2013年2月《韩华通讯》第128期开始，板块名称改为《衣建美教授文集》，再到2014年6月最后确定为《衣建美文集》。

44) “韩华文艺讲习会”创建于1980年代末，由高丽大学中文系讲师衣建美与毕业于台湾师范大学的林勉君共同推动，是一个专为先迁韩华中学学生开设，以介绍文学发展潮流、增强学生对文学的理解和作品鉴赏能力为目的的文学社团。1980年代末韩华文艺讲习班在汉城华侨中学的开讲给先迁韩华的华文文学创作奠定了知识基础。

1970-80年代出现的先迁韩华的再移居热潮，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先迁韩华华文文学创作阵营，至少是部分阵营的转移。因为在当时特别是具有再移居美国等发达国家条件的先迁韩华，基本上都是财力充裕甚至雄厚，或是具有一定文化素养或从事教师工作的华人。这些再迁韩华中有很多是具备华文文学创作潜能，或是曾经从事过华文文学创作人士，比如《韩华春秋》的创办者中，除了鞠柏岭以外，其他几位几乎都离开韩国再移居其他地区。可以体现先迁韩华华文文学创作阵营转移的代表地区就是美国。

先迁韩华再移居美国之后，通过在当地建立起“美国齐鲁联谊会”等组织，强化了山东地区出身韩华的身份认同。并且再迁美国韩华的华文文学创作活动也较为活跃，由这些组织发行的一些旨在搞好各地韩华交流联谊为目的的通讯性华文杂志随之相继出台，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是《美国齐鲁韩华杂志》和《韩华世界》。

《美国齐鲁韩华杂志》原称《北美齐鲁韩华通讯》，创刊于2000年9月，是季刊，每年发行4期，至今仍在发行中。2009年因为刊物页面增加，编辑成员改组，名称也被改为《美国齐鲁韩华杂志》。首先从《北美齐鲁韩华通讯》和《美国齐鲁韩华杂志》的名称上多少可以感觉到再迁韩国华人漂移混杂在美国、齐鲁(中国大陆)、韩国之间的跨国移居特征。另外，从杂志名称的变化上也可以看出，再迁美国的韩国华人从2009年以前重视杂志的消息报道性，即希望通过这本杂志使各地的韩国华人互通消息，互知生活境况为目的，转变为2009年以后的重视杂志的文学性或文艺性特征。

另一本华文杂志《韩华世界》，从2009年到2011年，每两年发行一期，共发行3期后停刊，与《美国齐鲁韩华杂志》相比，《韩华世界》则较少出现通讯性文章，文学体裁以散文为主，大部分都在描写再迁美国韩国华人的生活情况和心理感受等，是研究再迁美国韩华生活状况以及身份认同等问题的重要资料。

再迁美国韩华除了正式出版的华文杂志以外，还有以网络为媒介的非正式出版物——《韩华文艺》网络专栏。再移居美国的韩国华人于1982年创建的“美国南加州韩华联谊会”网站(<http://www.hanhwa-la.org>)，至今已有三十多年的历史，其目的是希望取代报纸或杂志的功能，利用网站的时效性与韩华交流和沟通。网站上开设的《韩华文艺》专栏同样为再迁韩华的华文文学创作提供了展现的舞台。

通过上述内容，可以大致了解不同年代先迁韩华华文文学创作目的以及内容的不同，了解韩华华文文学创作阵营的变迁情况。这对于理解接下来将要介绍和分析的，有关韩华华文文学各个文学体裁在不同年代创作的变迁情况具有很大的辅助作用。

第 1 节 韩国华人华文散文的创作情况⁴⁵⁾

韩华华文散文作品，不管是在数量、内容还是形式上，在韩华华文文学的各个文体类型中都占有绝对优势。根据笔者所收集的资料，从1960年代至2017年，登载在韩华华文报刊杂志上的散文作品有300余篇，其中先迁韩华华文散文作品有150篇左右，再迁美国韩华华文散文作品有150余篇，各约占韩华华文散文作品数量的50%。除此以外，还有一部再迁台湾韩华2004年出版的散文集。

也许300余篇这个数字不免使人感到韩华散文创作的贫乏，但是在考虑到从事文学活动的韩华在人数上的限制，以及有利于韩华从事文学创作的外在条件的不充分等因素时，300余篇这个数字在韩华华文文学的历史中就具有了重要意义。即，因为后迁韩华移居时间还不长，尚未正式打开文学创作的局面。而先迁韩华在人口上仅有2万余人，由于受教育程度以及受韩语影响程度等原因，实际从事华文文学活动者还主要集中在第二、三代先迁韩华。再迁韩华中从事文学活动者，也主要是再移居美国或台湾等地的第二、三代先迁韩华。韩华作者中也没有专门从事文学创作者，他们终日为生计奔波，只能利用闲余时间创作。可以刊登作品的韩华报刊或杂志等的缺乏，也是韩华从事文学创作上的一个阻力。最后也不能排除笔者资料收集的不充分性等因素。

韩华华文散文从内容上看，横跨韩国、美国、台湾、中国大陆，以及其他华人居住地等多个国家和地区，涉及韩华经济、韩华社会、韩华教育、韩华移居生活实态等各个方面。从创作形式上看，又主要包括四种类型：杂文、哲理散文、游记、随笔等，下面分别考察各类型散文的创作情况。

1. 韩华华文杂文的创作情况

1960年代，不管是从韩华华文杂文作品的数量上，还是出现作者的人数上来看，都可以视为韩华华文杂文创作的高峰期。

此时期第二、三代先迁韩华已在韩国成长起来，较之第一代，具有更多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可以选择到韩国或是台湾的大学就读。随着第二、三代先迁韩华教育程度的提高，他们观察事物的视野更加开阔。他们认为眼前这个韩华社会已是千疮百孔问题重重，自觉有必要去揭露问题，谋求改善方案，以促进韩华社会的进步与发展。而杂文是一种直接而迅速地反映社会现象和问题、变化与倾向的文艺性论文，内容广泛，形式多样，这种文学形式正好迎合先迁韩华青年的上述创作目的。

45) 在进行作品分析时，出于必要笔者会引用或简述韩华文学作品的内容。由于韩华在语言上出现的混种化或韩国化特征，笔者在尽量保持韩华文学作品原本文风的叙述过程中，很可能也带有一定程度的韩国化倾向。对于其中一些难于理解的词汇或表达，笔者都会用[]或注释的方式加以解释。以下内容皆如此。

先迁韩华的杂文，在语言上活泼豪放，又不失锋利。时而以自嘲或反讽的形式，通过影射或讽喻的修辞手法，揭露韩华经济萧条难于发展，韩华生活诸多受限等不合理之处，如：熊仁的《“外行人”说外行话》(1965)、《炸酱面值价几何》(1965)、张铁板的《王书房的苦恼》(1965)、王小二的《四月的大邱》(1965)、无影岛的《侨民心声》(1965)等；时而运用双关、借喻等手法，揭露先迁韩华社会内部问题百出，不良风气弥漫的现实，如：洛东客的《釜山华侨“物语”》(1965)、《洛东随笔》(1965)等。

特别是揭露韩华教育中存在问题的杂文，更是运用幽默、讽刺的笔法，做到了战斗性与愉悦性的和谐统一。比如，揭露先迁韩华学校自身运营上存在问题的杂文，欧东方的《杏坛现形记》(1965)、司马希的《饭碗校长的“杰作”》(1965)、啸天的《港都风情“话”》(1965)等就是如此，诙谐而尖锐地嘲讽了先迁韩华学校校长从选举到行政管理上的不正之风，在学生管理上不重视人性化教育的弊端。

以其中的一篇《杏坛现形记》为例，在作者幽默滑稽的笔锋下，一位不懂教育倚老卖老的老校长滑稽百出的丑态跃然纸上，令人读后啼笑皆非。年轻有为的前任校长因为不怕得罪权贵，不抱“饭碗主义”思想，凡关于校内行政措施及人事安排决不受人干涉，甘愿做学校学生的校长，结果不幸被开除出校。终生为国民党立下汗马功劳却根本不懂教育的六旬老者，忠诚担当着“董事会的校长”之职，至终安然无恙。

正如《杏坛现形记》中刻画的“老校长”与“年轻校长”形象，如果单独看每一篇杂文，作品中都独立地塑造出了一个或是各几个鲜明的形象，但若是将这些形象合在一起，就会看到整个时代的面貌，即，在韩华青年人与老一辈韩华之间，已经产生了一条深深的代沟，先迁韩华社会落后的旧风习、保守的旧思想，正在埋没扼杀着韩华青年的前途和出路。在先迁韩华社会，老一辈人眼里的年轻人，总是乳臭未干的毛头小子，干不了大事，不能委以重任，因而韩华青年的才能毫无用武之地。身处这个矛盾重重的社会中，韩华青年自觉有权利也有义务去改造这个社会，但是对于他们这失落的一代、自顾不暇的一群来说，却只有无尽的哀怨与叹息。

1970-90年代，韩华这种利用诙谐幽默笔调，直戳问题要害的杂文文风逐渐呈现消退趋势。进入2000年代以后，由于再迁美国韩华华文杂文的创作，使韩华杂文重展昔日姿态。

再迁美国韩华的杂文作品，主要涉及四个方面的内容：其一，是与韩国相关题材的杂文，如：阿里郎的《说韩国泡菜》(2007)、老高丽的《“马格里”韩国米酒》(2007)；其二，是与中国大陆相关题材的杂文，如：编辑文章《酒醉乎？热情乎？龌龊乎？》(2007)、《中国人的不拘小节》(2007)、吕仁良的《北京的八大胡同可谓不雅观胡同》(2007)、乌鸦的《韩华节俭成性》(2007)、司晨的《大陆宾馆 无理索赔》(2010)；其三，是与台湾相关题材的杂文，如：焉晋琦的《中华民国与我》(2012)、李作堂的《难忘祖国德政与恩情》(2011)；其四，是与韩华

相关题材的杂文，如：贾凤鸣，《闲话韩国华侨的普通话》(2011)、李作基的《龙的传人》(2007)、《浅谈旅美韩华与韩裔》(2007)、于尚君的《韩华国籍的三岔路口》(2013)。这些杂文所涉及的题材本身就具有多元性，复杂性，这一现象也可以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再迁韩华在身份认同上的混种性特征。

2. 韩华华文哲理散文的创作情况

从笔者掌握的资料上来看，韩华华文哲理散文的创作至少在1960年代就已经出现，比如：先迁韩华黄务的《痰盂有感》(1965)、周宁的《仲秋夜语》(1965)、顽石的《大千世界》(1975)、轩生的《大自然的启示》(1975)等作品。

到了1980-90年代，韩华哲理散文不管是在作品内容上，还是在作品寓意的深刻性上，都达到了较高的创作水准。此时期，韩华的散文创作文风逐渐内敛化，以散文的形式讲哲理，借物寓意，劝诫教化，启迪人生的哲理散文则较为引人注目。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作者是出现在1980年代的先迁韩华夏虫，以及1990年代的先迁韩华王齐先。

作者夏虫，善于以物喻意。其作品《仲夏呓语》(1983)通过家里已经使用了22年，并预计还能用上十年八年的“顺风”牌电扇，寓意万事都要从“长远”打算，凡事长远才能见到它的真价。《语冰集》(1983)则通过称赞家里一台使用了二十年仍然坚实耐用的大同牌电锅，是因其公司在许多“看不见”的地方精心而为以致成功的实例，来批判那些专在“看得见”的地方用力，“看不见”的地方则乏力的社会现象，用嘲讽的笔调将一座只在“看得见”的高楼大厦、街路广场上下功夫，而忽视“看不见”的上下水道，最后成为壮观其上不堪其下的都市，比作便秘的美人，令人惋惜。更值得注意的是这里的大同电锅是作者从台湾买回来的，作者借用台湾的物品，忧虑的是自己实际上所生活的韩国都市现实。

作者王齐先是一位牧师，他的作品多少有一些说教意味。《自胜者强》(1990)意在劝诫韩华必须对自己产生信心，对于自己的所短所长一目了然，认识清楚，才能开拓自己的前途。一个人如果能认识自己的缺点，再能克服自己的缺点，当然不难日新又新，成就无限。假若一个人屈服在自己的缺点下，又自己做不了自己的主，那才是一个可悲的人。《油条受屈》(1990)有力求为“油条”翻身的架势，作者认为本指一个人油滑、奸巧、固执的“老油条”一词这实在叫油条受屈，因为油条的原料，是一种洁白无瑕，人类维持生计所必须的面粉，在日常生活中人人都少不了。虽然在体型上并不甚高大，但却有潜在发酵的功能，其发挥的程度往往要比本身大出若干倍，比起墨守成规，无所发展的锅饼，更要有过之无不及。另外作者还赋予“油条”一种更深刻的寓意，即是一种在棍棒下成长，热辣辣的油锅中磨练，被揉、被压、被打、被煎熬后仍能以黄金般的色彩跻身社会的坚强意志，而作者又似乎在暗示这正是韩华身上所具有的那种精神。

作者们在借物寓意的手法上，相当具有跨越性，比如：作者表面上似乎在叙说韩华社会的一种最普通不过的食物(这种食物在韩国是没有的)，但最终寓意却在于思考跨国移居者在移居地生活的态度与精神。亦或是借用家中使用的台湾产品来教化韩华在韩国社会生活，就要具备长远的眼光。作品表面看来都以不相干的事物展开，开头看似并不鲜明，但通过道理的论述，以及最后的评论使主题分明。

2000年代以后，韩华华文哲理散文的创作很少出现，这里也不排除笔者收集资料上的局限性。

3. 韩华华文游记的创作情况

至少从1960年代开始就已经出现了韩华华文游记的创作，比如：有关台湾之行的巴本宽的《老巴游台不亦乐乎》(1966)、高登河的《台北十日记》(1979)等；有关美国等其他地区之行的曹青菊的《旅美履痕》(1964)、于碧川的《旅美琐记》(1982)、港影的《“华人”在“英伦”》、邹生的《旅次见闻与杂感》(1984)等作品。

进入1990年代，游记继而成为韩华散文创作的主旋律，这大概是受到先迁韩华的再迁现象，以及韩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等历史事件的影响。从作品内容上来看，记叙的主要是有关游览中国大陆、美国以及其他华人居住地区的所见所感，在某种程度上体现出韩华华文文学的跨国性。

其中，值得关注的是先迁韩华有关中国大陆纪行的4篇游记作品：辉光的《暴风雨降临前的北京城》(1990)、王梦兰的《大陆探亲归去来》(1990)、贺山的《大陆纪行》(1990)、张泰河的《回乡探亲一期待和失望》(1991)。

从作品的创作时间上来看，正值韩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前夕，时隔四十年之久先迁韩华又重新获得踏上中国大陆的机会。四十年，是足够一代人成长的时间，许多在韩国出生的第二代或者第三代华人从未有机会踏上过中国大陆这片土地，也就是那个作为祖籍所在地的“故乡”。先迁韩华生活在韩国社会，几十年的时间足以使一代人习惯了韩国式的生活以及韩国人看待问题的角度，而大部分先迁韩华从小学到高中都在华人学校使用中华民国的教材接受台湾式教育，对政治与历史的看法又不可避免地被染上台湾色彩。这样的经历就使得先迁韩华在踏上中国大陆这片土地上的时候，身份变得模糊不清，也就是这样的移居经历，使他们已经不能完全回到一个纯粹的(从未有过跨国移居经验的)“返乡者”的身份，与故乡重续旧情。他们会从与“纯粹的返乡者”不同的视角来“审视”那个“道听途说的故乡”。

在先迁韩华的上述游记作品中可以看到，他们惊讶于当时中国大陆的贫穷：“大陆第三大城市的天津机场，像一片废墟，没有一架外国飞机，只有二架小型中国民航机停留在机场”。⁴⁶⁾他们惊讶于所谓大城市的大型百货公司设施的简陋，这甚至会使他们联想到：“虽然

46) 辉光, <暴风雨降临前的北京城>, 《韩华》, 首尔: 韩中文化协会, 1990.6, p. 28.

大陆输出石油和煤炭，但那是人民受冷挨冻所换来的”。⁴⁷⁾他们惊讶于在中国大陆一打电话就能通，惊讶于中国大陆也在研究红楼梦这本中国文艺史上的巨作。他们看待事物的态度更接近于一个局外人的审视，也许他们在惊讶中国大陆的实际面貌要比自己“想象”中的还要差。有人在国际饭店前面购买到新义州与平壤的火车票，这对于一个“纯粹的返乡者”来说并没有什么特别，可能会平凡到视而不见。但是对于长期生活在南韩，对北韩几乎一无所知，甚至认为那里是禁地的韩华就会觉得“这是一件新鲜的景象”。当那个高中课本上的“大观园”真实的出现在眼前时，他们除了会看到“怡红院，潇湘院，回廊上十三金钗的诗词，一道又一道的院墙”之外，也会批判：“也许大观园是近来才建造的，总有些偷工减料之感，尽管皆是雕龙刻凤的装饰，却又缺少古香古色的味道”。⁴⁸⁾

先迁韩华的游记作品中还表示，来到自出生四十年未见的故乡，来到父母离乡前的故居，在来自韩国的他们看来，这所故居里的陈设“连简陋都称不上”，亲戚使用的收音机还是韩国五十年代木盒做的那种。出租车司机当得知他们是从韩国来的，对他们说“姓资的都富，姓马的都穷”，他们也并没有加以反驳，却想到了中国的一句古语“哀莫大于心死”，并自我推断，像司机那样认清大陆的生活水平和先进国家相差太远，和台湾韩国更相差很大，将可能成为推进中国大陆经济开放改革的主力。⁴⁹⁾

先迁韩华有关中国大陆的游记作品，其价值就在于它从某一个侧面体现出先迁韩华对自身身份认同的思考。认同是指我们如何看待自己与他人如何看待我们的方式⁵⁰⁾，很明显，中国大陆人并不把这位来自韩国的华人认同为和自己属于同一群体，至少在出租车司机眼里他们一个“姓资”，一个“姓马”。而韩华在听到这些话语之后，也并没有急于辨明，而是采取一种默认的方式。也就是说，此时韩华看待自己的方式，与出租车司机看待自己的方式，在不属于中国大陆人这一点上达成了一致。

还有一篇值得关注的游记作品是先迁韩华苗岭的《新印旅行记》(1990)。作者游历了印尼、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等地，有趣的是作者按照自己的标准排列了“华人在南洋的地位”，而作者排序的标准是值得关注的问题。

作者将新加坡华人排在第一位，理由是新加坡种族平等，采用中、英语为国语，政治最清明，具有严刑峻法的法家制度，华人在新加坡是主人翁。马来西亚华人被定位为“二等国民”，理由是马来西亚华人虽然掌握经济大权，有华文报纸、华语电台，但是独立后马来人执政，华人在政治上深受排斥，距离政治平等，尚有一段距离。印尼华人被排在第三位，原因

47) 张泰河, <回乡探亲—期待和失望>, 《韩华》, 首尔: 韩中文化协会, 1991.2, p. 30.

48) 辉光, <暴风雨降临前的北京城>, 《韩华》, 首尔: 韩中文化协会, 1990.6, pp. 28-31.

49) 参考张泰河, <回乡探亲—期待和失望>, 《韩华》, 首尔: 韩中文化协会, 1991.2, pp. 31-32。这里所谓姓资的是指资本主义国家, 姓马的是指马克思主义国家。

50) 史书美, 杨华庆译, 蔡建鑫校, 《视觉与认同—跨太平洋华语语系表述·呈现》, 台北: 联经出版社, 2013, pp. 34-35.

是印尼华人被同化，在南洋的华人中印尼华人遭遇最惨，荷人统治时代，华人掌握印尼经济，不愿参加政治活动。印尼独立后，被人宰割，苏卡诺时代与中共建交，亲中华民国的华人被迫害不能在印尼立足，大批往外迁移。另外在华人受教育问题上作者也将印尼华人与韩华作了比较，自1965年后印尼政府对华人实行同化政策，关闭华侨学校，在公共场所，一律禁止使用中国语文，与此相比先迁韩华在受汉语教育方面自由自在。

从作者对华人在移居国所处地位的评价标准上可以看出，作者认为最重要的基准是看华人在移居国家的政治地位，也就是华人在移居国政治上所享受到的民主自由程度；其次是华人在移居国的经济地位，也就是华人在移居国家经济被允许自由发展的程度；最后是在移居国的语言文化自由程度。作者认为华人不能掌握政治大权，而是在移居国掌握了主要经济命脉，则可算作“二等国民”。如果按照作者的这种评价标准来看，至少在作者心里在移居国既没有拥有政治地位也没有获得经济发展自由的韩华只能沦为“三等”。不仅是作者，其他韩华也有同样的感受，他们同样认为韩华人少力薄，论人口论经济皆不能与新加坡南洋等地相比，韩华没有玩魔术的本钱，只能在灰色地带安分守己。⁵¹⁾

然而在笔者看来，即使被作者评价为掌握政治大权的“一等国民”——新加坡华人，虽然汉语、英语都被认定为国语，但实际上在新加坡不精通英语，也是根本不能进入仕途的。由此，我们不得不再次思考边缘性的问题，也就是说，被作者评价为“主人翁”的新加坡华人，是否真正摆脱了其边缘性的地位，成为了中心？再进一步说，如果新加坡华人的地位尚如此，那么包括韩华在内的其他世界各地的华人群体的边缘性问题又当如何？

另外，还有一个问题是需要明确的，即，表面上看起来，作者认为印尼华人在南洋华人的地位最低的根本原因是“被同化”，但是这并不表示作者反对移居者与移居国家的“同化”，作者反对的是移居国家对移居者所实施的强行同化政策，对于新加坡华人以自由主人翁的姿态，与印度人、马来人平等相处，共同为建设新加坡而努力这一点，是表示肯定与羡慕的。作者向往的是，移居国家可以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给予移居者充分的自由空间，移居者也会积极自愿地进行在地化实践，扎根于移居社会，并为移居国家的发展贡献力量。

2000年代以后，先迁韩华衣建美创作了游记《不虚此行——梵蒂冈》(2014)等作品；再迁美国韩华也继续延续着韩华华文游记的创作，出现了陈维云的《韩花姐妹埃及游记》(2007)、高文俊的《日本游记》(2009)等。

4. 韩华华文随笔的创作情况

韩华华文随笔的创作，同样在1960年代就已经出现，比如：先迁韩华齐鲁的《客在他乡》

51) 萧兮，〈请为侨校留一片净土〉，《北美齐鲁韩华通讯》第14期，Laguan Woods, California：美国齐鲁联谊协会，2006.12, p. 35.

(1964)、尉迟的《背十字架的人》(1965)等。1970-90年代又相继出现了先迁韩华陈传治的《香泉寺》(1975)、高登河的《病中散记 四则》(1978)、王齐先的《七七感言—从七七到九零年代的回想》(1990)等作品。

2000年代以后， 华文随笔的创作成为韩华散文创作的新趋势。特别是先迁韩华女性作者的出现，更成为韩华散文创作，更进一步说成为韩华华文文学中一道新的亮丽风景。

先迁韩华女作者衣建美，是在韩国出生的第二代华人，曾在高丽大学、诚信女子大学等地任教，至今仍担任韩华学会副会长，以及爱华图书馆馆长之职。衣建美于2010年6月开始在《韩华通讯-衣建美文集》板块上发表随笔，至今已发表80余篇。衣建美善写生活随笔，在创作手法上，往往旁征博引，行文缜密，又富有深情，就像作者在与读者谈心般轻松。作者的写作意图大多在于传达一种快乐的心情，或者是一点感悟，一个发现，通过评析世态人情，启人心智，引人深思。

“乐活”是衣建美生活随笔的一大主题，作者认为有谁没哭过，有谁没痛过，有谁没笑过，有谁没爱过，有谁没孤独过，有谁没失意、低落、软弱、羞愧、恐慌过，人活着多少都有点儿自我存在的困惑与质疑。重要的是要定格“活在当下”，日子过得越滋润越好，就像花园中的花草，阳春白雪，得以自在。所以她主张让生活变成“一种美学，一种品味”，要懂得“乐活”、“慢活”、“绿活”，“用收放自如的人生，笑傲于潇洒人间”。

衣建美的大部分随笔都显出一种乐观、积极对待生活的态度，但实际上，在作者的人生经历中，却并非只有平坦和一帆风顺。作者也曾由于家里经济拮据而无奈地选择免费在台湾国立华侨实验中学就读普师科；也曾在足够录取分数的情况下，只因为韩华的身份而被韩国的首尔大学拒之门外。作者也表示有时自己也会去质疑一些事物的可靠性，持久性，但有一件事绝不能怀疑，那就是不能怀疑“我”的存在，所以她相信踏出去的每一步，都会抵达一个目的地。⁵²⁾让生命更美好之前，时时停泊关照心面，人的心静了，就气定神宁，在人生中的沉浮之中，让心依然拥有淡定豁达，心若不动，风又奈何，在宁静中品味生活享受人生。

她的散文无疑为先迁韩华孤独压抑的移居生活带来一丝春意，一丝温暖。更重要的是作者相信韩华能够通过调整心态，从而更好地适应移居地的生活，因为在她眼里，韩华有一种“真精神”，这种“真精神”就是即使处在客观不完全的条件下，仍然可以去不断拓展，仍然有勇气去面对不同的横逆及阻碍。

2000年代以后， 再迁美国韩华的随笔创作也成为韩华华文散文的一大亮点。从内容上来看，大部分作品是关于对曾经的韩国移居生活的回忆，也有一小部分是涉及移居美国后生活情况的作品。这些再迁美国韩华的随笔， 体现着再迁美国韩华对身份问题始终不断地思

52) 以上叙述参考衣建美，〈衣建美生活随笔〉，《韩华通讯》147期，首尔：汉城华侨协会，2014.9；衣建美，〈吹皱一江春水〉，《韩华通讯》156期，2015.6。

考，也体现出他们对“根”的思考与诠释。

再迁美国韩华焉晋琦的《见不得光的一座冠军银杯》(2009)，回忆的是作者与其他四位韩华代替台湾选手参加大韩射击联盟在济州岛举办的国际亲善狩猎射击大会，最终荣获银奖，却由于自己是“冒牌货”的身份而没有勇气向任何人夸奖它的来历，故而这座银雕的冠军奖杯虽然得来不易，但也因为师出无名而见不得光。作者只好将它摆在客厅暗角处木厨架上，心领神会的自观自赏。

再迁美国韩华季冬的《东漂散记》(2013)，追忆着位于中国大使馆前的，汇集中正图书馆大厦、华侨协会、华侨小学、居善堂、各侨团，荟萃韩华人文文化，被韩华约定俗成的“馆前街”，同时也为使领馆前右侧巷口那座曾经对于韩华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的，党国威权时代的国民党驻韩直属支部的二层水泥楼房，如今已然成为没有香火的闲庙，而感发望“庙”兴叹之情。

再迁美国韩华王宜敏的《巨星的陨落——追悼许传修同学》(2010)以追悼文的形式，追述了1955年以第一个韩华学生身份到美国留学的许传修，罗城大学毕业后通过自己不懈地努力将事业由餐馆扩展到旅馆及房地产获得成功后，捐巨款在中国大陆的故乡日照市建立第一中学、日照高级工业学校、设立贫困学生奖学金、建立现代化自来水厂，同时热心帮助先迁韩华，也热心居住当地的公益事业，捐献不比故乡更少，成为罗城著名慈善家的事迹。

上述三篇随笔可以在某种程度上体现出再迁美国韩华在身份认同上的变化，即再移居前的1950-70年代，先迁韩华始终承认中华民国的正统地位，具有中华民国国籍，但是在身份上却具有一种模糊性，就像作者所说自己是个“冒牌的台湾人”。再迁美国之后，这种对中华民国的认同逐渐弱化，再迁美国的韩华更习惯称自己是台湾人，同时他们不仅热心移居地的公益事业，也不忘支援中国大陆故乡的建设、心系仍然留在韩国的华人，从某一层面体现出再迁美国韩华身份认同上的混种性特征，关于这一问题，将在第四章和第五章展开具体论述。

再迁美国韩华作者中还出现了一位女性作者崔楼一莺，她于2007年至2011年在美国发行的韩华华文杂志上共发表过4篇随笔：《吾爱吾师》(2007)、《小公洞往事》(2009)、《伤逝》(2010)、《那一代的事》(2011)。作者用清新婉约的文笔，脱去世俗纷争，脱去凡尘困扰，通过对曾经在韩移居生活的回忆，描画了一个充满温情的真实的韩华社会。也可以说，正是因为韩国的移居生活，也曾经充满了温情与美好，才会使得韩华即使再迁他地，仍然久久怀念。

《小公洞往事》中作者回忆着人情味浓郁的小公洞的童年生活。作者听祖母说英国人把他们从上海带到首尔是因为祖父是西装裁缝，安排他们定居贞洞⁵³⁾，但是现在想起来这栋楼房

53) 这里的“洞”是韩国的地区行政单位之一，在市、区、邑之下，下分统和班。

被祖父母装修得像极了上海的弄堂住宅。作者身在美国，但是她对童年时期在韩国生活的一切都记忆分明：她仍然记得“源泰昌”，记得以源泰昌为中心，向西大门走，便是小时常去的首尔俱乐部，记得吴福森爷爷是那里的大总管，吴业兴三叔是宴会高手，杨秋冬阿姨表现了上海人的素质和潜力；仍然记得走到大汉门，过了马路是一排餐馆栉次鳞比，有中央饭店、天津饭店，仍然记得天津饭店是天津人开的，家规大，大女儿与自己同班，一下学便得回家，穿着密密实；仍然记得小时候每天都要经过的老李小铺，李老爹似乎有做不完的事，他不与自己打招呼，却说“听说昨天你迟到了，还买这么多零食做什么？”作者仍然记得那时小公洞的人是多么的纯朴自然。⁵⁴⁾

《那一代的事》中作者回忆着那个年代，华人孩子们的天真无邪。在那个战乱的年代，孩子们却因为每天可以背着有地址名片的“十字”急救小背包，听着刺耳的警报笛而兴奋。在那个父亲是敌伪汪政府领馆专员，母亲是日本人，一家人就像一滴油，融不进华人社会的年代，孩子们也总会聚在那个小伙伴的家门口，叫一声“冯明玲，来跳绳啊！”作者还回忆着那个年代，韩华的纯朴热情。她无法忘怀在那个因为战争，人人都生活艰辛的时期里，当自己避难到釜山时被一家韩华照顾得无微不至的年代。⁵⁵⁾

作者通过一些琐碎得不能再琐碎，平凡得不能再平凡的生活细节，用极温柔的声音向世界宣告这就是真实的先迁韩华，一个充满温情的韩华社会，作者将这个特殊的群落称之为“真正的华侨文明”⁵⁶⁾。在这些随笔中，也体现了作者对“根”的诠释。作者认为虽然那个年代过去了，他们这一辈人都已年逾古稀，经历了忧患，涉猎的知识半新半旧，因缘际会，偶然也按捺不住或中或西的影响在意识中，但是儿时的故事，儿时的梦想，即使再迁往任何地方都刻刻难忘，因为那些是让自己生命丰美的前尘往事，那是身藏的老根，忘了浇水也不干枯。

5. 韩华华文散文集的创作情况

2004年，再迁台湾韩华郝明义出版了散文集《故事》。

郝明义1956年在韩国釜山出生，在釜山的华侨学校读小学和中学，之后又升入台湾的台湾大学。1978年毕业于台大商学系国际贸易组，次年开始进入出版业工作。1996年创立大块文化出版公司，2001年创立《网络与书》，任大块文化董事长与《网络与书》发行人之职。他的著作有《故事》(大块文化出版)、《工作DNA》(大块文化出版)等，其中与韩国移居生活有关的作品是出版于2004年的散文集《故事》。

54) 以上叙述参考崔楼一莺，〈小公洞往事〉，《韩华世界》第2期，Walnut Creek, California：韩华基金会，2009.10，p. 19。

55) 以上叙述参考崔楼一莺，〈那一代的事〉，《韩华世界》第3期，Walnut Creek, California：韩华基金会，2011.10，p. 55。

56) 崔楼一莺，〈小公洞往事〉，《韩华世界》第2期，Walnut Creek, California：韩华基金会，2009.10，p. 19。

作者谈到他最初会写《故事》这本书，是因为一个人，是他的一次接受记者采访时，谈生命里影响深刻的女性，除了母亲他的心头浮现了另一个人的身影，她就是作者在就读华人中学的时候，他的级任导师池復荣。由此作者试着打开自己尘封的记忆，在整理一个老师的故事的同时，也回顾了许多自己作为一个学生的故事。

在郝明义的印象里，韩国地形多山，釜山更是丘陵起伏。他觉得釜山这个城市很好描述：一条沿着海岸线蜿蜒的大马路所形成的交通要道；一片倚山临海，高高低低绵延在山坡上的房子。郝明义的记忆回到1960-70年代的韩国釜山，火车站对面，越过交通动脉的大马路，进去一点点，左右又分出两段窄得开进一辆车都嫌窄的，两者内容却大不相同的街道：右边这一条，是每个傍着海洋的城市都会有的，让水手上岸玩耍的酒吧街，他现在仍然觉得1960-70年代这样“德克萨斯胡同”在韩国洋溢着各种意义。和“德克萨斯胡同”相对的左边这一条，是另一种气氛。大约从清朝的时候开始，中国人到釜山来居住和活动的场所，总长不过两百来公尺，主要热闹的那一段更不过总长的一半。早年韩国人称前街为“清官胡同”，而华人们则称这条具体而微的街道为“唐人街”。前街往上，爬一个大约四十度的陡坡，有另一条宽窄相当的街，叫后街，郝明义的家就住在后街上。⁵⁷⁾

郝明义表示选择离开韩国到台湾生活的原因有两个，第一是因为华人在韩国当地受到各种限制以及不平等待遇这些现实因素的影响。第二是因为对中国文化根深柢固的认同，而选择台湾是因为觉得那里才是中国文化保留得最完整的地方——虽然那是个遥远的陌生的热带国家。⁵⁸⁾但是郝明义并不否认韩国文化对自身的巨大影响，甚至认为自己之所以有勇气只身来到台湾打拼，也是受到韩国人所特有的某种精神的影响，这是郝明义在韩国居住、成长的时候没有认知，反而人过中年，回忆过去的时候才觉悟到的。

总体来看，韩华华文散文创作存在着自身的一个发展变化过程。

1960年代，接受高等教育的韩华青年与仍然固守旧思想的老一辈保守派之间产生了代沟。因此先迁韩华青年批判韩华社会现实的创作目的，使得杂文成为此时期韩华主要的创作形式，多以诙谐幽默、讥笑嘲讽的手法，揭开韩华社会的伤疤，以求治愈良方。1970年代以后，杂文这种创作形式仍然出现，但是明显不如1960年代的创作那般活跃。再到2000年代以后，由于再迁美国韩华杂文创作的加入，使韩华华文杂文创作重新活跃起来。

1970-90年代，韩华散文的文风逐渐由诙谐嘲讽，向寓意教化探索人生哲理的方向转变，创作目的主要在于探讨先迁韩华如何能够更好地生活在韩国社会。因此，此时期多位先迁韩华作者多选用哲理散文，特别是其中的生活哲理散文的形式进行创作，达到了较高的创作水准。

57) 以上叙述参考郝明义，《故事》，台北：大块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4.3，pp. 27-32。

58) 郝明义，《故事》，台北：大块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4.3，p. 110。

1990年代，从某种意义上可以看作是韩华游记创作的一个高峰期。韩华游记作品，从内容上看主要记录的多是游览中国大陆，或是美国等其他华人移居地的经历，在风格上，抒情色彩并不浓厚，而带有很强的议论色彩。先迁韩华游记作品最大的研究价值则在于，这些作品从某一侧面体现出先迁韩华对身份认同的思考。

2000年代以后，韩华的散文作品，呈现出一种在经历了为谋求出路而焦急苦恼，为身份的模糊不清而迷茫困惑之后的一种淡定，一种尘埃落定后的平静。此时期的先迁韩华多以随笔的方式抒写生活，抒写作为跨国移居者的人生，并在人生中寻找乐趣，寻找人生的真谛。再迁韩华华文散文从内容题材上来看，涉及韩国、中国大陆、台湾、美国等各个地区，跨国移居者的特征更加明显，混种性身份特征也更加明显。另外，再迁韩华对曾经那段韩国移居生活的影响，持有肯定的态度，在一些有关韩国移居生活回忆的散文作品中还体现出再迁韩华对“根”的思考与诠释。

由于笔者资料收集得还不够充分，后迁韩华华文散文作品在这里未能得到考察。有关后迁韩华华文散文作品的调查与研究，还有待今后的不懈探索与努力。

第 2 节 韩国华人华文诗歌的创作情况

据笔者的不完全统计，韩华华文诗歌作品约计188首，主要包括两个部分：其一，是先迁韩华创作的作品约有65首，创作于1960年代的约有45首，创作于1970年代的约有16首，创作于1990年代的约有4首。其二，是再迁韩华分别于1980年代与2000年代出版的诗集中，共收录诗歌作品123首。先迁韩华华文诗歌作品的来源又主要包括两个部分：第一是先迁韩华发表在各个时期华文杂志上的诗歌；第二是先迁韩华个人诗画展中展出的华文诗歌作品。

从韩华华文诗歌的内容以及内容的表达方式上来看，韩华华文诗歌又主要包括四种类型：抒情诗、叙事诗、拟古派诗与现代派诗，下面分别来考察这几种诗歌类型的创作情况。

1. 韩华华文抒情诗的创作情况

1960年代，主要出现了9位韩华诗歌作者，创作的抒情诗约有24首。其中比较多产的是先迁韩华洛蓝，在韩华杂志上共刊登过9篇作品：《痴寻你走了》(1964)、《别后》(1964)、《思念之飞行·在四季》(1964)、《圣诞感怀》(1964)、《除夕在我心深处》(1965)、《失落的约会》(1965)、《마도로스⁵⁹PAN》(1965)、《蓝色中的爱》(1965)、《我是很甲骨文的》(1965)等。其次，先迁韩华枫涛也在杂志上登载过5篇作品：《想你》(1964)、《我心灵中——你的爱》

59) 作者解释为“海员”之意。原是荷兰语matroos, 远洋船员之意。

(1965)、《伤情，在四季》(1965)、《梦境》(1965)、《我寂寞等你》(1965)等。此外，还有先迁韩华回罕的《为你.....我的爱》(1965)、《静夜中的人》(1965)，先迁韩华北斗的《寄语》(1965)、《心颂》(1965)，先迁韩华春光的《失去的爱》(1965)等等。

从这一时期诗歌的内容上看，除了几篇具有颂诗和讽刺诗的风格之外，大多为直抒胸臆，抒发爱恋思念之情的情歌类。诗歌没有具体叙述事件或生活的过程，但是韩华作者们却又通过抒发自己的思想情感来反映生活，激荡着时代的旋律。

此时期的抒情诗多以“离别”、“失落”、“伤情”、“寂寞”、“失去”等为主题，诗中流露出无尽的悲情色彩。比如：洛蓝的《痴寻，你走了》⁶⁰⁾中，作者在“拨荆棘的草丛，爬蜿蜒的雪径，涉重重的溪河，穿密集的人群，从城镇巷街，僻乡孤岛”疯狂地找寻，因为他必须在毫无预告毫无心理准备的情况下承受离别的重量：“你走了，是悄悄的，不向我道一声亲热的称呼，不向我回眸最后的一瞥。”作者对这样的离别充满了埋怨，因为这样的离别“欠我一声深情的祝福，温柔的叮咛，欠我一个含泪的抛吻，世纪末的拥抱。”

这里作者似乎是在抱怨弃他而去的恋人的无情，但是从诗人埋怨的语气以及诗歌字里行间所流露的感情上，又使人怀疑作者所埋怨的“恋人”到底所指为何？从当时韩华的韩国移居背景上来看，1950年代毫无征兆的战争，战后韩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关系的恶化使先迁韩华失去了心灵的依靠，他们被禁止再踏上那个在经受苦痛或寂寞时可以暂时作为心理慰藉的“故乡”。作者此时“摒弃了时间，摒弃了空间”，以他全部的呼吸想要寻找的，也许是恋人，但也许是“重燃自己生命的火光”，是“枯竭了的灵感与荒废了的梦”，是“向另一个梦另一片海波抛锚，渡一身异国星月的光辉，逐向另一幅画另一篇诗另一首恋曲扬帆。”⁶¹⁾也就是在变动变化变迁中寻找新的平衡，新的开始，适应变化开始更好的生活。

先迁韩华的另外一首爱情诗也在某种程度上证明了这一点。在春光的《失去的爱》⁶²⁾中，作者这样写道：“我何曾爱过你？没有和你漫步过烟雾漫迷的沙滩，从莫流连在百花缤纷的山畔，但是，你的倩影猛力难忘。”这样的描写更加使人联想到作者在这里提到的自己都不敢确定是否爱过的“爱人”，或许指的就是韩华曾经为了更好的生活而选择离开的“故乡”。如前所述，此时期的韩华作者大多是接受过高等教育的第二代或第三代华人，从诗歌的创作时期上来看，诗歌的作者很可能在记忆尚未分明的幼年时期曾经去过中国大陆的故乡，或甚至从未踏上过故乡的土地。他们对中国大陆，对所谓故乡的认识不过是从父辈那里听来的并非真实的建立在想象之上的“形象”。

因为没有过真实的接触，所以作者的感情也处于模糊不确定的状态。诗中说“没有和你

60) 洛蓝, <痴寻 你走了>, 《韩华春秋》第1期, 首尔: 韩华春秋编辑委员会, 1964.6, p. 10.

61) 洛蓝, <叫도르스 PAN>, 《韩华春秋》第14期, 首尔: 韩华春秋编辑委员会, 1965.7, p. 32.

62) 春光, <失去的爱>, 《韩华春秋》第16期, 首尔: 韩华春秋编辑委员会, 1965.9, p. 32.

漫步过烟雾漫迷的沙滩，从莫流连在百花缤纷的山畔”，而漫步烟雾弥漫的沙滩，流连在百花缤纷的山畔，这些都属于作者与韩国之间的真实经验，真实记忆。但即使如此，故乡的情影也猛力难忘，这种对故乡的哀恋之情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加深。这里体现出作者肉体与精神上的矛盾与错置，作者生长、生活在韩国，所有的经验、经历留下的都是自己与韩国的记忆，但是韩国却不是作者精神上可以寄托之地，而故乡，即使是被想象的虚无缥缈的存在，却是作者无法忘怀的情绪。

另一方面，这些叙述又从某一层面上体现了先迁韩华以非韩国人身份，生活在韩国的错位生存的无奈，这是一种就像“隔季的秋风，将春花吹成枯黄，抑是北国的霜雪，冒昧地来访早春”般的错置；⁶³⁾是一种当“圣诞老人轻叩人们的心扉，天使也为这份欢愉赐报佳音，上帝慈爱的灵光照亮每个人的心坎”的时候，而“在时间与空间的狂流里，我却被贬低遗忘于这荒岛孤溟之夜”的错置；⁶⁴⁾这种错置使他们觉得自己就像是“被遗忘于北极海的一棵小贝壳”，是“喜马拉雅山上的一块顽石”，是一片无人能了无人能解的“残缺的甲骨文”。⁶⁵⁾这种错置使他们形成了谨言慎行的性格，“不敢吐露深藏在胸中的一言”，也正因如此，他们将自己的精神寄托，那个想象的“故乡”幻化成恋人，以此委婉含蓄地抒发自己对故乡的爱恋、思念之情。

由于历史的变革，也许所有的先迁韩华都不曾想到，与故乡或是仍留在故乡的亲人的离别竟会成为某种意义上的“永别”。因此，有些先迁韩华的诗歌，也许还可以理解为在表达与故乡隔绝后的悲凉心境。隔绝离别的凄凉使他们“再也激不起爱河的涟漪”，“人间庸俗的欢笑”也不能激起他们“深藏着的喜怒哀乐”，即使在“攘来熙往的人群，喧嚣缤纷的夜都庙会”，他们的心都像“盘据于赤道的子午线，香火久绝的古刹，世纪末的冰原上”一般冰冷。⁶⁶⁾当“苍老的相思已晕迷”的时候，他们“再无勇气看星月追逐，再无勇气品尝各种色调，再无勇气循当年的雪径去体味故乡的真实，再无勇气回顾当年的誓约在风雪中蹉跎。”⁶⁷⁾与故乡的决绝就像一扁“载满了创痛的回忆”的叶舟，“驶向那不知名的彼方”⁶⁸⁾，先迁韩华成了失去归路的流浪者，漂泊在没有终点，只有落脚点的人生旅途上。

1970年代出现的韩华抒情诗约有7首，除了继续发扬抒情类情歌诗风的作品，如：湖岗的《六月夜曲》(1974)、周玉蕙的《三月的思念》(1975)、《恋情》(1975)、《期待》(1975)，周思平的《五月的雨》(1975)等外，还出现了几首讽刺诗，如：湖岗的《自由的寓言 七则》(1974)、《写画狂 五则》(1974)。

63) 洛蓝, <失落的约会>, 《韩华春秋》第11期, 首尔: 韩华春秋编辑委员会, 1965.4, p. 32.

64) 洛蓝, <圣诞感怀>, 《韩华春秋》第7期, 首尔: 韩华春秋编辑委员会, 1964.12, p. 32.

65) 洛蓝, <我是很甲骨文的>, 《韩华春秋》第10期, 首尔: 韩华春秋编辑委员会, 1965.3, p. 32.

66) 洛蓝, <别后>, 《韩华春秋》第2期, 首尔: 韩华春秋编辑委员会, 1964.7, p. 9.

67) 枫涛, <伤情, 在四季>, 《韩华春秋》第11期, 首尔: 韩华春秋编辑委员会, 1965.4, p. 32.

68) 回罕, <为你.....我的爱>, 《韩华春秋》第14期, 首尔: 韩华春秋编辑委员会, 1965.7, p. 32.

1990年代，引人注目的是先迁韩华林树兰的4首抒情诗。林树兰是一位西洋画画家，也喜欢写诗。他在韩华杂志上刊载的4首诗歌作品分别是《无尽的叹息》(1990)、《我的两只小手》(1990)、《短谈》(1990)、《异邦人的悲哀》(1990)。林树兰的诗风也主要以抒情为主，多以内心独白的表现方式来宣泄内心的矛盾情绪，同时也是对作者生活现实的一种反映。酷爱艺术的作者，凭借“艺术无国界”的信念，将毕生精力都投入到艺术创作中去，渴望得到韩国社会的认可。遗憾的是，结果令其大失所望。像烙印般抹不去的“异邦人”身份，连累其作品也跟着遭到排斥，进不了韩国艺术品展示会的大门。艺术才能也像被贴上身份的标签，得不到认可，而华文诗歌就成为作者宣泄痛苦无奈情绪的途径。

林树兰诗歌的价值在于，从经济、社会、教育、生活以外的另一个层面，即，艺术层面上体现了先迁韩华对于身份的困惑与思考，同时也从一个侧面表达了先迁韩华渴望被韩国社会承认的迫切希望。关于这些问题，将在第四章展开更具体的分析和论述。

由于资料上的局限性，2000年代以后出现的韩华华文抒情诗还有待今后的继续发掘与研究。

2. 韩华华文叙事诗的创作情况

从笔者收集的资料上来看，韩华华文诗歌作者较多创作抒情诗，从事叙事诗创作的韩华就显得凤毛菱角。韩华华文叙事诗主要出现在1960-70年代，在叙事诗方面取得突出成就的先迁韩华柳耀广，堪称韩华叙事诗作者的代表，他的诗歌也堪称韩华叙事诗的代表。因此，柳耀广以及他的叙事诗在韩华华文诗歌历史上就显得格外重要。

柳耀广出生在中国大连，八个月大的时候被父母带到韩国。因为遭遇韩国战争，为了避难来到釜山，上高中以后回到首尔。柳耀广从小酷爱文学和绘画，但是父亲出于生计的考虑极力反对，因此柳耀广被迫升入成均馆大学国语国文系(韩国语言文学系)。但是柳耀广并没有放弃自己的理想，在大学期间他也未间断过绘画和写诗，在诗歌与绘画领域都很有造诣。柳耀广在大学毕业之前的1969年10月10-12日，还在中华民国大使馆中山堂举办了个人诗画展。诗画展上共展出诗歌作品33首，其中华文诗歌21首，韩汉译作5首，韩文诗歌7首。后来，韩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之后，曾经有包括《女性春秋》和《北方杂志》等几家韩国的杂志社采访柳耀广，在采访报道中称赞他的韩语诗歌属韩华韩语诗歌的首创，称赞他始终把韩国看作自己的第二故乡，为韩中文化交流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作者用诗的形式刻画人物，情节虽然简单，但是完整集中主题鲜明，再通过刻画人物与叙述情节来抒发感情，达到情景交融的效果。

比如，读柳耀广的诗，眼前便可浮现出：为了饥饿的肚皮，不管是在严冬冰水里挣扎，还是在酷夏火炉旁烘烤，不得不挥着膀子制作五十块钱一碗炸酱面，与此同时还要默默承受

着顾客的刁难，税吏的压榨，以及保健所的威胁，终日身心疲惫的韩华父子形象。看到“父亲弯着驼下来的腰”又在道歉的时候，作者不禁“深深地哭了”，他发现自己也在不经意间“那么轻易的放走了十三个미안합니다[对不起]”。⁶⁹⁾柳耀广也会通过他的诗，给人们讲述了一段凄惨的故事，一个发生在韩国大成路上，明伦堂里，十字路头，终日和雨结伴，卖纸伞的孩子和他父亲的故事：父亲“喜欢雨天，喜欢雨打在自己的头上”，因为他的儿子在卖纸伞。父亲下雨天从来不用雨伞，因为那是“孩子和自己的饭碗”。父亲目睹了被雨洗净了的，儿子今晨被车碾死的现场，也流尽了自己的眼泪。此时，作者并没有继续絮说父亲接下来的凄凉，而是到父亲“捧起孤独的纸伞，雨再也打不着他的头了”⁷⁰⁾戛然而止，这样的处理，似乎给读者留下了更多的想象空间。

作者还用诗歌的形式，嘲讽韩华社会每况愈下的风化：

.....

廉价的奶子哺乳着廉价的儿子

三流的菜娘只在喝茶

.....

神女提着高高地牌子

——这里是你的故乡

没有风的夜的私娼窟

呈着一遍叹息

明晨的麦神何去寻求？

.....

从旅馆私奔的男与女

又缜进了麻痹的沟

看到这风景的小食母笑掉了牙

.....

老人与老人正在叹息

往年这时天上有风

风下的风化也不像今夕

悲哀地走进了酒馆

温存着老鸨的嘴

.....⁷¹⁾

69) 柳耀广，《中国人》，首尔：中国大使馆中山堂诗画展，1969.10.10-12，诗歌创作时间：1968.10.26。

70) 柳耀广，《雨的寄语》，《韩华》，首尔：韩中文化协会，1990.8，p. 37，诗歌创作时间：1970.6.3。

71) 柳耀广，《没有风的夜》，《韩华》，首尔：韩中文化协会，1990.7，p. 48，诗歌创作时间：1970.7.27。

所有被刻画得人物，以及整个情节展开都被作者安排在一个狭窄阴暗到令人窒息的巷子里：喂哺儿子的母亲、三流的菜娘、娼窟的光顾者、私奔的男女、笑掉牙的小食母、叹息的老人等众多人物纷纷登场，但是叙述却并不紊乱，作者用精炼的叙事，展现出层次分明的场景构成，再通过这些人物的场景展示生活的本质。

在作者看来，人生是“混着血与泪”的沉重与痛苦，人生就是麻木到不去过问“活着的意义”，只为一个又一个“明日”，“活在苦与痛里”⁷²⁾。作者之所以活得如此痛苦，是因为理想与父母的期望产生了矛盾“父亲要我拿起刀子，征服这个世界，母亲要我拿起算盘。盘算这个世界。他们投资全家的财产，我却要写诗。”1950年代战争给韩华带来的创伤还未愈合，1960年代来自韩国政府的诸多针对外国人的限制制度对他们的经济和生活更是雪上加霜。韩华可以赖以生存的途径手段的选择范围被限制得越来越狭窄，中华料理几乎成了韩华经济的最后一道生命线。在这种情况下，作者的父母为了生存不得不倾其所有来维系这个唯一可以支撑一家人生活的命脉。作者仰望的天空都像“被沥青漆满”，压抑的天空下面是一个“佝偻，病弱的影子”，作者也想过“抛弃一切，欲更上尽头”，但是他最终发现自己被“地心的吸力，牢牢地钉住了”。⁷³⁾作者只怪自己生活在一个处处受到限制的社会，一个不容许拥有自己理想的时代。

柳耀广创作的华文诗歌有几十首，收录在诗画展中诗歌作品集中，以及刊登在韩华杂志上的诗歌作品仅有27首，还有很多优秀的诗歌尚未能与读者见面实属一大憾事。作者将自己的实际经验与真实生活升华为艺术，他的一首诗就是韩华生活的一个断面，将这些断面连接起来，就可以从点到面的了解和体会韩华的移居生活景象。因为作者将自己的人生融入诗歌之中，所以他的诗会给人带来一种生存的厚重感。

1980年代以后韩华华文叙事诗的创作情况，还有待今后的继续考察。

3. 韩华华文拟古派诗的创作情况

从笔者掌握的资料上来看，韩华华文拟古派诗主要出现在1970年代，1970年代以后很少发现这种类型的诗歌。

韩华华文拟古派诗，从作品语言的音韵格律和结构形式上看，属于仿照格律诗的形式创作的诗歌。作者是先迁韩华张世镛，字禹声，从1974年至1978年，使用这种近似格律诗的形式陆续在韩华杂志上刊登了6首作品，分别是：《落花岩》(1974)、《于密阳》(1975)、《游雪岳山》(1977)、《游赤裳山安国寺》(1977)、《有感诗两则》(1978)、《观公州百济文化祭有

72) 柳耀广，《明日》，首尔：中国大使馆中山堂诗画展，1969.10.10-12，诗歌创作时间：1967.5.18。

73) 柳耀广，《这个时代的诗(自绘像)》，首尔：中国大使馆中山堂诗画展，1969.10.10-12，诗歌创作时间：1967.9.23。

感》(1978)。尽管诗歌也许不能完全做到像中国古代诗歌中的“律诗”“绝句”那样，在平仄、用韵的规定上讲求得那般严格，但是不管是从字数、句数的安排上，还是在对仗押韵上都很有功夫。

张世镛的主要诗风是咏物言志，在描写沿途所见韩国自然景观时，善于捕捉特征着意描摹，在感叹韩国大自然的优美壮观之余，更在诗中融汇了作者对韩国历史文化的思考。

4. 韩华华文现代派诗的创作情况

从笔者掌握的资料上来看，韩华华文现代派诗同样主要出现在1970年代，1970年代以后很少发现这种类型的诗歌。韩华华文现代派诗，是一种对现代派诗歌创作的尝试，很可能是受到当时台湾诗坛这种诗风的影响，比较具有代表性的是先迁韩华非马的《焚》(1975)：

飞 上 天
飞 上 天
飞上天
飞天
飞

坐着潜水艇
乘着黑牡丹

循着圆
画个星
画个星
再画一个圆
画一个圆
再
画个 圆⁷⁴⁾

诗歌内容抽象，通过诗歌在形式建构上的特殊效果，刺激读者的视觉神经，使抽象的内容更加飘渺，引发更广阔的遐想。比如，可以想象成由于飞上天空梦想的破灭而只好潜入地下，并不停原地打转的无奈。内容与形式相辅相成，展现出更加独特的艺术效果。这种创作形式在韩华华文诗歌创作中还是很少见的。

74) 非马, <焚>, 《韩中文化》, 首尔: 韩中文化协会, 1975.6, p. 32。

5. 韩华华文诗集的创作情况

再迁台湾韩华初安民，分别于1985年和2001年出版了诗集《愁心先醉》和《往南方的路》。

初安民1957年出生在韩国，是第二代先迁韩华，祖籍山东牟平。从小学到高中均就读韩华学校，1977年到台湾成功大学攻读中文专业，后举家再迁台湾定居。1985年曾任中学教员、杂志编辑，《联合文学》社长兼总编辑，现任《印刻文学生活志》总编辑。初安民的创作文类以诗为主，台湾文学界评价他的作品常将家国之思寄寓抒情形式，并能踏出现实生活的框囿中，而将思维和感觉的触角延伸到更广阔的世界。⁷⁵⁾正如初安民为自己诗集拟定的名称“往南方的路”一样，他的人生似乎一直在往南方逃亡、流浪。初安民的父亲也像其他许多华人一样为了躲避灾难寻求更加安定的生活而移居到韩国，刚刚在韩国落脚就再次因为战争而逃往韩国的南方，直到后来继续往南漂泊到台湾，继而初安民又来到了台湾的台南寻找自己的落脚点。初安民说自己是吉卜赛的邻居，流浪是相伴人生的主旋律。初安民的命运似乎注定与漂泊交织在一起，无法摆脱。

初安民将在大学期间创作的诗歌进行整理，1985年由晨星出版社出版了他的第一本诗集《愁心先醉》。《愁心先醉》共收录诗歌60篇，作品的排列并非按照创作时间顺序，而是作者按照作品性格的不同自分四辑：第一辑《心象篇》共有作品12篇，第二辑《意象篇》共有作品18篇，第三辑《现象篇》共有作品15篇，第四辑抽象篇共有作品15篇。初安民又于2001年由台南市立图书馆出版了他的第二部诗集《往南方的路》。《往南方的路》共收录诗歌63首。第一辑《伫立到黄昏》收录诗歌27首，第二辑《如果，一枚苹果坠地》收录诗歌22首，第三辑《愁心先醉》收录的是其一九八五以前创作的诗歌14首。

第一部诗集具有浓厚的自传色彩，正如张梦机所说初安民有一大部分作品是相当自传式的，譬如写侨生、写离家、写母亲、写二十九岁生日、写北上南下等等；这些诗都那么具体而深刻地表现出他内心的愁情与爱恋。⁷⁶⁾这部诗集记载着诗人初安民作为一个跨国移居者的人生经历以及心路历程。“诗”就是初安民对郁积心底的爱恋情愁的发泄，当他将自己即将出版的诗集校对完毕时，像江河决堤般流下泪水，在夜深大雨的街头上狂奔，积在内心多年的欢笑与泪水，也全交付在这狂嚣的风雨之中了。⁷⁷⁾通过这部诗集我们可以进一步了解再迁台湾的韩华的生活和心理情况。

作者将诗集的第一辑命名为《心象篇》，心象指的是对象不在面前时人的头脑中浮现而出的形象，可以是保存在人脑里曾经感知过的某一事物或人物的形象，比如“母亲”，诗人通过

75) 参考国立台湾文学馆台湾作家作品目录网站：<http://www.nmtl.gov.tw/>。

76) 初安民，〈真正的初安民—张梦机序〉，《愁心先醉》，台中：晨星出版社，1985。

77) 初安民，〈自序〉，《愁心先醉》，台中：晨星出版社，1985。

对韩国生活往事的回忆使那位并不在眼前的脸上爬满皱纹眼神充满担忧的母亲形象跃然纸上。“母亲”这一形象之所以会经常出现在诗人的脑海中，又与他曾经多次反复感知的客观现实相联系。诗人反复的“离家”经验使诗人对母亲充满思念，而反复的“离家”背后又隐藏着韩国社会差别与排外的现实。另外也可以是对记忆内容进行重新组合，在取舍过程中建构起新的形象。⁷⁸⁾比如与诗人从相遇到相恋再到分别的充满感情纠结的“女子”形象，可以说是诗人通过将有关韩国的记忆重新组合建构出的新形象。无可避免的宿命早就决定诗人必须爱上这名女子，但想不到的是他的真心表露却并不被人接受，致使诗人成了罪无可赦的叛逆者。⁷⁹⁾诗人也许是想表述自己命中注定来到“韩国”并爱上这片土地，但是他与“韩国”的爱恋却从一开始就是一种不被接受的“错误”。

意象是在一刹那间里呈现理智和情感的复合物，在第二辑《意象篇》中诗人使用比喻意象，用具体的事物来比喻抽象的事物或概念使之形象化和具体化。⁸⁰⁾比如作者用不停转的“马达”⁸¹⁾比喻为了融入台湾而像机器般不停歇的工作；用“流星”⁸²⁾比喻永无止境的漂泊；用“无可缝补底裂隙”⁸³⁾隐喻与台湾社会之间存在的一道无法逾越的鸿沟；用浑然浸染上茶香的“煮茶的水”⁸⁴⁾隐喻已经浸染上韩国文化风俗习惯很难保持原来模样的韩华的混种性。

《现象篇》中诗人使用视觉意象和听觉意象来描写给诗人视觉上或听觉上产生深刻印象的事物或人物。⁸⁵⁾比如：“磨刀的老人”——“把黑发磨成白发，用生命磨取生活”，会使诗人联想到父亲，甚至未来的自己；⁸⁶⁾“板门店”⁸⁷⁾——对于所有的韩国人以及当时在韩国生活的人来说，都无疑是“仍然像心脏一样跳动着涌不完的悲哀”，而在“板门店”前合影留念的游客则激怒诗人，引发对其“患上战争健忘症的人类”的嘲讽；⁸⁸⁾“乒乓”——这一听觉意象使诗人联想到一位韩国残废军人，就像桌球一样被两边的拍子打来打去却“不知道谁是赢家谁是输家”，并为此深感悲哀。⁸⁹⁾初安民之所以对战争如此敏感也是缘自他对战争是造成自己漂泊命运最根本原因的认知。

《抽象篇》中用形象的描述解读了许多难以把握的概念和抽象的情思，包括：疑惑、痛

78) 这里对“心象”概念的解释参考庞好农，〈论萨伏依「异域」的心象叙事〉，《外国语文》第31卷第5期，重庆：四川外语学院，2015，pp. 14-17。

79) 初安民，〈爱与罪〉，《愁心先醉》，台中：晨星出版社，1985，pp. 22-23。

80) 意象的概念参考刘保安，〈论狄金森诗歌中的意象〉，《新乡学院学报》第24卷第5期，新乡：新乡学院，2010，p. 115。

81) 初安民，〈心情十六行〉，《愁心先醉》，台中：晨星出版社，1985，p. 65。

82) 初安民，〈浪子·乡愁〉，《愁心先醉》，台中：晨星出版社，1985，p. 66。

83) 初安民，〈难追〉，《愁心先醉》，台中：晨星出版社，1985，p. 74。

84) 初安民，〈心情十六行〉，《愁心先醉》，台中：晨星出版社，1985，p. 62。

85) 参考刘保安，〈论狄金森诗歌中的意象〉，《新乡学院学报》第24卷第5期，新乡：新乡学院，2010，p. 117。

86) 初安民，〈磨刀的老人〉，《愁心先醉》，台中：晨星出版社，1985，pp. 114-115。

87) 板门店位于朝鲜半岛中西部，1953年7月27日，南韩与北韓的停战协定在这里签订。

88) 初安民，〈板门店〉，《愁心先醉》，台中：晨星出版社，1985，pp. 116-120。

89) 初安民，〈乒乓〉，《愁心先醉》，台中：晨星出版社，1985，p. 129。

苦、坚执、寂寞、孤独、丧失、希望等等。在诗人笔下，“痛苦”：是用昂贵价钱买下大口径机关枪，与每日降临的黑夜展开的生死搏斗；⁹⁰⁾“寂寞”：和影子是一场反反覆覆凌乱的循环，卸下寂寞，卸不下影子，卸下影子，卸不下寂寞；⁹¹⁾“孤独”：就像梵高割耳这当事，每一声嚎叫都有距离，距离乃孤独割开的声音；⁹²⁾“丧失”：是被长长的钩在海上的水手，他的上陆，是另一个梦的下海；⁹³⁾“坚执”：是笔直的坚持在这里，拒绝任何形式的搬家⁹⁴⁾；“希望”：是丢掉所有的仇，丢掉所有的恨，丢掉所有的往事，然后开始走向一个叫黎明的地方；是将自己迸裂满天，占领全部的天空；是酒醒的早上，微笑着开向眼前的一朵小花。⁹⁵⁾

初安民的诗可以说是他自焚式的沉思后沉淀的结晶。他用诗来向人们诉说一个跨国移居者的心声，或者说用诗来为许许多多的跨国移居者代言。陈述他们彻底感受到的，自己在命运面前的束手无策，对一寸栖身之地的无比渴望；叙说他们生活在如此辽阔宇宙中却无一寸真正栖身之地的悲哀。初安民以一个诗人墨客的敏锐领悟到既然无法成为一颗“生根”的流星，那就做一颗生根的“流星”吧；既然流星的悲哀是滑落时不能连根拔起，那就任凭那些根留在那里，并且永远牢牢地扎下去吧；当这些根连成线，再连成无限网络的时候，当那些各自分散，自求发展的流星布满天空，散发满天星光的时候，也许就是被接纳的季节了。⁹⁶⁾

总体来看，韩华华文诗歌通过凝练的语言，不仅表达了作者的丰富情感，更重要的是集中反映了一个时代的韩华心声，一个时代的韩华社会风貌。

1960年代是韩华华文抒情诗的多产期，出现了几位较有成就的抒情诗作者。此时期的抒情诗作品通过诗的语言，渲染出一种浓重的悲情色调，突出“离别”与“失去”的主题。我们可以将这些抒情诗看作爱情事，认为是在描写分手的恋人感情上的伤痛，但是如果从1950年代大韩民国政府成立后，选择留在韩国的华人就不得不与中国大陆的故乡以及故乡的亲人宣告“离别”承受“失去”，这一大的历史背景下去解读时，先迁韩华的抒情诗就具有了时代的意义。

1960-70年代还出现了一位具有代表性的叙事诗作者柳耀广，作者将很多叙事诗的情节设定在一个狭小封闭的空间，在这个压抑的空间里，各种处于社会底层的韩华人物纷纷登场。作者的叙事诗主要采用批判现实主义的手法，若将作者的叙事诗拼接起来，就可以在某一

90) 初安民, <奋战记>,《愁心先醉》,台中:晨星出版社,1985, pp. 191-192.

91) 初安民, <影子与寂寞>,《愁心先醉》,台中:晨星出版社,1985, pp. 76-77.

92) 初安民, <割耳者—致梵谷>,《愁心先醉》,台中:晨星出版社,1985, p. 99.

93) 初安民, <水手>,《愁心先醉》,台中:晨星出版社,1985, p. 189.

94) 初安民, <树>,《愁心先醉》,台中:晨星出版社,1985, p. 171.

95) 参考初安民, <一个叫黎明的地方>、<满天星>、<酒醒的早上>,《愁心先醉》,台中:晨星出版社,1985, p. 174, p. 166, p. 196.

96) 以上有关初安民诗歌的论述是在梁楠, <生根的流星:论韩华诗人初安民《愁心先醉》中的跨国认同>,《中国现代文学》No.80, 首尔:韩国中国现代文学学会, 2017, pp. 110-112、127的基础上进行修改后的内容。

种程度上看到1960-70年代韩华社会生活的压抑与艰辛。

1970年代以后，韩华在诗歌的创作形式上更加多样化，除了抒情诗之外，还出现了仿照格律诗创作的拟古派诗歌作品，以及对现代派诗创作手法的尝试。现代派诗创作手法的运用，从某种意义上说预示着韩华在感情表现上的内敛化，他们不再像1960年代那样的直抒胸臆，而是用更加抽象的语言与形式，表现一种更加深奥的情感，给读者留下非常广阔的想象空间。此时期出现的拟古派诗，都是赞颂韩国大自然景观壮丽旖旎的内容。但是先迁韩华拟古派诗的价值就在于，它既不同于韩国人对于韩国风光的赞美，也不同于纯粹的外国人对于韩国自然风光的赞叹。从诗歌内容上看，作者具备充分的韩国历史文化常识，在此基础上利用格律诗的形式，站在一个移居者的立场，抒发对景观以及景观背后所蕴含的韩国历史文化的独特见解。

1990年代，出现了一种以内心独白的形式来抒发情感的抒情诗，作者毫不掩饰地发泄内心对于韩华在韩国社会永远改变不了的“异邦人”身份的埋怨，但是如果换一个角度来看待，这些诗歌同时也是渴望被韩国社会承认的发声。

再迁韩华的诗歌作品，使我们有幸看到再迁台湾韩华与曾经的移居地韩国之间千丝万缕的关系。再迁台湾韩华在诗中，将自己与韩国的爱恋比作一个被宿命安排的“错误”。当他毅然决定了断这个错误，在再迁之地开始新的生活时，结果却发现在语言文化生活习惯等方面已经深受韩国的影响，就像一杯煮茶的水，浑然染上了茶香。再迁韩华诗歌作品的贡献就在于，它与其他再迁韩华文学作品一起，引发人们对韩华华文文学范畴问题的重新思考。

第 3 节 韩国华人华文其他文类的创作情况

从笔者收集的资料上来看，韩国华人除了散文与诗歌作品外，还创作了评论、小说等其他文学体裁的作品。

1. 韩华华文评论的创作情况

据笔者的不完全统计，自1960年代以来，各个时期都出现过韩华华文评论创作，作品总数约有90余篇。其中，先迁韩华的作品有70余篇，约占韩华评论作品总数的80%，再迁韩华的作品约占总数的20%。再从先迁韩华的华文评论创作情况来看，创作于1960年代的评论作品有50余篇，约占先迁韩华评论作品总数的70%，约占韩华评论作品总数的60%。

先迁韩华通过评论这种文学形式，针对人物、事物或时事，及时迅速地进行主观或客观的批评议论，阐述自我观点与感受。这不禁使人联想到先迁韩华的杂文创作，可以说在1960

年代，评论与杂文一起迎合了这个时期先迁韩华，特别是韩华青年对韩华社会、韩华教育、韩华报刊文艺工作等等问题，发表个人看法与评价的创作欲望。但是与杂文创作不同的是，评论作品脱去幽默诙谐的色彩，主要在议论说理上下功夫。

比如，1960年代在先迁韩华华侨协会选举工作上出现了问题，于是先迁韩华纷纷写文章批判这次选举工作的荒谬，指出这样的选举办法将给韩华社会带来怎样的负面影响，评论包括：陆伟森的《荒谬的“户主互选”》(1965)、《汉城华侨协会“选举办法”批判》(1965)、《谈侨社选举》(1964)、洪荒的《民主倒车路难开》(1965)、李省的《开民主的玩笑》(1965)、编辑文章《汉协改选说从头》(1965)、《风云宝座无人就职》(1965)等。通过这些评论，1950年代以后，受中华民国政府管理的韩华自治机构华侨协会⁹⁷⁾，对于先迁韩华的重要性就可见一斑了。另外，评论作者在文章中主张在韩华社会应该真正将民主思想落到实处这一点，也能体现出1950年代以后先迁韩华受到中华民国思想教育的影响。

不管是在评论内容所反映的时代特征，还是从作品在当时所引起的社会反响上来看，《馆前街漫话》都可算是1960年代先迁韩华华文评论的代表。

《馆前街漫话》是在发行于1960年代的韩华杂志《韩华春秋》上所设的评论连载专栏，从1964年6月始至1966年4月止共发表了14期评论文章。评论的作者据推测应该是《韩华春秋》的编辑，每一期评论都会对针对当时发生在先迁韩华社会中的大事件发表个人看法。《馆前街漫话》针砭时弊，批判韩华社会弊端的文风被当时的大部分读者所认可。有人评价说：“《韩华春秋》的内容确实够丰富，论述的文章最引人注目，公正不苟的评论精神值得钦佩。而《馆前街漫话》是最具特色者，将馆前街许多大小事件，以犀利的笔锋，公正的态度，描述出来。”⁹⁸⁾

“馆前街”这一名称并非韩国政府在法律上划定行政区域时的正式命名，而是《馆前街漫话》的作者自创，其对“馆前街”的定义是这样的：“汉城市明洞入口与忠武路一街之间，乃我华侨在韩，党、政、团、报、校，荟萃之地，上至我使领馆，下至瓜子小贩，结聚于此，举凡外交大事，侨社缤纷，亦莫不肇于此，决于此，整日价车水马龙，三教九流穿梭其间，华侨暱称之为“衙门街”，吾人定名为‘馆前街’也。”⁹⁹⁾通过《韩华春秋》的发行，“馆前街”这一新名词逐渐被先迁韩华所接受，认为这一名称名实相宜，就约定俗成地沿习下来。由此，《馆前街漫话》给先迁韩华社会带来的影响也可见一斑了。

通过《馆前街漫话》，我们可以从多个层面了解1960年代先迁韩华，特别是韩华青年所面

97) 自1950年代，先迁韩华在台湾驻韩国大使的管理下实行韩国华人自治，即当时的台湾驻韩大使邵毓麟把蒋总裁(蒋介石)“新县制”中的“管教养卫”，和“基层组织”的“保甲制”适用到侨务工作上去，而演变发展成一套华人组织与华人自治制度，将韩国华人社会分化为48个自治区，每一区都设有华侨协会作为管理机构。参考邵毓麟，《使韩回忆录》，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0，p. 127。

98) 晓星，〈局外人谈《春秋》〉，《韩国春秋》第13期，首尔：韩华春秋编辑委员会，1965.6，p. 30。

99) 〈馆前街漫话〉，《韩华春秋》第1期，首尔：韩华春秋编辑委员会，1964.6，p. 5。

临的社会问题，以及困境与疑惑。

第一，《馆前街漫话》与1960年代的杂文一起，揭示了先迁韩华青年与老一辈韩华之间的矛盾。

越来越多的第二、三代先迁韩华青年，通过接受高等教育，逐渐认识韩华社会的停滞不前，经济发展困难，除了与韩国政府所制定的政策有关以外，与老一辈韩华的封闭保守，不注重与韩国社会的交流，不识韩语等因素都有直接关系。韩华青年认为韩华社会存在的弊端，应该通过文学的形式刊载在报刊杂志上，以唤醒韩华，共谋发展之路。老一辈韩华则固步自封，守着“家丑不可外扬”的旧思想，就像讳疾忌医的患者，宁愿隐患“旧疾”，也不愿示人，因而极尽能事地反对韩华青年创办华文刊物。先迁韩华社会仍然沿袭着长辈为先的传统思想，韩华社会的自治机构华侨协会的会长、副会长，也往往由所谓德高望重或资金雄厚的老一辈华人来担任，由于权力都集中在老一辈华人手中，因此严重打消了韩华青年人参与协会选举的积极性，也大大束缚了韩华青年有意革新韩华社会的手脚，数年寒窗苦只能换来失业青年的悲凉处境。

第二，《馆前街漫话》针对台湾政府对先迁韩华的关心程度提出质疑。

1950年代大韩民国政府成立，仍然留在韩国的华人在国籍上归属中华民国，先迁韩华只承认中华民国在政治上的正统地位。先迁韩华“是故一兴起故国之思，就跑到馆前街来看看飘扬着的国旗，和健行于馆里馆外的官人，以疗故国之思。”¹⁰⁰⁾浪迹客乡孤立无助的先迁韩华，渴望中华民国政府派来的“官”，作为国民的公仆，可以同样眷顾这些生活在韩国的“国民”，成为先迁韩华可以依靠的坚强后盾，但结果却令他们失望。因此，评论作者批判先迁韩华在韩国见到的“祖国官员”，都是一副“官权冲天”的官僚习气，根本感受不到对韩华的关心之意。

另外，评论作者还批判台湾政府派驻韩国的使领馆官员，也只重视“外交”，对先迁韩华社会的事情，采取事不关己的态度。韩华社会闹纠纷，台湾驻韩大使却表示：“侨社纠纷，让他们自己闹好了，我们不必管，我们只管外交好了。”¹⁰¹⁾韩华要求使领馆人员出面主持汉城华侨协会选举工作，领事部的刘秘书说：“部分侨胞要我们对侨社不合理的事情动手术，领事部不能接受，一个医生给病人开刀也得取得家长同意，和病人的合作。”评论作者不由感叹：“我们不知我们的家长是谁，在国内我们整体应把总统看成家长，在海外，大使主张不管侨务，刘领事大概可算我们的家长了，集医生与家长于一身的刘秘书，不同意动手术，就由

100) 参考〈馆前街漫话〉，《韩华春秋》第18期，首尔：韩华春秋编辑委员会，1965.12，p. 8。

101) 这里所说“侨社纠纷”是指先迁韩国华人派系间的纠纷，先迁韩国华人派系早在台湾驻韩刘大使任期，除了地方上的新派、旧派以外，最严重的是以首尔为首的陈派与以仁川为首的吕派间的对立，陈派掌握汉城华侨协会，吕派除掌握了仁川地盘以外，并且控制了全南韩华侨协会的最高组织华侨协会总会，陈派为了巩固势力，另外组织了全南韩性质的中华饮食业协会，于是两派的对立更形尖锐。具体内容参考沈缙，〈梁大使荆棘满途〉，《韩华春秋》第11期，首尔：韩华春秋编辑委员会，1965.4，p. 2。

我们这些病人自生自灭吧！”¹⁰²⁾

评论作者还发现，台湾政府的间接管制，甚至影响到韩华社会华文刊物的言论自由。因此，作者犀利批判了那些“当言而不言”的新闻报刊，认为作为一种社会的“语言”，某些新闻报刊根本没有尽到自己这一社会责任，一些需要通过报道让韩华知晓的大事，却因为对当局[台湾政府]不利而避而不谈，成为专听台湾领事馆命令的“御用工具”。¹⁰³⁾

第三，《馆前街漫话》反映出先迁韩华对身份产生的疑惑。如上所述，先迁韩华具有中华民国国籍，但是这似乎只是一种形式上的认可。令作者感到荒唐不已的是，移居韩国的先迁韩华被要求必须证实自己的“华人身份”。因此，作者批判道：“如果想证明你确实是一位华侨的话，必须有“华侨登记证”，有了它不仅证明你是正宗华侨，并且可以证明你是一个被无理剥削的可怜虫！因为你必须每年缴纳一次人头税，然后在“登记证”后面盖上一个肮脏的戳印！”¹⁰⁴⁾

韩华教育问题是先迁韩华始终关注的话题，从评论作品的内容上可以看出，先迁韩华在不同时期对韩华教育问题关心的侧重点也有所不同。比如，出现在1960年代的评论：官雯的《漫谈侨中招生考试》(1964)、李省的《升学考试的困扰》(1965)、向日葵的《论当前韩华侨教》(1965)等评论中，重点在于提出招生考试在先迁韩华学校教育中的重要性问题。作者们认为先迁韩华学生由韩华小学升入韩华中学的过程中几乎没有任何升学压力，这样很可能导致学生疏于学业，将来升入台湾的大学读书就会感到吃力。如果在韩华学校严格实行招生考试制度，可以促进韩华学生对学习必要性的认识。作者们还提倡通过聘请台湾师资或在台湾深造返韩的韩华青年，提高教学质量。这些看法与观点，不仅对于培养先迁韩华学生的汉语表达能力，甚至在华文文学创作等方面都可能起到直接或间接的促进作用。

1970年代的有韩华教育的评论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韩说的《侨教浅谈》(1975)。作者强调先迁韩华30年来之所以在受教育程度上发生如此大的变化，与先迁韩华对韩华教育的重视，慷慨捐献血汗钱帮助韩华学校建设这一点是分不开的。作者批判的是与先迁韩华对韩华学校的投入相比，学校培养出来的学生素质却并不令人满意。这篇评论给我们提供了这样一个信息：1950-70年代这30年间，先迁韩华的受教育程度大幅提高，用作者的话说：“三十年前，如能初级小学毕业，已经难得，而今，华侨子弟如果小学没毕业，那才稀奇。”¹⁰⁵⁾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为何1960年代以前较少发现先迁韩华从事文学或文化活动，或者说为何1960年代以后才真正出现了一定规模的韩华华文文学创作的原因。

1990年代的评论中，值得关注的是一凡的《华侨学校学生说国语在这里也亮起红灯？》

102) 本报记者，〈汉协改选说从头〉，《韩华春秋》第9期，首尔：韩华春秋编辑委员会，1965.2，p. 7。

103) 〈馆前街漫话〉，《韩华春秋》第1期，首尔：韩华春秋编辑委员会，1964.6，p. 6。

104) 〈馆前街漫话〉，《韩华春秋》第19期，首尔：韩华春秋编辑委员会，1966.1，p. 10。

105) 韩说，〈侨教浅谈〉，《韩中文化》，首尔：韩中文化协会，1975.1，p. 17。

(1990)。作者意在批评此时期先迁韩华学生的汉语水平已经到了令人担忧的地步，呼吁韩华学校多重视韩华学生的汉语教育问题。但是这篇评论的贡献并不仅限于此，它的贡献还在于给先迁韩华语言的研究上提供了重要的线索，更进一步说，对韩华华文文学的研究也具有启示意义。首先，1990年代就读韩华学校的学生，大多应该属于第四代先迁韩华，通过评论内容可以了解他们当时的语言状况是：韩语比汉语说得更流畅，比汉语讲起来更方便。这是因为第四代先迁韩华虽然继续在韩华学校接受中华民国国语教育，但实际上除上课时间以外，几乎很少有可以接触汉语的机会，甚至跟父母(均非韩国人)也讲韩语，同时也说明第二代或第三代先迁韩华在韩国生活的适应过程中，也逐渐习惯于使用韩语。其次，根据评论中所说：“学生们讲的中国语文都是倒转的”¹⁰⁶⁾这句话上来看，第四代先迁韩华已经在汉语口头语上形成了与韩语语法等的混种现象，这一问题将在第四章展开具体论述。最后，先迁韩华的这种语言混种现象，是否在书面语中也同样出现，又或者说先迁韩华的这种语言混种现象，在先迁韩华的华文文学创作上，将形成怎样的影响，就成为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课题。

2000年代以后，先迁韩华华文评论的创作阵营发生了转移，主要出现在再迁美国韩华发行的华文杂志上。

再迁美国韩华的评论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有崔仁茂的《韩华总会事件 发人深省》(2004)、《刚上山 又下山》(2004)、《侨校问题症结在那里?》(2006)、萧兮的《请为侨校留一片净土》(2006)、一剪梅的《冀望韩国政府多一点“施惠”少一点“互惠”》(2010)等。

这些文章或是评论再迁美国韩华在美国自发成立的韩华总会存在的问题，或是批评先迁韩华学校出现的问题，亦或是议论韩国政府对先迁韩华所实行政策。笔者认为这些评论值得关注的原因，并不在于强调作者所抒观点的正确性可行性，而在于这些评论对于思考韩国华文文学范畴问题，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也就是说，这些再迁韩华的评论在内容上反映出，先迁韩华中的一部分再迁至美国，重新开始在美国的移居生活，但是他们仍然与韩华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再迁美国韩华在美国自发成立的韩华总会，在组织韩华联谊活动，从事各种文学和文化活动等方面，在团结韩华的功能上，近似于韩国的华侨协会。另外，再迁美国韩华即使身在美国，仍然心系韩华，关心韩华的教育事业，与先迁韩华共同探讨如何改善韩华在韩生活等问题。再迁韩华评论作品所体现的这些特征，都体现出将再迁韩华华文文学看作韩华华文文学一个子集的必要性。

106) 参考一凡，〈华侨学校学生说国语在这里也亮起红灯?〉，《韩华》，首尔：韩中文化协会，1990.7，p. 12-13。

2. 韩华华文小说的创作情况

到目前为止，笔者共收集到4部韩华华文小说作品，其中包括先迁韩华创作的3部短篇小说，后迁韩华创作的1部长篇小说。

先迁韩华的3部短篇小说，均出现在1960年代。张岚的《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从1964年6月至1964年12月共分6期连载在当时的韩华杂志《韩华春秋》上，小说采用自传体的形式，讲述了一位先迁韩华青年到台湾求学的经历。夏侯辰的《外人部队》从1965年1月开始登载在《韩华春秋》第8期上，共连载了9期。是作者根据真人真事改编，讲述了一段韩战期间华人青年英勇抗敌的故事。长峰的《烟台风云》，从1965年8月开始登载在《韩华春秋》的第15期上，共连载了5期。这部小说完全出于作者虚构，讲述的是民国年间青年崔如宏为了给父母报仇不断寻找复仇之路，最后成为一名革命军为父母报仇后，放弃一切与深爱的青楼女子红云浪迹天涯的故事。小说在创作上笔法运用纯熟，情节安排连贯紧凑，是一部文学性很强的作品。

这3部短篇小说的意义就在于，它们是笔者所收集资料中较早以连载形式出现的文学作品，小说不管是在人物形象的刻画，还是在故事情节的展开，以及环境描写上都达到了较高水平，意味着先迁韩华在1960年代就已经具备了长期性、计划性的文学创作能力。其次，3部小说作品都具有比较鲜明的写作目的，而其写作目的又与作者的先迁韩华身份有着重要的关联性。换句话说，这3部短篇小说可以在某种程度上体现出韩华华文文学自身所具有的某种特殊性。

《烟台风云》这部小说，单从故事情节上来看，就是将武侠与言情相结合的一部爱情小说，似乎与先迁韩华没有什么关联性。但是作者将故事发生的地点选定为“烟台”，就使这部小说具有了特殊的意义。首先，先迁韩华90%以上都是山东出身，不管是从作者的角度还是从先迁韩华读者的角度来看，烟台都是他们较为熟悉的地方，一方面便于作者在创作中的自然环境以及社会环境的描写；另一方面，这些描写有可以使先迁韩华读者产生共鸣。其次，从历史背景上来看，烟台对于先迁韩华来说，是一个具有追忆性的地点：一个回不去了的代表祖籍所在地的地点；一个对于早期韩华来说，是其经济繁荣时期的贸易重地，而对于1960年代的先迁韩华来说，却是只能向往和回忆的过去。

《外人部队》这部小说，作者的写作目的非常明确，是打算给华人共同参加韩国战争的经历留下一个历史的记录。从作者产生创作欲望到真正动笔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作者初中一年级时，第一次听到1951年华人搜索队副队长姜惠霖烈士作战阵亡的英勇故事，那时作者就产生了要为这些英勇的斗士们立传的想法，作者觉得“既然生活在一个战斗的时代，就应该为这个时代留下一页历史的副本，这是一个读书人起码的责任。”¹⁰⁷但是作者因为文字修

养上的不自信而未动笔，腹稿在作者心里蕴藏了13年。直到1964年12月12日姜烈士遗骨正式安葬首尔市郊铜雀台韩国军公墓，作者自觉不能让这个英勇的故事，随着烈士忠骨永埋地下，终于在1965年1月开始动笔，出于对搜索队家族安全地考虑，除故事中的时间地点保持正确性之外，人名采用化名，为了易于处理，采用较为自由的小说体，¹⁰⁸⁾以连载的形式刊登在韩华杂志上。

《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是笔者收集资料中出现的第一部韩华小说，作者开宗明义：“我不强调能写出一篇感人肺腑的东西，我只求读的人对它有一种亲切感，他们在此可以找到自己的内心，自己的生活，自己的现实问题，以及自己的将来。”¹⁰⁹⁾不管是从作者的写作目的，还是从小说内容上来看，这部小说都非常接近当时先迁韩华，特别是韩华青年真实的生活现实。小说中描写的故事真实生动，应该与作者的亲身经历，或是与作者亲眼目睹周围韩华青年朋友的真实事迹有关。小说细致地展现了主人公的性格和命运，不仅表现了主人公内心的复杂矛盾，还体现出先迁韩华青年与老一辈人在思想上的矛盾冲突，通过小说中人物所处社会生活环境的描写，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更为整体的先迁韩华社会生活。因此，笔者在此更加详细地介绍一下这部小说。

《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采用倒叙的方式，开篇讲述的是一位穷困潦倒的韩华青年锤辰只身从釜山来到首尔，毫无目的毫无计划地寻求谋生之路。到了首尔却发现自己曾经熟悉景象已经面目全非，正当他彷徨无措时，恰好在中央邮政局附近遇到了初中时的同学黄秀民和宋强。无宿可投的锤辰只好暂时住在宋强家里，黄秀民拜托自己的妹妹给锤辰找了一份家教的工作维持生计。一天他带着家教的孩子过街时，一辆时髦的轿车从他们身边飞驰而过。正当他们怔住的时候，从车上走下来的女人迫使他回想起所有的往事。

这个女人正是他的初中同学赵萍萍，他们的再次相见是锤辰高二那年暑假在基隆的码头。当时许多留学台湾的侨生都借着海关检查松懈之机往来台韩之间大批的做买卖，从中赚取大量的钱，赵萍萍也是其中的一位。赵萍萍向锤辰表白心意，锤辰觉得两人的家庭背景相差悬殊有意躲避。最后当锤辰刚刚说服自己想去接受这份感情的时候，他却有一次郊游中看到赵萍萍与朋友的哥哥依偎在一起。感情上的失落加上联考名落孙山使锤辰变得郁郁寡欢，整日把时间消磨在弹子房。弹尽粮绝走投无路的锤辰突然听到洗衣服的老王跟别的同学交谈的声音，使他又产生了一线希望。老王答应帮他向朋友借四千元，合一百块美金给他，条件是月利五分，并且要求他拿这笔钱买些美国军装、几箱苹果、韩国的鲍鱼、海螺罐头，和几个大烟泡。锤辰心里明白他不该借这笔钱，可是眼前这被扣掉第一个月利息剩下的三千八

107) 夏侯辰，〈外人部队—序〉，《韩华春秋》第8期，首尔：韩华春秋编辑委员会，1965.1，p. 29。

108) 同上。

109) 张岚，〈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韩华春秋》第1期，首尔：韩华春秋编辑委员会，1964.6，p. 28。

百块钱让他无法抗拒。

正当他满怀希望地踏上基隆码头的时候再次遇到了赵萍萍，似乎已经忘记过去创痛的锤辰心里又在复炽着冲动。锤辰再次为了保护赵萍萍一口揽下赵萍萍的行李说是自己的。赵萍萍的行李被查出里面装满面霜盒子，有些盒子里还装了手表。此时锤辰感到事情不妙，他觉得自己是走不出海关的门了。后来锤辰被告知可以回家了，但是行李还要扣押几天，原来是赵萍萍的表哥过来解了围。锤辰失望的回到家等消息，但是没想到他等来的是石沉大海。他怎么也联系不到赵萍萍的表哥，再没能取回自己的行李，只得知赵萍萍已经跟她的表哥订婚，她是不再回台湾，而自己是再也不能回台湾，他的一切损失一光。

这部短篇小说以主人公锤辰作为韩华学生身份到台湾接受教育过程中的不幸遭遇为主线，在短短的篇幅内诉说了先迁韩华几代人的痛苦迷茫与无奈的生活现实。锤辰的父亲是大学毕业，这种学历在锤辰父亲的年代是绝非常见的。这种学历在锤辰初中同学宋强的父亲——一位庄稼人的眼里，一定是可以赚大钱，或是可以到一家机关里谋个一官半职的。但是现实中的锤辰的父亲，却委身于一家工厂，甚至拿不到合理的工资。虽然身兼工厂设计的重任，微薄的薪金却已经使锤辰和两个妹妹失学在家，后来又靠借债勉强维持锤辰的弟弟在台湾念书的学费。得知此事后，宋强的父亲感叹道：“唉，年头不值了，念书的人也都得遭罪了。”¹¹⁰⁾小说的作者明显在通过锤辰父亲的亲身经历苦诉：即使拥有再多学问，在这个封闭落后的韩华社会仍然找不到用武之地。找不到出路已成为从父辈延续至今的几代华人的共同悲哀。

然而，一辈子靠种田在韩国生活，没有念过多少书的宋强父亲的境遇更是苦不堪言。

看看我这种了一辈子庄稼，还不是什么也没有，过去几年还好，年年赚的，年年吃，可是如今地又吃了官司，这年头真不是好混的。自从日本狗子倒了霉，咱们买了韩国人的这块地，也没到法院去登记，如今有韩国人冒名在法院登记了，就要咱的地白白的给他们，你想想天下还有这样的理？不光是咱的地出了这么大的事，别人家也有，追根到底咱们国家也不强，为什么日本刚倒霉的时候没有这样的事？¹¹¹⁾

正如宋强的父亲所说，土地所有权问题是一项曾经令先迁韩华最头痛的问题。原本在韩国私人土地买卖时，不需在登记所的登记簿上填写籍贯一项，因此许多先迁韩华便以自己的名义在法院登记了土地所有权。后来韩国政府一切走向轨道，明文规定外国人不得拥有土地所有权，但在这项法律出台之前，韩华以自己名义登记土地所有权的事实就失去了法律保障。

110) 张岚，〈自有一番滋味在心头〉，《韩华春秋》第4期，首尔：韩华春秋编辑委员会，1964.9，p. 31。

111) 同上。

一旦引起纠纷，因为得不到当时法律的保障，韩华因此蒙受的损失不计其数。¹¹²⁾小说的作者借叙述者锤辰之口，发出了同情的感慨：“一个人一生的成果就这样轻易地被剥掉，尽管法律是一回事，人情上又是另一回事，但是我们华侨由于过去知识的低落遭到这种不白之灾的有多少？”¹¹³⁾

同样在痛苦生活中挣扎的两代人，看待问题的角度却不尽相同：宋强的父亲将华人社会的落后归结于祖国的不够强大；而青年人锤辰却认为是由于上一代华人的无知。而两代韩华之所以会在思想和认识上出现差异，与韩华青年有机会在台湾接受高等教育，扩展视野是分不开的。1952年第一批韩华学生到台湾升学，为韩华提供了诸多方便，也为韩华学生提供了更多的求学机会。接受新知识新思想后的韩华青年再回到这个落后的韩华社会后，无疑会发现韩华社会存在的问题，意识到老一辈韩华的封闭思想是阻碍韩华社会发展的一大障碍。因此，产生寻求改造落后韩华社会，寻找韩华青年出路的想法和决心。

穷困是韩华青年所面临的第一大困境，曾经繁荣一时的韩华经济日占时期受到日本的诸多压制逐渐走向衰落，韩国光复后虽然得到一定的恢复，但随之而来的韩国战争等重大国际局势变化使韩华经济再次一蹶不振，萧条衰败。而经济上的衰落对于本就封闭的韩华社会的就业问题来说更是雪上加霜。锤辰的初中同学黄秀民在首尔也并不如意，由于找不到职业被逼得进入一所三四流的大学去鬼混。交了女朋友，但是女朋友的家人因为嫌他家里穷，竭力反对他们的婚事。¹¹⁴⁾两位被残酷社会现实扼杀希望的年轻人在街上的偶遇已使彼此心照不宣。在学生时代就一向慷慨的宋强请他们到一家韩国餐馆吃烤肉，沐浴在友谊中的锤辰，一向不善喝酒，那天也发泄般喝得酩酊大醉，酒醒后发现自己已经来到宋强家。一支洋火的光亮，照射出一幅家徒四壁的凄凉景象。本以为来到首尔可以找到希望，看到至今没有找到职业的黄秀民以及宋强的境况后，只令锤辰更加失望。万般无奈之下，不得不勉强接受一份自己并不喜欢的家教工作，每天行尸走肉般为了糊口而生活。更使锤辰担忧的是，他发现下一代韩华少年，小小年纪就因为未来的不透明而像自己一样的苦闷和忧郁。他不由感叹是这个封闭落后的韩华社会扼杀了韩华青年的出路和前途。

1970-2000年代也应该出现过韩华华文小说作品，有关这方面的内容，有待今后继续发掘。

2010年代以后，出现了一部韩华华文长篇小说《蒲公英：文麒留韩记》，是由后迁韩华李文所作，作者现任东明大学外籍教授。作者从2006年动笔，至2015年修改完成，历时近10年之久。小说的很大一部分是作者在釜山一家考试院¹¹⁵⁾的一个只有五六平米大小的房间中

112) 公孙维, <我们当前的急务>, 《韩华春秋》第6期, 首尔: 韩华春秋编辑委员会, 1964.11, p. 3.

113) 张岚, <自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韩华春秋》第4期, 首尔: 韩华春秋编辑委员会, 1964.9, p. 31.

114) 同上, pp. 29-30.

115) 韩国的考试院指的是一种居住设施, 在此居住者大部分是需要长时间准备各种考试的应试生。由于考试院价格低廉, 应试生以外的人也经常使用。

完成。在正式出版之前曾登过腾讯网读书频道原创文学板块的首页，也签过一家规模不算大的文学网站，最后于2017年1月由人民日报出版社正式出版。¹¹⁶⁾

小说讲述的是22岁的中国西安青年文麒，2005年汉语文学专业大学本科毕业之后选择到韩国留学，最后由一位在韩国留学的中国留学生转变为长期移居的韩华的人生历程。小说不仅叙述了主人公文麒开始由于语言不通、经济拮据等困难吃了不好苦头，但是通过不懈努力博士毕业后最终留在自己留学的大学任教，书写了一部国际版小人物的翻身故事。同时也塑造了一群与文麒同时代，像文麒一样为了追求更好的生活离开家乡移居海外的跨国移居者形象，包括：文麒刚到韩国时的前辈兼同屋矣智渊、离开中国已有八年的刘哲铭、文麒的旧友董轩泽，还有文麒的两位同乡及初中校友郑卫鸿和时光。

矣智渊在韩国硕士毕业后去了日本攻读博士，肄业后又去了香港，华丽转身为月薪三万港币的项目经理。刘哲铭则游历了欧洲，走遍了大大小小十余个国家，最终在韩国取得了金融硕士学位，成功签到一家釜山的公司成了上班一族。董轩泽则在首尔蒸蒸日上，他始终打算毕了业要和媳妇去美国挖金矿。不过他最后没有去美国，而是回到了中国挖金矿。不过对于一个跨国移居者身份的董轩泽来说，他的再回到中国也许并非回归，而是一次再移居。也或许他始终没有放弃过去美国挖金矿的梦想，甚至有一天终会实现。郑卫鸿和时光则和文麒一样，为了前途，告别家乡，“漂在”釜山。¹¹⁷⁾

主人公文麒的外公是教授，父母也是，文麒从降生一个月起，便住在位于大学校内家属院的家里。¹¹⁸⁾出身书香门第的文麒并非因为家境贫寒，为了摆脱贫困才选择来到韩国，文麒觉得中国已经改革开放二十多年了，时代告诉自己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最好方式是留学。由此可以看出，不管是为了摆脱贫困或是劳动需要而选择移居他地的先迁韩华，还是并非出此原因的后迁韩华，他们为了追求更好的生活这一最终目的是一样的。

其实韩国并非小说主人公的首选之地，他首先想到的是近代文明的发源地欧洲、当今最发达的美国、一脉传承儒家文化的日本、战斗民族的俄罗斯或是物美价廉的乌克兰。他是在偶然看到的一则赴韩留学招生广告上标明的学制和费用，以及未来的就业前景后才有些心动的。文麒内心隐隐觉得韩国在世界留学排名上属于二流国家，自己的选择恐怕有被人看不起的可能，但是在考虑到家庭经济情况又不允许他有渴望去发达国家的梦想，所以文麒不得不进行自我催眠，尽量将去韩国留学这个决定合理化，说服自己。首先他要找到排除那些理想的留学国家的理由：自己身材单薄，去西方先不说贵，面对高鼻子深眼睛的欧美大汉怕被揍，去经济实力普通的俄罗斯或乌克兰，在同样的理由下，经济上的回报率还太低。去日本，首

116) 参考李文，《蒲公英：文麒留韩记》，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2017.1, p. 256。

117) 李文，《蒲公英：文麒留韩记》，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2017.1, pp. 174-184。

118) 同上, p. 49。

当其冲的问题是太贵，当然钱的问题不是问题，哪怕自己过去兼N份职，怕的是杀鸡取蛋一般地影响学习。其次是找到选择韩国的理由：韩国，他印象中的这个与中国一衣带水的半岛国家，是一个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开始迅速崛起的，如今已是中等发达的亚洲新兴工业国，遍地都是大长腿一般的美女，人们彬彬有礼，有几家诸如三星、现代、LG等世界知名的大公司和一支希丁克带领的令亚洲对手闻风丧胆，让世界球迷不敢小瞧的黄种人男子足球队。¹¹⁹⁾

先迁与再迁韩华最初是想寻求更好的生活而选择来到韩国，但由于历史和政治上的原因毫无自主权的成为有故乡却无法返回的离散者。后迁韩华较之先迁韩华则具有很大的自主性，为了寻求更好的生活凭借自己的判断选择来到韩国学习、工作或是生活，同时他们又具有随时可以返回故乡的自由，因此他们大部分都会选择长期往返两地的双重居住形式，成为新型的跨国移居者。就像小说《蒲公英》中的主人公文麒一样，并非经受战乱、灾难之苦，他们的跨国移居行为出自更高的精神追求，对中国以外世界的好奇，对成功海归人士的憧憬，对自己也可能成为其中一员的幻想。

后迁韩华的这部长篇小说，通过心理描写、动作描写、语言描写、外貌描写、神态描写等手法，刻画了一群明显不同于先迁韩华的新型跨国移居者形象。这些新型的跨国移居者大体具有这样一些特征：跨国移居行为具有更大的自主性，他们非常明确自己的跨国移居目的，即通过跨国移居行为想要获得哪些收获，并通过客观分析自身情况，较有逻辑性地从几个作为移居目标的国家中选择一个就目前来说最适合自己的国家。这里的目前很重要，因为这里潜藏着他们很可能在积累经验增长阅历之后，再次移居其他目标国家的可能性，这里的其他目标国家甚至可以包括曾经的出发地。即使他们很可能始终保持往返出发地中国与现移居地韩国的双重移居模式，但是由于他们的移居目的明确，因此在移居期间会完全忠实于自己的移居地生活。

以上笔者论述了有关韩华华文散文、诗歌、评论、小说等文学体裁的创作情况。从韩华华文文学作品数量上看，散文最为丰富，诗歌次之，小说等其他文学体裁则居末位。

从创作年代上来看，1960年代散文、诗歌、小说、评论等体裁的作品均有出现，特别是批判韩华社会现实的杂文和评论，针砭时弊，尖锐地揭露了韩华社会存在的诸多问题，还形成了一个在韩华社会中影响较为广泛的评论板块。另外带有浪漫主义色彩的抒情诗与批判现实的现实主义诗歌不管是在内容上，还是创作手法上均已臻成熟。笔者收集到的3部韩华华文短篇小说也出现在此时期，丰富了韩华华文文学的体裁形式。

1970年代以后，杂文、评论的数量明显减少，在诗歌方面也几乎很难发现批判现实的叙事诗，此时期的韩华文学作品多采用比喻的形式，内容更加隐晦，形式也更加抽象化。2000

119) 李文,《蒲公英:文麒留韩记》,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2017.1, p. 3.

年代以后，再迁韩华的作品占居多数，特别是体现再迁韩华“韩国”之思，带有回忆性的散文作品出现的最多。2010年代之后出现了一部由后迁韩华创作的华文长篇小说，刻画了一群明显不同于先迁韩华的新型跨国移居者形象。

但是韩华华文文学还不仅限于这几种文学体裁，通过笔者收集的资料，可以推测韩华很可能也从事过剧本的创作。比如，创刊于1970年代的先迁韩华杂志《韩中文化》上，曾经刊登过有关韩华话剧表演的评论，在紫石的《观〈鼎食之家〉排演有感》中，作者说：“《鼎食之家》是此次旅韩华侨同学会，为了纪念本年度春节，追忆当年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为国家、民族，反抗暴力捐躯事迹，经过好几个月时间，许多精力，和关系人士的帮助而演出的话剧。”¹²⁰⁾通过作者的叙述，可以推测先迁韩华至少应该进行过话剧《鼎食之家》剧本的创作或改编工作，而像这样剧本的创作和改编工作也应该不仅限于此。因此有关韩华华文剧本创作的发掘和研究还有待今后的继续深入。

120) 紫石, <观《鼎食之家》排演有感>, 《韩中文化》, 首尔: 韩中文化协会, 1977.2, p. 29.

第 3 章 韩国华人华文文学的“离散”与“反离散”

“离散者”一词源自希腊词汇“Diaspora”，本指被放逐而离散各地的犹太人。进入现代则更广泛指代那些如政治难民一样的不自愿地被迫移居，或因为资本与劳动的需求而引发的自愿移居行为。离散者是为了追求个人理想或寻求更好的生活离开故乡，不断过着流徙生活的群体。之所以说是流徙生活，是因为他们已经没有可以再回去的故乡，现在的居住地也仅仅是临时的落脚处，并非最终的目的地。如果发现了更好的居所，他们又会考虑再次迁移。¹²¹⁾但是，“离散”作为一种价值观隐含对出发地的忠诚与向往，在离散者与出发地之间形成一种约束性的必然关系。因此，有必要避免将“离散中国人”理解为中国国民在世界范围内的播散，作为一个普遍化范畴，它以一个统一的民族、文化、语言、发源地或祖国为基础。¹²²⁾应该辩证地认识“离散”与“反离散”理论，重新思考华人华文文学中所体现的离散特征。

第 1 节 “排斥”：“大国奴”与“高丽棒子”

移居者在移居地受到当地居民的排斥，可以说是一种普遍存在的现象。在不同历史时期，先迁韩华华文文学、再迁韩华华文文学与后迁韩华华文文学，都在以各自不同的形式体现着韩华在韩国社会受到的“排斥”。

1. 羡慕与恐怖两面性心理下的“排斥”

再迁韩华郝明义在其散文集《故事》中有这样一段回忆：

中国人居住在韩国，双方由于千丝万缕的过去，有着十分微妙的情愫。小时候走在街上，韩国小孩会叫我们“大国奴，滚回你们自己国家！”中国人讲起韩国人，则喜欢称之为“高丽棒子”。“大国奴”在“高丽棒子”的国度里，可以选择的行业寥寥无几。最普遍的，是开一个以卖炸酱面为主的饭馆。韩国人爱吃炸酱面，炸酱面相当于中国人的代名词。¹²³⁾

“大国奴”并非韩国人称呼韩华的原意，而是韩华的误译。本来的韩国词汇是“대국놈”，“대

121) 详细内容参考梁楠，〈离散语境下韩国华人的身份认同〉，《中国现代文学》Vol.67，首尔：韩国中国现代文学学会，2013.12，pp. 165-166。

122) 参考史书美，《反离散—华语语系研究论》，台北：联经出版社，2017，pp. 15-31。

123) 郝明义，《故事》，台北：大块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4.3，p. 110。

국놈”又继而变形为“때놈”、“대놈”、“떠놈”，这里“놈”的汉语意思是“者”，原本不带有贬义色彩¹²⁴⁾，“대국놈”的汉语意思是“大国者”。韩华之所以译成“大国奴”，大概是由于韩语的“놈”与汉语的“奴”字发音接近，再加上韩华在韩国社会感受到的歧视与排斥情绪所致。“高丽棒子”一词应该在清国时期就已出现，“棒子”一词可能是对韩语“방자”的误传。韩语“방자”对应的汉语原本是“房子”或“帮子”，指朝鲜王朝时地方官府的听差或仆人，也指代高丽时中国使臣所住驿馆里的听差或仆人，后被误传为“棒子”，“高丽棒子”一词也就含有轻蔑之意。这里的“大国奴”与“高丽棒子”似乎极为经典地道出了共同生活在一个国度里的韩国人与韩华看待对方的态度，即两种“情绪”间的相互作用，属于两个处于竞争关系的群体间出现的相互排斥现象。也就是说，韩华在韩国所感受的排斥，是建立在相互性基础上的。

早期的韩华在清国政府的庇护下，以“大国国民”的身份开始其移居的历史，并在清国政府的庇护下，较之其他地区的移居者，更快速更顺利地扩张了在韩国的居住地面积，也更轻松地聚敛了财富。就举当时韩华主要聚居地之一的仁川来说，1884年签订的《仁川华商租界章程》，将现韩国仁川市善邻洞地区的五千坪土地设为中国租界地，韩华在此租借地上大兴土木，建造中国式建筑，这里也就成为日后仁川中国城的雏形。不仅如此，在之后的1887年和1889年又接连在釜山、元山等地区设立了中国租借地。当时以“大国国民”身份傲慢自居的早期韩华，是韩国人既羡慕又嫉妒的对象。

关于早期韩华在韩国移居历史中曾经创下的“辉煌”，在先迁韩华的文学作品中也所有体现。比如，月尾楼主的《仁川华侨今昔》(1964)中就曾回忆过当时韩华的经济活动是多么活跃，经济实力是多么雄厚：

在仁川全盛时期，这里的华侨曾握有全韩的经济大权，来自烟台、青岛、上海、香港、川流不息的海轮，载来些洋袜热水瓶等轻工业制品，甚至连手工业生产的粉条，都要仰赖中国大陆供给，当日的仁川善邻洞中国街、雕栏玉砌、笙歌京戏、置身其间，不治身之在异乡，站在华侨商会的高坡上，下瞰仁川海港，威海渔船桅旗飘风，中国商轮，青天白日旗高悬，犹之于站在烟台东卡子门上，看挡浪坝海景。住在这里的华侨，不要会韩国话，可以很顺利地到市场买到任何东西。¹²⁵⁾

通过作者的描述，不难想象早期移居韩国的华人在清国政府的庇护下，轻易掌握韩国主要经济命脉，繁盛一时的景象。同时从作者的语气上也多少可以体会，不管早期先迁韩华是通过何种途径迎来这段仁川华人的黄金时代，作者都为此结果感到自豪，对黄金时代的再次到来充满憧憬。

124) 现在在韩语中也带有轻视之意。

125) 月尾楼主，〈仁川华侨今昔〉，《韩华春秋》第5期，首尔：韩华春秋编辑委员会，1964.10，p. 13。

从当时的历史背景上来看，韩半岛地区与中国大陆地区时常发生冲突，正处于艰难时期的朝鲜，加之日本帝国主义方面挑拨离间等因素，对外国势力更加怀有敌对心理。随着这些具有“大国国民”身份的移居者在人口上的增多，导致韩国人的就业机会受到威胁。并且由于一些韩华富商在经济上的独占地位，使韩国人经济在发展上也受到制约。再加上，这些早期韩华可以自由往返于韩国与故乡之间，在韩国人看来，他们随时都有在韩国聚敛财富后就回到故乡的可能性。因此，韩国人看待韩华就带有了更复杂的情绪，是同时具有羡慕、嫉妒、恐怖、反感等几种情感的复合体。换句话说，此时的韩华在韩国的移居生活中，与其说感受到来自韩国社会的排斥，不如说是由于韩国人羡慕与恐怖的双重心理而对韩华产生的“疏远”。

1992年韩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后，随着两国间交流的增多，以留学或投资等方式来韩的中国大陆人口逐渐增多，其中又从短期变为长期移居的后迁韩华人口也随之增多。韩国政府通过实施各种政策，放宽移居条件，促进华人的在韩投资与移居。2010年2月还实行了外国人房地产投资移民制度，促使大批中国人通过在济州岛购买房地产的方式，获取在韩国的永住权，成为又一新型的后迁韩华。

韩国政府的一系列积极促进华人投资和移居的政策，虽然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同时也产生了一些负面影响。比如，在韩国人看待(后迁)韩华的态度上，就引起了负面效应。由于在韩国政府的促进政策下，短时间内突然出现的大批华人移居者，造成了一些韩国人的恐怖心理。实际上，在2010年外国人房地产投资移民制度实施以前，韩国人对韩华的反感情绪就始终处于潜伏状态，一旦有事件发生，就会以显现状态出现。根据韩国学者申玄俊的论述，2008年4月的“中国人圣火传递暴力示威事件”发生之后，一些韩国网站纷纷发出要求赶走韩华的言论。2013年还有网站发出“华侨歧视是谎言，他们反而是特权层”的主张。申玄俊就这些现象，再联想到电影《新世界》中主人公背叛了利用自己的韩国警察，最终选择虽然伪装警察但信任自己的老板的结局，认为这些正体现了中国崛起之后，混合着中国热与中国恐怖两种感情的，韩国人的两面性情绪。¹²⁶⁾

后迁韩华作者曾在其小说中表示：“在异国他乡的华文创作是一种追求事业成功的方式，同时也是一种追求安全感的方式。”¹²⁷⁾“不安”似乎是贯穿跨国移居者整个异域移居历史的词汇，产生跨国移居者不安情绪的因素有很多，比如包括语言、文化、生活习惯、社会秩序、就业环境等多种因素，这些都是需要移居者去积极适应的方面。除此以外，当地居民对待移居者的态度，也不能排除是造成移居者不安情绪的一个因素，且是移居者凭借主观努力也并不容易解决的问题。

126) 신현준, <중국 굴기 이후 한국화교와 다문화주의—간여적 중국인인가 부상하는 과(跨)문화 주체인가?>, 《한중 인문학연구》Vol.49, 서울: 한중인문학회, 2015, pp. 287-289.

127) 参考李文, <自序>, 《蒲公英: 文麒留韩记》, 北京: 人民日报出版社, 2017.1, p. 1.

另外，后迁韩华在移居形式上主要包括留学移居、投资移居、商业移居、结婚移居等形式，属于完全自主性的移居行为。后迁韩华大部分具有较高学历，移居前也已经具备了一定的经济基础，拥有可以自由往返的故乡。作为跨国移居者的后迁韩华，具有往返韩国与中国大陆两地的双重居住特征，因此在韩国人看来，后迁韩华所具有的“移动性”较其“在地性”就显得更加明显，也就是说，韩国人认为后迁韩华随时有返回故乡的可能，因而无法足够信任他们的“在地性”。

不管是在韩国人看待韩华的具有羡慕和恐怖这种两面性的情绪上，还是韩华所具有的移动性特征上，早期韩华与后迁韩华都具有相似性。因此，在笔者看来，早期韩华与后迁韩华在移居地韩国所感受到的“排斥”也应该具有相似性，属于产生在韩国人羡慕与恐怖心理下的“排斥”形态，这一点在后迁韩华华文文学中也被体现出来。

后迁韩华长篇小说《蒲公英：文麒留韩记》(2017)中就描写了主人公文麒，身处韩中两国学生这个大集体之中，却总感到灵魂游离在集体之外。为了改善自己与韩国学生之间的关系，主人公文麒并非没有努力过。为了与韩国同学搞好关系，文麒甚至会“自我欺骗似的”去配合，但是经过半年多的努力，他发现和这班心地纯洁的韩国学生还是相处出了距离感。文麒感到这种距离来自于韩国同学善良中透出的堤防，也包括对文麒经济状况的怜悯。¹²⁸⁾

小说的作者李文，同样作为后迁韩华，采取了全知全能的叙述角度，将自己的亲身体会，借小说中另一个人物关智渊之口说出：“国外就这样，再怎么样，至少是初来乍到的你，都只是一个随时会消失的，不明底细的外国人。用你，也只是一次性手套而已，何况你还是最便宜的那款。”¹²⁹⁾并且作者所塑造的关智渊这一人物形象，也似乎“看破红尘”般的，严格执行自己的交友原则：关智渊交往的女友是韩国人，但从一开始他就没有期待过会有什么未来，只是互相学习，搭伴儿，避免阴阳失调，他以后计划去日本读博士。¹³⁰⁾

后迁韩华的小说再一次体现出后迁韩华作为新型的跨国移居者所具有的特征：不仅他们的移居行为本身具有较强的自主性，始终保持往返韩中两地的双重居住形式的自由性，并且在忠实于移居地生活的同时，也不放弃选择更利于自己生活的其他移居地的移动性。

2. 文化想象意义上的“排斥”

韩华真正感到来自韩国社会的排斥，应该是在韩国进入近代化促进期之后。此时的先迁韩华大多以苦力身份出现，在韩国社会成为“野蛮”与“无知”的象征。在韩国近代化热潮中发行的《独立新闻》、《每日新闻》等报纸，以及《血的泪》、《秋月色》、《巢鹤岭》等新小说中也都

128) 参考李文，《蒲公英：文麒留韩记》，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2017年1月，38页。

129) 李文，《蒲公英：文麒留韩记》，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2017年1月，39页。

130) 同上，17页。

将韩华描写成吸饮朝鲜人血液的水蛭，露骨地体现出韩国人对中国的反感情绪。¹³¹⁾除了小说以外，韩国人也使用其他艺术形式来表现对中国的反感情绪，而先迁韩华就在韩国人这种关于中国以及韩华的文化想象中感到了“排斥”，笔者将韩华所感受的这种排斥类型称为文化想象意义上的“排斥”。

韩华所感受到的这种文化想象意义上的“排斥”，通过先迁韩华的文学作品体现出来。比如，先迁韩华的两篇影评作品：一篇是谭闾于1964年10月发表在韩华杂志上的《歪曲史实的〈北京五十五日〉》，一篇是严石于1965年1月发表在韩华杂志上的《影迷顾影》。

这两篇影评都与1964年中秋节期间在韩国上映的一部名为《北京五十五日》(55 Days at Peking)的美国电影有关，据《歪曲史实的〈北京五十五日〉》的作者介绍这部由英文小说改编再搬上银幕的影片，在当时被评为最受影迷欢迎的影片，又因为内容涉及义和团和八国联军的史事，也引起了韩华影迷的争睹现象。但是韩国影迷与韩华影迷各自的观后感受却大不相同。也许在韩国影迷的眼中这实在是一部豪华巨片，但是在韩华看来这根本不是什么历史巨著，完全是一部发生在中国的“西部大活剧”¹³²⁾。影片中天坛成为慈禧太后主政之所，后面站立的彪形大汉纯粹是阿拉伯式的斗力武士，让人恍惚有置身阿拉伯宫廷之感。作者发现这部电影的内容并没有根据历史，而是完全凭借西方对中国的想象，虚构而成。只要有天坛、有小脚、有鸦片鬼就是清国，至于西太后是否在天坛还是在乾清宫理政，这并不是西方人所欲深究的事情。更令作者费解的是影片的顾问居然是旅居西班牙的中国人黄马赛，负责布景及片头美术设计的也是誉满国际的华人。

这部影片令当时观看过的作者异常愤懑，影片中许多故意侮辱中国人的场面，在一个迁移国外居住的华人看来难以理解，作者在文章中表明：“现今世界是以促进国际了解为潮流的，这种侮辱某一国人的影片，是使人难以接受的，是非常愤懑而感遗憾的事。”但是即使愤懑，作者仍然很无奈，因为他深知：“空口辩谈是无益的，最好的方法是中国人拿出力量来拍制一部真正符合史实的《北京五十五日》影片，才是有意义的事。但是环视中国影界及政府宣传机关，又令人灰心丧气。谁有魄力做这件事，想来令人心酸，使人欲语还休”！¹³³⁾《影迷顾影》的作者严石也模仿好莱坞电影滑稽打趣的手法，在其文章中这样“诠释”着西方对中国的想象：

好莱坞的电影从打红蕃打起很起劲的打，直打到《日正当中》才打够了.....好莱坞的编剧家，为了填补科学拓展的七十厘米的巨型银幕空白，而又自感其年青的历史不够“面积”，打回头向东看，看见了“马哥勃罗”当年为仕之地——土地够面积，历史半万年，

131) 参考최승현, 《화교의 역사 생존의 역사》, 인천: 화약고, 2006, pp. 251-254.

132) 指好莱坞以美国西部大开发时期为背景制作的牛仔电影。

133) 谭闾, 〈歪曲史实的《北京五十五日》〉, 《韩华春秋》第5期, 首尔: 韩华春秋编辑委员会, 1964.10, p. 25.

够搞一阵子的啦。于是乎，朋友们都比我详细，咱们的天坛竟被“隆重”地搬上银幕，叫却斯顿骑士顿，领着一队人马在“北京”胡闹了“五十五日”。¹³⁴⁾

看到此处，笔者不禁联想到萨义德所著《东方主义》绪论中的一段描写，即：一位法国记者1975-1976年黎巴嫩内战期间访问贝鲁特(Beirut)时，对市区满目疮痍的景象曾不无感伤地写道：“它让我想起了……夏多布里昂和内瓦尔笔下的东方。”而萨义德对这位记者的看法非常肯定，说：“他的印象无疑是正确的，特别是对一个欧洲人来说。因为东方几乎是被欧洲人凭空创造出来的地方。”¹³⁵⁾这就是萨义德所提出的“东方主义”理论，他所要批判的是东方仅是人为建构起来的，是被想象的被“东方化”(Orientalized)了的产物。比如，阿拉伯人被想象成骑在骆驼背上，无力与易败的游牧民族。在影视作品中，阿拉伯人要么与好色要么与残忍和不诚实联系在一起。要么因为过分纵欲而颓废，要么善于玩弄阴谋诡计，有着施虐狂的本性，邪恶而低贱。¹³⁶⁾

当然，萨义德的“东方主义”是一个极为复杂庞大的理论体系，笔者在这里无意套用萨义德的“东方主义”来分析先迁韩华的这篇影评。但是从这篇影评中，笔者确实看到了西方对中国的想象，以及通过想象的虚构，及西方的“再中国化”行为。也就是说西方电影导演所拍摄的有关清国时期的电影，并不符合真正的中国历史，而是建立在西方对中国的想象，为迎合西方人的喜好而虚构的产物。而笔者在这里更想强调的是：本来是西方的导演为迎合西方人的口味而拍摄的有关清国时期的电影，在韩国上映时，也同样大受韩国影迷欢迎这一点上。并且，随后韩国影迷这种喜好得到了更大的满足，因为韩国导演也效仿西方导演，同样凭借韩国人对中国的想象建构出一个虚构的中国，在这里中国就成为被韩国想象，被韩国“中国化”了的产物。比如，韩国导演所拍摄的《清日战争与女杰闵妃》，“西太后”的登场似乎就成为“中国历史腐朽”的代名词；李艺春饰演清国使臣，朱善泰饰演袁世凯等，通过动员全部丑角来饰演清国使臣，来预示“中国政治的无能”。¹³⁷⁾影评《影迷顾影》的作者还指出韩国影视业发挥中国想象，建构“想象的中国”，并非肇自《清日战争与女杰闵妃》，在此之前早已存在像《鸦片战争》中让林则徐死于虎门大火中；《安市城》中杨薰扮饰的唐太宗，被一箭射瞎了眼睛，在“安市城”下上表演了一场捉放唐太宗的滑稽闹剧，中国人的面孔在银幕上成了被取笑的对象。¹³⁸⁾

罗伯特·扬说：“东方学家与东方人之间的差异是，前者书写后者，而后者则被前者书

134) 严石, <影迷顾影>, 《韩华春秋》第8期, 首尔: 韩华春秋编辑委员会, 1965.1, p. 22.

135) 爱德华·W. 萨义德, 王宇根译, 《东方学》, 北京: 三联书店, 2007, p. 1.

136) 参考爱德华·W. 萨义德, 王宇根译, 《东方学》, 北京: 三联书店, 2007, pp. 365-367.

137) 参考严石, <影迷顾影>, 《韩华春秋》第8期, 首尔: 韩华春秋编辑委员会, 1965.1, p. 22.

138) 同上, p. 22.

写。对后者来说，其假定的角色是被动接受；对前者而言，则是观察、研究等的权力。二者之间的关系本质上是一种权力关系。”¹³⁹⁾借用罗伯特·扬的理论，我们是否可以这样理解：韩国电影导演凭借韩国人对中国的想象来建构一个“想象的中国”，中国则被动接受着韩国导演以及韩国人的想象。当然，我们也不能否认，或许中国采用同样的方式建构了“想象的韩国”。这里更重要的问题是，韩国人对中国的想象，影响着韩国人看待(先迁)韩华的态度与情绪，进一步使先迁韩华也成为了韩国人想象的对象。韩国学者张守贤在论文中说：“回忆起小时候，说到华侨总会使我联想到神秘、危险、充满戒备心的人。”¹⁴⁰⁾小孩子并不可能凭空发挥如此想象，他是在受到周围长辈们的言行与观念的影响，也就是说韩国人对韩华的想象已经形成某种社会氛围。

“掌柜”、“王书房”本来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名称，但是如果在韩国提到“掌柜”，提到“王书房”，人们就会自然而然地联想到韩华。“掌柜”原本是中国古代对于店主的称谓，这种习俗被韩华带到韩国，在韩国以店主身份做生意的韩华被店员称为“掌柜”。随着韩华经济的衰落，中餐馆成了韩华的主要营生，由于中餐馆的“掌柜”称呼不绝于耳，韩国人听起来在发音上类似韩语“짱깨”，“짱깨”[掌柜]随之成为带有轻蔑之意的韩华代名词。“王书房”一词来自“绸缎商王书房”，在韩国本是指代做绸缎商生意的王姓华人女婿，但是后来“王书房”这一称谓也被蒙上了一层浓重的贬义色彩，成为只认金钱，贪婪吝啬的代名词，被用在对韩华的称呼上。

中餐馆确实与韩华有着历史渊远的关系。早期韩华为了给清国政府派遣到朝鲜的军人提供饮食上的方便而开设。清国军队撤走后，韩华中餐馆的主要顾客就是那些通过朝清贸易获得可观利润的韩华富商。韩华经济繁荣时期，韩华经营的中餐馆不仅对韩华，对韩国人来说也属于高级餐馆，先迁韩华也因此获得了丰厚经济利润。1930年代韩华经济开始走向衰落，再加上1960年代韩国政府对先迁韩华在政策上的压制，使先迁韩华可以从事的职业非常有限。结果具有一定知识和资本的先迁韩华再迁他地，仍然留在韩国的韩华几乎只能靠经营中餐馆为生。近来，后迁韩华也开始为满足那些从中国大陆移居韩国的华人，以及韩国人对中餐的需求继续在韩国经营中餐馆。

先迁韩华陈传治在其评论中总结了韩华经营中餐馆由盛到衰的过程：当年韩华为了躲避家乡的灾难，只身来到韩国打拼就是靠着那有名的三把刀—剃刀、剪刀、菜刀。在韩华经济鼎盛时期，中餐馆曾一时是高层贵客光临的场所，炸酱面也随之成为身份地位的象征。随着岁月的流逝，布置精致幽雅的西餐厅、韩餐厅等多如雨后春笋，可是韩华经济却日渐衰落。韩华经营的餐馆设备和刚开店时并没有什么改变，日久失修渐渐苍老、陈旧。韩华餐馆被视

139) 罗伯特·J.C. 扬, 容新芳译, 《后殖民主义与世界格局》,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13, p. 396.

140) 장수현, <한화(韓華), 그 배제의 역사>, 《당대비평》, 서울: 생각나무출판사, 2000, p. 245.

为低级塞肚皮之处，而西餐、韩食则被视为等而上之。¹⁴¹⁾也有先迁韩华打趣道：“在六二五[韩国战争]以前，以及再早，华食黄金时代，吃‘清’料理物美价好，吃中华高等料理，三生有幸，身价高，非常展扬；凡在挂红彩墨底金字招牌中走出来的客人，不管吃的是大滷，酱面，总是非常展扬地一边剔牙，慢慢离去。那种风光如今一去不复返矣。哪个老兄今天还敢在中国馆子门口剔牙，叫女朋友撞上多难为情，莫非这小子落魄江湖吃酱面啦？怎么敢嫁！”¹⁴²⁾韩华中餐馆今非昔比的景象被暴露得一览无遗。

先迁韩华在作品中表示，“炸酱面”始终是韩国社会关注的对象，比如：当中国餐馆的炸酱面由三十元涨至四十元时，立刻引起部分新闻记者的关注，纷纷加以报导。本是由于肉类涨价而不得不调整炸酱面价格的事实，被一些报纸说成利润数倍，称之为暴利，甚至有的报纸还开列了一碗面的生产成本，导致一碗四十元的炸酱面又成为保健当局调查的对象。以至于涨价还不到三天，大邱街面上就有三十余家韩华开的餐馆受到停止营业处分，处分理由均为违反卫生法。不过在韩华将价格还原以后，“停业风波”就再未发生过了。¹⁴³⁾韩华不禁埋怨：“拿着三十块钱，只能到南大门的地摊上，吃一客鱼刺白饭，或到阳洞路边的实费食堂排队，吃一碗苦力饭，若想到倭食[日食]洋餐馆去，此数只够给小费之用，中国饮食店怎样能在此种廉价的生意下继续下来呢？”¹⁴⁴⁾

一位先迁韩华干脆自嘲式的以“王书房”自居，写作了一篇《王书房的苦恼》，呼诉了韩华经营中餐馆的苦衷：韩华经营的中餐馆里经常有“不方便时招呼王书房挂账”的现象，但是在这简单的“挂账”两个字里面却有很大的学问。顾客吃完了一摆手，踢桌跑堂的一躬到地，连声的“안녕가시요”[请慢走]，到了月底王书房就要夹着账单各地收账了。特别是一度发生粮荒的时候，那些薪水阶级每天中午都到中餐馆来吃三十元的炸酱面，真是座无虚席。可是由于多半的顾客要求缓期付账，干了一场好买卖，结果账本上反而出现了赤字。这不禁令“王书房”感慨道：“同样是一碗面，用机器压出来，在“米里齐”[鳀鱼]汤里一泡，撒上两粒葱花卖出去，就成了“提倡粉食”，叫做“粉食提倡中心”，每碗卖二十元，税金特优。而一碗满满的中国面，用手一条条的拉出来，有菜有肉，有海味，每碗三十五元，而且还要赊账，就成了暴利，就成了不正利得？”¹⁴⁵⁾

从以上先迁韩华的叙述中明显可以体会到他们对“炸酱面太受韩国社会关注”的不满。但是从另外的角度来看，这也说明炸酱面的价格已经达到了左右韩国物价的程度，“炸酱面”已经成为韩国人饮食文化的一部分。因此，不仅韩华在移居韩国的过程中形成了文化上的混种

141) 参考陈传治, <当前旅韩华侨的处境>, 《韩中文化》, 首尔: 韩中文化协会, 1974.11, p. 25.

142) 夏虫, <仲夏呓语>, 《韩中文化》, 首尔: 韩中文化协会, 1983.8, p. 37.

143) 参考熊仁, <炸酱面值价几何>, 《韩华春秋》第12期, 首尔: 韩华春秋编辑委员会, 1965.5, p. 9; 王小二, <四月的大邱>, 《韩华春秋》第13期, 首尔: 韩华春秋编辑委员会, 1965.6, p. 26.

144) 熊仁, <炸酱面值价几何>, 《韩华春秋》第12期, 首尔: 韩华春秋编辑委员会, 1965.5, p. 10.

145) 张铁板, <王书房的苦恼>, 《韩华春秋》第13期, 首尔: 韩华春秋编辑委员会, 1965.6, p. 16.

现象，韩国人也同样通过韩华受到了中国文化的影响。

在韩国“王书房”与“掌柜”已经成为先迁韩华的代名词，韩国人已经习惯于将“王书房”与“掌柜”所代表着的韩华想象成落后、无知、低能的，只知蓄钱不懂花钱的守财奴形象，是与“我们”韩国人相区别的，非韩国人的“他者”。韩国学者张守贤的论述正可作为有力的佐证，他在论文中这样写道：“华侨的历史可以说是异邦人生活史。他们对于我们来说是异邦人，我们也同样希望他们永远以异邦人的身份存在下去。提出繁琐的归化条件使他们难以取得韩国国籍也是出于这样的理由。韩国政府对于华侨教育和文化没有选择同化政策也不是出于对他们的尊重，而是由于无法接受‘他们’成为‘我们’的偏狭思想。以血统主义为根本的排他性国民观念使我们很难想象华侨成为我们的一部分。”¹⁴⁶⁾正如丹尼斯·赫依(Denys Hay)所说的欧洲观(the idea of Europe)是一种将“我们”欧洲人与“那些”非欧洲人区分开来的集体观念¹⁴⁷⁾，韩国社会也在利用这种排他的集体意识将“我们”韩国人与“那些”非韩国人区分开来。因此，先迁韩华在韩国人有关韩华的想象中感受到“排斥”。

再迁美国韩华也在回忆韩国生活的文章中深表感慨，认为早期移居韩国的华人数十年的努力，事与愿违，付诸东流，留下来的韩华仍然抱残守缺，操持旧业，一直没有出现过发迹的大企业，也没有能参与政界的名流闻人，不知何时才能出人头地？前途茫茫，不知所向。造成韩国人以为中国人只会做炸酱面，不了解先迁韩华内心的苦衷。先迁韩华若是走在韩国的乡间地方被韩国孩子看到，就会被称呼“炸酱面大叔，安宁含笑哟[您好]？”虽然是一句善意的招呼，也会使韩华听起来不太悦耳，啼笑皆非。¹⁴⁸⁾

炸酱面不过是维持先迁韩华经济来源的途径，在这里却被赋予了一种身份的象征。不知从何时起，炸酱面在韩国已然成为先迁韩华的代名词。对于韩华来说，不管是韩国人还是中国人，把炸酱面与自己连结在一起的时候，“都好像在刺痛他们的伤心处”¹⁴⁹⁾。再迁美国韩华崔仁茂在他的文章中说：“韩国是民主国家，但它带给我们太多的心理伤痛，法令严苛华侨发展是次要问题，很多人最承受不了是社会的歧视，我们从童年到长大，耳边几乎没停过“刷拉”¹⁵⁰⁾与“大国奴”的刺耳虐讽。”¹⁵¹⁾另一位再迁美国韩华也说：“我们不但曾受到经济打压歧视，也受到精神诬蔑歧视，“中国奴”、“大国奴”、“张果老”¹⁵²⁾、“炸酱面”曾不绝于耳，直到我们移民来美才消停。”¹⁵³⁾

146) 장수현, <한화(韓華), 그 배제의 역사>, 《당대비평》, 서울: 생각나무출판사, 2000, pp245-258.

147) 爱德华·W. 萨义德, 王宇根译, 《东方学》, 北京: 三联书店, 2007, pp. 365-367.

148) 这段叙述参考焉晋琦, <回顾旅韩华侨和韩国民族的恩怨>, 《美国齐鲁韩华杂志》32期, Laguan Woods, California: 美国齐鲁联谊协会, 2012.2, p. 82.

149) 参考崔仁茂编著, 《韩华在浴火中重生》, 南埃尔蒙特: 捌玖印刷公司, 2003.1, p. 109.

150) 韩语说成“썰라썰라”, 指汉语, 是韩国人模仿的汉语发音。

151) 崔仁茂, <刚上山 又下山>, 《北美齐鲁韩华通讯》第10期, Laguan Woods, California: 美国齐鲁联谊协会, 2004.5, p. 60.

152) 韩语说成“짱골라”, 大概是从汉语“掌柜的”的发音而来, 带有轻视之意。

崔仁茂还在他编著的《韩华在浴火中重生》中对韩国与美国的移居生活作过比较，根据他的比较可以了解到：韩华移居韩国，为了适应韩国人喜欢吃辣的习惯，每道菜都加辣椒，创造了适合韩国人口味的“韩式中菜”。韩华再迁美国后，为了适应美国人口味偏甜的习惯，每道菜都加些糖，开创出适合美国人口味的“美式中菜”。在美国中餐妇孺皆知的中菜是“鸡炒面”，在韩国中餐家喻户晓的中菜是“炸酱面”。叙述到这里都是一些顺应常理，毫无非议的事实。但问题是“鸡炒面”在美国人心中只是单纯的中菜联想名词，而“炸酱面”在韩国人心中却是百味杂陈，另有弦外之音，其中隐藏着中国人的落后、无知、低能。¹⁵⁴⁾再迁华人崔仁茂在这里对于美国中餐与韩国中餐各自具有意义上的比较耐人寻味，即，韩国中餐，特别是其中最为韩国人熟悉的炸酱面在韩国所具有的特殊意义，就使得表现这方面内容的韩华文学，具有了不同于其他地区华人文学的特殊意义。

3. 生存意义上的“排斥”

韩华在韩国的移居生活中所感受的“排斥”，在类型上，还包括来自实际生活中的排斥，笔者将韩华所感受到的这种排斥类型称为生存意义上的“排斥”。韩华同样通过华文创作的形式，将自己在充满排斥的社会环境下，移居生活的艰难与困惑表露无遗。

先迁韩华移居韩国的生活已逾百年，但摆在眼前的现实是韩华青年仍然很难在韩国社会找到一席之地，即使是从台湾高等学府学成归来的青年人。现实是即使学到满腹经纶，即使内心充满抱负，到头来能做的仍然只是继承父辈家业，比如开中餐馆解决生计，每天机械式地开张、关张、迎客、送客，重复着同样的工作，谈不上未来与希望。先迁韩华柳耀广写作的华文诗中就生动真实地展现了上述场景：

你听那惹人心血的声调
你看那挥着膀子的操作
泣血的残声
为着饥饿的肚皮
……
严冬冰水里的挣扎
酷夏火炉旁的烘烤
……
我又深深地哭了

153) 一剪梅, <冀望韩国政府多一点“施惠”少一点“互惠”>, 《美国齐鲁韩华杂志》第26期, Laguna Woods, California : 美国齐鲁联谊会, 2010.5, p. 8.

154) 参考崔仁茂编著, 《韩华在浴火中重生》, 南埃尔蒙特: 捌玖印刷公司, 2003.1, p. 110.

父亲正在弯着驼下来的腰
미안합니다[非常抱歉]
또 오세요[欢迎再来]
而我 这一刻
又那么轻易的放走了十三个 미안합니다[非常抱歉]
.....

那走失的路子
随着走失的岁月
.....¹⁵⁵⁾

这是在韩国出生在韩国长大的第二代华人，正直二十岁的热血青年亲身体会到的真实生活。诗中的“미안합니다”是韩语，汉语是“对不起”、“抱歉”之意。诗中的父子俩是在向光顾的韩国客人道歉，因为这些顾客在吃完五十块韩币一碗的炸酱面之后，不住地抱怨“맛이 없어 해, 버져서 해”[味道不好，面也不筋斗]。这是韩国人嘲讽韩华韩语说得不自然的一种方式。¹⁵⁶⁾作者通过直接引用到诗中的方式，既体现出韩国人对韩华的轻视，同时也可以说明即使韩华的韩语说得不够熟练，也仍然能听出韩国人的弦外之音。更进一步说，作者在证明，像作者这样的韩华与韩国人具有同样水准的韩语表达能力以及韩国文化素养。不管是严冬冰水还是酷夏的火炉都不能阻挡韩华餐馆厨房里发出的泣血残声。即使如此辛苦的工作，由于税吏的压榨和保健所的威胁，辛勤劳动也只能换来饱尝饥饿的痛苦和凄凉的生活。即使作者望着父亲弯着驼下来的腰向无理取闹的客人道歉：“미안합니다, 또 오세요”[非常抱歉，欢迎再来]，却无奈地发现此刻的自己能做的只有深深地哭着，也“那么轻易的放走了十三个미안합니다[非常抱歉]”。而时间并不会因为某个人的悲哀，或某个群体的悲哀而停止，日历仍然在无情地翻过一页又一页，而作者却感到随着岁月的流逝，自己只会更加迷失人生的方向。

如果说上述《中国人》这首诗再现了一家中国餐馆华人父子的生活场景的话，那么柳耀广的另一首《没有风的夜》则再现了作者所生活的韩华社会的一个断面。“没有风的夜，也没有星，巷子里窒息地停电，工厂业已休业，蜘蛛更网密地网越了夜。”只此一句描写就形象地描画出一片萧条凄凉到令人压抑窒息的景象。“廉价的奶子哺乳着廉价的儿子”体现着华人的自卑；茶坊的生意萧条到无人光顾，似乎在这里什么都会变成“三流”；只有送餐的摩托车在忙碌着打破了这死一般的沉寂，而这“死巷的游龙50C.C.的小车”，却是他们维持生计的重要

155) 柳耀广，《中国人》，首尔：中国大使馆中山堂诗画展，1969.10.10-12，诗歌创作时间：1968.10.26。

156) 正确的韩语表达应该是：“맛 없네요. 퍼졌어요”。

手段。施展才华的欲望被压抑到只剩下失落与迷茫，迷茫的人不由得大声询问哪里才是可以容身的故乡？无奈之下就把那个“温柔乡”暂且当成“故乡”，以求得短暂的安慰。老人们目睹了“从旅馆私奔的男与女，又进了麻痹沟”后，连连叹息：“往年这时天上有风，风下的风化也不像今夕”。在这个“钱都失效”的年代，有谁可以唤醒那个“午睡尚未醒的警察？”¹⁵⁷⁾

作者担心由于精神寄托的欠缺和精神生活的匮乏，而造成韩华社会的不良风化。作者期待着韩国政府的管理，而不是限制；期盼着韩国社会的关心，而不是漠视。但是实际情况是怎样的呢？先迁韩华记者一凡也在一篇报道中针对韩华‘不正当的娱乐风气’问题作出过批评：“谈起正当的娱乐，在这个侨社里才是一些有识之士感到伤心的事，青年人也是无奈的。然而，韩国治安人员的特例(把华侨例外—警察和刑警人员就是对我们的这方面之‘不正’网开一面)才使我们这个侨社对娱乐有所‘不正’—欠缺正当娱乐。”¹⁵⁸⁾可见作者的担忧也是不无根据的，在当时的作者眼里韩华在韩国生活的这几十年，不过是“从同化期的怪物，到七十年代的赘物”。韩华社会之外的韩国社会飞驰着“洪水似的汽车”，而韩华社会却只剩“与日渐加增的赤字”。目睹这一切的作者，受伤的心早已空虚，就“像那轨道，再也复合不起”。¹⁵⁹⁾

首尔是作者生活的地方，也是他再熟悉不过的地方。“明洞、馆前街、막걸리巷[米酒巷]、地下道、圣母病院的玛丽亚、美都波[百货公司]”，他已经不知道走过多少圈，在这些地方他看到的是“男人与女人”，却又似乎不是“男人与女人”，而是“社长与贵妇人”，是“花花公子与梨大[梨花女子大学]的招牌”，在这些本应平等却被划分出阶级或等级的男男女女中，作者找不到自己的容身之所，他不知道该“身将何处？”可他也逃不掉，就像一只“走不出这漩涡的羔羊”。¹⁶⁰⁾

作为刚满二十几岁的热血青年，本该满怀憧憬、满怀抱负。但是先迁韩华柳耀广所感受的青年时代是：“年轻人的心怀要以文字描写，那是虚伪的谎言；年轻人的苦闷要以肉体来泄露，那是逃避梦想”，“死亡”与“逃避”都“不是永恒的解脱”。他们“是历史的羔羊，这一代的，没有战争，也没有着和平”。¹⁶¹⁾充满梦想，却不得不为生活所迫而行将放弃；充满抱负却为了家人生计不得不埋没在小小餐馆里受尽歧视、冷眼与打击。作者最佩服的是“孤雁”的勇气，因为在逆洞中，孤雁敢站起来，敢面对现实，发出反抗的声音，抗议对一个年代的苦闷与处境的不满。但是当作者看到疲困、绝望的大雁时，却似乎在大雁渐渐放下的羽翼中，看到了自己的影子。¹⁶²⁾于是，作者在日记中无奈的写道：

157) 参考柳耀广，〈没有风的夜〉，《韩华》，首尔：韩中文化协会，1990.7，pp. 48-49，诗歌创作时间：1970.7.27。部分内容是在梁楠，〈离散语境下韩国华人的身份认同〉，《中国现代文学》Vol.67，首尔：韩国中国现代文学学会，2013，pp. 170-171基础上所做的修改。

158) 一凡，〈中友会郊外夏游〉，《韩华》，首尔：韩中文化协会，1990.7，p. 28。

159) 以上引文出自柳耀广，《电车》，首尔：中国大使馆中山堂诗画展，1969.10.10-12，诗歌创作时间：1968.11。

160) 以上引文出自柳耀广，《明洞的羔羊》，首尔：中国大使馆中山堂诗画展，1969.10.10-12，诗歌创作时间：1969.3。

161) 以上引文出自柳耀广，《年轻人》，首尔：中国大使馆中山堂诗画展，1969.10.10-12，诗歌创作时间：1969.9。

出路，这是一个最现实的年代。学不能通而其用，十六年的教育，带来的只是没落的饭馆，与一些社会的冷眼。这一代，这样的，一点，点渡了下来。谁知他会停在哪？他会发展到哪？¹⁶³⁾

作者柳耀广也效仿“孤雁”，鼓起勇气，为始终因循在苦闷里而走不出的，先迁韩华上一代与这一代的悲剧，写下一首诗，发生一个世代的《心声》：

筑着高高城壁的人呀！
为什么你缚夺了我们的
空气与食粮
只让我们，消化着
你们的排泄
……
为什么在我们爬的时候
你就跑了
在我们走的时候
你却飞了
……
不要忘了
你们也是来自子宫
……
让我们都在人的乐园里起舞¹⁶⁴⁾

这首诗很具代表性的表达了先迁韩华因为受到韩国社会的排斥，感到自己与韩国社会之间隔着一座高高的无法逾越的城壁，而这座城壁不仅阻隔了沟通与融合，并且阻断着被围困在城壁中的华人社会的发展。孤岛般孤立围城中的韩华永远追不上围城外面世界的发展速度，当围城外面的人已经跑了的时候，他们还在爬；而当他们才开始走的时候，围城外面的人却已经飞了。就像被隔离的韩华只能在时空逐渐狭窄的围城中等待呼吸的窒息。这种透不过气来的生活，使围城中的华人渴望飞翔，飞出这令人窒息的空间，平等地在“人的乐园”里享受平等的生活。

162) 参考柳耀广日记，写于1969.1.18。

163) 柳耀广日记，写于1969.1.18。

164) 以上引文出自柳耀广，《心声》，首尔：中国大使馆中山堂诗画展，1969.10.10-12，诗歌创作时间：1969.9。

先迁韩华林树兰是一位西洋画画家，也喜欢写诗。他毕生追求在写诗、绘画、围棋弄墨中领略人生快乐，同时也为对艺术的固执与执着孤苦一生。本以为艺术是无国界的，但最终他的艺术结晶也未得到韩国社会的承认，只留下无尽的叹息。他为自己喜爱的都是些“冷门子”，是“逆流而行”感到不幸；他为自己近五十多年的生命始终“在战焰弥漫中成长”感到不幸；他为像自己这样“为了艺术而艺术的人非得盖棺论价”感到不幸，就像“十九世纪后期印象派代表画家梵谷”，或是他“寄居的大韩民国的李仲燮先生和朴寿根画伯”。¹⁶⁵⁾然而，他觉得最为不幸的是韩国社会对他这个“外人”的排斥。在一次东亚美术祭上，他由于“外人”的身份而被拒之门外，这使他体会到了人生中从未有过的沉痛。本以为艺术应该是不分国别和人种的，但是在韩国他的艺术作品却被打上了“外人”的烙印。为此他“狂怒”，他“发作”：“我痛恨，我失望！你们，为什么把我看成了异邦人？你们该知道异邦人的痛苦吗？”不过他这般歇斯底里的嚎叫，只换来“奇异的讥笑声”。¹⁶⁶⁾

先迁韩华的身份在韩国都得不到承认，第二代以及之后的先迁韩华几乎都在韩国出生，在韩国成长，却从未属于过这个社会。而实际上，他们的身份在中国大陆在台湾也得不到承认，他们似乎只能归属于“韩国华人”。来自韩国社会的排斥，总是在提醒着他们“异邦人”的身份，“他者”的角色。他们将过着客居生活的自己比喻成荒漠上的淘金者，梦想总“在烈日的鞭笞下号响”，脚下总像“带着问号脚镣，叮当，叮当！回响”。¹⁶⁷⁾身份的不确定似乎使前方的路也变得迷茫，眼前的“路，瘦到遥远”。¹⁶⁸⁾也许是生活的艰辛使他们觉得生活像一片苦海，就连金色的夕阳照耀下的海面都呈现出“铁灰”般的颜色，海底埋藏了“多姿多彩的回忆”，但也埋藏了“怆痛的残渣”，因此这片铁灰色的大海不知破碎了多少寻梦人“绮丽的梦”。只有秋夜的北斗星座永远指示着地下这群“迷途的羔羊”。¹⁶⁹⁾

综上所述，韩华在韩国社会所感受到的“排斥”，主要体现出三种类型：第一种是产生在韩国人羡慕与恐怕心理下的“排斥”，第二种是产生于韩国人对韩华文化想象意义上的“排斥”，第三种是韩国在实际生活中所感受到的生存意义上的“排斥”。

韩华在韩国所感受到的“排斥”存在一种相互性：“大国奴”的表述，本是韩华对韩语“대국놈”[大国者]的误译，但是在误译当中，又不完全出于误会，其中饱含着韩国人对于早期韩华以“大国国民”傲慢姿态登场的一种混合着羡慕、嫉妒、恐怖、反感、排斥等情感的复杂情

165) 这里的引文出自林树兰, <短谈>, 《韩华》, 首尔: 韩中文化协会, 1990.7, p. 49.

166) 这里的引文出自林树兰, <异邦人的悲哀>, 《韩华》, 首尔: 韩中文化协会, 1990.8, p. 38. 以上这段有林树兰的论述是在梁楠, <离散语境下韩国华人的身份认同>, 《中国现代文学》Vol.67, 首尔: 韩国中国现代文学学会, 2013, pp. 171-172的基础上修改后的内容.

167) 张岚, <市声>, 《韩华春秋》第9期, 首尔: 韩华春秋编辑委员会, 1965.2, p. 32.

168) 戈风, <寒夜行>, 《韩华春秋》第9期, 首尔: 韩华春秋编辑委员会, 1965.2, p. 32.

169) 孙荻, <默忆>, 《韩华春秋》第7期, 首尔: 韩华春秋编辑委员会, 1964.12, p. 32.

绪，以及韩华由高傲的“大国国民”沦落为只会做炸酱面的无知贪婪的社会底层的失落与无奈；熔铸着韩华在移居社会的复杂情绪下，受尽歧视与排斥的人生经验。“高丽棒子”的表述中，含有韩华对于自己文化上的优越感，但同时也内涵着一种“取宠式”的逆反情绪，即，这种表面上看起来意在区分彼此，主动拒绝被同化的行为，实际上是当韩华感到移居生活充满排斥与歧视，在地化愿望受到挫折之后，一种发泄不满情绪的方式，最终目的仍然在于想引起韩国社会对韩华的关注。

第 2 节 “乡愁”：“落叶归根”还是“落地生根”

不管是出于什么原因选择背井离乡移居他地，这种行为的本身也许就意味着迎接自己的将是一种期许与不安互相胶乳融合的生存状态。与故乡的生活相比，异地生活的诸多不便也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只是当移居者相对来说，较为成功地适应了移居地的生活，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在地化，那么这些移居者所感受的期许也许会稍稍大于不安，那么接下来，移居者将会继续自己的在地化实践。相反，当移居者在适应移居地生活的过程中感到困难重重，处处碰壁时，他们的不安感就会胜过期许。随着时间的流逝，这种不安感还会越演越烈，以至于引发移居者对于故乡的思念。接下来的问题是，如果移居者所思念的故乡实际上已经是一个回不去了的地方，他们就出生并成长在移居地，这个被称为“第二故乡”的地方，他们对故乡没有亲身体验的记忆，那么这些移居者的“乡愁”会是怎样一种状态？当这些移居者再迁他地的时候，他们的“乡愁”又是怎样一种状态？

为了考察这些问题，笔者将在这一节中通过三种不同类型的“乡愁”，来分析韩华文学中所体现的，韩华在不同时代所呈现的各不相同的“乡愁”特征。

1. 寄托于故乡的“乡愁”

先迁韩华的评论《仁川华侨今昔》(1964)中记录了一位年逾七旬的先迁韩华老翁，即，第一代先迁韩华在看到当时韩华社会萧条景象后发出的感慨：“中国人在高丽的黄金时代已过去了，想当年仁川中国街每到旧历年，热闹的情况和老家儿有什么不同呢？唉！那种日子，哪天会再来呢？”¹⁷⁰⁾

七旬韩华老翁的这段感慨，给我们提供了重要的启示：这里的“黄金时代”指的应该是19世纪末期至20世纪30年代以前，韩华经济上出现的繁荣，韩华社会生活上的富足时期。所谓乐不思蜀，在韩华所谓的黄金时代里，他们可以随心所欲的生活，甚至在不懂韩语的情况下也不会感到生活的不便，因此也就意识不到谙习韩语，熟悉韩国文化的必要性，以至于觉得移居韩国与在“老家儿”生活没什么两样。

从这些内容上可以看出，早期韩华，至少是处于或经历过“黄金时代”的韩华，他们在身份认同上更接近“中国人”的认同。并且，早期韩华可以自由返回故乡，再加上韩国的生活与“老家儿”没什么两样，所以此时的韩华应该不具有明显的“乡愁”意识，即使有“乡愁”，他们的乡愁也会寄托在移居前的故乡。

如果说先迁韩华的移居大多是为躲避战乱或灾难之苦，带有一定的被动因素，那么后迁韩华的移居行为更带有主动性，因而后迁韩华的移居大多出自更高的精神追求，对中国以外

170) 月尾楼主, <仁川华侨今昔>, 《韩华春秋》第5期, 首尔: 韩华春秋编辑委员会, 1964.10, p. 13.。

世界的好奇，对成功海归人士的憧憬，对自己也可能成为其中一员的幻想，因此在他们的生活中有着更多的新奇与憧憬。

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当这种新奇感消失殆尽之后，后迁韩华同样感到莫大的孤独与寂寞，尤其是在万籁俱寂的夜晚。这个时候他们会想念故乡，想念故乡带给自己的那份安全感。

就像后迁韩华李文的小说《蒲公英：文麒留韩记》中所描写的那样：每当感到生活在异国的孤独，主人公文麒就想再次踏上西安的土地，亲口跟家人和朋友讲述自己异国他乡的这些见闻和感受，想再去找回哪怕是独自一人散布在钟楼大街附近的那种浪漫，想再好好吃一顿为秦始皇统一天下立下过汗马功劳的羊肉泡馍。作者笔下的文麒从小到大都没有怎么出过远门，第一次离家，便只身来到了尽管地理上不算太遥远，但心理上绝对陌生的韩国。异国的乡愁也是更加深刻的，因为除了家人和朋友，这里也没有了长城和熊猫。¹⁷¹⁾作者借主人公文麒之口感慨道：“海外是新奇、差异和独木桥。现在，没有新奇，别的，也只能确定成为老人以后，不会忘记这块尽管始终都不属于自己，但却留下过汗水的地方。”¹⁷²⁾

由此可见，后迁韩华的“乡愁”仍然寄托在自己的故乡，因为后迁韩华移居韩国的时间还不是很长，并且在移居过程中也积极采取韩中两地的双重居住策略，可以自由往返故乡的原因。

这种具有较强自主性的新型跨国移居形式，使后迁韩华的移居生活明显少了悲观与压抑，增添了许多乐观与自信。这一点可以从作者李文在小说中所设定的，主人公文麒化解孤独的方式上略见一斑。比如，后迁韩华可以理性地将克制个人需求和欲望这件事上升到理论的高度，告诫自己：“根据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人只有首先满足第一及第二层次的需求，即生理需要和安全需要，才有精力和能力去考虑更高层次的情感归属、尊重的需求。现在只想，也只能先去解决自己的基本生存问题。”¹⁷³⁾后迁韩华可以以一个跨国移居者的姿态，将自己目前所感受的迷茫与冲动理解为那是在任何时代，任何国家，任何制度下，都是大同小异的。像作者笔下的文麒一样从村上春树的《挪威的森林》里，读出年轻人的憧憬与希望。¹⁷⁴⁾

2. 建立在在地化之上的“乡愁”

20世纪30年代以后，先迁韩华在韩国经历了日占时期来自日本殖民当局的排挤与压制，甚至遭受了由于日本人的挑唆而引发的“万宝山排华事件”，这些历史事件都使先迁韩华在经济上遭受了重创。20世纪40年代中后期，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终结，先迁韩华的经济刚刚得到一些恢复，又遭遇韩国战争的影响，经济更是每况愈下。大韩民国政府成立后，韩国的经济得到了恢复与发展，遗憾的是韩华经济却没有得到必要的扶持，进入1960年代，先迁韩

171) 参考李文，《蒲公英：文麒留韩记》，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2017.1, p. 111.

172) 李文，《蒲公英：文麒留韩记》，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2017.1, p. 224.

173) 参考李文，《蒲公英：文麒留韩记》，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2017.1, p. 60.

174) 同上, p. 98.

华经济更是出现一片萧条颓废景象。

此时，当第二、三代先迁韩华走访坐落于仁川市善邻洞的中国街，见到矗立其间的多座年久失修的清式建筑时，他们便会感慨从中华楼油彩斑驳的画栋与雕梁中窥见的韩华昔日的繁华与热闹；感慨中华楼对面，如今散居着多户韩华的那些历经沧桑的旧式建筑，谁又能想到那曾是“执清韩贸易之牛耳的华商‘同顺泰’的发祥地呢？”先迁韩华为曾经赈济过朝鲜高宗帝宫中内用，甚且周转过朝鲜国库短拙的“同顺泰”¹⁷⁵⁾感到自豪，同时也为韩华眼前的现实，在残喘中的挣扎，泥泞中的跋涉生活感到凄凉。

一些接受高等教育的第二、三代先迁韩华感到不解的是，摆在先迁韩华眼前的已经是一个千疮百孔，日暮途穷，在日渐穷困中终日为温饱挣扎的社会。但即使如此，仍然有一些先迁韩华固守着粉饰太平，因循苟且，不求进取的封闭思想。为了唤醒这些保守顽固腐朽思想的韩华睁开双眼细心观察，客观面对现实，于是选择通过文字的方式，将一个真实的韩华社会展现在所有韩华面前。一位先迁韩华作者在作品中这样描写中国街的凄凉：“往日的怡台东旧址，现在成了种冬瓜眉豆的菜圃，天盛东及春机栈的门口，蒿草成树，老狗躺在街中心睡觉，漏房人家在马路上晒棉被”¹⁷⁶⁾，这些场景使经过此地的作者不觉凄然泪下。

白衣民族
染上了冷淡的殖民主的色彩
藩属，殖民地，兄弟，友朋.....
随着历史的变迁
注定了早已离去
袁世凯也已不在
炎黄子孙
饥饿与凌视
中华的弘魂何处寻回？¹⁷⁷⁾

第二代先迁韩华柳耀广写于1960年代末期的这首诗歌，可以从一个侧面体现出先迁韩华在韩处境的变化。先迁韩华与韩国人在实际生活中也像兄弟亲友般和睦相处，先迁韩华眼中的韩国人是纯洁无邪的白衣民族。随着历史的变迁，清国政府这样的坚强后盾已成为历史，早期韩华的辉煌也一去不返。20世纪30年代来自日本殖民者的压制，再到1950年代韩国战争的迫害，都使先迁韩华在经济以及生活上受到严重影响，但是这一时期的先迁韩华始终与韩

175) 引文出自侨民, <韩国华侨今昔>, 《韩中文化》, 首尔: 韩中文化协会, 1974.6, pp. 19-20。以上叙述也参考此文。

176) 月尾楼主, <仁川华侨今昔>, 《韩华春秋》第5期, 首尔: 韩华春秋编辑委员会, 1964.10, p. 13。

177) 柳耀广, 《乡愁》, 首尔: 中国大使馆中山堂诗画展, 1969.10.10-12, 诗歌创作时间: 1969.4.16。

国人一起站在受害者的立场上。自20世纪后半叶，韩国政府对先迁韩华实施的一系列限制政策，在经历了永住权制度缺失、国籍变更限制、经济制度压制、教育自律政策等一系列困境之后，先迁韩华在韩国开始感到一种排斥的社会氛围。

也许只有先迁韩华还记得，坐落在仁川北山美国麦克阿瑟元帅铜像右前方的兽魂塔，因为那里原是为纪念清国末年袁世凯大将奉命来韩，协助韩人整备军伍的功德，埋藏他初次来韩时所乘船上使用桅杆的地方。当一位韩华发现那桅杆不见了，起初他心中默默期待的是，韩国人在山上怕风吹雨打容易毁坏，而移植到了博物馆。结果事情的真相是韩国人光复后，把这点小小的纪念品也拆除了。先迁韩华作者心里非常清楚，这一件小事琐碎到不会影响任何人，但他仍然不免在发出“不薄古人爱今人”的幽思下，想起这件事，并顺手记在游记中，借此“发古人之幽思”。¹⁷⁸⁾也许在别人看来这是一件不值一提的小事，但即使是这样的小事，也足以使敏感的移居者产生莫大的失望。因为这样一件小事，就足以引起先迁韩华对客乡生活产生不安与危机感。

尤其是在看到经济日益发展的韩国社会，只有先迁韩华仍然在其中挣扎的凄凉时，更加感到隔在自己与韩国社会之间的那座城墙，高到无法逾越，强烈的排外感又使他们随时都会触景生情，思念家乡：

客岁易逝，十数年来已不见故乡底村影。弃乡人客途倦旅，偏偏又逢家乡事。最难忘一个月圆的节日，看到一帮子同乡客在台北街头扮演的那出街头戏。那是一种在家乡叫着跑“早船”的游艺……这种家乡游艺，如今迹近廉价地叫卖在异乡的街头，怎使同乡人看得下去。我挤出人墙，无法留恋这些微的故乡音容。¹⁷⁹⁾

一句“弃乡人客”不知道出了作者多少辛酸与无奈。舍弃家乡甚至亲人来到陌生的他国，为了融入这个新的环境而奋斗打拼了十数年，却仍旧摆脱不了异乡人客的身份。

但是在这段引文里，不免令人诧异，为何当作者看到家乡的游艺被同乡客叫卖在异乡街头时，竟不敢以这再熟悉不过的，充满故乡风情的音调，慰藉思念家乡的愁苦，更不愿走上前去，与那些充满家乡气息的同乡人寒暄？为何作者此时做出的选择却是挤出人墙，匆匆逃避？或许是因为眼前的情景，使作者联想到那欧洲古老的路上，驾着大篷车流浪的“吉普赛人”，到了这个世纪又被披上“波希米亚”的袍衣，渐渐定息在“塞纳”河畔。作者也不愿知道“东方的路上，又添了多少流浪的新客，正迈步在陌生的路上，歌着不熟练的曲调，肩着沉重的乡愁，流浪流浪。”¹⁸⁰⁾在异国他乡偶遇的同乡人和亲切的家乡小调，丝毫不能带给这个因

178) 参考高登河，〈谈游记〉，《韩中文化》，首尔：韩中文化协会，1977.7，p. 42。

179) 齐鲁，〈客在他乡〉，《韩华春秋》第1期，首尔：韩华春秋编辑委员会，1964.6，p. 26。

180) 同上。

为渴望更好的生活，充满希望移居异地，却始终改变不了异乡人身份的离散者任何慰藉与安慰。充满乡情的家乡游艺在异乡的廉价叫卖，反而让他感到十分的不舒服，只能让他毫无留恋地赶快逃离这微些的故乡之音，他不想因此联想到更多的“吉普赛”，更多的流浪，以及流浪的沉重与凄凉。

然而，笔者同时认为，作者故意逃避在异乡偶遇的乡音，不仅是因为这些同乡人低廉贱卖家乡游艺的行为，增添了他作为离散者的痛苦，还在于先迁韩华自身身份认同的变化。早期的先迁韩华因为拥有清国政府的大力支持，在韩华经济上较为轻易地取得了繁荣发展，对于自己的身份与地位有着很强的自豪感，再加上那个时期大部分韩华把家人留在中国，即使家人也随之移居韩国，他们也可以自由地往返韩中两地，因此可以说早期的韩华仍然保持着中国人的身份认同。随着大韩民国政府的成立，故乡就成了一个在法律上回不去的地方。对于那些出生在韩国，从未踏过中国土地的第二、三代先迁韩华来说，更加对自己的身份产生疑惑。他们始终生活在韩国，习惯了韩国的风俗习惯，但却从未被韩国人接受过；他们从父辈那里得知，自己的祖籍在中国大陆，自己的身份是中国人，但实际上他们却连祖籍所在地是个什么样子都不知道，他们不得不开始追问“自己究竟是谁？”因为祖籍的关系被打上中国人的烙印，但是长期的韩国移居生活，不能返回故乡的限制，来自中华民国的思想教育等因素，已经使他们形成了一种与中国大陆的中国人不同的身份认同。也就是说，故乡的回不去，已经不仅是法律意义上的回不去，更是身份认同意义上的回不去。

史书美认为“中国人的离散”这一观念掩饰了现今的殖民状态，比如从中国来的移民群在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等地组成多数人口，或数量可观的少数人口，这些地方在特定意义上可被视为定居殖民地，这些定居殖民地可约略地和英国人定居殖民北美、澳洲与纽西兰等殖民地相比拟。另外，离散作为一种价值观隐含对祖国的忠诚与向往，在离散者与祖国之间形成一种约束性的必然关系。此离散框架同时也延续“海外华侨”的范畴，这些海外华人被认为应该和中国性在狭义定义下相互召唤，中国性因而成为可量化的概念，成为一个人是否够中国的准则。“离散中国人”被理解为中华民族在世界范围内的播散，作为一个普遍化范畴，它以一个统一的民族、文化、语言、发源地或祖国为基础。这一称谓假定这些人渴望回到作为祖国的中国，而且它们的最终目的也是服务中国。因此史书美主张离散是有时效性的，会过期的，不能在三百年后仍声称为离散者，每个人都应该被赋予成为当地人的机会。¹⁸¹⁾

史书美在这里对于华人定居殖民的强调，不免流露出其为究明华语语系文学与英语语系文学、法语语系文学、西语语系文学等等文学体系具有共性的目的，因为毕竟这些语系都带有强烈的殖民和后殖民辩证色彩，都反映了19世纪以来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力量占据某一海外地区后，所形成的语言霸权及后果。¹⁸²⁾因此，定居殖民的提出多少带有其牵强的一面，

181) 参考史书美，《反离散—华语语系研究论》，台北：联经出版社，2017.6，pp. 15-31。

但是史书美对于以下问题的提问仍然值得思考，即，“印度尼西亚土生华人和马来西亚混血的‘峇峇(Babab)’们，即那些已经形成独特混血文化的‘海峡华人’；那些有中国祖先可以追溯，或种族或民族不同的混血人群，诸如在暹罗的华人后代，柬埔寨和印度支那的混血儿，秘鲁的Injerto和Chinacholos，特立尼达拉岛和毛里求斯的克里奥尔人，菲律宾的麦斯蒂索人，继续将其纳入‘离散中国人’范畴究竟是否还有意义？这样做到底是谁的企图？”¹⁸³⁾这些提问，对于我们思考如何看待华人华文文学中所体现的离散特征，思考是否华人华文文学作品中在申诉受到移居社会排斥与疏远的事实，就代表着华人对中国大陆故土的无限依恋，对“落叶归根”无限渴望的问题上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从一些创作于1960年代的随笔中，可以看到第二、三代先迁韩华对中国大陆的印象：“北平，这个曾被誉为‘文化之都’的古城，现在不仅已丧失了足以自豪的文化，同时也丧失了从前那种令人依恋的气氛……尽管那些巍峨的宫殿和园林，依然雄峙如故；尽管毛泽东的宣传，极尽委婉动听；但是只要看一眼人民的生活与工作，即使最不敏感的人，也可以觉察到这种可悲的变化。”¹⁸⁴⁾另一篇写于1960年代的随笔中也有类似的内容：“今夕在祖国大陆一轮惨白的月亮，凄凉地沉浸在一片汪洋之中，真是流泪眼看流泪眼，断肠人对断肠人，能够享受团圆之乐的，万中难有一个，今夕，大陆的同胞，或尝不到月饼滋味，但他们会先想到月饼的故事，更由月饼的故事想到他们一线希望。”¹⁸⁵⁾1960年代韩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尚未建立邦交，此时的先迁韩华是很难回到中国大陆的。这些文章很可能是作者从一些有关中国大陆的道听途途中阐发的联想。作者对中国大陆的印象，又明显受到了当时韩国社会舆论以及中华民国思想教育的影响。下面是当时中华民国政府利用假期时间组织夏令营，对先迁韩华学生进行的民主思想教育一周授课安排，从课程安排上不难看出先迁韩华所受中华民国思想教育的一斑：

功课是民族主义四小时，民权主义四小时，民生主义四小时，领袖言行二小时，中华民国建国史二小时，国际现势一小时，匪情二小时，我国海军二小时，我国空军二小时，我国陆军二小时，我们的信心一小时，大使馆之任务一小时，音乐二小时，此外他们除利用早起晚上的时间，爬山散步。¹⁸⁶⁾

在韩国的社会舆论下，在中华民国的思想教育下，先迁韩华想象中的中国大陆是落后的、愚昧的，是与先迁韩华相区别的存在。即使先迁韩华社会经济已趋萧条，但是在他们看

182) 王德威, <中文写作的越界与回归—谈华语语系文学>,《上海文学》, 上海: 上海市作家协会, 2006, p. 91.

183) 参考史书美,《反离散—华语语系研究论》, 台北: 联经出版社, 2017, pp. 33-34.

184) 枕客, <宣统皇帝溥仪>,《韩华春秋》第8期, 首尔: 韩华春秋编辑委员会, 1965.1, p. 25.

185) 周宁, <仲秋夜语>,《韩华春秋》第16期, 首尔: 韩华春秋编辑委员会, 1965.9, p. 23.

186) 公孙维, <三民主义宏扬侨社>,《韩华春秋》第15期, 首尔: 韩华春秋编辑委员会, 1965.8, p.17.

来，与中国大陆相比韩华社会的生活是“富足而知礼节”的，他们已经不自觉地心中划分开了先进与落后的等级。即使先迁韩华处在“身在他乡为异客，国破家亡剩此身，遗民泪尽胡尘里，南望王师又一年”的处境下，他们仍然会哀叹“那些深陷水深火热的大陆灾胞”：“一样明月照着天堂地狱，一样明月照着离散团圆，一样明月有人满怀诗兴，写他鼓腹而歌，一样明月有人愁肠百结潸然泪下。”¹⁸⁷⁾

在第二、三代先迁韩华作者的笔下，中国大陆是失去自由的牢笼铁幕，而生活在中国大陆的人就像“紧关在厩栏里的消瘦的马”，当它望见一群无羁的野马在田野间飞驰，伤心的哭了，因为“它并不担心自己的命运，而是担心它的同伴，不小心会关进铁幕！”在他们眼里失去自由的人会迅速老朽，就像一棵被折断的花朵迅速枯萎，或是一簇被伐下的树叶迅速干衰。于是他们梦见，“大陆上的兄弟姐妹们，老的可怕”。他们想象着历史上有一个无底的坟墓，里面不知埋葬了多少“与自由为仇的枯骨！”¹⁸⁸⁾

先迁韩华对中国大陆的这种想象，在某种意义上就意味着一种“丧失”，即，他们的祖籍所在地，他们的故乡，对于先迁韩华来说，已是一个名存实亡的存在。先迁韩华在排斥的痛苦中挣扎，挣扎的痛苦又使他们更加思念故乡，但是他们此时所思想的故乡，其实已经不再是那个当初第一代韩华出于无奈或为了追求更好生活而暂时离开的大陆。不仅是在法律上还是心理上，中国大陆都成为一个再也回不去的地方，他们的乡愁随之成了无法消解的凄凉。他们企图去寻找，一个可以慰藉乡愁的地方，可是找回的却是一个遥不可及的迷茫。他们感到“像是失落了什么？抑是在寻找什么？”，最终他们发现自己：“失落的是孤独，寻找的是同情，而找到的只有痛苦”¹⁸⁹⁾；他们发现自己：“在时间与空间的狂流里，被贬低遗忘于这荒岛孤溟”¹⁹⁰⁾；他们发现：“这忧闷，这感伤，无从排遣。这寂寞，这烦恼，无所舒畅。”他们斟满期望地想知道“故国山川，京都面目将何？”但是他们的热情，他们的信心，他们长长的等待，换回的只有“二十五年的记忆层层，二十五年前黑发变白”。¹⁹¹⁾

1990年代以前，在韩国出生从未去过中国大陆的第二、三代韩华，没有机会亲眼见过中国大陆的真实景象。他们有关中国大陆的了解，来自“父亲总会在除夕的晚上永不厌倦地讲着他的家乡，他的亲友，他的故事。”¹⁹²⁾其实，他们根本无法明白父亲口中的世界所发生的事情究竟如何。进入1990年代，韩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在即，先迁韩华可以真实地踏上中国大陆这片土地，亲眼兑现这个从父辈那里听来的，或在照片和影视上见过的，曾被自己想象过一次又一次的“故乡”。他们试图将那些片断的记忆，和那些分段的悲剧相连接：

187) 周宁，〈仲秋夜语〉，《韩华春秋》第16期，首尔：韩华春秋编辑委员会，1965.9，p. 23。

188) 以上引文出自湖岗，〈自由的寓言〉，《韩中文化》，首尔：韩中文化协会，1974.7，p. 30。

189) 北斗，〈寄语〉，《韩华春秋》第14期，首尔：韩华春秋编辑委员会，1965.7，p. 32。

190) 洛蓝，〈圣诞感怀〉，《韩华春秋》第7期，首尔：韩华春秋编辑委员会，1964.12，p. 32。

191) 周玉蕙，〈期待〉，《韩中文化》，首尔：韩中文化协会，1975.3，p. 29。

192) 初安民，〈自序〉，《愁心先醉》，台中：晨星出版社，1985。

今天到天坛公园观赏……记得儿时在北京五十五天》这部电影上看到天坛，在台湾台北的植物园也有他的缩影。如今站在这历史的建物下，别有一番滋味。193)

到了烟台驻北京办事处，将房间订好，即搭车到天安门广场。是电视上常常看到的。194)

我们来不及休息，就想往街头跑跑，吃了早饭，就开始了上海之游，先渡过了苏州河口的外白渡桥，看到黄浦江的外滩，那灰灰地西式石造楼房，在照片，在影视上，看过无数次，如今我在他的门口一路过。南京路的拥挤，霞飞路的破旧，这些小说书上的地名，我在念着，我在逛着……195)

从第二、三代先迁韩华的文学作品中可以看出，故乡对于大多第二代及其后的先迁韩华来说，是观看西方拍摄的有关中国历史题材的电影中出现的一个个犹如“天坛”场景的断面，而这部电影中所展现的中国，却已经是被西方想象的，重新被西方构建的“中国”；他们所认知的“天安门”，也是通过韩国录制并播放的电视节目，但是我们很难保证这里的“天安门”不是已经被韩国想象过的，并重新建构的形象。所以当这个被父辈描述过无数次，在照片影视上见过无数次的“故乡”真实地出现在眼前时，当他们生平第一次踏上那个夜思日想的籍贯所在地，中国山东土地的时候，代替欣喜的却是莫名的陌生和疑惑。

在中国大陆旅行的日子里，他们反而时常想起韩国。比如，来到中国东北的交通要地长春，他们会想起刚好韩国播放的《末代皇帝》连续剧，此时也演到溥仪成为伪皇帝的时期；看到长春城镇上同时穿梭着驴马车、脚踏车、汽车的混杂景象，再看到走在铺装率很低的道路上的男女老少时，又会联想到这是二三十年前韩国的情形，不由觉得中国的落后；晚间到朝鲜族餐馆吃着狗肉冷面，听着美妙的《落雨的永东桥》[韩国流行歌曲]时，他们又会遗憾没有真露烧酒[韩国烧酒的一种]，不然完全像似在首尔近郊的那个小镇用餐了；路见卖蛇者，就会敏感于他的嘴上没有一丝笑容，继而惋惜白白丢掉的蛇胆及蛇血，想着这些若是拿到首尔，也会赚上一笔国难财。196)

对于第二、三代先迁韩华来说，“故乡”归根结底只是一个通过间接得来的信息建构的虚幻形象，即使实实在在地踩踏在她的身上，实实在在地触摸到她的肌肤，也并不能感觉到她的真实。而那个生于斯长于斯的第二故乡韩国，对于先迁韩华来说才是真实存在的，即使当他们离开韩国，选择再迁他地，韩国仍然是始终跟随他们的“乡愁”。吃着韩国的饭菜，喝着

193) 辉光, <暴风雨降临前的北京城>, 《韩华》, 首尔: 韩中文化协会, 1990.6, p. 28.

194) 张泰河, <回乡探亲—期待和失望>, 《韩华》, 首尔: 韩中文化协会, 1991.2, p. 30.

195) 贺山, <大陆纪行>, 《韩华》, 首尔: 韩中文化协会, 1990.7, p. 18.

196) 参考贺山, <大陆纪行>, 《韩华》, 首尔: 韩中文化协会, 1990.7, p. 18.

韩国的烧酒，听着韩国的歌，看着韩国电视长大的先迁韩华，即使身处中国大陆之中，也总有游离其外之感，他们只是游客，是来观光和游玩的过客，旅途的尽头仍然是他们要继续生存下去的韩国，因为他们的家人和朋友在韩国，他们的工作和事业在韩国，他们的真实生活在韩国，他们此刻人生的落脚点在韩国，他们失去了可以回去的故乡，而适应此刻的落脚点——韩国的生活才是更为重要的。

一位第二代先迁韩华作者通过文学的形式，道出了自己也或许是先迁韩华群体的决心：“在外流浪的人，比别人经历过更多的风险，也就比别人更懂得人生，更比别人多许多抵抗风雨欺凌的力量。一个能在孤独寂寞中克服环境完成使命的人即是伟人。人生像是在海上航行的一叶孤舟，获得成功的人，都是靠自己的力量。与其希望别人来帮助自己，不如放下这未必可能达成的希望，试着拿出自己的力量来渡过难关。自助者天助，上苍也喜欢照顾勇敢的人，所以只要不退缩、不逃避，尽管人海风涛险恶，但我们多半能够化险为夷。勇敢的生活，勇敢的面对苦难，把一切苦难当作我们这一生不能逃脱的考验，通过了这些考验，我们就可达到彼岸。不管有没有人来援助我们，我们自己总得打定主意，凭自己的力量，支撑任何危险的局面。”¹⁹⁷⁾

从上述引文可以看出，第二、三代先迁韩华不再奢求别人的帮助，依靠自己的力量抵抗风雨的欺凌，支撑任何危险的局面，最终达到胜利的彼岸。笔者认为，这段表述正体现出第二、三代先迁韩华在身份认同上的变化。也就是说，第二、三代先迁韩华不再固执于来自祖籍的，作为“中国人”的身份认同，承认自己是流浪人，就是在承认以中国人的身份在韩国生活的这种错置，并在此承认的基础上形成一种新型的混种性身份认同。这里的混种性认同，指的是他们的身份认同处于一种既是而非的状态，即，既是中国人，但又不同于中国大陆的中国人；既不属于韩国人，又具有韩国人的某些特征，具有韩国与中国两种文化两种身份相互交融相互混杂存在的特征。第二、三代先迁韩华所形成的这种混种性身份认同，从某种意义上可以看作是其对自身错置命运的解构。因此，即使第二、三代先迁韩华因为受到来自移居社会的排斥与疏远而怀有浓重的“乡愁”，那“乡愁”也已经不再完全寄予那个不管曾经在法律上，还是在身份认同上都回不去了的祖籍所在地，而是建立在在地化之上的，或者说已经在地化了的“乡愁”，“落地归根”的渴望也已经在地化的实践中转化为对“落地生根”的期许。

再迁美国韩华的文学作品中，纯粹描写再迁美国韩华在美国生活的作品并不多，大部分都是回忆曾经在韩移居生活的内容，并通过这些回忆表达再迁美国韩华浓浓的韩国之思。由于主要从事文学创作的再迁美国韩华就是再迁之前的先迁韩华第二、三代，因此即使现在生活在美国，他们的许多童年和青年时的回忆都是有关韩国的。

197) 望乡，〈坚强不是蛮横，独立不是孤独〉，《韩中文化》，首尔：韩中文化协会，1984.4，p. 28。

比如，再迁美国韩华李作堂通过散文的形式表达了对韩战期间韩华师生同甘共苦岁月的怀念，他在《忆“下端”侨中》中引用韩华教师赵世恕所撰写的诗文，充满深情地记述着1950年代韩华师生并肩度过的三年“军人帐篷”生活，记录了那段充满欢笑和泪水生活的点点滴滴。¹⁹⁸⁾再迁美国韩华崔楼一莺始终忘不了避难釜山时，好心的釜山韩华一家不顾自己家里生活的艰辛，对自己无微不至的照顾，她用充满温情的语言将这段记忆记录在《那一代的事》中。¹⁹⁹⁾再迁美国韩华焉晋琦的《千言万语说不尽第二故乡韩国情》(2010)中，因为阴错阳差与汉城华侨小学的百年校庆失之交臂，作者发自内心地感到惋惜，也为韩华社会建物依旧在，人物已全非而无尽感伤，同时为离开韩国三十年后居然还有韩华青年认出龙钟老态驼背佝偻的自己而喜出望外，只因他那口已然改变不了的韩华的特殊乡音。²⁰⁰⁾

从这些再迁美国韩华的文学作品中可以看出，他们再韩国出生，在韩国成长，即使曾经的韩国移居生活不仅只有美好的回忆，但是在那些日子里他们仍然感到了生活中的温情，再迁之前他们在那里埋下了从童年到青年的记忆，同时也在那里埋下了再迁后的“乡愁”。如笔者在第二章中所述，再迁美国韩华在随笔中体现了对“根”的诠释，认为虽然移居韩国的那个年代过去了，他们这一辈人都已年逾古稀，经历了忧患，偶然也按捺不住或中或西的影响在意识中，但是儿时的故事，儿时的梦想，即使再迁往任何地方都刻刻难忘，因为那些是让自己生命丰美的前尘往事，那是身藏的老根，忘了浇水也不干枯。²⁰¹⁾在此意义上，也许再迁韩华正是在与先迁韩华“落地生根”的期许一起，追溯韩华自己的“根”。

3. 建立在想象或再创意义上的“乡愁”

从再迁台湾韩华的文学作品中不难看出，他们也曾经恍惚觉得，父亲口中的那个与自己“脐带相连、肉体相叠”的地方，是真正可以用她最宽阔的胸怀，焚烧自己“冰冷的躯体”，使自己重获新生，拥有一个有尊严的真正被接受的身份。但摆在眼前的现实却是，那只是“地理课本上的，不曾不敢不会不肯，踏不出也踏不近的”²⁰²⁾地方。父亲口中的“故乡”，对于父亲来说也许是个真实的存在，或者更确切地说，是曾经真实存在过的地方，但是对于自己却并非如此。那里只是祖籍的所在，不是可以成为归属的故乡。

再迁台湾韩华在其文学作品中表示，韩国社会对先迁韩华的排斥氛围，是他们痛下决心，毅然做出离开生活了几十年的移居地韩国，迁往另外一个移居地，开始另一个充满未知生活的选择的原因之一。再迁台湾韩华在作品中还表示，他们失去了那个作为祖籍所在地的“故

198) 李作堂, <忆“下端”侨中>, 《韩华世界》第1期, Walnut Creek, California: 韩华基金会, 2007.10, p. 41.

199) 崔楼一莺, <那一代的事>, 《韩华世界》第3期, Walnut Creek, California: 韩华基金会, 2011.10, p. 55.

200) 焉晋琦, <千言万语说不尽第二故乡韩国情>, 《美国齐鲁韩华杂志》第25期, Laguna Woods, California: 美国齐鲁联谊会, 2010.1, pp. 13-14.

201) 参考崔楼一莺, 《小公洞往事》, 《韩华世界》第2期, Walnut Creek, California: 韩华基金会, 2009.10, p. 19.

202) 初安民, <海焚>, 《愁心先醉》, 台中: 晨星出版社, 1985, pp. 175-177.

乡”，也不曾真正属于过移居地韩国，他们的生活就像“候鸟移动的轨道，是一种往返两地底泥泞”，“两边”都是握不住的“浓浓的茫茫”。他们需要有一个可以寄托情感的地方，渴望被一个大海般宽广的胸怀接纳，渴望无处可去的乡愁找到最终的归属，就像再迁台湾韩华诗人初安民渴望“流星从滑落的瞬间起”，就“迸裂着没有乡愁底流浪”。²⁰³⁾

而促使第二、三代先迁韩华再迁他地的原因，又不只是在韩国社会受到的排斥。不管是再迁台湾韩华散文作家郝明义还是再迁台湾韩华诗人初安民都曾表示，他们之所以选择再迁台湾，是因为对中国文化根深柢固的认同，觉得台湾是中国文化保留得最完整的地方。但是从再迁台湾韩华的文学作品，特别是初安民的诗歌中可以看出，再迁台湾韩华的移居生活并不像他们期待的那般乐观。初安民创作于1980年代的很多诗歌中都流露出难于融入台湾社会的无奈，他总感到自己与台湾社会之间就像被人落下断然的一刀，“切割成无可缝补底裂隙，愈来愈显得遥远起来”。诗人追问这是谁的错误？可是“没有一个敢拍胸脯勇敢的站出来，他们全部躲在属于自己的角落里，涂改事实，暗箭伤人，把一切变成愈来愈难追的全部”。²⁰⁴⁾不管初安民如何努力与外界交流，如何像马达一样不停转地挣扎着融入社会，他的一切努力都被不能选择的固定不变的籍贯无情地割断，在台湾人眼里他始终还是个外省人。他感到自己就像一只来自北国，扑向飓烈火焰的蛾，“不留余地不求退路，倾尽生命所有底力气”²⁰⁵⁾地奔向南方最后一盏灯火，也是自己最后的希望。但是满腔的热情依然融化不了现实的冷酷，他怀着飞蛾扑火般的热情奔向台湾，结果却“被生活烈焰烧烤成，骨瘦如柴的身影，如此凄迷，如此无依”。²⁰⁶⁾

初安民起初觉得台湾毕竟是自己被命运安排了国籍的地方，模糊地期待着投奔台湾也许会成为另一种形式的“回归”，但结果却发现那并不是一种“回归”，而是再一次的“移居”行为。不管他如何努力不去接近在台湾生活的韩华圈²⁰⁷⁾，尽量隐藏自己的韩华身份，不管他如何努力去忘掉那些白色的记忆，如何甩掉那个如影相随的韩华身份，在别人眼里他始终还是在台湾生活的韩华。初安民本以为与韩国的记忆隔断，真心热爱这个命运安排给自己的“祖国”，就可以从此告别吉卜赛式的流浪，一颗流星终可以“生根”，但是现实却让他尝到了重蹈覆辙的滋味，结果他只是渴望生根的“流星”，依然在流浪。现实让他清醒地认识到护照上的台湾只是一个没有身份号码的形式上的证件，根本不能拿来证身明份。

再迁台湾韩华因为接受教育，相较在韩国可以选择更多社会待遇较好的职业。尽管如此也很难认为他们完全被台湾社会所同化。韩国华人虽然与台湾人外貌相同，同样使用汉语，

203) 初安民，〈浪子·乡愁〉，《愁心先醉》，台中：晨星出版社，1985，p. 87。

204) 初安民，〈难追〉，《愁心先醉》，台中：晨星出版社，1985，pp. 74-75。

205) 初安民，〈扑火〉，《愁心先醉》，台中：晨星出版社，1985，p. 41。

206) 初安民，〈无题〉，《愁心先醉》，台中：晨星出版社，1985，p. 90。

207) 王恩美在2013年12月接受笔者采访时说：“在台湾生活的第一代韩国华人互相还有些联系，但是第二代以后的韩国华人基本上没有什么来往。华侨协会也只是形式，没有什么活动。”

但是因为他们祖籍的关系，中国大陆山东的方言与饮食结构，韩国式的语调，不同于台湾人的生活习惯等总被台湾人问到是不是“韩国人”，或是属于“哪类中国人”的问题，因为这种与主流台湾人差别化的提问，往往为自己已经沦落边缘而感到绝望。²⁰⁸⁾这些在韩国被韩国人称为台湾人的群体，真正来到台湾却又变回了韩国人，或与主流台湾人相区别的外省人，只有他们的边缘地位永远不曾改变。

初安民并没有过多的苛求和奢望，只为人类最基本的生存渴望，只想为了生存，“向辽阔宇宙租借一寸空间”²⁰⁹⁾，去“安定被妥协的生活”²¹⁰⁾，但是生活却是“排山倒海而来底煎熬”²¹¹⁾。生存的无奈，使作者久已徘徊在眼眶里的两行滚烫的泪落下，落在“那久被生活侵蚀过的脸，负荷这心灵煎熬的告白”²¹²⁾。初安民觉得抽烟喝酒以及沉思，是思索人类一些难题痛苦的后遗症²¹³⁾，于是他拼命三郎式的饮酒，可是不管是酒后的狂笑还是痛哭，都掩饰不住他掩藏在狂傲底下的脆弱。他痛彻心肺地体会到有些结果是靠努力靠奋斗换不回来的，比如被承认这回事。不管自己如何努力，始终都摆脱不了那个“无人眷顾，无人垂爱”²¹⁴⁾，一无所有，不被承认的命运，“永远都是异质底，任何一种溶剂都化不开，破碎满地却溶不成一丝一毫”²¹⁵⁾的存在。

融入台湾社会的艰难，使初安民感到就连日历都显得那么残忍，因为它“自己没有生命但却收拾别人生命，把岁月压扁，然后飘一下来，像古刑场进行斩首的勾当。”²¹⁶⁾他不知道自己的未来究竟应该驶向何方，“往北，是漫漫无止境的茫茫；往南，已无轨道铺排。仿佛，永远驶不近终点般被驱迫着，而遥悬的欲念落实却是望津止渴的奔驰。”²¹⁷⁾这里的北，也许是指台湾的北部，也可能是台湾以北的他曾经生活过的韩国，或更北边的命运登记册上标注着籍贯的地方。这里的南，也许是台湾的南部，也许是更南端的什么地方。初安民只想知道哪里才是他的终点？哪里才真正属于一颗流星的归宿？初安民静静回首自己走过的二十八年岁月，仿佛只是一场九十分钟的电影，高潮过后只剩散场的茫然。“未曾目睹国破家亡的动乱，却有家国底疼痛，未曾经历颠沛流离的日子，却有漂泊底岁月，未曾走过锦绣壮阔的江山，却有乡愁底身世，固定不移地籍贯里，到处登记着流浪的住址。”²¹⁸⁾移居韩国，他始终没有

208) 参考이창호, <한국화교의 "귀환"이주와 새로운 적응>, 《한국문화인류학》Vol.45, 서울: 한국문화인류학회, 2012, p. 169.

209) 初安民, <冷冷的活着>, 《愁心先醉》, 台中: 晨星出版社, 1985, p. 80.

210) 初安民, <无题>, 《愁心先醉》, 台中: 晨星出版社, 1985, p. 90.

211) 初安民, <加糖>, 《愁心先醉》, 台中: 晨星出版社, 1985, p. 85.

212) 初安民, <无题>, 《愁心先醉》, 台中: 晨星出版社, 1985, pp. 88-89.

213) 初安民, <加糖>, 《愁心先醉》, 台中: 晨星出版社, 1985, p. 85.

214) 初安民, <失业者的告白>, 《愁心先醉》, 台中: 晨星出版社, 1985, pp. 130-132.

215) 初安民, <扑火>, 《愁心先醉》, 台中: 晨星出版社, 1985, p. 41.

216) 初安民, <日历>, 《愁心先醉》, 台中: 晨星出版社, 1985, p. 101.

217) 初安民, <终站的夜思>, 《愁心先醉》, 台中: 晨星出版社, 1985, pp. 96-97.

218) 初安民, <霜深楚水寒>, 《愁心先醉》, 台中: 晨星出版社, 1985, p. 92.

为自己这颗流星生下根，再迁台湾也没有成为“生根”的流星，却成为那颗永远渴望生根的“流星”，沉浸在永恒的哀痛里：

我们是生了根的流星
我们悲哀是不能滑落的连根拔起
于是
于是流星在哭泣
一如哭我的醉梦
梦时在何方
醒后在何处
我们一概打探不出
探不出的如一件悬案
恒悬在我们永恒的哀痛里²¹⁹⁾

再迁台湾韩华由于在韩国感受到的排斥选择离开，又由于对中国文化根深蒂固的认同而选择再迁台湾。但是当他们在台湾的在地化意愿受到挫折的时候，就产生了幽怨的“乡愁”。此时可以寄托“乡愁”的地方，已经不是父亲口中的那个“故乡”，而是寄予着自身对中国文化的追求，对中国文化的认同，一个被想象的，被创造的，理想化的“故乡”。再迁台湾韩华的“乡愁”，是建立在想象与创造之上的“乡愁”。

综上所述，韩华华文文学中体现了“乡愁”，但是不同时期不同韩华群体的“乡愁”，又各自以不同的形态出现。

早期韩华拥有清国政府的支持，后迁韩华也在移居韩国的同时仍然没有放弃将中国大陆作为另一个生存基地。因此，早期韩华的“乡愁”与后迁韩华的“乡愁”，在存在形态上存在相似性，他们的乡愁都寄托在对故乡的思念之上。

当先迁韩华失去了清国政府的支持，继而又失去了可以回去的故乡之后，中国大陆的“故乡”就成了模糊不清的想象，韩国却记载着他们所有成长的痕迹，他们更在意目前生活的落脚点。所以，此时先迁韩华的“乡愁”是建立在在地化基础上的，或者说是在地化了的“乡愁”。再迁美国韩华的“乡愁”仍然寄托在对曾经移居韩国生活的回忆中，而其中起到重要作用的就是“韩华语言”，即，先迁韩华所谓的特殊“乡音”。有关这方面的内容，将在下一章具

219) 初安民, <冷冷的活着>,《愁心先醉》,台中:晨星出版社,1985, p. 80。以上五段叙述是在梁楠,《生根的流星:论韩华诗人初安民《愁心先醉》中的跨国认同》,《中国现代文学》No.80,首尔:韩国中国现代文学学会,2017, pp. 119-122的基础上修改后的内容。

体展开论述。

再迁台湾韩华的“乡愁”是由于对中国文化的认同，而通过为自己想象或再创造一个“理想乡”，作为寄托乡愁的地方。

由于资料的缺乏，我们还无法从文学作品中更具体地分析第三代或之后世代的先迁韩华，第二代或之后世代再迁韩华的“乡愁”以何种形态出现。但是笔者推测，他们的“乡愁”应该体现出越加浓郁的在地化色彩。有关在地化的内容，将在下一章展开具体论述。

第 4 章 韩国华人华文文学的跨国性

跨国主义可以理解为是强调行为主体的活动与实践的概念，移居者的日常生活(工作、约会、业余、消费、宗教活动、政治参与等)形成了地域性、国家性、世界性规模的网络并发挥各种作用。由于跨国移居者作为活动与实践行为主体的重要性，Smith(2006)甚至提出了跨国生活或跨国人生(transnational life)的概念²²⁰⁾，也就是说每一个移居者的个案都是一部生动的跨国人生史，都是需要被关注的对象。跨国移居者除了所属的跨国华人网络以外，也会在新的移居地通过多种群体和制度构成多种在地的韩华网络，接受来自多重方面的影响。因此就有必要关注跨国移居者所属的多种社会网络对其移居地日常生活造成的影响，以及由此形成的相互关系。跨国移居者在跨越国境的同时又极其微妙地采取通过在地化形成并努力维系跨国网络的战略。在这里形成自我意识的众多事件与共同体在特定场所相互连接。即，多种在地的社会关系与社会性的形态与一系列明确的位置相连接，这将对身份认同的持续(再)形成造成重要影响。²²¹⁾

第 1 节 韩国华人华文文学中出现的混种性

混种性概念已经成为全球化时代文化研究最重要的关键词。文化已经跨越单一同质的国民文化界限，文化间的跨界与混种作为文化沟通与交流的强烈力量登上舞台，宣告文化归属于特定国民文化的时代逐渐走向终结²²²⁾。混种性最初是生物学术语，在字典上被解释为骡子、杂种狗等通过异种间的交配产生的生物。而现在混种性概念在人文学领域已经被广泛认知，在文化研究领域也广泛流行。

在文化接触的过程中形成文化混种是非常普遍的现象，这一点在韩华华文文学研究上，也是不容忽视的一点，即，考察韩华华文文学中所体现的，出发地中国大陆的文化、移居地韩国的文化以及法定国籍所在地台湾的文化之间，是如何彼此交切穿插，如何相互碰撞交流，从而导致先迁韩华文化上的混种，进而分析这种文化上的混种性，又将如何影响韩华在身份认同上的变化，就成为非常重要也非常必要的课题。本节主要从口头语混种、书面语混种和文化混种三个方面，探讨韩华华文文学中出现的混种现象。

220) 参考이용균, <초국가적 이주 연구의 발전과 한계: 발생학적 이해와 미래 연구 방향>, 《한국도시지리학회지》Vol.16No.1, 서울: 한국도시지리학회, 2013, pp. 40-48.

221) 参考이영민, <글로벌 시대의 트랜스이주와 장소의 재구성: 문화지리적 연구관점과 방법의 재정립>, 《문화역사지리》Vol.25No.11, 서울: 한국문화역사지리학회, 2013, pp. 56-57.

222) 김용규, 《혼종문화론》, 서울: 소명출판사, 2013, p. 281.

1. 韩华华文文学中出现的口头语上的混种

先迁韩华在其创作于1990年代的游记中说，当他们来到中国大陆时，不管是“饭后淹没在王府井的人群里”，还是踏上“中国最大商业都市上海”，不管在“南方还是北方”，都会觉得自己是个“道道地地的中国人”，但是“除了语言”。²²³⁾语言似乎是一道无法逾越的障壁，先迁韩华那特殊的腔调，即使回到故乡自信满满地搬出家乡话，也会被故乡人询问：“你从韩国回来的？”再迁韩华也通过文学的形式对此发出感叹：“韩华额头上好像有个刺青，五湖四海无所遁形。即使再迁他地离开韩国几十年，即使变得龙钟老态，驼背佝偻，也依然“乡音[韩华的特殊乡音]不改”。²²⁴⁾

再迁美国韩华贾凤鸣，在他的文章《闲话韩国华侨的普通话》中将这种与众不同的“韩华汉语”定义为：以烟台为中心的牟平和福山话为基础，融入以文登荣成话为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不但文词语句交互使用，腔调口音也混杂难分，同时也加入许许多多的韩国话及其口音。他还阐述了这种“韩华汉语”的产生过程：“韩华侨社由于国共内战后，与故乡隔绝四十多年，原旅韩经商务农务工的侨胞有家归不得，后来渡海避难者也加入这个侨社。在近半个世纪中，这些人互通婚姻，当然也包括中韩联姻、合伙共谋营生，互相影响着生活方式，讲着口音不同的语言，久而久之自然形成韩华侨社的“普通话”，绝非政治的颁定和提倡，也非有组织的议决，而是自然自体渐渐形成的大家听得懂，说得出，可娴熟运用的一种语言。”贾凤鸣还风趣地说，因为“韩华普通话有这么一点‘混血’的特殊性，韩华不管走到天涯海角只要开口讲话，立即被人辨认出‘你是韩国华侨’的身份。”²²⁵⁾

笔者认为，之所以会产生这种“韩华汉语”，很可能是因为大韩民国政府成立后，仅有近百分之二十的先迁韩华留在南韩。先迁韩华在人口上的锐减，就等于是韩国说汉语人口的减少，先迁韩华在韩国说汉语机会的减少。再加上先迁韩华由于生活环境的原因，在很多交涉事宜上时常要与韩国人接触，这就使先迁韩华越来越感到学习韩语的必要性。对于那些学龄前的先迁韩华儿童来说，他们平时都与韩国儿童一起玩耍，以至于很多先迁韩华儿童不会说汉语，韩语反而讲得很熟练，甚至出现了在韩华家里互相使用韩语沟通的现象。²²⁶⁾另一方面，先迁韩华在移居韩国之前，没有受到多少普及标准汉语的影响。因为，中国大陆于1955年确定现代标准汉语名称由国语改称普通话，开始正式推广。而自1910-20年代开始至1955年是推行国语的时期。也就是说，从移居时间上来看，先迁韩华在移居前应该没有多

223) 贺山，〈大陆纪行〉，《韩华》，首尔：韩中文化协会，1990.5，p. 22。

224) 贾凤鸣，〈闲话韩国华侨的普通话〉，《美国齐鲁韩华杂志》第30期，Laguan Woods, California：美国齐鲁联谊协会，2011.7，p. 10；焉晋琦，〈千言万语说不尽第二故乡韩国情〉，《美国齐鲁韩华杂志》第25期，Laguan Woods, California：美国齐鲁联谊协会，2010.1，p. 13。

225) 参考贾凤鸣，〈闲话韩国华侨的普通话〉，《美国齐鲁韩华杂志》第30期，Laguan Woods, California：美国齐鲁联谊协会 2011.7，p. 10。

226) 参考秦裕光，《旅韩六十年见闻录—韩国华侨史话》，台北：中华民国韩国研究学会，1983，pp. 140-141。

少可以接触普通话的机会，移居后也大多接受台湾式的国语教育，受到普及汉语普通话的机会应该不是很多。再加上，方言的变化具有延续性和稳固性，它不会随着官话的改变而急剧地改变，²²⁷⁾因此先迁韩华的山东方言，在国语、韩语等语言的影响下，就形成了上述这种口头语上的混种现象。

史书美也曾以先迁韩华为例，试图证明她所强调的散布到世界各地华人的语言混种性问题，她认为：

住在南韩的汉人使用的是一种混合山东话与韩语的语言，甚至同一个句子里同时出现两种语言语义、语辞或文法混杂的现象。尽管当地人推行标准汉语教育—早期由台湾政府支助，而当中华人民共和国与南韩恢复邦交后则转由中国政府支助—但这种语言交杂的现象在第二代或第三代的南韩山东人当中确实特别明显。就像别的地方一样，标准汉语在南韩只作为书面语言；当说话的时候，山东话里不会听到标准汉语。在南韩的山东话和在中国山东省的山东话也不尽相同，在山东省有许多地方语言都自称山东话。²²⁸⁾

很多韩国学者也就先迁韩华的语言混种问题做过研究，综合史书美以及韩国学者的研究情况，先迁韩华的语言混种现象大概可以总结为以下几点特征：

第一，先迁韩华的语言混种现象主要出现在口头语中，即山东话与韩语的混种，同一个句子里同时出现两种语言语义、语辞或文法混杂的现象。比如²²⁹⁾：

① 거의 父母亲이 韩国쪽이나 아니면 爸爸, 妈妈가 韩国人이고.

[几乎父母都是韩国人或者爸爸, 妈妈一方是韩国人。]

② 清萍가 做了잖아.

[清萍做了。]

③ 第二天, 第三天가 有意思了거든.

[第二天, 第三天很有意思。]

先迁韩华说话的时候，山东话里不会听到标准汉语，也就是中国官方定义的标准语言(国

227) 殷梅, <从山东方言俗语看齐鲁文化>, 《青岛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27卷第3期, 青岛: 青岛科技大学, 2011, p. 55.

228) 史书美, 杨华庆译, 蔡建鑫校, 《视觉与认同 — 跨太平洋华语语系表述·呈现》, 台北: 联经出版社, 2013, pp. 55-56.

229) 例句参考박수현, 《한국어-중국어 이중언어사용의 연구- 한국 화교(華僑) 언어를 중심으로》, 영남대학교 석사학위논문, 2010, p. 58. 例句下方的汉语解释由笔者标注。

语/普通话), 因为“移民之前/时”是非常重要的指标, 中国内外的地方语言从此会出现不同的发展。韩华使用的山东话也与中国山东省的山东话不尽相同, 韩华方言与他们的母胎方言山东地区方言无疑有着密切的关系, 但是随着时代的更替, 母胎方言的特征渐渐消失, 韩华方言出现相互同化的现象。在发音上破坏声调、弱化卷舌音与儿化音。(史书美, 2013; 严翼相, 1999; 朴守贤, 2010)再迁美国韩华焉晋琦在其文章中的叙述可以佐证先迁韩华的这一语言混种特征, 他说:“韩华子弟出现了语言上的改变, 成了中韩语混杂的双拼盘, 中语语法里的动词, 被动词, 形容词, 再穿插几句韩国话中的感叹词和语尾音, 把意义弄得前后倒置, 听起来既不山东, 又不韩国, 倒很像第三国语言, 演变成韩华独创一格的地区方言。”²³⁰⁾

第二, 先迁韩华随着情况、场所或者对话对象的不同, 会出现多种语言代码转换(code-switching)现象。比如: 先迁韩华跟韩国人对话时使用韩语代码, 跟中国人对话时使用汉语代码, 而先迁韩华之间对话时使用先迁韩华语言代码。这种先迁韩华语言也不是在任何时候都被使用, 只被关系亲密或密切的华人之间使用。

正如再迁美国韩华贾凤鸣所说:“各乡的人在各家庭中所使用的语言, 率皆以本乡的原音土话为主, 但进入学校和侨社集会等场合, 都会自动切换成流行的普通话。近年来, 侨社青少年群体中也多以韩话交流, 中文渐成只布学校课堂中授课听讲。”²³¹⁾先迁韩华的韩中双语使用, 并非随意性的语言活动, 而是发生在相关语言语法框架内的行为, 体现着双语使用者的语言使用能力。贾凤鸣所说的“韩华普通话”其实就是一种混种化的先迁韩华语言, 是一种通过韩语和汉语高度巧妙的结合, 同时具有韩语和汉语两种语言特征的独立性语言类型, 体现了人类语言的创意性, 一部分先迁韩华甚至认为这种先迁韩华语言就是自己的母语。(朴守贤, 2010)

第三, 先迁韩华在与非亲密关系的华人之间, 或需要使用敬语的正式场合时使用汉语, 标准汉语则只被作为书面语言使用。(朴守贤, 2010; 史书美, 2013)

2. 韩华华文文学中出现的书面语上的混种

韩国学者关于先迁韩华语言混种现象的研究较为丰富, 但是这些研究主要局限于先迁韩华口头语的混种现象上, 至于书面语使用上的混种现象几乎没有被提及, 只在梁楠·高慧琳的论文《韩国华人华文文学的混种性》中被论述过。所以, 有关先迁韩华书面语的混种现象, 仍然存在更深入研究的必要性。就笔者所收集到的韩华华文文学资料上看, 先迁韩华华文文学和再迁韩华华文文学中出现的书面语混种现象, 不像口头语的混种现象那样严重, 几乎没

230) 焉晋琦, <回顾旅韩华侨和韩国民族的恩怨>, 《美国齐鲁韩华杂志》第32期, Laguna Woods, California: 美国齐鲁联谊会, 2012.2, p. 82.

231) 参考贾凤鸣, <闲话韩国华侨的普通话>, 《美国齐鲁韩华杂志》第30期, Laguna Woods, California: 美国齐鲁联谊会 2011.7, p. 10.

有出现过中国山东方言与韩语两种语言的语辞或文法混杂现象，书面语的混种现象主要出现在汉语和韩语两种语言的语辞互译性混杂使用上。

笔者所谓汉语和韩语两种语言的语辞互译性混杂使用，如表3所示，是指先迁韩华或再迁韩华在进行华文创作的过程中，即使存在与韩语词汇相对应的汉语词汇，仍然有意或无意地使用直接由韩语词汇音译过来的词汇，此时的汉语仅作为这个音译词汇的标注符号存在。这种由韩语音译后产生的词汇，虽然使用汉语标注，但它与标准汉语的表达方式之间存在差异，具有自创性特征，在再创过程中，同时又赋予这一音译词汇一种文化上的混种性。因此有些自创性音译词汇，只有先迁韩华或再迁韩华之间言传意会，没有经验过韩国文化的人，很难理解其中的内涵。

[表3：先迁韩华与再迁韩华文学作品中出现的韩汉双语语辞互译现象一览表]

出现年代	作品中使用的词汇	韩语词汇	汉语词汇
1960年代	试练	시련	考验
	逮冒	데모	示威
1970-80年代	废业/闭业	폐업	停业
	料食业	요식업	饮食业/餐饮业
	告诉	고소하다	诉讼
	构内食堂	구내식당	单位食堂
	狗智	거지	乞丐
1990年代	看板	간판	广告牌
	礼式场	예식장	礼堂
	沐浴汤	목욕탕	澡堂
	暴风注意报	폭풍주의보	暴风警报
	相对方	상대방	对方
	终着站	종착역	终点站
	放送	방송	广播
	下日	다음날	第二天
1990&2010年代	觉书	각서	担保
	建物	건물	建筑物
2000年代以后	桌球	탁구	乒乓球
	登校	등교	上学
	金木吃	김치	韩国泡菜
	马格里	막걸리	韩国米酒

之所以会在先迁韩华与再迁韩华的华文创作中出现这种书面语的混种现象，大概也是因为先迁韩华在移居韩国之前，没有受到多少普及普通话的影响。但是笔者在这里并非想强调先迁韩华或再迁韩华在华文创作过程中，知道哪些韩语词汇对应的标准汉语词汇，又不知道

哪些。而是想究明不管先迁韩华或再迁韩华是否知道与韩语词汇相对应的标准汉语词汇，他们为何会在华文创作中有意或无意识地弃而不用，选择使用带有自创性的，由韩语词汇音译成的汉语表达？正如史书美所说：“翻译并非甲等于乙的等式，翻译显示不了确定性与复杂性，有待在特定历史时空中解读。”²³²⁾笔者也希望通过研究可以从一个侧面考察韩华华文文学中出现书面语混种现象的原因，从而为整个华人华文文学语言混种现象的研究上，提供一定的参考价值。

1960年代主要出现了两个先迁韩华通过直接音译韩语而自创的词汇：试练和逮冒。

我们生活在友邦韩国，友邦的一切情事，都直接或间接的影响我们的生活，生存。我们无法不寄以最大的关心。从三年前五一六军事革命后，由朴正熙、金钟泌为核心的革命团体，现经过三年来的试练，已由革命团体蜕变成成功为强有力的政党—民主共和党这一今日的执权党。²³³⁾

韩国华侨子弟们一批一批的回国深造，一批一批地学成归来，在这种华侨经济日益不景气的情况下，除了教学实在没有第二条出路，于是大家就拼命的在侨教圈中钻。师资再也不“缺货”了，使得老师整日“战战兢兢”，成了董事会的应声虫；而学校也成了董事会的附属品，不再是超然而清高的百年树人的场所，也是使得侨教形成一片混乱。于是乎，在学校的学生“逮冒”老师，“逮冒”学校，甚至“逮冒”大使馆。²³⁴⁾

这两个词汇是非常带有时代特征的，它们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先迁韩华在1960年代所经历的历史事件，以及当时的心理特征。首先，就“试练”这一音译词汇来说，就像引文作者叙述的那样，移居地韩国的一切事情都与移居者先迁韩华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系，先迁韩华与韩国人一起经历着韩国的历史。发生在韩国的重大历史事件，不仅会引起韩国人对未来的不安，移居者韩华也同样如此。当他们将这种情绪转移到纸上的时候，也许在内心上不自觉地感到，汉语词汇“考验”不足以体现韩国的这次重大历史变革，给先迁韩华带来的，与韩国人同样厚重的心理影响，只有通过音译韩语词汇“试练”[시련]才能被充分表达出来。

其次，“逮冒”是对韩语词汇“데미”的音译，这一音译词汇出现在1960年代先迁韩华的文学作品中，一方面是在批判先迁韩华教育体制上存在的问题，同时也是在强调韩华教育体制亟待革新的迫切性。到了1990年代，还出现了直接使用韩语词汇的现象，比如在1990年代发行的先迁韩华华文杂志中曾出现过一篇题为《台湾也有데미》的评论文章，文中载有台湾人

232) 史书美，杨华庆译，蔡建鑫校，《视觉与认同——跨太平洋华语语系表述·呈现》，台北：联经出版社，2013，p. 18。

233) 编辑，〈给读者的报告〉，《韩华春秋》第18期，首尔：韩华春秋编辑委员会，1965.12，p. 1。

234) 向日葵，〈论当前韩华侨教〉，《韩华春秋》第14期，首尔：韩华春秋编辑委员会，1965.7，pp. 23-24。

举行示威游行的照片，照片下作者标注：“看！这张图片像不像在韩国？”²³⁵⁾先迁韩华在照片上看到台湾人示威的情景就会联想到韩国，也许是因为他们在韩国亲眼目睹了韩国人频繁的示威游行场景，并且亲身感受到正是一次又一次的“逮冒”运动，推进了韩国社会民主化的进程，推动了韩国社会的前进与发展。这对于颂扬孙文三民主义的先迁韩华来说，正好不谋而合。当一些思想先进的先迁韩华知识青年，发现先迁韩华社会虽然表面上提倡民主，但骨子里却固守着封建保守思想，因此为了实现先迁韩华社会的民主化，他们也效仿韩国社会的逮冒运动，来唤醒先迁韩华的民主思想。

随着先迁韩华移居韩国时间的增长，这种书面语的混种现象出现的数量也更多，频度也更加频繁。1970-80年代可以发现的韩汉双语互译词汇包括：废业/闭业、料食业、告诉、构内食堂、狗智等，这些词汇大部分与先迁韩华的经济有关。

我们若不粉饰太平因循苟且，肯睁开眼睛细心观察这个侨社，就不难发现这是个千疮百孔的侨社，日暮途穷的侨社……先以侨社经济来说吧，我们是在日渐穷困因为温饱而挣扎中，如今华侨在各行各业都已无法与人竞争，原来的生意不是转让，就是废业。大家虽然勉强固守着中华料食业，赖以为生，可是也在赋税重，用人难各种困境下处于风雨飘摇的逆境中，能够仍操旧业与人力抗的已属凤毛菱角。²³⁶⁾

待进入一九七〇年代，华侨几个大餐馆相继闭业，而一般普通餐馆也在减缩。²³⁷⁾

一九五四年五月避难回汉城后，笔者曾在太平路的SEOUL新闻社经营构内食堂，位置在报社的入口处。²³⁸⁾

去美国之人并不全部都好……二十五年驾驶技术考三次没领到驾驶证明，那里要饭的(狗智)多韩国三倍。²³⁹⁾

1950年代的韩国战争给先迁韩华的经济造成了致命伤，即使在1960年代韩国经济恢复发展的时期，先迁韩华的经济也仍然没有得到支持与保护，反而受到各种限制，因此先迁韩华的经济从此一蹶不振。再到1970-80年代更是每况愈下，作为先迁韩华主要生存手段的中华餐饮业，停业倒闭的现象相继发生。在此时期，先迁韩华亲眼所见亲耳所闻的“폐업”事

235) 记者，〈台湾也有叫모〉，《韩华》，首尔：韩中文化协会，1990.6，p. 26。

236) 编辑，〈侨社论坛〉，《韩中文化》，首尔：韩中文化协会，1974.7，p. 27。

237) 秦裕光，《旅韩六十年见闻录—韩国华侨史话》，台北：中华民国韩国研究学会，1983，p. 88。

238) 同上，p. 141。

239) 同上，p. 161。

件实在太多，所以他们自然而然地在作品中使用“폐업”的音译词汇“废业/闭业”，来表达在韩国发展华人经济的艰难。韩语音译词汇“构内食堂”的使用，大概是因为在韩国没有“单位”这一概念，再加上先迁韩华接触普通话教育的机会又很少的原因造成。韩语音译词汇“狗智”的使用，目的在于劝诫那些受再迁风潮影响的先迁韩华，不要盲目羡慕再迁美国韩华，美国也并非想象中那般的“天堂”。而“构内食堂”、“狗智”这些直接译音韩语词汇的使用，也体现出在长期的移居生活中，先迁韩华对韩国文化的熟悉与习惯。

1990年代这种将韩语直接音译词汇，混杂使用在中文写作中的现象出现得最多，词汇主要包括：看板、建物、礼式场、沐浴汤、暴风注意报、相对方、艺能、终着站、放送、下日、觉书、试练等，与1970-80年代的情况相比，在词汇的意义特征上明显更加生活化。

就在无穷花礼式场不远处的华人餐馆燕来春，老板张恩桐更是忙着楼上楼下，前前后后，不亦乐乎地如同自己家里办喜事。240)

停电的电视映着停电的节目，沐浴汤的烟囱没有一丝灰尘，从旅馆私奔的男与女，又钻进了麻痹的沟，看到这风景的小食母笑掉了牙。241)

一家男女老幼一窝蜂学唱国语歌曲，寓娱乐于学习，藉以学习中国语文，同时按时收听新加坡及马来西亚的电视国语放送，辅助学习国语。242)

因气象台发布暴风注意报，所以船在码头整整延了一天，二十七日下午开航，行至海中，船稍遇风浪左摇右晃.....二十八日晨，船至威海近海。市内的建物及远山清晰可见，想起家乡和亲人，思潮起伏。243)

我们一进入北京首都机场，就可看到三星电子无偿提供的彩电，机场内拖拉行李的轮车，也是三星赠送的，从机场快要进入北京市区时，又可以看到大韩航空的大型竖立看板、北京亚运大会主会场的工人体育馆，门口也树立了双龙建设赞助大会的看板。244)

特别是礼式场、沐浴汤、放送、暴风注意报等词汇，明显带有韩国社会生活习俗的特征。从中国人举办婚礼的风俗习惯上看，城里人大多喜欢在饭店酒店举办，农村人则喜欢在家里举办。而韩国人喜欢专门的예식장(礼式场)举办，这种文化在中国很少见到，再加上

240) 小侨民, <小地方办大事>, 《韩华》, 首尔: 韩中文化协会, 1990.6, p. 43.

241) 柳耀广, <没有风的夜>, 《韩华》, 首尔: 韩中文化协会, 1990.7, p. 48.

242) 苗岭, <新印旅行记>, 《韩华》, 首尔: 韩中文化协会, 1990.10, p. 26.

243) 张泰河, <回乡探亲—期待和失望>, 《韩华》, 首尔: 韩中文化协会, 1991.2, p. 30.

244) 丘陵, <韩国要不要支援北京亚运>, 《韩华》, 首尔: 韩中文化协会, p. 24.

到了1990年代，第二代或第三代先迁韩华大部分到了谈婚论嫁的年纪，在韩国筹备婚礼就难免入乡随俗，选择到韩国的예식장(礼式场)举行婚礼。韩国的风俗已经深入韩华心里，所以他们在华文写作上也就不自觉地使用韩语“예식장”的直接音译词汇“礼式场”，来表达“礼堂”的意思。

“沐浴汤”这一音译词汇也同样如此，虽然在中国也存在“澡堂文化”，但是中国的“澡堂文化”并没有韩国“목욕탕”文化这么大众化、全民化，因此先迁韩华在华文写作中使用韩语直接音译词汇“沐浴汤”，也是出于一种文化需要。“放送”、“暴风注意报”这些音译词汇也不例外，从时间上来看第一代先迁韩华移居韩国时还不存在电视广播文化，而第二代和第三代先迁韩华从出生开始，接触的就是韩国的电视广播文化，熟悉的也是韩国特色的“放送”，因此在一些电视广播用语上也更熟悉如“暴风注意报”这样的，韩国式的表达方式。

2000年代以后，韩语直接音译汉语词汇的混杂使用现象主要出现在再迁韩华华文文学作品中。

兵兵，乒乒乓乓，我不是桌球，我却像桌球，被两边的拍子，打来打去，不知谁是赢家输家。²⁴⁵⁾

每次离家登校之前，总是先把佩在衣领上的一枚校徽，擦得乌黑发光，以吸引路人醒目注视，因为当时的首尔大学的确是誉冠全国，也是唯一的国立最高学府。²⁴⁶⁾

韩华尤其有点不同于其他地区的华人，习以为常嗜吃辣的，餐桌上少不了一盘金木吃泡菜。²⁴⁷⁾

马格里酒可以止渴消暑，并有忍饥止饿功效。²⁴⁸⁾

“建物”(建筑物)、“桌球”(乒乓球)、“登校”(上学)这些音译词汇，是再迁韩华再迁之前就已经习惯了表达方式。“芹木池”(韩国泡菜)、“马格里”(韩国米酒)这种音译词汇的使用，既包涵了再迁韩华文化混种上的意义，也就是说，即使先迁韩华再迁他地，仍然改变不了在韩国养成的饮食习惯，韩国的泡菜和米酒仍然成为他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同时这些音译词汇中也蕴涵着他们对韩国的乡愁。

245) 初安民, <乒乓>,《愁心先醉》, 台中: 晨星出版社, 1985, p. 129.

246) 焉晋琦, <大韩民国学生革命亲历记>,《北美齐鲁韩华通讯》第17期, Laguna Woods, California: 美国齐鲁联谊协会, 2007.11, p. 27.

247) 李作堂, <浅谈旅美韩华与韩裔>,《韩华世界》第1期, Walnut Creek, California: 韩华基金会, 2007.10, p. 8.

248) 老高丽, <“马格里”韩国米酒>,《韩华世界》第1期, Walnut Creek, California: 韩华基金会, 2007.10, p. 61.

从表3中可以看出这种韩汉互译语辞混杂使用现象，随着时间的增长而出现逐渐增加的趋势。1990年代的韩华杂志上出现的韩语与汉语语辞互译混杂使用现象，比1960-70年代韩华杂志中出现得更加频繁。这是因为：第一，随着移居者世代的更迭延续，移居者与出发地语言环境接触的机会逐渐减少，与移居地语言环境的接触机会逐渐增多。第二，随着韩国与中国大陆或台湾社会环境之间差异的增大，韩华就会直接接受那些在中国大陆或台湾没有，而在韩国产生或出现的事物与现象。即，那些通过中国大陆或台湾的媒体或教科书学不到的，在韩国才使用词汇，只有通过意译或者音译使用的方式来表达，相对来说，后者更加便利。

另外值得关注的是，先迁韩华的这种书面语混种现象，不仅体现在上述的词汇上，还体现在书面语的表达方式，甚至他们的思考方式上。比如，先迁韩华看到韩国人出殡的挽联上面写着：“敬吊空手来空手去”的悼词，就会联想到1960年代韩国的流行歌曲《下宿生》歌词中出现的类似内容：“人生是流浪者之路，自何处来，往何处去；赤手来，赤手去。”并以此韩国式的思考方式，通过文学的方式告诫韩华不要在子孙面前讲：“拿了多少钱，捐了多少地”，应该告诉他们“你的祖先没干坏事”。²⁴⁹⁾再迁美国韩华在中国烟台看到路上脚踏车、电动车、摩托车争先恐后，车辆或逆向行驶或侵入行人道，各行其是乱成一团的景象时，会联想到韩国的谚语：“为了早到10分钟，竟比人家早走10年”，想起韩国过去也是如此，但经过倡导与严格管理，不仅“提高了国民素质”，也“增加了国家财政收入”的先进一面。²⁵⁰⁾此时，再迁韩华启动了韩国人的思考模式，这种思考模式又通过汉语的形式被表达出来。

不管先迁韩华是否被韩国社会承认，也不管先迁韩华是主动地或是被动地在接受着韩国文化，韩国文化都始终与先迁韩华为了维系群体的凝聚力而坚守的中国文化，以及从台湾灌输而来的台湾文化相互碰撞，穿插交切，形成了先迁韩华的文化混种形态，这种混种特征又以韩华华文文学创作的形式，从混杂使用自创性的韩语直接音译词汇的方式表现出来，而且也体现在他们的思考方式上。这种混种化了的语言，又随着先迁韩华的再迁，被再迁韩华使用在再迁之地的文学创作中。

后迁韩华因为移居时间较短，在中国国内受汉语教育时间又长，所以语言性混种现象只出现在日常口语中，这种口头语上的混种现象也只限于韩语词汇的插入，尚未形成像先迁韩华那样复杂的口头语混种现象。就像后迁韩华作者李文，将个人的观察与见解通过小说《蒲公英》所表现的那样：“不知不觉来韩国近两年了，近两年的时光让许多海外学子油然而生一种已然身为老华侨之感，言语间不时夹杂外语，因为他们在中国待了短暂的二十多年，而在国外已经度过了漫长的一年半。”²⁵¹⁾但是在后迁韩华华文文学中尚未出现书面语上的混种

249) 侨谊, <侨社、侨民素描>, 《韩中文化》, 首尔: 韩中文化协会, 1985.7, p. 28.

250) 吕仁良, <北京的八大胡同可谓不雅观胡同>, 《北美齐鲁韩华通讯》第17期, Laguan Woods, California: 美国齐鲁联谊会, 2007.11, p. 10; 编辑, <中国人的不拘小节>, 《北美齐鲁韩华通讯》第17期, Laguan Woods, California: 美国齐鲁联谊会, 2007.11, p. 32.

现象。随着后迁韩华移居时间的增长，后迁韩华对韩国这个移居地投入的情感越来越多，形成越来越强烈的在地化欲望，也许后迁韩华也会形成一种新的语言混种形态，使韩华华文文学继续保持活力。

3. 韩华华文文学中出现的文化上的混种

韩国文化、中国大陆文化、台湾文化的相互交流与碰撞、相互交切与混杂，不仅使先迁韩华在语言上出现了混种性特征以外，在文化以及身份认同上也出现了混种性特征。

从先迁韩华的作品中可以看到，早期移居韩国的华人，即使在韩国生活，也大部分保留着故乡的一些固有风俗。比如，每到农历年早期韩华便将天地神、财神、祖先一并在家中供奉，供奉的风俗也与韩国不同，按照故乡的传统供桌上不供牛肉，并且从农历年一直休息到农历十五的元宵节。随着先迁韩华在韩国移居时间的增长，早期韩华所遵从的故乡风俗，都因为受到韩国文化的影响而不得不随之发生改变。因为韩国的农历年只放假3天，为了适应韩国的生活方式，先迁韩华的农历年也由以前的休息15天，缩短到6天，再到后来完全按照韩国的习俗休息3天。另外，先迁韩华的婚礼也已不如早期韩华办得那般热闹。因为韩国光复后，社会急速变化，生活节奏也随之加快，先迁韩华受韩国文化的影响，举办婚礼也多改用新式。²⁵²⁾

韩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邦交之后，许多在韩国出生的第二、三代先迁韩华，生平第一次踏上中国大陆这片土地，并以文学的形式，记录着当时的心境。在第二、三代先迁韩华的游记中，他们不自觉地将“故宫与前门之间著名的天安门广场”与韩国的“汉城宫殿”比较一番，随后油然而产生“中国人的骄傲”；同时也不忘联想到曾经在“汉城冬天大雪纷飞时，爬道峰山或北汉山”时的情景是多么壮观。²⁵³⁾充分接受了移居地文化洗礼的先迁韩华，踏上中国大陆这片土地上时，那些自称生活不错的中国大陆亲戚，在他们眼里只有在招待自己吃饭时才有酒有肉，亲戚们自己吃饭时，就没有什么东西了。当这位先迁韩华看到那些大陆亲戚们吃个肯德基就要花掉一个星期的工资时，就不再敢花钱了，因为他害怕看到亲戚们那“不知在羡慕抑或忌妒的眼神”²⁵⁴⁾。

作者所谓“羡慕抑或忌妒的眼神”，有些类似于过去韩国人看待韩华的态度。因此，韩国人对于韩华的排斥，不仅存在于韩国社会。即，外国人嫌恶症(移居者排斥现象)存在于世界各个地区，甚至汉族群体之间也可能存在。换句话说，这是由群体与群体之间的利害冲突所

251) 李文，《蒲公英：文麒麟留韩记》，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2017.1, p. 134.

252) 这段叙述参考秦裕光，《旅韩六十年见闻录—韩国华侨史话》，台北：中华民国韩国研究学会，1983, pp. 106-108.

253) 辉光，〈暴风雨降临前的北京城—一九八九年五月日记在北京〉，《韩华》，首尔：韩中文化协会，1990.5, p. 29；贺山，〈大陆纪行〉，《韩华》，首尔：韩中文化协会，1990.5, p. 21.

254) 贺山，〈大陆纪行〉，《韩华》，首尔：韩中文化协会，1990.5, pp. 19-31；辉光，〈暴风雨降临前的北京城—一九八九年五月日记在北京〉，《韩华》，首尔：韩中文化协会，1990.5, pp. 30-31.

产生。

先迁韩华在自称“身为中国人”的同时又以外来者自居，无意识中已经将自己与中国大陆人区分开来。也许他们是想从自己的经济水平与亲戚家的消费情况的比较中构建差异，构建自己与中国大陆人之间的异质性，从差异中获得处于优越地位的满足，通过差异再次确认自己曾经选择移居韩国行为的正确性，慰藉那在移居生涯中似乎从未找到归属感的不安。斯图尔特·霍尔所说：“离散经验不是纯粹的，必然通过认识异质性与多样性，不是拒绝差异，而是通过差异用认同的概念去定义混种性，跨国移居者的认同是通过变化和差异，自身不断的生产与再生产的过程。”²⁵⁵⁾作为跨国移居者的先迁韩华，正是通过对自身的变化，以及自身与中国大陆人之间存在差异性的认识，构建不同于中国大陆人的，新的身份认同。

里昂·尤里斯《QB V II》中叙述了一段美籍犹太人作家的故事：这位美籍犹太人作家即使在父亲多次劝告他不要忘记自己民族的根之后，也不认同自己的身份，认为那是代代历史的包袱，跟他无关。直到父亲过世，他在犹太的传统丧礼上，突然发现原来他身上烙印着祖先血统。先迁韩华会将这部分描写在心里尘封二十多年也不曾退色。但是他们仍然会在承认自己身上烙印着祖先血统的同时，为“岁月号沉船事件”中每一位不幸遇难的韩国人哀痛不已²⁵⁶⁾；也为韩半岛剑拔弩张的紧张情势而牵挂忧惧。即使他们很清楚，不管在台湾呆长呆短，自己都只是个过客，但仍然因为台北的十七级“苏迪勒”台风坐立不安，整日目不转睛的盯住电视气象报导；同时也为中国天津滨海新区大爆炸事件而恐惧颤栗，为每一个人祈求平安，因为他们知道平安是人心最深的渴望与需求。²⁵⁷⁾

一位先迁韩华曾在1960年代写过一篇名为《痰盂有感》的杂文，文章大意是：作者新搬进首尔南山脚下的“他他米”²⁵⁸⁾屋，为了预防到家来访韩华亲友的“国吐”(韩华讽刺中国人的随地吐痰行为的说法)行为，作为“安全措施”，便从台湾带回来两个搪瓷痰盂。但作者发现也许由于时代不同了，也许由于移居海外受外国人生活的影响，没有继承这随地吐痰的国粹。于是这扮相虽美，但毕竟是惯于藏垢纳污的痰盂，终被判定不配登大雅之堂，放在客厅的那个便上演了一出“自君别后”。而放在卧室那一个无奈太太强烈反对，凭借“裙带关系”保住了位子，却在以后的日子里尽受“胯下之辱”。由此作者感慨这一对出身相同，能力相同的痰盂，因为所处环境不同，最后结局便判若霄壤。立足于客厅的，学以致用，如今虽告落伍，被割

255) 再引用성정혜, 《탈식민시대의 디아스포라와 혼종성 : 살만 루시디의 <자정의 아이들>, <수치>, <악마의 시>》, 이화여자대학교 박사학위논문, 2010, p. 13.

256) “岁月号沉船事件”是指2014年4月16日，韩国的一艘载有476人的“岁月”号客轮，在韩国全罗南道珍岛郡屏风岛以北海域意外进水并最终沉没事件。先迁韩华衣建美为不幸遇难者写作诗歌《黄丝带》以示哀悼之情。参考衣建美，〈衣建美文集〉，《韩华通讯》，首尔：汉城华侨协会，2014.6.

257) 参考衣建美，〈后德载物〉，《韩华通讯》，首尔：汉城华侨协会，2014.4；衣建美，〈愿你平安〉，《韩华通讯》，首尔：汉城华侨协会，2015.9.

258) 是指一种日式房间，日占时期被引进韩国，现已消失。

了脖子，也还落得半辈子干净。侧身于卧室的，可就惨啦，不远千里而来的大才，用非所学，复任人污辱，无法自拔，尽受一辈子肮脏气，这以裙带关系而得来的职务，往往不见得是“高就”，而在实际生活中，类似此情况的事还比比皆是。²⁵⁹⁾

这篇文章的作者本意在于嘲讽那些从台湾学成归韩的韩华子弟，依靠裙带关系得到一官半职，但却是用非所学，复任人污辱，无法自拔的社会现象，但是这篇文章却引发笔者对跨国移居者“中国性”问题的思考。痰盂在过去本是一般中国家庭的必备之物，是中国人的一种生活习惯，一种中国文化，一种与韩国的“他他米”生活不相协调的文化。先迁韩华移居韩国后，随着移居时间的增长，也就慢慢习惯了韩国的“他他米”生活，甚至在地化实践还使很多先迁韩华改掉了中国人身上的一些旧习。先迁韩华坚持兴建华人学校，弘扬中国文化，以此增强先迁韩华社会的凝聚力，但同时他们也无法阻挡韩国文化对中国文化的冲撞，抗拒不了中国文化与韩国文化的相互揉杂与混合，他们在自觉地固守中国文化的过程中，也在不自觉地形成一种由于文化间的碰撞交流，交切穿插后而产生的混种文化。也就是说，即使先迁韩华曾经是以中国文化为根基，但是随着异地文化与中国文化的混种糅合，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再一味地强调其“中国性”，也许就像那只被移植到韩国的，卧室里的痰盂一样，即使曾经是千里之外来的大才，也永远适应不了新的环境，结果得“受一辈子肮脏气”了。说得更严重些，将“中国人”这一具体化的范畴，作为一个种族和民族的标签，将“中国性”看作一种衡量华人是否够“中国”的工具，最终究竟是在为谁服务？其结果是否会使移居国将移居来的华人永远看作是外国的，而不具备真正本土的资格？²⁶⁰⁾

再迁台湾韩华初安民以诗的形式，描述了再迁台湾韩华在文化上的混种特征。他将这种混种性比喻成“煮茶的水”²⁶¹⁾，即使再将茶与水分离晒干，也仍然回不到原本的茶与水的样子，仍然是一碗浑然浸染上茶香的茶水。再迁台湾韩华本以为来到台湾便是回归祖国，重新回到中华文化的怀抱，但是真正来到台湾，生活其中，才发现自己就像那煮茶的水，已经浸染上了韩国文化风俗习惯，再也回不到原来的模样。

再迁台湾韩华郝明义在其散文中也同样强调过韩国文化对他的影响。他在散文中说：就像在很多韩国人眼里中国人可以腰缠万贯，却衣着邈邈是一件不可理解的事情一样，在很多韩华眼里韩国人身上也存在着一种“韩国习气”——奢侈与虚荣。郝明义承认韩国与中国在文化上存在着差异，他认为这是因为韩国人的消费习惯是总喜欢把钱花在别人看得到的地方，在韩国衣着往往就代表一个人的身份与阶级。但同时郝明义更愿意将这种“韩国习气”理解为韩战之后，韩国政府急于摆脱贫穷，想要透过支持一些大财团的崛起来振兴韩国经济，结

259) 黄务，〈痰盂有感〉，《韩华春秋》第10期，首尔：韩华春秋编辑委员会，1965.3，p. 22。

260) 参考史书美，《反离散—华语语系研究论》，台北：联经出版社，2017.6，p. 32。

261) 初安民，〈心事十六行〉，《愁心先醉》，台中：晨星出版社，1985，p. 62。

果也在无意中透过这些新财富拥有者的暴发户心态，进一步扭曲了社会的价值观。他们的用心立意都没有错，只是用力过猛了一些。

郝明义非常肯定韩国战争之后，韩国为了追求社会发展而进行的一系列“霹雳手段”，以及韩国人所特有的对待生活的“激越之情”。他由韩国文化联想到台湾文化，认为虽然开放是台湾社会最好的一面，但是和韩国相比，台湾文化差的正是这股勇往直前的决心与自我期许的精神。台湾对于当初决定再迁台湾的郝明义来说，既是个应许之地，但同时也有更大的可能成为一个破灭的虚幻。他始终认为来台湾是自己人生最美好的决定之一，但他更认为可以只身来到这个陌生之地的勇气，正是来自在韩国成长期间所形成的这股“激越之情”：

釜山和台北，之间不只隔着距离，还隔着大海；华侨社会和台北的社会，之间不只存在着文化的不同，还有大小的悬殊。多一点理性的思考，稳当的想法，我就要留在原地，不必前来了。要飞跃那么遥远的距离，我只能像一根冲天炮似地勳然拔起。不是嚣张到令人难以忍受，也许就没有那么大的动能让我脱离那里。²⁶²⁾

初安民与郝明义都是再迁台湾韩华，有着类似的移居经历，并且存在着一个共同将台湾作为再迁之地的理由——对中国文化根深柢固的认同。两者都为了尽快适应再迁之地的生活，尽量使自己处于一种对于曾经的移居地韩国的忘却状态，初安民曾一度尝试与曾经的移居地韩国挥手告别，郝明义也曾经认为对于还不到五十岁的人来说，远不是回顾过去的时候。但是结果却发现，就像记忆的本质，是破坏，而不是保留²⁶³⁾，有些东西并不是想忘掉就可以忘得掉的，想抹去就可以抹得掉的，比如与生俱来的籍贯，或是曾经的移居生活所留下的烙印。但是两者所不同的是初安民觉得既然抹不掉，就被迫带着这些烙印继续扎根台湾，同时为自己想象一个可以作为真正归属的中国——文化的中国。而郝明义则决定乐观接受来自曾经的居住地韩国的一切风俗习惯与文化的影响，特别是积极承认韩国文化中对自身起到积极影响的部分。郝明义在散文结尾部分说道：“四十之后，越来越觉得时间不是条往前的直线，而是个自我循环的圆圈。只是圆圈的本身在移动。你在前进，你回到过去；你回到过去，你又前进。²⁶⁴⁾他觉得只有承认并接受，而不是逃避过去，才是继续前进的动力。

从再迁美国韩华的文学作品中可以看出，就连先迁韩华自己也感觉到，不仅在外貌上先迁韩华与韩国人具有很多相似之处，几十年的韩国移居生活，使先迁韩华在讲究辈分礼节、性情偏于急躁、以及饮食习惯等生活习性上都变得与韩国人十分接近。因此，就使得先迁韩华即使再迁他地，也仍然延续着在韩国养成的生活和饮食习性，习惯与韩国人聚居在一起。

262) 郝明义，《故事》，台北：大块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4.3，p. 187。

263) 郝明义，《故事》，台北：大块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4.3，p. 123。

264) 同上，p. 192。

比如，再迁美国韩华在文学作品中表示：由于那些来自三千里江山的生活习性，自觉与韩裔在外表和内里都相差不多，分不出来：高大粗壮，豪迈热情，重于伦理，辈份有序，讲义气，味儿不对劲就掀桌子比拳头。再迁美国韩华无论男女老幼，由小到大，年年、餐餐都少不了韩国泡菜，韩国泡菜成为他们生活饮食中不能缺少的一道菜。再迁美国韩华因为印有中国字样的壁纸和中国式布置的家具，将其确定为自己的未来居所，但是当它们搬进新家后，又像在韩国生活时那样，为了维持那洁白整齐的厨房，而改变饮食习惯，放弃大锅烹炒油炸，只做清淡的蒸煮。在美国看到《国际市场》这部韩国电影，也能使这些再迁韩华忆起曾经位于国际市场南面的，父亲的杂货店。在美国，韩国人聚居的地方，再迁韩华也喜欢插上一腿，成为“互助互惠的生命共同体”。²⁶⁵⁾

再迁美国韩华不仅因为几十年的韩国移居生活而受到了许多韩国文化的影响，并且在三十余年的美国移居生活中，也同样受到了美国文化的影响，这些影响都使再迁美国韩华在思考问题的方式上除了具有韩国化倾向之外，也或多或少存在着美国化的倾向，这种思考问题方式上的混种化，又通过再迁美国韩华华文作品表现出来。

比如，再迁美国韩华在文学作品中就以“准洋人”的身份自居，体现出再迁美国韩华受到美国文化的影响。他们在作品中这样说：“自觉来美国已有三十年，在生活习惯上因为与洋人耳濡目染的接触，已七、八不离十称得上是个准洋人，中国的风俗人情与西方大有不同之处，所以身为最先进国家的国民，在中国的一举一动亦应该有先进的尺度与作风。”²⁶⁶⁾

这种异地文化的影响，有使再迁美国韩华在看待中国大陆的问题上，具有两面性。他们在承认中国大陆改革开放三十多年后，社会方方面面都出现了长足进步的同时，仍然表示有些中国大陆人处事的观念与做法使他们不能“消受”。比如，再迁美国韩华在作品中表示，坐人力车游逛北京八大胡同，一路上看到墙上系着尼龙绳晒衣服、被褥、甚至女人内衣裤，路边丢弃垃圾，尼龙袋随风起舞，这仍然停滞在十八世纪文化中的残墙断瓦，破烂不堪，居民在里面腐朽苟生的生活场景，顿时感到“惨不忍睹”。但是使再迁美国韩华更加不能忍受的是，由于这些现象会给“外国佬”造成负面影响，因而使自己这个“中国人”的颜面尽失。²⁶⁷⁾

再迁美国韩华在作品中表示：他们怀念故乡的美味，但不喜欢在中国大陆下馆子，因为那些“地沟油、染色馒头、瘦肉精、一滴香”等实在令他们觉得可怕。由于美国保险“不保美

265) 这段叙述参考李作堂，〈浅谈旅美韩华与韩裔〉，《韩华世界》第1期，Walnut Creek, California：韩华基金会，2007.10，p. 8；阿里郎，〈说韩国泡菜〉，《韩华世界》第1期，Walnut Creek, California：韩华基金会，2007.10，p. 56；唯一，〈国际市场〉，《韩华文艺》，南加州韩华联谊会网站<http://www.hanhwa-la.org>，2015.5.31；焉晋琦，〈回顾旅韩华侨和韩国民族的恩怨〉，《美国齐鲁韩华杂志》第32期，Laguan Woods, California：美国齐鲁联谊协会，2012.2，p. 82。

266) 乌鸦，〈韩华节俭成性〉，《北美齐鲁韩华通讯》第17期，Laguan Woods, California：美国齐鲁联谊协会，2007.11，p. 34。

267) 参考司晨，〈大陆宾馆 无理索赔〉，《美国齐鲁韩华杂志》第25期，Laguan Woods, California：美国齐鲁联谊协会，2010.1，p. 25；吕仁良，〈“美国齐鲁联谊协会”烟台成立分会〉，《北美齐鲁韩华通讯》第17期，Laguan Woods, California：美国齐鲁联谊协会，2007.11，p. 8。

化门面”等项目，他们选择到中国大陆开发区的公立医院，感叹大陆公立医院的医疗又快又好又便宜，同时也惊愕大陆医务人员无一人戴手套。在美国看惯了医生、护士换手套的频率，简直到了浪费的地步，而这“Made in China的手套”在中国医院竟然看不到。很多再迁美国韩华已在美国旧金山的齐鲁墓地备好墓穴，因为他们觉得在基本的人权和文化水平上，中国大陆仍有进步的空间，在这一点上，先进的美国连逝去的人都会保障人权，不会逼迁墓地。268)

中国大陆文化、韩国文化、再迁地区文化等几种文化间的相互混杂相互碰撞，使再迁韩华的身份认同具有了一种既是而非的混种性特征，即，既是中国的、韩国的、再迁地区的；同时又不完全是中国的、韩国的、再迁地区的混种性身份认同。

后迁韩华华文文学中所体现的文化混种，主要是后迁韩华通过模仿的形式进行积极地在本地化实践，并在此过程中形成了文化上的混种。

后迁韩华作者李文，以自己在韩的亲身经历为基础，在小说《蒲公英》中塑造了几个在韩中国留学生的典型形象，从这几个人物形象上，都可以看到文化混种的影子。比如，小说主人公文麒的高中同学董轩泽，来韩国四年，在初来乍到的文麒眼中，如今的他是一个讲着一口流利韩语的，举手投足间依然不失领军人物范儿的，“韩国式的中国人”。269)这种“韩国式的中国人”形象，在韩国的大学校园里几乎无处不在。刚入学的主人公文麒，在宿舍楼正门前见到两个陌生人，一高一矮，像是学生模样的韩国人，但是通过交流才知道，他们也是两个“韩国式的中国人”。文麒来到学校食堂，更是满眼的“韩国式中国人”，身在其中的文麒，反而觉得自己变成了“与众不同的外国人”。270)

当文麒得知认识了一年有余，说一口流畅韩语，讲中文时都尚略带韩文余音的“韩国同学”，竟然是中国上海人，跟自己一样是汉族，是留学生时，不禁为此大为震惊，深陷对这位同学的回忆之中，不能自拔。文麒这才真正认识到：气质的悄然变化才是融入当地生活的最高境界，是自己借鉴学习的对象。文麒也遇到过一些“搞不清楚国籍的神秘人物”，但是因为那些人一般“不是朝鲜族就是华侨”，文麒觉得搞不清楚他们的国籍是理所当然的事，但是眼前这位同学却是纯汉族血统，仅仅来韩国五年，不能不令他佩服不已。271)

通过小说主人公文麒的观察，可以将韩中国留学生的文化混种程度分为三个等级：第一，是像文麒一样，刚来韩国尚需在语学堂学习的留学生。从这些学生由内而外反映出的眼神、身姿、衣着、发型等方面，都可以判断他们全部来自中国的四面八方。第二，是像来韩

268) 以上引文均出自李作堂，〈返乡杂记〉，《美国齐鲁韩华杂志》第31期，Laguan Woods, California：美国齐鲁联谊协会，2011.10，p. 38。

269) 李文，《蒲公英：文麒留韩记》，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2017.1，pp. 5-6。

270) 同上，p. 10。

271) 以上引文参考李文，《蒲公英：文麒留韩记》，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2017.1，p. 162。

国四年的，董轩泽这样的“韩国式中国人”，这些中国留学生从外表看上去俨然像极了韩国人，但是谈吐之间马上暴露自己中国人的真实身份。第三，是像令文麒佩服不已的，来韩国五年的上海同学，不仅在外貌和语言上，甚至在神态气质上都难以辨认真实身份，也就是文麒所谓的融入当地生活的最高境界。由此也可以看出在韩国生活时间的长短，模仿韩国人的程度等因素都是左右后迁韩华文化混种程度的重要因素。

主人公文麒已经为自己树立了学习借鉴的目标，即，像那位连气质都像韩国人的上海同学那样，达到融入韩国社会的最高境界，这使他的在地化信念更加坚定。为了让身上充满中国因素，尚处于融入韩国社会第一阶段的自己，上升为第二阶段的“韩国式的中国人”，他首先从着装上入手，用自己辛辛苦苦打工赚来的薪水买衣服，因为在穿着上像个当地人，就意味着“直观地标志着自己向留学最高境界的‘假洋鬼子’方向又迈进了一步”。²⁷²⁾这里所谓的“假洋鬼子”²⁷³⁾，其实就是融入韩国社会的第三阶段，不仅在语言和外貌上，在气质上也要悄然变化成韩国人。文麒甚至为自己只要不怎么说话，便常被误认为是当地人，还能常为当地人指路而感到心满意足，即使他看起来像一个“患有严重口吃的韩国人”。²⁷⁴⁾为了继续加快变成“假洋鬼子”的步伐，文麒选择用打工的方式深入韩国人的生活。对于一个语言还不好的外国留学生来说，找工作绝非易事，但是文麒仍然从找工作的过程中收获了经验：“找工作会使自己脸皮越来越厚，而在厚厚的脸皮下边，可以找到更为理性的答案，也可以使自己保持在心平气和地状态下与他人沟通。”因为文麒坚信，“人的财富绝大部分从社交中获取，想做社交的王者，首先要善于与人沟通。”²⁷⁵⁾

从中国国内大学毕业的时候，主人公文麒也几乎和所有同学一样，偶尔有人生不过如此之感慨，毕业来到异国他乡之后才逐渐清醒地认识到未来即使是可以预知的，自己亲身去经历的时候永远还是初体验。²⁷⁶⁾当文麒初次体验的韩国式教育机制，与他已经习惯了二十余年的中国式教育体制发生冲突与碰撞的时候，他就会觉得这种初体验可用一个“乱”字来概括。韩国的高等教育，学生的自主性很强，课是自由选择，也可以轻易地休学、复学、退学，一切像是吃自助餐，这让在中国国内被辅导员领导习惯了的文麒感到有些无所适从。生活依着惯性向前迈进，文麒在这个混沌的世界里继续迂回。²⁷⁷⁾适应是一个漫长的，一点一滴积累的过程，文麒慢慢适应了韩国式的教育体制，也适应了“官方方言是韩语，通用中文”的教育环境，这种习惯有时甚至使文麒觉得自己日后如果回国，还能否很好地适应全中文的职场环境。²⁷⁸⁾

272) 李文，《蒲公英：文麒留韩记》，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2017.1，p. 77。

273) 盛行于19-20世纪初的一种现象，鲁迅的《阿Q正传》中也曾出现。这里是作者的一种变相使用。

274) 李文，《蒲公英：文麒留韩记》，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2017.1，p. 82。

275) 参考李文，《蒲公英：文麒留韩记》，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2017.1，p. 90。

276) 同上，p. 92。

277) 同上，pp. 152-155。

主人公文麒在韩国的移居生活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某一天当文麒望着头顶这片湛蓝的，令他身心无比舒畅的广阔天空时，他发现自己已经禁不住地喜欢上了这里。但是，到了假期，他又会只想买到最快发往中国西安的机票而不论价格。在家乡享受着无限亲情，文麒还是会偶尔莫名地想念韩国。回韩国之前，他又会采购各式各样经济实惠的中式作料，因为在这个有“五味五色”之称的韩国，偶尔也需要做一些具备“国菜五品”的正宗中国菜，来满足一下自己丰富敏感的中国味蕾。²⁷⁹⁾

小说还通过主人公文麒的视线，将先迁韩华与后迁韩华的不同特征作出了比较，文麒可以很清楚的辨认班里三种类型的女生：“一是韩国人，二是出生于韩国的华侨，三是和他一样，中国人的血统，又在中国出生、长大的‘纯中国人’。”²⁸⁰⁾我们似乎也可以这样理解文麒眼中的这三类女生，一类是“纯韩国人”，一类是“纯中国人”，一类是出生于韩国的华侨，也就是笔者所说的先迁韩华。这里所谓的“纯”，并非血统上的意义，而带有文化上的内涵，特别是指从小到大，伴随整个成长过程的生活环境的影响。

小说中这样解释“纯中国”女孩的定义：“无论你来自中国的哪里，无论你是谁民族，只要是在光荣的革命烈士鲜血染红的旗帜下成长起来的一代，张口就会是唐宋元明清、长城、故宫、长江、黄河、清华、北大、李小龙、章子怡、郑渊洁、韩寒、郭敬明、周杰伦和娃娃头冰激凌。熟悉得让你想起红领巾、中高考、清贫但丝毫不乏浪漫的中国校园里的中国式恋爱。”²⁸¹⁾这些文化，却是在韩国出生成长的先迁韩华未曾接触也不甚了解的部分，这些“既是拿着上边写着有中国字样身份证的韩国人，也是出生、成长在韩国的中国人”的先迁韩华女生：“性格中既有中国女孩的婉约爽朗，又有韩国女孩的温柔贤淑。”²⁸²⁾

这些特征，又是后迁韩华女生所不具有的。从小生活环境的不同，使在韩国出生和成长的先迁韩华，与在中国土生土长的后迁韩华具有完全不同的气质，这也就意味着，先迁韩华与后迁韩华各自经历着不同的文化混种过程。

综上所述，由于生活环境所致，先迁韩华越来越觉悟到韩语在移居生活中的重要性。随着先迁韩华韩语熟练程度的提高，再加上先迁韩华在韩华学校接受的国语教育，这些语言因素都在不断影响着先迁韩华的语言，使先迁韩华在口头语上自创了属于自己的语言——“韩华汉语”。并且先迁韩华在进行华文文学创作时，也出现了混杂使用韩语直接音译汉语语辞的现象，形成了独特的先迁韩华书面语混种特征，这种特征还体现在先迁韩华的思考方式上。

278) 李文，《蒲公英：文麒留韩记》，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2017.1，p. 159。

279) 参考李文，《蒲公英：文麒留韩记》，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2017.1，pp. 115-126。

280) 李文，《蒲公英：文麒留韩记》，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2017.1，p. 34。

281) 李文，《蒲公英：文麒留韩记》，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2017.1，p. 35。

282) 同上。

随着先迁韩华的再迁，这种语言上的混种现象又被再迁韩华继续使用在再迁之地的文学创作上。

韩国文化、中国大陆文化、台湾文化以及其他再迁之地文化间的相互碰撞与交切，又使先迁韩华、再迁韩华、后迁韩华各自出现了不同特征的文化混种现象。先迁韩华坚持兴建华人学校，弘扬中国文化，以此增强先迁韩华社会的凝聚力，但同时他们也无法阻挡韩国文化对中国文化的冲击，在韩国文化的影响下，很多故乡的传统风俗已渐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可以适应韩国社会生活的新风俗，形成了新的生活习性。再迁韩华乐观接受曾经的居住地—韩国风俗与文化影响的态度，也可以从一个侧面证明韩国文化对先迁韩华所起到的积极影响。先迁韩华与后迁韩华虽然各自经历着不同的文化混种过程，但是在这种混种文化形成的过程中，都与其积极的在地化实践存在着密不可分的关联性。

第 2 节 韩国华人华文文学中出现的在地化

在地化是指通过在出发地和移居地社会、经济、政治上的扎根，从而在特定场所展开或维持一系列的社会关系，在地化所强调的是移居者要进行跨国实践就必须在特定场所扎根。²⁸³⁾事实上，在横跨东南亚、非洲和南美洲的后殖民民族国家中，当地讲各种华语的人早就已经在地化，并成为当地本土的一部分了。印尼出生的土生华人(peranakans)与马来西亚的混血峇峇(babas)都发展出独自的文化混种性。在新加坡，甚至在其成为独立国家之前，从中国移民的知识分子已经把该地当作是自身文化的中心，他们为自己创造了南洋想象。从马来西亚到台湾的黄锦树也认为，“马华文学”既然是马华社群在地创造的华文成果，必须诚实面对自身的多重身份和发声位置，不必总是依附着中国五四新文学或现实主义的那个民族或国家谱系，必须面对与生俱来的驳杂性。也正因如此，史书美反对“离散中国人”理论，认为无须永远沉浸在“花果飘零”的情结里，同时提出“反离散”论，来强调“落地生根”的重要性，即明明知道“我们回不去了”，而仍然“无中生有”，塑造、拆卸、增益、变通、嘲仿他们对中国的想象和实践。²⁸⁴⁾

如前所述，早期移居韩国的华人，由于在身份以及社会地位上的优越感，也许还意识不到融入韩国社会的必要性，因此也就谈不上在地化欲望。随着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的发生，以及先迁韩华在韩国社会地位和生存处境的变迁，先迁韩华逐渐意识到多与韩国人接触，先迁韩华社会多与韩国社会交流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后迁韩华的跨国移居行为具有很强的自主性，并且具有明确的往返韩中两地的双重居住策略，这就使得后迁韩华在韩国的移居生活中也会伴随着积极的在地化实践。先迁韩华华文文学与后迁韩华华文文学中所体现的文化混种特征就是他们积极进行在地化实践的有力证明。先迁韩华与后迁韩华的在地化也分别通过各自的文学形式体现出来。

1. 韩华华文小说对在地化重要性的暗示

先迁韩华张岚在1960年代创作了一部自传体短篇小说《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从主人公锺辰自述的一段人生经历和所发事件的角度写成。因为自传体小说一般都是作者在亲身经历的真人真事的基础上，运用小说的艺术手法，经过虚构、想象、加工而成，所以这部小说就具有了反映当时先迁韩华社会风貌的时代意义。另外，这部小说的重要意义还在于，不

283) GIELIS, R., "A global sense of migrant places: towards a place perspective in the study of migrant transnationalism", *GLOBAL NETWORKS* Vol.9 No.2, 2009, pp. 280-284.

284) 以上叙述参考史书美，杨华庆译，蔡建鑫校，《视觉与认同——跨太平洋华语语系表述·呈现》，台北：联经出版社，2013，p. 47；王德威，《华语语系的人文视野与新加坡经验：十个关键词》，《华文文学》第122期，汕头：汕头大学，2014，pp. 11-14。

管是作者有意还是无意之为，小说都达到了这样一种效果，即，采用排除法的方式，通过揭露那些所谓的先迁韩华“未来出路”的不确定性与不透明性，最终暗示先迁韩华想要改变现状，真正找到突破口的方法就是在地化。

首先，作者揭示了先迁韩华把台湾当作未来出路的不确定性。

小说的主人公锤辰，在韩华学校读到初中毕业，被父亲送到台湾读高中。父亲作出这一选择的原因，一方面出于知识分子的敏感，意识到知识对于先迁韩华的重要性。另一方面，根据个人经验他又觉得在先迁韩华社会，即使受到高等教育仍然难以找到出路，只有拼命将子女送到台湾，期盼子女有朝一日可以留在台湾发展，或许可以有个更好的未来。当然，促使父亲作出这一选择的另一重要原因，就是台湾政府从1952年开始实施的鼓励韩华学生赴台升学政策，锤辰家庭经济拮据，享受这一政策，可以减少锤辰家里的经济负担。

先迁韩华衣建美也在其随笔中回忆道：“六十年前，我在台湾板桥国立华侨实验中学就读普师科。我所以读普师科，是因为我初中毕业那段日子，家里的经济情况不太好，只能无奈的选择可以免费就读的普师科。六十年后的今天，我对国民党的栽培（也是国家的栽培）有一份虔诚的感恩。对于能与世界各地华人学子同聚一堂，研读中华文化，更有着一份说不出的思念！”²⁸⁵由此可见，华人赴台升学优惠政策的出台本身是好事，在当时给先迁韩华，特别是经济上有困难的韩华创造了更多的学习机会。但问题是这一政策的最终目的，并不在于培养华人学生，并为他们创造更多的在台就业机会，²⁸⁶而是台湾政府为与中国大陆抗衡，拉拢华人增强实力的举措之一。一位再迁美国韩华在作品中回忆说：“自民国四十一年政府有了侨生政策，就千方百计与大陆在全球争取侨生，那是国策。”²⁸⁷也就是说，台湾政府实施的鼓励华人赴台升学政策，目的并非在于接受。

台湾政府鼓励先迁韩华赴台升学，却没有从实质上为先迁韩华解决最重要的外汇问题。由于外汇不通，先迁韩华只能自行解决在台留学的生活费，因此越来越多的留台学生做起往返台韩两地的生意，形成了一股不小的“生意潮”，上演了小说中台湾基隆码头的一幕：“站在基隆的码头，晒着焦热的太阳，等待着同学们的行李被检查，实际所谓检查的手续只不过是形式而已，因此在这种漏洞中，有很多同学大批的做买卖，这些人捞取大量的钱。”²⁸⁸

台湾政府为了笼络各地华人，对赴台华人一味地采取“放宽”、“优待”政策。各地华人赴

285) 健而美，〈往事堪回首〉，《韩华文艺》，南加州韩华联谊会网站<http://www.hanhwa-la.org>, 2015.6.15.

286) “根据侨委会的侨教方针，我们很明显的看出，他们欢迎海外侨生，返回升学，但其目的乃是希望这些接受了祖国文化熏陶的青年，能返回原侨居地，将所学所长，贡献给当地的侨社，但是就历年来看，返国升学的侨生愈来愈多，而想学成之后继续留台工作的侨生，也逐年成比例的增加。侨委会为避免留台工作侨生太多，已明文规定，凡在台就读侨生，学成必须返回原侨居地工作，除不能返回原侨居地者可以留台工作外，凡有特殊原因续留台工作者，必须由侨委会认可。”从上述论述可以知道台湾政府出台此项政策的目的在于“培养”，并不在于“接受”。参考司宛春，〈留台侨生的出路〉，《韩华春秋》第3期，首尔：韩华春秋编辑委员会，1964.8，p. 17.

287) 李作堂，〈难忘祖国德政与恩情〉，《韩华世界》第3期，Walnut Creek, California：韩华基金会，2011.10，p. 57.

288) 张岚，〈自有一番滋味在心头〉，《韩华春秋》第5期，首尔：韩华春秋编辑委员会，1964.10，p. 30.

台升学，皆可保送进入台湾一流水准的学校。当时就有一些先迁韩华纷纷写评论，议论此事：“目前华侨中学的水准与台湾各高中相较，约在第二流及第三流水准，而在国内这种二三流水准高中(如板桥中学、强恕中学、东方中学)毕业学生要想考入第一流大专(如台大、师大、成大等)是非常不容易的。但是因为侨生有待政策，韩华学校毕业的学生不经考试即可顺利进入台大、师大、成大等，跟不上课是很自然的事情。”²⁸⁹⁾由于华人学生功课差，升学时却可以得到很多优待，因而引起一些台湾学生的不满，他们认为是华人学生占去了台湾国内学生招生名额，造成华人学生与台湾学生之间的矛盾，以至后来问题愈演愈烈。

小说主人公锺辰因为感情上的受挫一蹶不振，以致最后学科有两门不及格。但是他还是占了侨生身份的便宜，侥幸取得了毕业资格。他也参加了联考，但名落孙山是预料之中的事。他再次占了侨生身份的光，进入了大学先修班。家境穷困所带来的痛苦，以及没有能力与台湾学生公平竞争的不自信，最终将他压抑至爆发，坠入了堕落的深渊：

入了先修班等于入了罪恶的陷阱，我学会了跳舞、聚赌。每天在毫无生气的日子里生活，让堕落啃蚀得愈来愈消瘦。“念书”已经是一项奢侈的名词了，凭良心讲，我才不要变得那种假道学，没有零化钱的时候，同学的衣服、像机、收音机甚至书本，可以暂时顺手牵羊到当铺里去当掉，或者变卖，找个零化有什么不可以的？²⁹⁰⁾

先迁韩华只身来到台湾，进入一个陌生的环境，一切都不习惯，心理上无法安定，当学业上发生困难，则更加消极，无法安心向学，此时一旦受到不良影响，更易步入堕落。同时台湾各大专学校由于学生过多，校方无法周全照顾每一位学生，一些华人学生无人监管，自由放纵，每日只图玩乐，对课业即漠不关心，成绩日渐低落就成了常有发生的事。²⁹¹⁾先迁韩华原本就因为韩华社会经济落后，当各地华人学生聚在一起，看到其他地区华人的富有阔绰，羡慕不已，从而产生自卑心理。台湾政府对华人学生的一系列“放宽”政策，使很多先迁韩华把升学机会看成发财良机，利用往返韩台两地机会贩卖商品货物赚取金钱。当他们发现做这种生意比辛苦开餐馆卖乌冬炸酱面的父母赚钱容易得多的时候，就越发不可收拾，最终导致把更多精力放在生意，而非学业上。更遗憾的是由于金钱得来容易，赚取暴利之后更不懂得好好珍惜，整日把金钱用在花天酒地，聚赌炫富上。

直到十年后的1970年代，这种现象也毫无改变。再迁台湾韩华郝明义在他的散文集《故事》中回忆第一次到台湾读大学时的情景，简直可以说是锺辰的翻版。郝明义1974年刚来台湾的时候，也和锺辰一样，特别容易和同时韩国来的同学紧密聚合在一起。他后来觉得当时

289) 参考官雯，〈漫谈侨中招生考试〉，《韩华春秋》第3期，首尔：韩华春秋编辑委员会，1964.8，p. 3。

290) 张岚，〈自有一番滋味在心头〉，《韩华春秋》第6期，首尔：韩华春秋编辑委员会，1964.11，pp. 30-31。

291) 参考官雯，〈漫谈侨中招生考试〉，《韩华春秋》第3期，首尔：韩华春秋编辑委员会，1964.8，p. 3。

聚合的热情固然温暖了大家，但是也烧伤了大家。经常豁在一起饮酒作乐的结果，不但让大家的荷包同归于尽，更严重的是课业也一起沉沦。大二的时候，他甚至收到一张满江红的成绩单，差点被学校扫地出门，这一点也和十年前的锺辰惊人的相似。大四下学期，郝明义更奇怪地进入了一个荒唐的世界，眼看自己一步步下陷，就像沉入一个沼泽，完全无能为力。所有的理想、期许都云消烟散，前无去处，后无退路，只剩挣扎，但是越多的挣扎，又造成更深的陷落。走投无路的郝明义和一位朋友借了一笔钱，打算回韩国跑一趟单帮来赚钱还债，结果血本无归，债上加债。长达一个月的时间，郝明义流浪在首尔，辗转借住于朋友家里，还有一间廉价的旅舍，这些经历似乎又是十年前锺辰的重演。小说可以有虚构的成分，但是郝明义的《故事》却是对作者真实经历的回顾，这也再次证明到台湾升学的先迁韩华的经历甚至说遭遇具有普遍性。

1960年代往返台韩之间的韩国侨生曾发生过很严重的携带海关禁止物品事件，当时被称为“乌鱼事件”。乌鱼是韩国的名物，到了台湾就扶摇直上，身价倍增，先迁韩华学生视乌鱼为“最有希望的东西”，成批携带到台湾变卖赚回“大把钞票”。他们之所以“携带”乌鱼至台变卖，是因为外汇不通，不得不将韩国土产变卖冲作一切生活费用。²⁹²⁾起初两地海关也知内情，出于同情视而不见，但由于问题越来越严重，“乌鱼”就成了两地税关加强“随身携带物品”管理的导火线，锺辰最后的损失一光也是因此而起。很多先迁韩华对此事件的造成人也是受害者，抱有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态度。哀的是在以中国人身份出生在韩国这一问题上，他们没有任何选择的权利，得不到韩国或台湾任何一方真正意义上的关心和保护；怒的是基隆、台北、釜山等地的旅馆皆成了先迁韩华学生商客聚赌温柔的好去处；他们哀叹望子成龙的可怜家长，不惜任何的牺牲与操劳，东借西拉凑到笔可观的钱数，长途跋涉将子女送到台湾接受难能可贵的教育，结果却是送子女走上邪路；他们斥责那些走上歧途的子女从那由厚变薄再变无的钞票上，一点也嗅不到炸酱面和父兄的血汗味？斥责他们为了几个铜臭，可以廉价出售国家民族的尊严，三万多华人传统的美德好评也无辜的烙染上斑斑污点。²⁹³⁾

移居韩国的先迁韩华不断接受来自韩国与台湾两方面的思想与文化熏陶，不管是在法律上还是在心理上，都丧失了可以回去的故乡，中国大陆仅成为他们的祖籍所在地。而法定的国籍所在地台湾，对待先迁韩华又是一副漠视不闻的态度，并非真正的关心。先迁韩华确实在痛斥韩华学生的恶行，廉价出卖了国家民族的尊严，但是恐怕就连他们自己也越来越不清楚自己所要维系尊严的那个国家民族到底是哪里？也许他们所要维系的，就是那个沾染上浓厚炸酱面味道的先迁韩华的尊严，担心的也是那还要继续生活在韩国的，三万先迁韩华的传统美德与好评，被烙染上污点。

292) 参考鲁宾，〈也谈乌鱼小事〉，《韩华春秋》第2期，首尔：韩华春秋编辑委员会，1964.7，p. 12。

293) 参考禹汤，〈都是鱿鱼惹的祸〉，《韩华春秋》第8期，首尔：韩华春秋编辑委员会，1965.1，pp. 15-16。

总之，现实无情粉碎了小说主人公锺辰父亲抱有的希望，即，希望锺辰有机会在台湾找到落脚机会的幻想。

其次，作者揭示了固守先迁韩华社会这座“孤岛”的局限性。

小说通过主人公锺辰的事迹，体现出先迁韩华即使在台湾高等学府学成后返回移居地韩国，也仍然难于在先迁韩华社会找到一席之地。锺辰的家在釜山，刚从台湾回来不久的锺辰，本以为来到韩国经济最发达，信息最迅速的首都首尔，凭借自己的学历可以在韩华社会找到一份满意的工作。可是在见到中学时的好友宋强之后，他的希望被无情地泼了冷水。宋强没有去台湾学习，也就更加了解先迁韩华社会的就业现实，无数次的碰壁，使他早已放弃了在韩华社会求职的期待。作者通过宋强与锺辰的对话，表达了同样作为先迁韩华身份的自己，看待先迁韩华社会的矛盾心理：一方面不愿放弃幻想韩华社会还会出现一位开明的老板，肯拿出人道精神来培养下一代。另一方面在看破金钱至上的韩华社会现实后，又不得不承认自己的幻想终将走向破灭的命运。因为摆在眼前的现实是：有了知识，仍然要到具有经济实力的人那里去做事，没有钱，就没有发表议论的权利。在这个社会里，没有人愿意去听一个没钱人的“空话”。

现实中，像锺辰这样在台湾的大学毕业，在韩华社会找不到工作的先迁韩华还有很多。他们本打算学成后步入社会，为韩华社会服务，但现实是社会却没有自己的立足之地。他们通过文学的形式，来发泄自己的苦恼：“像目前僧多粥少，如此腐朽保守的韩华社会，一片不景气，又有何理由不令人感叹，不令人颓丧失望呢？”²⁹⁴这里所说的“僧多粥少”是指从当时韩华社会的现实情况来看，成为韩华学校的教员，几乎是在台湾的毕业后返回韩国的先迁韩华唯一的出路。但是韩华学校的数量毕竟有限，所需师资也很有限，再加上有些韩华学校宁愿高薪聘请台湾教师，因此学成返回韩国无处就业的先迁韩华不禁哀叹：“这是一件多么可悲的事！我们的韩华社会虽不是一个国家，但也是一个个的团体，我们有权保障我们自己子弟的职业。我们自祖国毕业的韩华侨生有不少师范大学毕业的，而为何侨校竭力不聘用侨生教员？又如仁川侨中有不少的教员多是聘自台湾的。”²⁹⁵

更可怕的是，先迁韩华青年的苦恼，已经传染到了下一代孩子身上。为了生存锺辰不得不在一个肮脏的大门，杂乱的院落，夹杂着黑暗和潮湿，夹杂着大人与孩子杂声的先迁韩华居住区里，找到一份家教为生。出于厌倦，锺辰每天像木乃伊一般延续着这份工作。在工作中锺辰又亲眼目睹了下一代韩华少年的愁苦心境：

“老师，我怎么这么不喜欢念书？”

294) 尉迟，〈毕业侨生心酸话〉，《韩华春秋》第13期，首尔：韩华春秋编辑委员会，1965.6，p. 17。

295) 禹汤，〈毕业失业知多少〉，《韩华春秋》第13期，首尔：韩华春秋编辑委员会，1965.6，p. 20。

“不喜欢念书是少年人的通病，那么你喜欢干什么？”
“我喜欢看电影。”
“你能看得懂韩国片子或者美国片子吗？”
“我懂得它们的大意。”
“那你为什么不多学点英语或者韩语，这样看电影懂的不是更多吗？”
“学英文要背生字、成语、课文，我的脑子不行啊，背了就忘。”
“那你还是没有决心。”
“我不能有决心，我每天觉得真发愁，可是我也不知道愁的是什么。”²⁹⁶⁾

不喜欢念书是少年人的通病，这也许可以理解。但是一个生活在韩国的华人孩子，很可能他已经是这个家族中生活在韩国的第三代甚至更久，但却不精通韩语，看韩国电影也只能懂得大意。从这一点可以看出至少到此时期，即小说登载的1960年代，大部分先迁韩华仍然没有意识到学好韩语的必要性。也就是说，他们虽然出生在韩国，生长在韩国，但是他们却并没有融入韩国社会之中。他们未曾离开，也没有想过离开先迁韩华这个社会圈，不管这个圈子里的人口增减与否，也不管这个圈子里的职业饱和与否，他们都没有想过离开，而是终日在其中挣扎，哪怕是在痛苦中挣扎。

同样作为韩华青年的作者，其实很了解这个上中学的孩子空虚的心情，但是他又无法为眼前这个小小年纪，就整天发愁的孩子做任何有帮助的解答。

再次，作者揭示了先迁韩华“再迁之梦”的不现实性。

每当想到那茫茫一片的前途，锤辰都会失神街头，他不知道自己要往哪里去，也不知道从哪里能得到答案。日复一日，精神上是无休止的疲倦，愈来愈想逃避，但却不知道想要逃避的究竟是什么。作者借锤辰之口来抱怨这个韩华社会简直扼杀了年轻人任何有希望的出路。感慨、气愤，一个话题再次的重覆也得不出任何结论，因为他们觉得没有力量改变自己的命运，一种莫名的空虚渗进思潮里，像着了魔似的瘫痪在椅子中，恐怖，这就是先迁韩华年轻人的悲哀。²⁹⁷⁾锤辰每天唯一可以感到幸福的时光，就是在美国公报院图书馆的每个书架前，拼着每一本书名，他并不一定就和它熟悉，他只是觉得这里的气氛令他舒畅。

白天我不再有所失落，虽然每天正午我辘辘的饥肠给我的痛苦令我心酸，我似乎能够容忍的太多了，每天像煞有介事似的，我夹着一本破旧的英汉字典，走进图书馆，我翻阅很多的书、报、杂志，而我并不急欲学什么英文；我只看图片，因为图片可以满足我梦幻里的一切，跳动在纸面上，令我陶醉，我常常流连忘返。²⁹⁸⁾

296) 张岚，〈自有一番滋味在心头〉，《韩华春秋》第4期，首尔：韩华春秋编辑委员会，1964.9，p. 31。

297) 同上，p. 29。

作者似乎在通过叙事者锤辰之口，叙说着先迁韩华的美国移民梦。先迁韩华自1950年代开始，为了寻找更好的生活开始再移居台湾、日本、美国等地。但是这些华人大部分都具有充分的移民资金，对于那些家境穷困的先迁韩华来说，只能坚守韩国艰苦奋斗，美国是他们向往却实现不了的再迁之梦。就像主人公锤辰一样在接连受到打击，找不到生活希望之后，隐约觉得美国也许是他可以找到出路的地方，但是他没有任何能力可以去往那个地方，只能坐在韩国的美国公报院图书馆里，看着美国的图片，望梅止渴，陶醉其中，不能自拔。

最后，作者对先迁韩华在地化重要性的暗示。

先迁韩华已经“丧失”了可以回去的故乡，同时被法定的国籍所在地台湾委婉地“拒之门外”，再迁之梦也似乎只属于那些具有充分经济实力的先迁韩华。即使先迁韩华赴台湾接受高等教育，但是这些努力也并未给他们的前途和出路带来任何希望。摆在眼前的现实是，那些接受了高等教育的先迁韩华并非都有机会留在台湾，其中的一大部分仍然要回到先迁韩华社会，找不到一处立足之地。残酷的社会现实，使一些先迁韩华青年反思问题的症结究竟所在何处？他们认为先迁韩华社会的落后，是因为上一代韩华的僵化顽固、固步自封；同时他们也在反思，对于以外国人身份生活在韩国的移居者来说，什么才是最重要的。

我们不得不去关注作者在小说中塑造的另外两个先迁韩华青年人物形象：一个是与锤辰有着模糊不清的恋爱关系的赵萍萍，另一个是赵萍萍的表哥。

由于家境相差悬殊，再加上赵萍萍读的是韩国的高中，可以占此便宜被保送上台大，这些都使锤辰觉得赵萍萍高不可攀，成为他想爱却不敢爱的对象。赵萍萍也明显对锤辰有好感，但是她最终还是选择与“更有能力”的表哥定了婚。赵萍萍的表哥在小说最后的部分才登场，一登场就上演了一出“英雄救美”，为被韩国海关扣留的赵萍萍和锤辰解了围，最终成为赵萍萍的未婚夫。作者对赵萍萍表哥的描写仅此而已，但是锤辰和赵萍萍解决不了的问题，赵萍萍的表哥却轻而易举的处理好，而他之所以能够做到，是因为跟韩国海关的工作人员很熟。作者在此处的情节设置，也许是出于真实的生活经验，但也许又是有意安排，通过与韩国人的人际关系，办成了锤辰想都不敢想的事情，似乎就是作者想留给读者的暗示。

始终留在韩国的先迁韩华青年宋强和黄秀民没有找到出路，去台湾留学的锤辰也一样找不到出路。先迁韩华社会的就业岗位已趋饱和，虽然韩华青年的学历逐渐提高，但是他们却不能学以致用，他们的能力没有可以发挥的余地。他们埋怨自己生活的社会，可是埋怨并不能解决任何问题。以中国人的身份生活在韩国社会，又要遵守韩华社会的秩序，这本身似乎就是一种错置。这种错置使先迁韩华青年始终处在彷徨无措的状态，再迁他地，对于家境贫寒的先迁韩华来说也是不能幻想之路。作者似乎在暗示：思想进步的先迁韩华青年困在墨守成规，无求发展的先迁韩华社会始终不会有出路，到了应该反省的时候了。反省上一代先迁

298) 张岚, <自有一番滋味在心头>,《韩华春秋》第5期, 首尔: 韩华春秋编辑委员会, 1964.10, p. 29.

韩华对“学而从夷”的反对，将“学而从夷”诮之谓“正气为之不伸，邪气因而弥炽”，将“学而从夷”谤之谓“忘本”、“奴才”、“不爱国”²⁹⁹⁾的思想是否正确，是否合时宜？也许可以改变先迁韩华社会现状，使先迁韩华青年谋求出路的突破口，就是在地化。多为融入韩国社会而努力，多与韩国人交流和沟通才是先迁韩华的真正出路。

后迁韩华李文的长篇小说《蒲公英》讲述的是中国留学生到韩国留学的故事，先迁韩华张岚的短篇小说《自有一番滋味在心头》讲述的是先迁韩华到台湾留学的故事。这两部小说在创作时间上相差几十年，在创作背景上也并非发生在相同的地点，人物身份也互不相同，因此很难将两部小说加以比较。但即使如此，不管是从作者的叙述风格还是故事情节的展开上，较之先迁韩华，后迁韩华都体现出一种更加积极乐观的精神。如果说在地化是先迁韩华在歧视、排斥、困苦、封闭的痛苦生活的挣扎中获得的领悟，那么后迁韩华则是从移居韩国开始，就关注与韩国人的交流，为追求更快速更彻底地的实现在地化而不懈努力。

后迁韩华具有往返韩中两地的双重居住特征，不管是以何种形式移居韩国，他们即使处在向后迁韩华转型前的阶段，也已经做好了积极融入韩国社会的决心。从落地那一刻起，就开始为实现在地化而努力。小说《蒲公英》中的另一个典型人物关智渊，就曾经以过来人，有经验者的姿态，忠告过初来乍到的文麒：“虽然我们是外国人，和从小生长在这里的韩国人未必有那么多的共同语言，但还是要跟韩国人玩儿，哪怕硬着头皮，因为这里是韩国。无论在哪里，我们的一切行为，都是围绕着生存这个主旋律发生的。”³⁰⁰⁾

主人公文麒将留学前辈的忠告铭记在心，并且也是按照留学前辈的话去做的，尽量多与韩国人接触，尽量多与韩国人建立友好关系。文麒曾在一家水果店打工，老板对他很照顾，后来辞职不干，老板也时常叫他一起出来喝酒，同时还介绍在水果店打工的另一些朋友给他认识，这些打工的朋友，也都是附近的留学生，这样便形成了一张关系网。当水果店老板干脆利落地向文麒借一百万韩币，说一周后归还的时候，文麒毫不犹豫，爽快迅速地打了两百万给水果店老板。不过事情的结局并不像想象的那么圆满，由于老板过期未还，让文麒意外地遇到了一场“金融危机”，幸亏有另外一名中国留学生郑卫鸿的帮忙，才让他勉强度过难关。

虽然这次不大不小的风波，让文麒懂得了患难见真情的真理，让他懂得了什么是可以借钱的生死弟兄关系，什么是像自己和那个老板这样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关系”；虽然在文麒积极地在地化实践过程中，这一次当地人的表现让他失望，但是文麒还是会以一种跨国移居者的独特方式来安慰自己：反观自照，自己的根也的确不在这里，可以跑得了和尚，跑得了庙。所以即使当自己选择主动相信当地人的时候，当地人也还是难以完全将自己作为一个长期的关系来经营。自己是一颗飘荡在太极旗下的，蒲公英的种子，看似自由自在，其实却也

299) 心芸, <苦闷·彷徨·迷茫—“学士”何去何从?>,《韩华春秋》第6期,首尔:韩华春秋编辑委员会,1964.11, p. 14.

300) 李文,《蒲公英:文麒留韩记》,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2017.1, p. 16.

身不由己。³⁰¹⁾文麒将这次事件，只看作是作为跨国移居者的自己，在地化实践中的一个过程，一次无法避免的经历。

主人公文麒很明确地认识到，语言是决定他是否可以与韩国人交流，融入韩国社会的关键因素。所以即使已经在中国国内大学毕业的他，仍然像高三学生一般，以对得住自己家人的方式拼命努力学习韩语，他希望有朝一日自己成为韩语狂人，然后名正言顺地坐进韩国某知名会社的职员办公室，成为大韩民国万千无名社员的一分子。³⁰²⁾

人民币的一涨一落直接影响一个生活在韩国的，中国留学生手中外币票子的厚度和硬度。人民币不断升值的同时，韩元又开始贬值，这一升一贬，让人民币兑换韩币的汇率创下一个个惊人的新高，这对于一个在韩中国留学生来说，本来是件值得高兴的事情。但是此时的文麒，却因为身处韩国，受了韩国人的教育，将来还有可能正式融入韩国的经济生活，所以也随着韩国经济的不景气，而多少产生了危机意识。他真心希望韩国可以挺过这次的汇率动荡，因为自己在这片土地上正播撒着越来越多的青春年华，而也正是韩国，成就了现在的这么一个会讲韩语，独立生活，生存能力显着加强的自己，这里的水土风物，人情世故，像一丝丝细密的根茎，在自己的心里越扎越深。³⁰³⁾

当孔庆东教授³⁰⁴⁾批判韩国的言论受到网络批判，被反了的时候，文麒也会喊一声：“反得好。”因为他觉得韩国也有很多英雄，他们在很多方面做得非常好。韩国年轻人内心纯净，笑容里没有杂质，韩国的阳光真的灿烂。当文麒利用假期返回故乡的时候，他也会想念韩国，因为那也是在想念身处韩国的，年轻的，喜欢追逐梦想的自己。他很清楚不是想念就要怎么样，想念就是想念。在追梦的过程中取得了一些成绩，即，当他的小说选题通过，和中国的出版社签了合同时，他仍然会希望凭借拥有一部著作的加分，可以在韩国谋到一个教授中国文化的职位，留在韩国。³⁰⁵⁾

2. 韩华华文其他文类作品中所体现的在地化

除了韩华华文小说作者以外，其他一些具有先进思想的韩华，同样意识到在地化的重要性，并通过华文文学的形式表现出来。

首先，先迁韩华华文文学作品中体现出，至少从1960年代先迁韩华就已经认识到作为移居者应改多与韩国社会沟通与交流的重要性。

1964年6月14日一位笔名为“N”的韩国人作者，在《全南每日新闻》上登载了一篇题为

301) 以上叙述参考李文，《蒲公英：文麒留韩记》，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2017.1，pp. 246-247。

302) 李文，《蒲公英：文麒留韩记》，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2017.1，p. 163。

303) 以上叙述参考李文，《蒲公英：文麒留韩记》，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2017.1，pp. 181-182。

304) 北京大学的孔庆东教授在韩国结束一年的访问学者生活回国后曾经发表过批判韩国的言论。

305) 以上叙述参考李文，《蒲公英：文麒留韩记》，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2017.1，p. 249。

《描写光州》的文章，主要是对先迁韩华的一些看法和评价，内容有褒有贬。这位韩国作者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国人曾以战胜国自傲，可是今天他们的民族，正如没有祖国的“犹太”民族一样，受到各国的贱视、虐待。他们在第二故乡——韩国土地上，伸开一大拇指，就是“钱”，直至进入地狱为止，不肯吃喝，不喜端装，“钱”字几乎使眼球都变成血色了，他们不乐意结交街邻与宗亲，而韩国人财政富裕的话，可以做些消遣余暇节目，他们只知勤俭节约，衣服穿脏了，不知烫洗，天生的外表的模样，就是肯吃苦耐劳，没有不劳而获的习性。”³⁰⁶⁾

一位先迁韩华在看到这篇文章后，虽然感觉内容上有很多对韩华误解的地方，但是并没有急于为自己辩护，而是悉心将此篇韩文文章译成汉语，登载在中文杂志上，以醒华人。希望先迁韩华因此文自觉深思，为先迁韩华社会的前途和发展寻找更好的途径。这位先迁韩华在翻译文章的同时，也自我反省道：“如果韩华社会本身组织能够健全，对外多做些文化宣传，舍弃寥寥的钱财，举办些公益福利事业，创办华侨俱乐部或康乐中心、座谈会，旅行联谊等等有益增进友邦人士相互了解的活动，未曾不可以减少友邦朋友对韩华的误解。”³⁰⁷⁾

由此可见，至少从1960年代开始，先迁韩华已经意识到在地化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这种对在地化重要性的认识，也使他们开始反省有关在韩国发行的韩华报刊未来改进方案的问题。先迁韩华在评论中提出：“目前所发行的华文报纸正刊充满了反共抗俄以及国内[台湾]政经新闻，并不能引起读者的兴趣。既然韩华居于韩国，食于韩国，韩国的政治经济举措，无不直接或间接与韩华有切身的关系。华文报刊作为与韩国社会交流与沟通的重要桥梁，报导台湾的米如何丰收，则不如报导韩国米价使读者来的关心。美议员傅尔卜莱德发表的谬论，则不如韩国政府发表的政策来的重要。”³⁰⁸⁾

同时，还有先迁韩华在韩华杂志上发表评论说：“中韩两国在地缘、文化、历史上有着浓烈的相关性，风俗大同，习性相近，既无种族上的隔阂，又少肤色上歧视。”³⁰⁹⁾“大韩民国是中国最亲善的友邦，风土人情最为相近，远眺黄海可解乡思，近体人情如同胞泽相处，虽在物质上或有所失缺，但在精神上却获得了补偿。”³¹⁰⁾这些言论既是在为先迁韩华继续移居韩国，无需再迁他地的合理化正当化，同时也是对先迁韩华在地化的可行性与重要性的强调与呼吁。

直到1980年代，这种呼吁仍未停止。此时的先迁韩华，对多与韩国人交流与接触的重要性的强调，在言语上更加直白。文章中说：“有的人说：‘韩国是我的第一故乡’，也有的说：‘是第二故乡’。旅居韩国四、五十年(或更久)，甚至出生在韩国的我们，这两句话都讲得通。

306) 原文题目是〈描写光州〉，一位笔名为金玉的先迁韩国华人，以〈中国人的过去和今天〉为题，翻译登载在《韩华春秋》第2期，首尔：韩华春秋编辑委员会，1964.7，p. 25，此处引用的是金玉所译内容。

307) 金玉，〈中国人的过去和今天〉，《韩华春秋》第2期，首尔：韩华春秋编辑委员会，1964.7，p. 25。

308) 参考管见生，〈韩华新闻刊物的管见〉，《韩华春秋》第1期，首尔：韩华春秋编辑委员会，1964.6，p. 2。

309) 心芸，〈苦闷·彷徨·迷茫——“学士”何去何从？〉，《韩华春秋》第6期，首尔：韩华春秋编辑委员会，1964.11，p. 14。

310) 侨民，〈韩国华侨今昔〉，《韩中文化》，首尔：韩中文化协会，1974.6，pp. 19-20。

我有几位学长，韩国大学毕业，经营中华餐馆，事业发达，究其原因，主要是靠韩国朋友(有法官、检察官及税吏等)。忠劝各位，多交些韩国朋友，打进韩国社会。”³¹¹⁾

其次，先迁韩华华文文学作品中体现出，至少从1960年代先迁韩华就已经认识到作为移居者谙习韩语的重要性。

从1950年代开始兴起赴台湾升学热潮，甚至后来达到巅峰。即使如此，仍然有少数深谋远虑的先迁韩华，在考虑到未来出路问题后，把子女送进韩国的大学。这些先迁韩华发表评论表示：他们清楚将来要想在异国求生存谋发展，必须要精通当地的语言文字，言语上无隔阂，在谋生的道路上才能驾轻就熟少遇困难。而事实也证明，当年被暗讥讪笑为“学而从夷”的“奴才”、“不爱国”者，现在事业上平步青云、扶摇直上，周旋于权贵之间，热衷谋福于韩华社会。³¹²⁾

从先迁韩华创作于1960年代的华文评论上来看，此时期的先迁韩华已经认识到韩华社会存在的现实问题，他们在文章中批判：大部分想在韩国从事调理师[厨师]行业的华人，因为不识韩文，在参加韩国调理师韩文笔试考试时，十有八九考不及格。以往只要有精湛的手艺，就可以进入大厨行列。但现在不管手艺如何好，如果不能通过韩国当局的调理师考试，手艺也将无用武之地。想在韩国从事汉医业工作的华人也同样如此，必须通过韩国社会保健部的汉医师国家考试。很多先迁韩华不能考取的原因，并不是专业素质低，而是因为不谙韩文之故。因此，先迁韩华在文章中呼吁韩华学校应该提倡韩文教育，先迁韩华应该提高韩国法律认识，多与居住国合作，把居住国看成自己的国家来爱护，才是移居海外华人的最上之策。否则讳疾忌医，固步自封，一再拖延搪塞，终有一天这些头痛问题一发不可收拾。³¹³⁾

先迁韩华针对韩华学校应加强韩语教育问题的呼吁，从1960年代一直延续到1990年代，强调的内容更加具体也更加广泛。比如，先迁韩华记者写于1990年代的一篇评论中，就详细介绍了当时汉城华侨中学校长孙树义就未来韩华学校教育革新问题的看法，文章指出：

韩国华侨教育，不同于国内及国外其它地区，教科书的采用，不能全部沿袭使用国内课本。近年来客观环境的演变，本校自去年伊始，高中毕业生升韩国大学的人数已超过回国升学的人数。我们的教育内容，为了适应应运而生的客观环境，部分应有增补及改编，如史地、公民，应加编韩国史地及法律，至于外侨有关的法律也应使学生了解，我们华侨下一代，才能适存于韩国。³¹⁴⁾

311) 侨谊，〈侨社、侨民素描〉，《韩中文化》，首尔：韩中文化协会，1985.7，p. 28。

312) 心芸，〈苦闷·彷徨·迷茫——“学士”何去何从？〉，《韩华春秋》第6期，首尔：韩华春秋编辑委员会，1964.11，p. 14。

313) 参考孙维，〈我们当前的急务〉，《韩华春秋》第6期，首尔：韩华春秋编辑委员会，1964.11，pp. 3-4。

314) 记者，〈尊师重道 我们做了多少？〉，《韩华》，首尔：韩中文化协会，1990.8，p. 8。

从先迁韩华的这篇评论中可以看出，到了1990年代，先迁韩华的在地化意识已经非常明确，在地化欲望也非常强烈。他们清醒地认识到，完全沿袭台湾教科书已经不能适应先迁韩华在韩生活的现况，如果想使下一代先迁韩华能够更好的适存于韩国社会，也就是说，如果想使下一代先迁韩华实现更加彻底的在地化，韩华教育就必须应时而变。

最后，先迁韩华华文文学作品中还体现出，先迁韩华对于自身应该被韩国社会接受的申辩。

先迁韩华的在地化，并没有只停留在意识和思想上，他们同时在申辩先迁韩华应该被韩国社会接受的理由。根据先迁韩华华文文学作品的内容，可以将这些理由归纳为以下几点：第一，先迁韩华中的很多人，是1938年从中国大陆逃亡而来，有些类似于抗战时流亡中国的韩国志士，虽然先迁韩华来韩后，为了糊口各有生业，但大部分人的移居目的并不是经商，而是一种政治避难。第二，很大一部分先迁韩华在韩国已经居住了三代以上，第二、三代华人在此地根生土长，可以说已成韩国的一部分，与那些来去自由的外国商人不能同日而语。第三，先迁韩华除教育税外，与韩国人一样缴纳一切高额的税金，并在韩国需要时，做财力的自动捐献。第四，虽然不服兵役，但是由于先迁韩华已把移居地韩国看成自己的国家，韩国战争时期曾有很多先迁韩华青年，与韩国人一起参加过韩国战争。³¹⁵⁾

先迁韩华所申诉的上述几点理由，使笔者联想到北美华人通过文学的形式对美国华人应该被美国社会所接受问题的呼吁，其中呼声最响的应属美国华裔作家汤亭亭。比如，汤亭亭在她的《中国佬》中就将故事、记忆、传说、想象与家族史杂揉在一起，通过描写美国华裔父辈们在美国的经历，如：与美国人共同参与第二次世界战争，建造的铁路，将美国的南方与北方、东部与西部连接起来，从而取得了“建设美国的先辈”这一合法地位，也因此应该获得称为美国人的权力。³¹⁶⁾

我们似乎可以这样理解先迁韩华所要强调的内容：第一，1938年以后移居韩国的先迁韩华，已经不同于早期那些以经商为目的来韩的清国商人，在出于政治流亡的目的上，更类似于那些逃亡中国的韩国人士。希望韩国政府在考虑如何对待这些以政治流亡目的移居韩国的先迁韩华时，将先迁韩华与那些流亡到中国的在外韩人放在同等的位置上。还可以进一步理解为，在全球大移动的环境下，先迁韩华作为跨国移居者群体的一个组成部分，应该被放在整个世界跨国移居者群体中去看待。另外，先迁韩华的身份认同具有混种性，变动性，不能简单地用“中国人”、“中国性”去框定先迁韩华的身份，也就是说，在研究跨国移居者的身份认同问题上，有必要将政治认同、文化认同、身份认同区分开来。

第二，先迁韩华强调自己在纳税、捐献等义务上与韩国人并无差别，实际上就是在强调

315) 笔者在参考孙维，〈我们当前的急务〉，《韩华春秋》第6期，首尔：韩华春秋编辑委员会，1964.11，p. 2的基础上作出的整理。

316) 参考刘增美，《族裔性与文学性之间——美国华裔文学批评研究》，南京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1，p. 30。

先迁韩华已经将自己看作韩国的一部分，并且将韩国看作自己居住和赖以生存的国家。继而呼吁韩国人不要过于关注先迁韩华作为跨国移居者的移动性，还应该关注作为跨国移居者所具有的在地性。先迁韩华与韩国人一起参与了韩国战争，他们是韩国历史的参与者，也是共同经历者，从某种意义上说，先迁韩华已经成为韩国历史的一部分。

先迁韩华正是通过上述理由，来诉求韩国政府应该区别对待先迁韩华与那些自由来去的外国商人游客，真正接受和承认先迁韩华是韩国社会的一个组成部分，而非“他者”。先迁韩华将此诉求，通过各种不同的文学体裁，委婉地表现出来。

先迁韩华刘金镛曾以中华民国旅韩华人的身份，参加过大韩民国独立复国运动，他的英勇事迹被载入大韩民国国史册，先迁韩华都为此精神振奋，视其为全体先迁韩华的光荣，并通过华文文学的形式，记录了这段先迁韩华与韩国人共同书写的韩国历史。另一位先迁韩华，以一个读书人起码的责任，将在他脑海中蕴藏了十三年故事跃然纸上，将韩华搜索队副队长姜惠霖一九五一年英勇阵亡的事迹改编成小说《外人部队》，不让这个英勇的故事，随着烈士忠骨永埋地下，而向更多人传扬。在编撰《旅韩六十年见闻录——韩国华侨史话》时，先迁韩华秦裕光也不忘把先迁韩华作为韩国近百年社会变迁的见证人，将先迁韩华所历尽的韩国近代重要变革，历史事件记录下来。即使先迁韩华再迁美国，也仍然不忘在韩国生活期间的点滴回忆，创作华文散文《忆韩战六十周年》，《忆韩战“代客”岁月》³¹⁷⁾，来回忆在韩国亲眼所见，亲身经历的一场惊心动魄的战火。

先迁韩华熟悉韩国历史，每每游览韩国各地名胜，都因为熟知典故而更为各地美景迷醉，不禁赋诗《落花岩》、《于密阳》、《游雪岳山》、《游赤裳山安国寺》、《观公州百济文化祭有感》来抒发对韩国美景的痴迷，对韩国大好河山的热爱之情。³¹⁸⁾长期生活在韩国的先迁韩华，就连不十分为人熟悉的忠南礼山“香泉寺”，也会产生偏爱之心，因为那是陪伴作者长大之处，是曾经为童年时期的作者消解心中烦忧的最佳游处。³¹⁹⁾

综上所述，先迁韩华在长期受到韩国社会的排斥之后，出于一种反抗情绪，他们也将先迁韩华与非先迁韩华相区分，虚拟地建构了一个属于先迁韩华自己的，特殊的生存空间，这一生活空间有些类似于霍米巴巴所提出的“第三空间”概念。这一特殊生存空间内部的先迁韩华，在承认自己是以中国人的身份生存在韩国社会的同时，又将自己与中国大陆的中国人相区分，与短暂往来韩国的商人游客相区分。并且，他们又以生活在韩国社会的中国人身份

317) 高文俊，〈忆“韩战六十周年”——韩华、韩华满天下〉，《美国齐鲁韩华杂志》第32期，Laguan Woods, California：美国齐鲁联谊会，2012.2，p. 32；卢锦，〈忆韩战“代客”岁月〉，《美国齐鲁韩华杂志》第32期，Laguan Woods, California：美国齐鲁联谊会，2012.2，p. 21。在卢锦的记忆中，代客(Duck译音)韩战翻译官生涯给他留下印象最深刻，他想在有生之年，记录下那段光辉岁月。

318) 这些诗是韩国华人作者张世镛，字禹声所作，并于1974-1978年登载在华人杂志《韩中文化》上。

319) 陈传治，〈香泉寺〉，《韩中文化》，首尔：韩中文化协会，1975.1，p. 29。

进行在地化实践，使自己成为韩国社会的一部分，同时希望韩国社会承认作为韩国社会一部分的先迁韩华群体。

如果说先迁韩华以中国人身份移居到韩国社会本身是一种错置，那么他们对于为了更好的生存就应该融入韩国社会的反思，并在此反思的基础上，进行扎根韩国社会的在地化实践行为，则是对此错置的解构。

就像后迁韩华作者李文借小说主人公文麒之口所说：“与其说是生活改变了我，让我的内心不再单纯，不再英俊，看不到了往日青春年代的原本面貌，不如说是在必然的基础上改变了这些的是自己。”³²⁰⁾作为跨国移居者的后迁韩华，在不放弃将故乡作为自己的生活基地的基础上，也从未放弃过移居地在地化实践，并通过这种长期的双重居住形式，形成了后迁韩华特殊的混种性身份认同。

320) 李文,《蒲公英:文麒留韩记》,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2017.1, p. 63.

第 5 章 结 论：韩国华人对身份认同的发声

笔者在整理韩国国内有关韩国华人研究成果的过程中发现，韩国学界不仅在针对韩国华人的称谓上，甚至在针对整个世界范围内华人的称谓上，都仍然习惯使用“华侨”，而非“华人”。实际上，全世界范围内的华人，已经形成一个庞大的跨国移居者群体。在这种情况下，韩国学界有必要突破既存概念的框囿，重新思考和认识华人，尤其是作为其中一个组成部分的韩国华人的问题。而在此之前，作为跨国移居者群体一部分的华人，以及华人群体一个组成部分的韩国华人的称谓，就成为首要明确的问题。

首先，从“华人”与“华侨”这两个表述本身来看，都不是从一开始就具有指代居住海外中国人(海外汉族)的意义，而从具有这一意义的时间上来看，不仅在出现时间上“华侨”要晚于“华人”，而且在使用时间上“华侨”也要短于“华人”，甚至自1955年的万隆会议之后，已经出现“华人”取代“华侨”，重新回复“华人”时代的景象。其次，从研究学者对“华人”与“华侨”这两个表述的看法上来看，很多学者认为“华侨”从被赋予指代海外中国国民意义开始，就带有强烈的政治色彩，这一称谓本身就存在着中国偏向的政治属性。“华侨”这一表述象征着中国政府开始关注海外居住华人在政治、经济方面的利用价值，是在利用他们在异地遭受种族歧视与其他形式的歧视，让海外华侨们能永远效忠中国。

其次，在“华人”与“华侨”这两个表述的选择上，我们更应该从如何看待中国，如何看待中国人的问题上去思考。中国已经不是一个一统的概念，所谓想象的中国共同体也不是一统的共同体，我们有必要从文化共同体的角度，而非一个政治实体来思考。选择使用“华人”这一表述，来指代长期生活在中国以外地区的汉族以及被汉族同化，或在文化上与汉族文化具有一体性的人，也是站在华人的立场，强调他们虽然与中国或汉族具有一定的关联性，但是从根本上说几乎或完全不具有回到传统的汉族共同体的可能性。³²¹⁾

本文所论述的韩国华人(韩华)，是指长期生活在韩国地区的汉族，以及被汉族同化或在文化上具有一体性的人。韩国华人使用华文创作的文学作品就是韩国华人华文文学(韩华华文文学)。再鉴于1992年以前移居韩国的华人，与1992年以后移居韩国的华人在性质上的不同，进一步以1992年为分界，将韩华划分为先迁韩华和后迁韩华。另外，将先迁韩华中由韩国再迁往其他国家的群体，称为再迁韩华。先迁韩华、再迁韩华、后迁韩华使用华文创作的文学分别称为先迁韩华华文文学、再迁韩华华文文学、后迁韩华华文文学，属于韩华华文文学的组成部分，均被视为本文的研究范畴。

321) 参考 김혜준, <화인화문문학(華人華文文學) 연구를 위한 시론>, 《중국어문논총》Vol.50, 서울: 중국어문연구회, 2011, pp. 80-83; 金惠俊·梁楠, <韩国华人华文文学初探>, 《中国语文论丛》Vol.55, 首尔: 中国语文研究会, 2011, p. 323.

由于目前研究条件上的限制，1945年以前的先迁韩华华文文学和1945年以后的先迁北韩华人华文文学未能得到研究³²²⁾ 因此，1945年以后的先迁南韩华人华文文学成为本文的主要研究对象。由于第四代之后的先迁韩华与老一辈韩华接触机会逐渐减少，接受韩国学校教育的机会越来越多，韩国化的倾向越加严重，与汉语相比更精通韩语。因此，从事华文文学创作的活跃程度较之第二、三代韩华出现回落。中国大陆出身的后迁韩华在大陆成长，文化程度普遍较高，从事华文创作的机会应该很大。但由于移居时间较短，尚未形成活跃的华文创作氛围。因此，第二、三代先迁韩华华文文学就成为韩华华文文学研究的重点。再迁韩华中大部分从事华文创作者，都是再移居之前的第二、三代先迁韩华。从某种意义上说，是第二、三代先迁韩华创作阵营的转移。他们与第二、三代先迁韩华有着共同的回忆，又有着不同的再移居经验。因此，再迁韩华文学与第二、三代先迁韩华文学出现了同中有异，异中有同的特征。

世界各地的华人华文文学，在具有息息相通性的同时，又各自展现出与众不同的面貌。这里可能有很多因素在起作用，比如，移居者的人数和性格，或者移居的时期及移居期间长短等。其中，起到关键性作用的因素应当是华人移居者群体自身与其移居社会的关系。³²³⁾ 韩华华文文学也同样在这些因素的作用下，呈现出不同于其他地区华人华文文学的独特性。

首先，早期韩华在移居地韩国所处的独特社会地位，使韩华与韩国社会形成了一种特殊的关系，因而韩华华文文学具有了不同于其他地区华人华文文学的独特特征。

进入19世纪，特别是从鸦片战争爆发后的1840年开始，出现了大量以华工身份移居海外的中国人(汉族)，目前遍布全世界的华人中，90%以上都是在19世纪中期鸦片战争爆发后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段时期内移居海外的华人或其后裔。³²⁴⁾ 中国人(汉族)大量移居新加坡，始于英国对新加坡的殖民开发。1832年，新加坡成为英国在东南亚殖民贸易基地后，由于对大量劳动力的需求，就出现了买卖被称为“猪仔”的契约华工现象，再加上1842年8月签订的《南京条约》中规定允许中国人自由出入境，因此苦力贸易更加正规化，再到1860年《北京条约》的签订，人身买卖甚至也被合法化，苦力贸易也随之发展到顶峰。1821-1931年约有6百万中国人作为契约华工运抵新加坡，或经新加坡转入南洋诸国从事苦力。1965年新加坡独立后，随着政局的逐渐稳定，新加坡华人逐渐放弃返回中国的想法，并将国籍改为新

322) 从移居时期与先迁韩华的生活情况来看，1945年以前的先迁韩华积极从事文学创作活动的可能性不是很大，但是也不能断言1945年以前的先迁韩华华文文学完全不存在。另外，从目前南北韩追求和平的局势上来看，未来对于先迁北韩华人华文文学的研究条件也可能会出现好转。关于这两项研究还有待今后的不断发掘与考察。

323) 김혜준, <화인화문문학(華人華文文學) 연구를 위한 시론>, 《중국어문논총》Vol.50, 서울: 중국어문연구회, 2011, p. 83.

324) 임채완·여병창·이단·최승현·이성란, <화교 디아스포라 이주рут와 기억의 역사>, 성남: 북코리아, 2013, p. 51.

加坡籍，在当地扎下根来，1945年以前移居新加坡的华人及其后裔大都已成为新加坡国民。

华人人口最多的印尼，也是由于19世纪初叶荷兰殖民当局放宽对华人的政策，再加上印尼种植园和锡矿业的发展，大量的契约华工涌入印尼，使得印尼华人人口大幅增长，仅至19世纪末期，华人人口就已超过50万人。中国人(汉族)大批移居马来亚，是自第二次鸦片战争战败后签订的《北京条约》允许外国商人招募苦力以及允许中国人自由出入境之后开始。当时西方殖民者从中国东南沿海招募或诱骗大批廉价劳工到马来亚等地从事挖锡种植等劳动。1805年英国殖民者还建立了招工移民机构，至1916年废除契约华工为止，由中国移居马来亚的华工总数高达550万人。

1848年1月，美国的加利福尼亚州发现金矿，出现淘金热潮，中国华工开始到达旧金山开采金矿。1862年，美国国会通过了兴建太平洋铁路法案，由于工程非常艰巨，劳力缺乏，“中央太平洋铁路公司”便于1865年开始试用华工3千名，1868年又雇用了1万2千名华工，至1880年全美华人已有10万人以上，主要是没有文化的杂单工，从事开矿山、修铁路、垦荒地、捕海鱼等职业。1858年初，加弗雷基河谷发现金矿，同年6月第一批华工300人从美国乘船抵达加拿大维多利亚港，赴金矿淘金。到19世纪60年代，仅在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淘金的华人就达3万多人。1880年，加拿大修建太平洋铁路，从中国先后招募2万多华工参加筑路工程。加拿大华工大部分也属于杂单工，至1891年以华工身份移居加拿大的华人就已超过9千人。³²⁵⁾

笔者之所以叙述这些早期移居东南亚、北美等其他地区华人的历史，是为了强调移居这些地区的早期华人，没有得到清国政府的任何支持，甚至在当时，清政府对于西方殖民者诱拐掠夺华工的行为也没有采取任何阻止或营救措施。³²⁶⁾与此相比，早期移居韩国华人的情况就显得大为不同。他们从移居韩国(朝鲜)开始，就得到了清国政府的大力支持。在清国政府的庇护下，早期韩华轻而易举地占有了土地，并顺利地掌握了韩国主要经济命脉，获得了可观的经济利益。与那些在其他地区被称为“猪仔”的早期移居华人不同，早期韩华在移居地韩国被视为“一等国民”³²⁷⁾，成为韩国人既羡慕又恐怖的对象。因此而产生的韩华华文文学的独特性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韩华华文文学中出现的“排斥”具有相互性。

当地人对移居者的排斥，或者说外国人嫌恶症，是世界各地都存在的普遍现象，只要是

325) 以上4段叙述是在参考国务院侨办侨务干部学校编著，《华侨华人概述》，北京：九州出版社，2005，pp. 3-124；임채완·여병창·리단·최승현, <화교 디아스포라의 집단적 기억과 재영토화>, 성남: 북코리아, 2014, pp. 76-149; 임채완·여병창·이단·최승현·이성란, <화교 디아스포라 이주루트와 기억의 역사>, 성남: 북코리아, 2013, pp. 51-110的基础上重新整理后的内容。

326) 임채완·여병창·리단·최승현, <화교 디아스포라의 집단적 기억과 재영토화>, 성남: 북코리아, 2014, p. 108.

327) 国务院侨办侨务干部学校编著，《华侨华人概述》，北京：九州出版社，2005，p. 91.

存在利益冲突的群体间都有可能产生。韩华华文文学也像其他地区华人华文文学一样，体现着移居者在移居地感受的“排斥”，但是与其他地区华人华文文学不同的是，韩华华文文学中所体现的“排斥”具有相互性。

从先迁韩华华文文学作品中可以看出，早期韩华因为在移居地所处的特殊地位，甚至在不懂韩语的情况下，也没有任何生活上的不便，随心所欲的生活使他们几乎感受不到来自韩国社会的“排斥”。如果说早期韩华与韩国人之间存在紧张情绪，那也是由于韩国人的羡慕与恐怕，而对早期韩华的“疏远”。随着先迁韩华在韩国社会地位的变迁，虽然先迁韩华和韩国人在个人关系上，大部分都能够和睦相处，但是他们仍然可以感受到来自韩国社会的“排斥”氛围，这种“排斥”仍然存在相互性。

也许“大国奴”与“高丽棒子”这两个称谓，是对这种相互性最好的阐释。这两个称谓出自韩华华文文学作品中，体现着先迁韩华与韩国人之间，相互看待对方的复杂“情绪”。“大国奴”作为韩国人对于先迁韩华的称谓，本是先迁韩华对韩语“대국놈”[大国者]的误译，但是在误译当中，又不完全出于误会，其中饱含着韩国人对早期韩华傲慢姿态的，既羡慕又反感的两面性情绪；也包涵着先迁韩华由高傲的“大国国民”沦落为无知贪婪的社会底层的失落与无奈；熔铸着先迁韩华在移居社会的复杂情绪下，受尽歧视与排斥的人生经验。“高丽棒子”是华人对韩语“방자”[帮子或房子]的误传，误传中又带有轻蔑的成分，含有韩华对自己文化上的优越感；同时也内涵着一种“取宠式”的逆反情绪。即，这种表面上看起来意在区分彼此，主动拒绝被同化的行为，实际上是当先迁韩华在地化愿望受到挫折之后，一种发泄不满情绪的方式，最终目的仍然在于引起韩国社会对韩华的关注。

韩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后，随着两国间交流的增多，以留学或投资等方式来韩的中国大陆人口逐渐增多，其中又从短期变为长期移居的后迁韩华人口也随之增多。韩国政府通过实施各种政策，放宽移居条件，促进华人的在韩投资与移居。韩国政府的一系列积极促进华人投资和移居的政策，虽然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同时也产生了一些负面影响。其中一个表现，就是使韩国人看待韩华的态度上，混合着中国热与中国恐怖两种感情的，韩国人的两面性情绪。³²⁸⁾因此，韩华华文文学体现出，后迁韩华与早期韩华在韩国社会所感受的“排斥”具有相似性，仍然存在相互性的特征。

第二，韩华华文文学中的“排斥”体现出韩国人对韩华的一种特殊的文化想象。

华人在遍布世界各地的移居地从事经营中餐馆、洗衣店等行业是非常普遍的现象。但是很少有华人在移居地经营的中餐馆，像韩华在韩国经营的中餐馆那样具有特殊的意义。

中餐馆与韩华具有密切的关系：先迁韩华最早在韩国开设中餐馆是为了给清国政府派遣

328) 신현준, <중국 굴기 이후 한국화교와 다문화주의—간여적 중국인인가 부상하는 과(跨)문화 주체인가?>, 《한중인문학연구》Vol.49, 서울: 한중인문학회, 2015, pp. 287-289.

到朝鲜的军人提供饮食上的方便，随后韩华中餐馆又成了韩华富商喜欢光顾的地方。韩华经济繁荣时期，不仅是对韩华来说，还是对韩国人来说，韩华的中餐馆都属于高级餐饮场所，韩华也因此获得了丰厚利润。随着韩华经济的衰落，再加上韩国政府在政策上的压制，具有知识和经济实力韩华的再迁，中餐馆几乎一度成为仍然留在韩国韩华的唯一营生，同时也被再迁韩华带到了再迁之地，并且具有了再迁之地的色彩。近来，后迁韩华也在为满足从中国大陆移居来韩的华人以及韩国人的需求，延续着韩华中餐馆的历史。

中餐馆与韩国人也具有密切的关系：韩华在韩国的移居过程中不断受到韩国文化的影响，韩国人也同样通过韩华受到中国文化的影响。其中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炸酱面”，作为韩华中餐馆的代表食物，已经成为韩国人饮食文化的一部分。甚至在一段时期，炸酱面的价格达到了可以左右韩国物价的程度。

由此可见，从某种意义上说，“炸酱面”在韩国社会具有的特殊文化意义，同样是引发韩国人对韩华产生既羡慕又恐怖的两面性情绪的因素之一，是影响韩华与韩国社会形成特殊关系的因素之一。在此过程中，韩华曾一度成为韩国人文化想象的对象。

这一点在先迁韩华的很多文学作品中被体现出来。作品中，“掌柜”、“王书房”这些本来在中国古代用于对店主的称谓，在韩国指代王姓女婿的称呼，被染上了贬义色彩，成为象征着落后无知贪婪吝啬的先迁韩华的代名词。在这里，韩国人是想象的主体，而先迁韩华就成为被想象被建构的对象。

正如再迁韩华华文文学作品中所说：韩华再迁美国后，为了适应美国人口味偏甜的习惯，每道菜都加些糖，开创了适合美国人口味的“美式中菜”。在美国妇孺皆知的中菜是“鸡炒面”，在韩国家喻户晓的中菜是“炸酱面”。但问题是“鸡炒面”在美国人心目中只是单纯的中菜联想名词，而“炸酱面”在韩国人心目中却是百味杂陈，另有弦外之音，其中隐藏着中国人的落后、无知、低能。³²⁹⁾再迁韩华作者将自己的亲身经历与感受通过文学的形式表现出来，同时也是韩华华文文学具有自身独特性的有力证明。

随着韩国社会对韩华的重视，韩华与韩国社会在关系上的变化，这些曾经被赋予贬义色彩的“掌柜”、“王书房”都已成为韩华移居历史的陈述，留下来的是记录着这些片断的韩华华文文学。

其次，韩华在人口数量和人口特征上存在的独特性，以及韩华同时受到韩国文化、中国大陆文化、台湾文化间穿插交错的影响，使韩华华文文学体现出不同于其他地区华人华文文学的独特特征。由此产生的独特性，主要体现在韩华华文文学中出现的与众不同的混种性上。

从全世界范围内的华人人口分布上看韩国华人的数量，就显得微乎其微了。主要集

329) 参考崔仁茂编著，《韩华在浴火中重生》，南埃尔蒙特：捌玖印刷公司，2003.1, p. 110.

中在亚洲38个国家和地区的华人人口已超过3千万，占全世界华人总数的82%以上，但是韩国华人人口，即使将先迁韩华、再迁韩华、后迁韩华加在一起也不足20万人，而移居历史最长，在移居时间上已经充分具备文学创作条件的先迁韩华，人口数量仅有2万余人。另外，全世界华人中，广东出身的华人约占华人总数的60%，福建出身的华人约占华人总数的30%，³³⁰⁾仅此两地出身的华人就约占华人总数的90%。由此比例上来看，90%以上属于山东出身的先迁韩华，在整个世界华人网络里，显得独树一帜。

再加上韩国文化、中国大陆文化、台湾文化间的相互交流与碰撞、相互交切与混杂，不仅使韩华在口头语、书面语以及文化上出现了特殊的混种性特征，并且形成了韩华自身独特的混种性身份认同。这些独特的混种特征，又通过韩华华文文学表现出来。

第一，韩华华文文学中出现了韩华在口头语上的混种现象。

先迁韩华在韩华学校接受的国语教育，以及在移居过程中对韩语环境的接触，这些因素都在不断对先迁韩华的山东方言产生冲击，使先迁韩华在口头语上自创了属于自己的语言——“韩华汉语”。

韩华作者以文学的形式表达出自己的亲身感受：一方面“韩华汉语”使他们觉得语言似乎是一道无法逾越的厚障壁，隔在先迁韩华与故乡人之间。先迁韩华那种特殊的腔调即使回到故乡自信满满地搬出家乡话，也会被故乡人询问：“你从韩国回来的？”另一方面，他们又从“韩华汉语”中感到了先迁韩华的凝聚力。即使先迁韩华再迁他地，离开韩国几十年；即使变得龙钟老态，驼背佝偻，也会因为“韩华汉语”被认出是韩华来。³³¹⁾

后迁韩华移居韩国的时间仅有二十几年，又在中国大陆充分接受了汉语教育，即使如此，在后迁韩华的口头语中也已经开始出现混种现象。这一点可以通过韩华小说中所体现的后迁韩华作者李文的视角看出，在他的观察下：移居韩国两年的时光可以让许多后迁韩华油然而生一种已然身为“老华侨之感”，言语间不时夹杂韩语，因为他们在中国大陆待了短暂的二十多年，而在韩国已经度过了漫长的两年。³³²⁾后迁韩华的小说中不仅体现出后迁韩华已经开始形成口头语上的混种现象，并且也体现出，在后迁韩华眼里，“老华侨”即笔者所谓的“先迁韩华”，已然是语言混种的典型。

第二，韩华华文文学中出现了韩华书面语上的混种现象。这种现象不仅体现在先迁韩华从事华文文学创作时，混杂使用自创性的韩语直接音译词汇，还体现在他们在文学文学创作中的一些表达方式和思考方式上。

330) 임채완·여병창·이단·최승현·이성란, <화교 디아스포라 이주рут와 기억의 역사>, 성남: 북코리아, 2013, p. 51.

331) 参考贾凤鸣, <闲话韩国华侨的普通话>, 《美国齐鲁韩华杂志》第30期, Laguan Woods, California: 美国齐鲁联谊协会, 2011.7, p. 10; 焉晋琦, <千言万语说不尽第二故乡韩国情>, 《美国齐鲁韩华杂志》第25期, Laguan Woods, California: 美国齐鲁联谊协会, 2010.1, p. 13.

332) 参考李文, 《蒲公英: 文麒留韩记》, 北京: 人民日报出版社, 2017.1, p. 134.

所谓自创性使用韩语直接音译词汇，是指先迁韩华在进行华文创作过程中，即使存在与韩语词汇相对应的汉语词汇，仍然有意或无意地使用韩华直接由韩语词汇音译成汉语的词汇，此时的汉语失去了原有的意义，仅作为这个音译词汇的标注符号存在。这些词汇在被韩华创造的过程中，也就具有了混种性意义。这些词汇在先迁韩华之间言传意会，但是对于其他没有经验过韩国文化的人，甚至很难理解其中的内涵。

笔者认为之所以会出现这种现象，很可能与先迁韩华在移居韩国之前，没有受到多少国语/普通话的普及有关。因为，中国大陆于1955年才开始正式推广普通话，从先迁韩华移居时间上来看，应该没有多少可以接触普通话的机会，移居后也大多接受中华民国的国语教育。另外，随着先迁韩华世代的更迭延续，他们与汉语环境接触的机会逐渐减少，与韩语环境的接触机会逐渐增多。随着时间的流逝，先迁韩国与中国大陆或台湾社会，在一些新兴的事物和现象的出现上也会产生差异。先迁韩华直接接受那些只在韩国出现的事物与现象，为了表达这些事物与现象，只有通过意译或者音译使用的方式，相对来说，后者更加便利。

第三，韩华华文文学中体现了韩华文化上的混种性。

先迁韩华华文文学作品中体现出，韩华在移居韩国的过程中，主动或被动地接受着韩国文化的影响，结果使早期韩华还保留的一些故乡的风俗习惯，比如：春节祭祖、婚礼、节假日等风俗，都随着韩国人的生活节奏，韩国人的文化氛围而不断改变，出现越来越明显的韩国化倾向。

不仅如此，再迁韩华还通过与美国华人与美国韩人的比较，将自己的观察与感受通过华文文学的形式表现出来。他们觉得韩华在韩国几十年的移居生涯，不仅在饮食习惯上，比如：顿顿离不开泡菜的习惯等；甚至连脾气秉性上，比如：豪迈热情，辈份有序，讲义气，急脾气等，都更接近美国韩人，因而美国韩人群居的地方，再迁韩华也喜欢“插上一腿”。³³³⁾

后迁韩华华文文学作品中体现出，后迁韩华主要通过模仿的形式进行积极地在地化实践。因此，在韩国生活时间的长短，积极模仿韩国人的程度等因素，就成了左右后迁韩华文化混种程度的重要因素。比如：当后迁韩华认识到，语言是决定他们是否可以与韩国人交流，融入韩国社会的关键时，就会像高三学生一般，拿出对得住自己家人的拼劲儿，努力学习韩语，希望有朝一日成为韩语狂人，名正言顺地坐进韩国的某职员办公室，成为大韩民国的一分子。作为一名后迁韩华，作者的体会是：适应是一个漫长的，一点一滴积累的过程，韩国的水土风物，人情世故，像一丝丝细密的根茎，在心里越扎越深。有时甚至担心日后回到中国，还能否很好地适应中国的职场环境。³³⁴⁾

第四，韩华华文文学中体现了韩华身份认同上的混种性。

333) 参考李作堂, <浅谈旅美韩华与韩裔>, 《韩华世界》第1期, Walnut Creek, California: 韩华基金会, 2007.10, p. 8.

334) 参考李文, 《蒲公英: 文麒留韩记》, 北京: 人民日报出版社, 2017.1, p. 163.

通过先迁韩华华文文学我们可以推测：早期韩华由于拥有清国政府这样的坚强后盾，再加上自身文化上的优越感，他们很可能仍然保持着中国人的认同。

通过先迁韩华华文文学我们可以充分看到第二、三代先迁韩华混种性身份认同的形成：20世纪中叶开始，先迁韩华在韩国社会受到来自政治与经济方面的不平等待遇，感受到韩国社会的排斥氛围，再加上先迁韩华的自主型教育体系，这些都使先迁韩华保持着很强的凝聚力。不管先迁韩华人口增减变化与否，他们都在为维系自己的组织和出版物而不懈努力，并坚持在自己发行的华文出版物上刊登文学作品。但是，吃着韩国的饭菜，喝着韩国的烧酒，听着韩国的歌，看着韩国电视长大的第二、三代先迁韩华，即使短期到中国大陆探亲，也总会不自觉的联想到韩国。在中国大陆，他们只是游客，是短暂观光和游玩的过客。他们的家人和朋友在韩国，他们的工作和事业在韩国，他们的真实生活在韩国，他们人生此刻的落脚点在韩国。

因此，第二、三代先迁韩华的笔下，展现出一个先迁韩华虚拟建构的，只属于先迁韩华自己的，特殊的生存空间，以此将先迁韩华与非先迁韩华区分开来。这一生活空间，有些类似于霍米·巴巴所提出的“第三空间”的概念。处于特殊生存空间内部的先迁韩华，在承认自己是以中国人的身份生存在韩国社会的同时，也将自己与中国大陆的中国人相区分，与短暂往来韩国的商人游客相区分。并且，他们又以生活在韩国社会的中国人身份进行在地化实践，努力使自己成为韩国社会的一部分，渴望得到韩国社会的承认。如果说先迁韩华以中国人身份移居到韩国社会本身是一种错置，那么他们对于为了更好的生存就应该融入韩国社会的反思，并在此反思的基础上进行扎根韩国社会的在地化实践，则是对此错置的解构。

通过先迁韩华华文文学我们可以预测：第三代，或之后世代的先迁韩华，随着在地化的更加深入，在他们的混种性身份认同里，韩国化的成分应该更多一些。

后迁韩华华文文学资料有限，这对于后迁韩华华文文学的研究，的确存在局限性。但是通过后迁韩华华文长篇小说，我们仍然可以看到后迁韩华身份认同上的混种特征。

后迁韩华在未来居住地的选择上采取开放式态度，即，哪里有机会，哪里更适合自己发展，就会选择在哪里生活。因此，韩国是其未来居住地的选项之一，中国是他们从未放弃过的选项，甚至其他地区也都有可能。在韩国生活期间，他们会利用网络与中国国内的朋友互相沟通，同时对于韩国文化也采取积极受容的态度。后迁韩华具有往返韩中两地的双重居住特征，不管是以何种形式移居韩国，他们即使处在向后迁韩华转型前的阶段，也已经做好了积极融入韩国社会的决心，并在积极地在地化实践中形成了混种性身份认同。就像作者所体会的那样：“与其说是生活改变了我，不如说是在必然的基础上改变了这些的是自己。”³³⁵⁾

通过后迁韩华华文文学我们可以预测：由于后迁韩华与先迁韩华的差异不仅体现在移居

335) 李文,《蒲公英:文麒留韩记》,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2017.1, p. 63.

时间上，在移居形式上也存在很大区别，属于完全自主性的移居行为。后迁韩华在中国大陆成长，至少具有中学以上的文化程度，他们从事华文文学创作的机会很大。但是因为他们的移居时间较短，恐怕距离他们正式开展文学活动还需要一段时间。由于后迁韩华的这种韩中两地型双重居住策略，未来的后迁韩华华文文学，应该具有与先迁韩华华文文学不同的特质。另外，随着时间的流逝，当后迁韩华对移居地韩国投注越来越多的情感，形成越来越强烈的在地化欲望时，后迁韩华很可能会以一种新的语言混种形式，使韩华华文文学继续保持活力。

人类的身份认同是在与他人、事件、事物等构成的多层连接中形成的关系产物，形成关系的他人、事件、事物等，从地理上来看可以是可接触的，也可以是相远离的；从时间上来看可以是现在的事情，也可以是过去的事情。跨国移居者通过对故乡的脱离与循环，以及跨越国境的扩张的社会网络，形成新的身份认同。通过与众多他者的接触与内面化，进行多种方式的相互交流，并在此过程中形成混种性。³³⁶⁾混种性身份认同意味着韩华已经具有多重所属，这些所属也已经不像拼接在一起的碎片那样容易被分离，而是互相糅杂融合在一起，难以再分割开来。

但是，作为跨国移居者的先迁韩华，仍然同时遭受着来自几个地区主流社会的排斥，甚至政策上的压迫。先迁韩华也通过华文文学的形式呼吁，这些来自多重主流社会的隐形压迫，正在将他们推向必须做出无奈选择的“三岔路口”。所谓的“三岔路口”，是指先迁韩华被迫面临的选择，即，第一条路是：继续保持原来的中华民国国籍，忍受种种不平等待遇和歧视，幻想着有朝一日能够重新回到往日的美好时光；第二条路是：为顺应现实环境，根据祖籍地缘，改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第三条路是：为维护财产和扎根韩国，申请归化为韩国国籍。³³⁷⁾

先迁韩华通过华文文学的形式，强调着自己在身份认同上的混种性，强调着被多重所属的各个主流社会接受的渴望。同时他们也通过华文文学的形式，告诉人们现实中的先迁韩华，至少是大多数先迁韩华，仍然是这样一个群体：虽然具有中华民国国籍，却不具有可以证明国民身份的证件；具有中国大陆故乡的祖籍，却不被中国大陆承认是同胞；经常被中国大陆人误解是台湾人，却不能像台湾同胞一样获得中国大陆发给的“台胞证”，只能获得发给一般外国人的“通行证”；长期生活在韩国，并且获得永驻的资格，却不具有公民的身份，只能以地方市民的身份，行使市民的选举权，但不包括被选举权。

336) 이영민, <글로벌 시대의 트랜스이주와 장소의 재구성: 문화지리적 연구관점과 방법의 재정립>, 《문화역사지리》 Vol.25No.11, 서울: 한국문화역사지리학회, 2013, p. 57.

337) 参考鞠柏峪, <歧路上的韩国华侨>, 《美国齐鲁韩华杂志》第35期, Laguna Woods, California: 美国齐鲁联谊协会, 2013.1, p. 22.

出生于黎巴嫩后移居法国的文学作家阿敏·马卢夫，在他的书中迫切呼吁当今时代对于重新认识身份认同的必要性，他说：“在这个以令人晕眩的速度飞速混杂融合的世界化时代，我们迫切需要一个关于身份认同的新概念。但是两分法式的选择方式在身份认同领域仍然在暗地里处于绝对优势。如果我们同时代的人没有勇气承认自身多样的所属，需要在否定自我与否定他者之间被迫做出选择，那么我们就是在制造把流血事件当作快事的疯子群体，或是在制造迷路彷徨者的群体。”³³⁸⁾也许有人会觉得他的说法有些过激，但是在这个跨国移居者与日俱增的现实情况下，对身份认同概念的重新认识已经成为整个人类共同面对的课题。

韩国华人以华文文学的形式，向全世界宣告韩华自身的独特性，宣告韩华华文文学的独特性；韩国华人以华文文学的形式，向全世界宣告韩华的混种性身份认同，宣告对于被承认多重所属的渴望。笔者认为聆听这些发声，并且使这些声音发出得更加有效，是作为学者应尽的责任。但是，目前有关韩华华文文学的研究力量还十分薄弱，特别是相较其它地区华人华文文学的研究情况时更显如此。

就东南亚地区华人华文文学来说，不仅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地区的华人华文文学研究成果极为丰硕；泰国、印尼等地区的华人华文文学也得到了充分的重视；最近越南、老挝、缅甸、文莱等地华人华文文学也相继被研究。北美、澳洲、欧洲等地区华人华文文学的研究也是硕果累累。但是有关韩华华文文学的研究严重不足，如笔者在绪论中所述，韩国学界有关韩华华文文学的研究成果，仅限于笔者独立完成或与其他学者共同完成的几篇学术论文。中国大陆学界的情况更糟，关于韩国华人的研究只包括27篇学术论文，6篇硕士学位论文，1篇博士学位论文。至于韩华华文文学的研究成果，尚处于零状态。³³⁹⁾相反，在中国大陆学界，仅就美国华裔文学的研究，就包括学术论文300多篇，博士学位论文90多篇³⁴⁰⁾，与韩华华文文学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以上论述也可以看作是笔者撰写本文的原因，但是笔者并不希望本文的意义仅限于，对打破全世界范围内有关韩华华文文学研究的硕士及博士学位论文尚处于零状态的现状上，具有一定的突破性意义。笔者更希望，通过对韩华华文文学独特性的整理，对于更加完整的理解华人华文文学的特征上，起到一定的贡献意义；通过强调韩华华文文学中所体现的韩华语言混种性与文化混种性，在重新思考中国文学的概念和范畴问题上，起到一定的启发意义；通过强调韩华华文文学中所体现的混种性身份认同，在呼吁人类认识新型身份认同的必要性上，可以发挥微薄之力。

笔者自知本文存在的局限性，由于收集资料上的限制，造成本文对韩华华文文学的研究

338) 아민 말루프, 박창호 옮김, 《사람 잡는 정체성》, 서울: 이론과 실천출판사, 2006, pp. 49.

339) 中国大陆学界关于韩国华人与韩华华文文学研究现况的调查时间为2018年6月30日。

340) 弥沙, 《美国华裔文学批评的嬗变: 族裔性、文学性、世界性》, 黑龙江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2016, p. 7.

并不完整。比如：针对早期韩华华文文学、先迁北韩华人华文文学、更丰富的后迁韩华华文文学情况等等，都有待今后包括笔者在内的更多学者继续发掘和研究，使韩华华文文学的研究更加完整化。再鉴于第二代先迁韩华柳耀广和鞠柏岭等作者，已经具有从事韩文创作的经验，这就说明第三代以及之后世代的先迁韩华，使用韩语或者韩汉双语创作的机会非常大。因此，还可以将研究视野扩大到包括韩华韩文文学在内的韩华文学的研究上。

[参考文献]

1. 韩国华人华文资料

(1) 韩国华人华文刊物

- 《韩华春秋》(月刊), 首尔: 韩华春秋编辑委员会, 1964.6-1965.12。
《韩中文化》(月刊), 首尔: 韩中文化协会, 1974.6 - 1984.12。
《韩华》(月刊), 首尔: 韩中文化协会, 1990.5-1991.2。
《韩华学报》(创刊号), 首尔: 韩华学会, 2001.8。
《韩华通讯》(月报), 首尔: 汉城华侨协会, 2002.6-2018.3。
《韩华学报》(第2辑), 首尔: 韩华学会, 2003.7。
《韩华学报》(第3辑), 首尔: 韩华学会, 2004.12。
《韩华世界》(年刊), Walnut Creek, California: 韩华基金会, 2009-2011。
《美国齐鲁韩华杂志》(季刊), Laguna Woods, California: 美国齐鲁联谊协会, 2000.9-2018.1。

(2) 韩国华人华文单行本

- 秦裕光编著, 《旅韩六十年见闻录—韩国华侨史话》, 台北: 中华民国韩国研究学会, 1983。
初安民, 《愁心先醉》, 台中: 晨星出版社, 1985。
初安民, 《往南方的路》, 台南: 台南市立图书馆, 2001.12。
崔仁茂编著, 《韩华在浴火中重生》, 南埃尔蒙特市: 捌玖印刷公司, 2003.1。
郝明义, 《故事》, 台北: 大块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2004.3。
李文, 《蒲公英: 文麒留韩记》, 北京: 人民日报出版社, 2017.1。

(3) 其他韩国华人华文资料

- 柳耀广诗画展中的华文诗歌, 首尔: 中国大使馆中山堂, 1969.10.10-12。
柳耀广日记, 1969。

2. 单行本

(1) 韩国国内出版

- 박은경, 《한국화교의 종족성》, 서울 : 한국연구원, 1986.
- 질 들뢰즈·펠릭스 가타리, 이진경 옮김, 《카프카 : 소수적인 문학을 위하여》, 서울 : 동문선, 2001.
- 최승현, 《화교의 역사 생존의 역사》, 인천: 화약고, 2006.
- 아민 말루프, 박창호 옮김, 《사람 잡는 정체성》, 서울 : 이론과 실천출판사, 2006.
- 구선희·허영란·장용경, 《한국화교의 생활과 정체성》, 과천 : 국사편찬위원회, 2007.
- 가야트리 차크라보르티 스피박, 문학이론연구회 옮김, 《경계선 넘기 - 새로운 문학연구의 모색》, 고양 : 도서출판 인간사랑, 2008.
- 로버트 J.C. 영, 김용규 옮김, 《백색신화》, 부산 : 경성대학교 출판부, 2008.
- 김옥동, 《포스트모더니즘》, 서울 : 연세대출판부, 2008.
- 김태만, 《내 안의 타자, 부산 차이니스 디아스포라》, 부산 : 부산발전연구원, 2009.
- 고부응 엮음, 《탈식민주의 - 이론과 쟁점》, 서울 : 문학과지성사, 2009.
- 강진아, 《동순태호 : 동아시아 화교 자본과 근대조선》, 대구 : 경북대학교출판부, 2011.
- 데이비드 허다트, 조만성 옮김, 《호미바바의 탈식민적 정체성》, 서울 : 엘피출판사, 2011.
- 가라타니 고진, 조영일 옮김, 《근대문학의 종언》, 서울 : 도서출판 b, 2012.
- 왕언메이, 송승석 역, 《한국화교-냉전체제와 조국의식》, 서울: 학교방, 2013.
- 김용규, 《혼종문화론》, 서울 : 소명출판사, 2013.
- 임채완·여병창·이단·최승현·이성란, <화교 디아스포라 이주루트와 기억의 역사>, 성남 : 북코리아, 2013.
- 임채완·여병창·리단·최승현, <화교 디아스포라의 집단적 기억과 재영토화>, 성남 : 북코리아, 2014.
- 김경연·김용규 엮음, 《세계문학의 가장자리에서》, 서울 : 현암사, 2014.
- 왕더웨이, 김혜준 옮김 《현대 중문소설 작가 22인 : 세기를 넘나드는 작가들》, 서울 : 학교방, 2014.
- 왕더웨이, 김혜준 옮김, 《시노폰 담론 중국문학 : 현대성의 다양한 목소리》, 서울 : 학교방, 2017.

(2) 韩国以外地区出版

Shu-mei Shih, *Visuality and Identity: Sinophone Articulations across the Pacific*,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June. 2007.

Shu-mei Shih, Chien-hsin Tsai and Brain Bernards, *Sinophone Studies: A Critical Reader*,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Jan. 2013.

邵毓麟,《使韩回忆录》,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0。

王赓武,《东南亚与华人—王赓武教授论文选集》,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86。

王东原,《浮生简述》,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7。

杨昭全·孙玉梅,《朝鲜华侨史》,北京:中国华侨出版公司,1991。

周蕾,《写在家国以外》,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5。

李晓虹,《中国当代散文审美建构》,深圳:海天出版社,1999。

黄万华,《文化转换中的世界华文文学》,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

饶芑子主编,《中国文学在东南亚》,汕头:暨南大学出版社,1999。

黄万华主编,《美国华文文学论》,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2000。

梁必承·李正熙,全敏译,《韩国,没有中国城的国家》,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0。

王赓武,《王赓武自选集》,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2。

梁秉钧,《书与城市》,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02。

钱超英编,《澳大利亚新华人文学及文化研究资料选》,杭州: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02。

王德威,《现代中国小说十讲》,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

程爱民主编,《美国华裔文学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黄万华,《多元文化语境中的华文文学》,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2004。

弗兰兹·法农,万冰译,《黑皮肤,白面具》,南京:译林出版社,2005。

弗兰兹·法农,万冰译,《全世界受苦的人》,南京:译林出版社,2005。

马仲可,《山东华侨研究》,北京:新星出版社,2005。

王德威,《众声喧哗以后》,台北:麦田出版社,2005。

饶芑子,《世界华文文学的新视野》,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

国务院侨办侨务干部学校编著,《华侨华人概述》,北京:九州出版社,2005。

刘俊,《跨界整合—世界华文文学综论》,北京:新星出版社,2005。

陆益龙,《嵌入式适应模式—韩国华侨文化与生活方式的变迁》,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

陈函平,《北美新华文文学》,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6。

- 蒲若茜,《族裔经验与文化想象》,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
- 王德威,《当代小说二十家》,北京:三联书店,2006。
- 王晓初·朱文斌主编,《世界华文文学研究》第3辑,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06。
- 王晓初·朱文斌主编,《世界华文文学研究》第4辑,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07。
- 饶芃子,《离散与回望》,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7。
- 毛会迎,《韩晟昊传》,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7。
- 爱德华·W. 萨义德,王宇根译,《东方学》,北京:三联书店,2007。
- 刘禾,《跨语际实践》,北京:三联书店,2008。
- 孔庆东,《独立韩秋》,重庆:重庆出版社,2008。
- 王晓初·朱文斌主编,《世界华文文学研究》第5辑,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09。
- 吴兵·王立礼主编,《华裔美国作家研究》,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9。
- 也斯,《后殖民食物与爱情》,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09。
- 赵稀方,《后殖民理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 王德威,《后殖民写作》,台北:麦田出版,初版二刷,2010。
- 王宁·生安锋·赵建红,《又见东方—后殖民主义理论与思潮》,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11。
- 生安锋,《霍米·巴巴的后殖民理论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
- 王淑玲,《韩国华侨历史与现状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
- 罗伯特·J·C·扬,容新芳译,《后殖民主义与世界格局》,南京:译林出版社,2013。
- 史书美,杨华庆译,蔡建鑫校,《视觉与认同—跨太平洋华语语系表述·呈现》,台北:联经出版社,2013。
- 葛兆光,《宅兹中国》,北京:中华书局,2015。
- 史书美,《反离散—华语语系研究论》,台北:联经出版社,2017。

3. 学术论文

(1) 韩文学术论文

엄익상·한종호·김순진, <서울 日照화교 방언조사보고>, 《중국언어연구》Vol.5, 서울:한국 중국언어학회, 1997, pp. 191-212.

엄익상·김현정·정미숙, <인천 榮成화교 한어음계분석>, 《중국언어연구》Vol.5, 서울:한국

- 중국언어학회, 1997, pp. 171-189.
- 장상언, <화교학생들의 언어생활에 관한 연구 : 한국의 바이링구얼>, 《일어일문학》, Vol.10 부산 : 대한일어일문학회, 1998, pp. 349-360.
- 엄익상, <한국 화교 방언: 조사 및 연구를 위한 제언>, 《중국어문학논집》Vol.11, 서울 : 중국어문학연구회, 1999, pp. 273-293.
- 왕춘식, <한국 화교2세의 질곡과 소망>, 《당대비평》, 서울 : 생각나무출판사, 2000, pp. 235-244.
- 장수현, <한화(韓華), 그 배제의 역사>, 《당대비평》, 서울 : 생각나무출판사, 2000, pp.245-258.
- 김경국·최승현·이강복·최지현, <한국의 화교연구 배경 및 동향 분석>, 《중국인문과학》Vol.26, 광주 : 중국인문학회, 2003, pp. 495-516.
- 이창호, <신화교의 국내 이주와 정체성의 정치>, 《민족연구》Vol.58, 서울 : 한국민족연구회, 2004, pp. 4-27.
- 박경태, <화교, 우리 안의 감춰진 이웃>, 《황해문화》Vol.47, 인천 : 새얼문화재단, 2005, pp. 234-248.
- 이해우·박용진, <전라북도 화교의 세대 간 언어 사용 실태에 대한 조사 연구>, 《중국어문학논집》 No.41, 서울 : 중국어문학연구회, 2006, pp. 53-73.
- 임채완, 박동훈, <한국 화교의 역할과 발전방향>, 《한국동북아논총》Vol.41, 광주 : 한국동북아학회, 2006, pp. 5-32.
- 최승현, <화교의 애국심 문제에 관한 역사적 고찰>, 《중국학논총》Vol.23, 대전 : 한국중국문화학회, 2007, pp. 225-247.
- 이창호, <한국 화교(華僑)의 사회적 지위와 관계의 공간 - 인천 화교의 관시(關係)와 후이(會)를 중심으로>, 《비교문화연구》 Vol.14No.1, 서울: 서울대학교 비교문화연구소, 2008, pp. 75-122.
- 손희연·서세정, <한국 화교 화자들의 이중언어 사용 연구>, 《사회언어학》Vol.16No.1, 서울 : 한국사회언어학회, 2008, pp. 185-211.
- 박배균, <초국가적 이주와 정착을 바라보는 공간적 관점에 대한 연구—장소, 영역, 네트워크, 스케일의 4가지 공간적 차원을 중심으로>, 《한국지역지리학회지》Vol.15, 대구 : 한국지역지리학회, 2009, pp. 616-634.
- 박경태, <'화교(華僑)'에서 '화인(華人)'으로: 식민시기와 냉전시기 인도네시아의 화인 정책>, 《다문화사회연구》Vol.2No.2, 서울 : 숙명여자대학교 다문화통합연구소, 2009, pp. 33-61.

- 김혜준, <한국의 중국현대문학 학위논문 및 이론서 목록>, 《중국현대문학》No.52, 서울 : 한국중국현대문학학회, 2010, pp. 225-246.
- 송승석, <‘한국화교’ 연구의 현황과 미래- 동아시아 구역 내 ‘한국화교’ 연구를 중심으로>, 《중국현대문학》Vol.55, 서울 : 한국중국현대문학학회, 2010, pp. 163-199.
- 최승현, <韓中混血考1 : 근대이전 한국의 중국계 정착민에 관한 연구>, 《중국학논총》Vol.29, 대전 : 한국중국문화학회, 2010, pp. 173-190.
- 김혜준, <화인화문문학(華人華文文學) 연구를 위한 시론>, 《중국어문논총》Vol.50, 서울 : 중국어문연구회, 2011, pp. 77-116.
- 강소영, <해외거주 한국화교의 한국어 사용현황 연구>, 《어문연구》Vol.70, 대전 : 어문연구학회, 2011, pp. 5-28.
- 강소영, <이중언어 사용자의 코드 스위칭의 유형과 원인 분석>, 《한어문교육》Vol.26, 서울 : 한국언어문학교육학회, 2012, pp. 207-237.
- 이창호, <한국화교의 "귀환"이주와 새로운 적응>, 《한국문화인류학》Vol.45, 서울 : 한국문화인류학회, 2012, pp. 153-199.
- 이창호, <이주민 2세대의 고향(home)의 의미와 초국적 정체성 : 화교 동생들의 인터넷 커뮤니티를 중심으로>, 《한국문화인류학》Vol.45No.1, 서울 : 한국문화인류학회, 2012, pp. 3-41.
- 김경학, <한국 화교의 초국가적 성격과 전망- 광주지역 화교를 중심으로>, 《민족문화논총》Vol.51, 대구 : 영남대학교 민족문화연구소, 2012, pp191-226.
- 이용일, <학제적 이주연구로서 이주의 역사>, 《로컬리티 인문학》Vol.8, 부산 : 부산대학교 한국민족문화연구소, 2012, pp247-252.
- 이영민, <글로벌 시대의 트랜스이주와 장소의 재구성: 문화지리적 연구관점과 방법의 재정립>, 《문화역사지리》Vol.25No.11, 서울 : 한국문화역사지리학회, 2013, pp. 47-62.
- 이용균, <초국가적 이주 연구의 발전과 한계: 발생학적 이해와 미래 연구 방향>, 《한국도시지리학회지》Vol.16No.1, 서울 : 한국도시지리학회, 2013, pp. 37-55.
- 宋佳, <한국화교의 출판활동에 대한 일연구>, 《한국학연구》Vol.46, 서울 : 고려대학교 한국학연구소, 2013, pp. 71-102.
- 송승석, <화교(華僑), 번역, 정치적 글쓰기 - 진유광(秦裕光)의 한국화교 서사(书写)를 중심으로>, 《외국학연구》Vol.24, 서울 : 중앙대학교 외국학연구소, 2013, pp. 323-361.
- 여병창, <화교디아스포라의 한반도 이주와 언어 정체성 고찰 - 한국 화교의 이중언어 사용양상을 중심으로>, 《중국문학연구》Vol.52, 서울 : 한국중문학회, 2013, pp.

263-293.

- 강진아, <경계인의 역사: 화교의 어제와 오늘>, 《로컬리티 인문화》Vol.12, 부산 : 부산대학교 한국민족문화연구소, 2014, pp. 275-285.
- 신현준, <중국 굴기 이후 한국화교와 다문화주의—잔여적 중국인인가 부상하는 과(跨)문화 주체인가?>, 《한중인문학연구》Vol.49, 서울 : 한중인문학회, 2015, pp. 263-292.
- 안미정·우양호, <한국화교로 본 한국의 다문화주의 성찰>, 《한국민족문화》Vol.56, 부산 : 부산대학교 한국민족문화연구소, 2015, pp. 383-416.
- 안병일, <미시간의 사례를 통하여 본 한국화교의 미국 이주와 정착, 그리고"미국한화(美國韓華)"정체성>, 《한국문화인류학》Vol.48No.3, 서울 : 한국문화인류학회, 2015, pp. 3-45.
- 왕언메이, <해방 70년과 한국화교의 삶- 한국화교에게 '진정한 해방'은 찾아왔는가?>, 《로컬리티의 인문학》Vol.44, 부산 : 부산대학교 한국민족문화연구소, 2015, pp. 1-1.
- 정은주, <국민과 외국인의 경계: 한국 내 화교의 시민권적 지위에 대한 성격 분석>, 《한국문화인류학》Vol.48No.1, 서울 : 한국문화인류학회, 2015, pp. 119-169.
- 이은상·정진선, <중국 중산계층의 성장과 신화교의 제주도 유입>, 《역사와 세계》Vol.49, 부산 : 효원사학회, 2016, pp. 63-95.
- 김기호, <중국과 대만 사이에서 변화하는 한국 화교의 이주민 정체성 - 서울 화교 사단 조직에 대한 사례 연구>, 《아태연구》Vol.23No.3, 서울 : 경희대학교 국제지역연구원, 2016, pp. 157-189.
- 김효선, <한국 화교의 한중 코드전환 유형과 분포- 부산 화교 3세를 중심으로>, 《어문연구》Vol.45No.2, 서울 : 한국어문교육연구회, 2017, pp. 35-59.
- 김혜미·이병철·이진경, <한국 화교의 정체성 유형에 대한 연구>, 《사회과학연구》Vol.43No.2, 서울 : 경희대학교 사회과학연구원, 2017, pp. 213-238.
- 김혜준, <시노폰 문학, 세계화문문학, 화인화문문학 - 시노폰 문학(Sinophone literature) 주장에 대한 중국 대륙 학계의 긍정과 비판>, 《중국어문논총》Vol.80, 서울 : 중국어문연구회, 2017, pp. 329-357.
- 김혜준, <시노폰 문학(Sinophone literature), 경계의 해체 또는 재획정>, 《중국현대문학》No.80, 서울 : 한국중국현대문학학회, 2017, pp. 73-105.
- 박규택, <대구화교중고등학교 학생의 이중적 언어사용과 혼종적 정체성>, 《한국지역지리학회지》Vol.23No.2, 대구 : 한국지역지리학회, 2017, pp. 354-365.

추광재·최민지, <이중 언어 사용의 특성과 교육 방법에 대한 고찰 -한국 화교를 중심으로->, 《학습자중심교과교육연구》Vol.17No.6, 서울 : 학습자중심교과교육학회, 2017, pp. 83-105.

(2) 韩文以外学术论文

Shu-mei Shih, "Global Literature and the Technologies of Recognition," *PMLA : Publications of the Modern Language Association of America*, Vol.119 No.1, 2004.

GIELIS, R., "A global sense of migrant places: towards a place perspective in the study of migrant transnationalism", *GLOBAL NETWORKS* Vol.9 No.2, 2009, pp. 271-287.

Shu-mei Shih, "Theory, Asia, Sinophone," *Postcolonial Studies*, Vol.13 No.4, 2010.

衣建美, <韩华教师成天地 : 第三届世界华文作家协会—韩国地区报告>, 《中央日报》(台湾), 1998.8.3.

郭梁, <中国的华侨华人研究与学科建设—浅议“华侨华人学”>, 《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03年3月第1期, 北京 : 中国华侨华人历史研究所, 2003, pp. 1-7.

尹佑晋, <韩国釜山荣成华侨方言与中国山东荣成方言的单字音系比较研究>, 《中国言语研究》Vol.17, 首尔 : 韩国中国言语学会, 2003, pp. 545-558.

廖赤阳·王维, <“日华文学” : 一座漂泊中的孤岛>, 黄万华主编, 《多元文化语境的华文文学》, 济南 : 山东文艺出版社, 2004, pp. 67-96.

张锦忠, <跨国流动的华文文学 - 台湾文学场域里的“在台马华文学”>, 《中国现代文学》No.34, 首尔 : 韩国中国现代文学学会, 2005, pp. 27-41.

王德威, <中文写作的越界与回归—谈华语语系文学>, 《上海文学》2006年9月号, 上海 : 上海市作家协会, 2006, pp. 91-93.

尹佑晋, <山东荣成方言与釜山华侨荣成方言的声母比较>, 《中国言语研究》Vol.22, 首尔 : 韩国中国言语学会, 2006, pp. 209-238.

梁楠, <从《韩晟昊传》看韩华离散者的身份认同—以1948年后为中心>, 《韩中言语文化研究》No.23, 首尔 : 韩国中国言语文化研究会, 2010, pp. 153-172.

朱崇科, <华语语系的华语建构及其问题>, 《学术研究》第7期, 广州 : 广东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2010, pp. 146-152.

- 刘保安,〈论狄金森诗歌中的意象〉,《新乡学院学报》第24卷 第5期,新乡:新乡学院,2010, pp. 115-118。
- 杨俊蕾,〈“中心—边缘”双梦记:海外华语语系文学研究中的流散、离散叙述〉,《中国比较文学》2010年第4期,上海:上海外国语大学中国比较文学学会,2010, pp. 89-98。
- 金惠俊·梁楠,〈韩国华人华文文学初探〉,《中国语文论丛》Vol.55,首尔:中国语文研究会,2011, pp. 323-343。
- 殷梅,〈从山东方言俗语看齐鲁文化〉,《青岛科技大学学报》第27卷第3期,青岛:青岛科技大学,2011, pp. 54-57。
- 史书美,赵娟译,〈反离散:华语语系作为文化生产的场域〉,《华文文学》总第107期,汕头:汕头大学,2011, pp. 5-14。
- 王德威,〈文学地理与国族想象:台湾的鲁迅,南洋的张爱玲〉,《中国现代文学》第22期,台北:中国现代文学学会,2012, pp. 11-38。
- 蔡建鑫,〈多元面向的华语语系文学观察—关于《华语语系文学与文化》专辑〉,《中国现代文学》第22期,台北:中国现代文学学会,2012, pp. 1-9。
- 曾军,〈“华语语系学术”的生成及其问题〉,《当代作家评论》2012年第4期,沈阳:辽宁省作家协会,2012, pp. 203-205。
- 庄华兴,〈马华文学的疆界化与去疆界化:一个史的描述〉,《中国现代文学》第22期,台北:中国现代文学学会,2012, pp. 93-106。
- 梁楠,〈离散语境下韩国华人的身份认同〉,《中国现代文学》No.67,首尔:韩国中国现代文学学会,2013, pp. 165-186。
- 曾琳,〈读史书美“反离散”原文及中译文有感〉,《华文文学》2014年第2期,汕头:汕头大学,2014, pp. 40-44。
- 王德威,〈华语语系的人文视野与新加坡经验:十个关键词〉,《华文文学》第122期,汕头:汕头大学,2014, pp. 7-13。
- 朱崇科,〈再论华语语系(文学)话语〉,《扬子江评论》2014年第1期,南京:江苏省作家协会,2014, pp. 15-20。
- 梁楠·高慧琳,〈韩国华人华文文学的混种性—以1990年代出版《韩华》杂志为中心〉,《中国小说论丛》Vol.47,富川:韩国中国小说学会,2015, pp. 223-239。
- 王德威,〈华夷风起:马来西亚与华语语系文学〉,《中山人文学报》第38期,高雄:中山大学,2015, pp. 5-17。
- 赵稀方,〈从后殖民理论到华语语系文学〉,《北方论丛》总第250期,哈尔滨:哈尔滨师范大学,2015, pp. 31-35。

- 许维贤·杨明惠, <华语语系研究不只是对中国中心主义的批判: 史书美访谈录>, 《中外文学》第44卷第1期, 台北: 台湾大学外文系, 2015, pp. 173-189.
- 刘俊, <“华语语系文学”的生成、发展与批判—以史书美、王德威为中心>, 《文艺研究》第11期, 北京: 中国艺术研究院, 2015, pp. 51-60.
- 庞好农, <论萨伏依《异域》的心象叙事>, 《外国语文》第31卷 第5期, 重庆: 四川外语学院, 2015, pp. 14-19.
- 朴宰雨·于丽丽·郑有珍, <韩国华文文学: 探索四个来源与现状>, 《中国学报》Vol.73, 首尔: 韩国中国学会, 2015, pp. 333-351.
- 梁楠, <生根的流星: 论韩华诗人初安民《愁心先醉》中的跨国认同>, 《中国现代文学》No.80, 首尔: 韩国中国现代文学学会, 2017, pp. 107-131.

4. 学位论文

- 강덕지, 《한국화교의 경제에 관한 고찰》, 성균관대학교 석사학위논문, 1974.
- 신문염, 《재한 화교의 경제에 관한 연구》, 경희대학교 석사학위논문, 1974.
- 추미란, 《재한화교의 기업경영에 대한 실증적 연구》, 단국대학교 석사학위논문, 1976.
- 담영성, 《조선말기의 청국상인에 관한 연구》, 단국대학교 석사학위논문, 1977.
- 담건평, 《재한화교의 사단조직에 대한 연구: 서울지역을 중심으로》, 서울대학교 석사학위논문, 1985.
- 주봉의, 《화교들의 문화이식 과정에 있어서의 매체이용 패턴에 관한 연구》, 서울대학교 석사학위논문, 1985.
- 도수화, 《현대 山東省 海陽縣 방언 조사: 한국 거주 화교의 발음을 중심으로》, 고려대학교 석사학위논문, 1993.
- 곽병곤, 《한중수교 이후 재한 화교사회의 변화에 관한 연구》, 고려대학교 석사학위논문, 2002.
- 김기호, 《초국가시대의 이주민 정체성—한국화교의 사례 연구》, 서울대학교 석사학위논문, 2005.
- 박수현, 《한국어-중국어 이중언어사용의 연구— 한국 화교(華僑) 언어를 중심으로》, 영남대학교 석사학위논문, 2010.
- 손유정, 《1965년 7·19사건과 한국 화교사회—《韓華春秋》를 중심으로》, 울산대학교 석사학위논문, 2014.

- 박은경, 《화교의 정착과 이동 : 한국의 경우》, 이화여자대학교 박사학위논문, 1981.
- 이옥련, 《근대 한국화교사회의 형성과 전개》, 인하대학교 박사학위논문, 2005.
- 이창호, 《한국 화교의 사회적 공간과 장소: 인천 차이나타운을 중심으로》, 한국학중앙연구원 박사학위논문, 2007.
- 이종우, 《한국 화교의 현지화에 관한 연구 : 부산 거주 화교를 中心으로》, 동아대학교 박사학위논문, 2007.
- 이진석, 《부산지역 화교의 사회연결망 변화와 사회자본화》, 동아대학교 박사학위논문, 2010.
- 성정혜, 《탈식민시대의 디아스포라와 혼종성 : 살만 루시디의 《자정의 아이들》, 《수치》, 《악마의 시》》, 이화여자대학교 박사학위논문, 2010.
- 최영, 《한국과 중국의 재외동포정책 비교연구》, 전남대학교 박사학위논문, 2011.
- 김일권, 《재한 중국인의 포섭과 배제를 통해 본 한국 다문화주의 연구 : 구 화교, 신 화교, 조선족을 중심으로》, 한국외국어대학교 박사학위논문, 2012.
- 고혜림, 《북미 화인화문문학에 나타난 디아스포라문학적 특징》, 부산대학교 박사학위논문, 2013.
- 蔡千芊, 《韩国华侨在韩社会地位的变迁》, 中国文化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16.
- 崔承现, 《韩国华侨史研究—从“上国”国民到多层认同》, 北京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2000.
- 尹佑晋, 《韩国釜山华侨的荣成方言与中国荣成本土方言的语音比较研究》, 山东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2007.
- 刘增美, 《族裔性与文学性之间—美国华裔文学批评研究》, 南京师范大学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2011.
- 弥沙, 《美国华裔文学批评的嬗变 : 族裔性、文学性、世界性》, 黑龙江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2016.

5. 参考网站

美国南加州韩华联谊会网站 : <http://www.hanhwa-la.org>

汉城华侨协会网站 <http://www.crashkc.com>

国立台湾文学馆台湾作家作品目录网站 : <http://www.nmtl.gov.tw/>

출입국·외국인정책본부사이트 : <http://www.immigration.go.kr>

교육과학기술부사이트 : <http://www.mest.go.kr>

한국화인화문문학 연구

— 한국화인의 정체성을 중심으로

양 난

부산대학교 대학원 중어중문학과

초 록(韩文摘要)

전 세계에 산재한 화인은 이미 거대한 초국가적 이주자 집단의 일부를 형성하고 있다. 이런 상황에서 학계는 기존의 패러다임에서 탈피하여 화인, 특히 한국화인의 문제를 새로이 사고하고 인식할 필요가 있다. 본고에서 다루는 한국화인(한화)이란 오랜 기간 한국에서 생활한 한족(漢族) 및 한족에 동화되었거나 혹은 문화적으로 한족 문화와 일체성을 가진 사람을 일컫는다. 그리고 이런 한국화인이 화문(華文)으로 창작한 문학 작품을 한국화인화문문학(한화화문문학)이라고 한다.

1992년 한국과 중화인민공화국의 수교를 경계로 그 이전부터 거주하던 한화와 그 이후에 새롭게 이주한 한화는 그 성격이 뚜렷하게 구분된다. 이 때문에 전자를 기존의 화로 후자를 신규한화로 구분한다. 또 기존화인 중에서 한국으로부터 다시 다른 국가/지역으로 이주한 집단은 재이주한화로 부른다. 이에 따라 기존한화, 재이주한화, 신규한화가 화문으로 창작한 문학 역시 각각 기존한화 화문문학, 재이주한화 화문문학, 신규한화 화문문학으로 구분한다. 물론 본고의 연구 대상은 이 모든 것을 합친 한화화문문학 전체이다.

현재 한국화인화문문학 연구와 관련한 석·박사 학위 논문이 전혀 없는 실정이다. 이에 필자는 상세하고 체계적으로 한화화문문학의 구체적 상황을 고찰하고자 했다. 우선 산문, 시가, 소설 및 기타 문학 장르로 나누어 한화화문문학 상황을 전반적으로 살펴보면, 각 문학 장르의 대표 작가 및 작품을 중점적으로 분석했다. 다음으로 한화화문문학의 상황에 대한 종합적인 검토에 근거하여, 다양한 각도에서 기존한화 화문학과 재이주한화 화문문학 및 신규한화 화문문학에서 드러나는 구체적인 특징을 추출해 내고, 각각의 독특성을 전제로 하면서 그 공통성을 찾아냈다. 마지막으로 한화화문문학을 통해 초국가 이주자로서 한화가 만들어 낸 새로운 형태의 문화적 정체성을 고찰했다.

초기 한화가 이주지 한국에서 처한 특별한 사회적 지위는 한화와 한국 사회 사이에 일종의 특수한 관계를 형성했다. 이로 인해 한화화문문학은 다른 지역 화인화문학과 구별되는 독특성을 가지게 되었다. 이러한 독특성은 주로 한화화문문학 중에 드러나는 '배척'이 상호작용에 의한 것이며, 한화가 느끼는 '배척'에는 일종의 특수한 문화적 상

상이 내포되어 있다는 것에서 찾아볼 수 있다. 초기한화는 청나라 정부의 비호 아래서 '대국 국민'이라는 오만한 모습으로 등장했다. 이는 한화의 한국 이주 역사가 시작되자마자 한국인으로 하여금 선망과 반감이라는 양가적인 정서를 느끼도록 만들었다. 이주자에 대한 현지 주민의 배척은 세계 각지에서 나타나는 일반적인 현상이다. 그런데 한국 사회에서 한화가 느낀 '배척'은 한화와 한국 사회 사이의 특수한 관계에 의한 것으로서, 상호 작용적이라는 특징을 가지게 되었다. 한국의 근대 시기에 이르러 한국화인이 대부분 육체노동자의 신분으로 이주하게 되자 한국 사회에서 한국화인은 다시 '야만'과 '무지'의 상징이 되었다. 기존화인에게는 낙후하고, 무지하고, 탐욕스럽고, 인색한 수전노의 이미지가 형성되면서, '짱깨'·'왕서방'이란 말이 기존한화의 대명사가 되었다.

한화의 인구수와 구성상의 독특성 및 한국 문화, 중국 대륙 문화, 타이완 문화로부터 받은 복잡다단한 영향은 한화화문문학이 다른 지역의 화인화문문학과 구별되는 독특한 특징을 나타내도록 만들었다. 이로부터 비롯된 한화문학의 독특성은 주로 한화화문문학 속에서 그것만의 혼종성으로 표현된다. 첫째, 한화화문문학 속에는 한화가 구두어(입말)에서 스스로 창조한 자신들만의 언어인 '한화중국어(韓華漢語)'가 나타난다. '한화중국어'는 한편으로는 기존한화로 하여금 언어란 념을 수 없는 장벽인 것처럼 느끼도록 만들면서 고향 사람들과의 사이를 갈라놓았고, 다른 한편으로는 기존한화의 응집력을 느끼도록 만들었다. 신규화인은 한국에 이주한 지 20여 년밖에 되지 않는다. 또 중국 대륙에서 중국어(漢語)/표준어(普通話) 교육을 충분히 받았다. 하지만 그럼에도 불구하고 신규화인의 구두어 중에도 이미 혼종 현상이 나타나고 있다. 둘째, 한화화문문학 속에는 한화가 서면어(글말)에서 이루어낸 특수한 혼종 현상이 나타난다. 이는 구체적으로 그들이 화문문학 창작을 할 때 스스로 만들어낸 바 한국어를 그대로 음역한 어휘라든가 표현 방식 및 사고 방식이라는 형태로 뒤섞여서 표출된다. 셋째, 한화화문문학 속에는 한화의 혼종적 정체성이 나타난다. 기존한화는 자신이 중국인 신분으로 한국 사회에서 살아간다고 생각한다. 하지만 자신과 중국 대륙의 중국인을 구분하고, 일시적으로 한국을 왕래하는 상인이나 관광객들과도 구분한다. 동시에 그들은 적극적으로 현지화(한국화)를 실천하고, 자신이 한국 사회의 일부가 되고자 노력하면서 한국 사회의 인정을 갈망한다. 신규한화는 한국과 중국을 오가는 이중 거주 형태를 선택하면서 모방 등의 방식으로 적극적으로 현지화를 실천하면서 이 과정에서 혼종적인 정체성을 형성하고 있다.

한화화문문학 속에 나타난 이런 혼종적 정체성은 한화가 이미 다중적인 속성을 가지고 있음을 의미한다. 이런 속성은 한데 모아놓은 조각들처럼 그렇게 쉽사리 분리할 수 있는 것이 아니다. 서로 뒤섞이고 융합되어 다시 떼어낼 수가 없는 것이다. 초국가적 이주자가 날로 증가하는 오늘날의 현실 속에서, 이런 새로운 형태의 정체성에 대해 새롭게 인식하는 것은 이미 인류 전체가 다 함께 직면한 과제가 되었다. 필자는 한화화문문학의 독특성에 대한 고찰을 통해서 화인화문문학의 특징을 더욱 온전히 이해하는데 도움이 되기를 기대한다. 한화화문문학 속에 나타난 한화중국어의 혼종성과 문화적 혼종성을 강조함으로써 중국 문학의 개념과 범주의 문제를 새롭게 사고하는 데 일정한 시사점을 줄 수 있기를 희망한다. 특히 한화화문문학 속에 나타난 혼종적 정체성을 강조함으로써 인류가 새로운 형태의 정체성에 대한 필요성을 인식하는 데 작은 힘이나마 보탬이 될 수 있기를 바란다.

感谢

笔者撰写这篇博士学位论文，前后共花费了近九年的时间，其中很重要的原因是由于研究资料的缺乏。笔者在寻找资料的过程中，几经周折，不断受挫。几近崩溃之际，韩华李溪信先生终于将收藏二十几年的韩华杂志借予笔者，以作研究之用。至今翻开李溪信先生主编的韩华杂志，都可以清晰地忆起，在笔者二十余次的登门拜望之后，李先生与笔者促膝长谈的情景；李先生给笔者讲述的那些创办韩华杂志的艰难往事，也仍然记忆犹新。李溪信先生提供的珍贵资料，使笔者的韩华华文文学研究真正走上了正轨。另外，如果没有再迁美国韩华崔仁茂先生的热心帮助，恐怕笔者很难如此顺利地将韩华华文文学研究扩展到再迁美国韩华领域。至今难忘笔者在没有联络电话，也没有电邮的情况下，仅凭一个地址，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远赴美国加州拜望素昧平生的崔仁茂先生时，崔先生夫妇热情接待笔者的情景；至今难忘崔先生夫妇招待笔者的那碗热腾腾的中国水饺，和饺子旁的那盘韩国泡菜。原本打算以本论文来报答两位先生对笔者的巨大帮助，但两位先生却故人已去，留下的只有笔者永远的遗憾！

笔者之所以可以找到这些线索，与三位韩华教授是分不开的，他们分别是檀国大学的许庚寅教授、高丽大学的衣建美教授和梁山大学的于德豪教授(现已离职)。三位教授在笔者参加韩华学会活动期间，得知笔者的研究方向后，多次为笔者提供重要线索与资料。因为得到三位教授的帮助，笔者少走了不少弯路，能与三位教授相识，实属笔者大幸。也许是笔者的努力终得上天眷顾，致使笔者的幸运还不止于此。继而，笔者又得到了韩华杂志编辑兼作者柳耀广先生和鞠柏岭先生的大力帮助。柳耀广先生非常关注笔者的研究进展，为了帮助笔者的研究，除了给笔者提供重要资料之外，甚至将自己的日记慷慨交予笔者，以作参考之用，令笔者深为感动。鞠柏岭先生不仅为笔者提供了非常具有研究价值的资料，并且还多次将其他重要资料邮寄给笔者，使笔者的研究获得了向更加深度发展的机会。两位先生的帮助，笔者终生难忘！

在笔者收集研究资料的过程中，为笔者提供重要线索的，还有台湾国立东华大学的须文蔚教授，在须文蔚教授热心与无私的帮助下，笔者有幸联系到再迁台湾韩华诗人初安民。2013年末初安民先生与笔者在台北的一家咖啡厅里，伴着窗外的雨声，长达几个小时的谈话情景，笔者直到现在仍然历历在目。须文蔚教授与初安民先生对笔者的帮助，笔者也将牢记终生！

除此之外，笔者也感谢在治学道路上，始终一贯关心与鼓励笔者的庆星大学的同事！感谢釜山大学现代中国文化研究室(现文室)的全体成员！现文室举办的每一次学术研讨会上，

成员之间的唇枪舌战，都使笔者在学术研究上受益匪浅。我们一起一路走来，并将继续一起一路走下去！

笔者还要诚挚感谢在治学道路上，指引笔者不断挑战学术高峰的几位教授。

首先诚挚感谢东国大学的金荣哲教授、釜山外国语大学的朴珉秀教授、灵山大学的钱锦教授，不顾教研工作的繁忙，欣然接受审查笔者博士论文的请求。在整个论文审查过程中，笔者如坐春风，各位教授精益求精的工作作风，诲人不倦的高尚师德令笔者钦佩不已！

其次衷心感谢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李晓虹教授，也是笔者的共同指导教授。作为笔者博士论文的远程审查委员，李晓虹教授不辞辛苦地将笔者冗长的论文审读几次，每次都通过长达几个小时的国际电话，将审读意见耐心详细地传达给笔者。李晓虹教授不仅从论文的结构布局、观点表述、字词表达的准确性等多方面提出了许多宝贵意见，还为笔者提供了丰富的中国大陆近现代文学研究的背景资料，使笔者能够以更加开阔的视野，针对研究课题进行更加深入的思考。李晓虹教授的悉心指导，使笔者受益终身！

当然笔者最大的幸运，就是有幸遇到博士导师金惠俊教授。金惠俊教授总是站在学术最前沿，始终教导学生进行学术研究要保持开阔的视野，指导学生将人类学、社会学等领域的知识，引入到文学的研究中来，并且一贯强调自身经验在研究中的重要性。导师的谆谆教诲，使笔者获得了巨大的学术灵感。因此，笔者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视野，没有仅局限于中国大陆，而是放眼全世界，关注全世界范围内的跨国移居者群体。再结合笔者自身的跨国移居经验，从学术的角度，关注移居韩国的华人群体，使笔者有机会完成这篇，在此领域具有世界首创意义的博士论文。并且，本论文虽属首创，但在金惠俊教授的指导下，超越了文学资料的梳理水准，使韩国华人华文文学研究上升到更高层次的理论高度。笔者今天的成绩，无不凝聚着金惠俊教授的智慧与心血。师恩如山，笔者将永志不忘！

此文献给笔者亲爱的家人

梁楠

2018.07.18